风流与风骨

——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

FENGLIU YU FENGGU

XIANDANGDAI ZHISHI FENZI QIREN QIWEN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

◎诗名应共宦名清

◎梅汝璈：『中国还得争气才行！』

◎王元化笔下的胡适之

◎季羡林留德日记中的储安平

◎一九四九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长沟流月去无声——旧年《大公报》人命运感怀

◎韦君宜的思痛录：编辑的忏悔与价值守护

张国功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21

风流与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与风骨 / 张国功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5.12
ISBN 978-7-5568-1415-2

Ⅰ. ①风… Ⅱ. ①张…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6279号

风流与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 张国功/著

出 版 人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李一意
书籍设计	梅家强 曾 静 刘 展 先锋設計 PIONEER DESIGN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8-1415-2
定 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5—875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791-86512056）

序 PREFACE

有机会把自己写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字整理出一个集子，对我这样喜欢随意读书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快意之至的事情。

文中涉及的人物，按时间，包括现当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民国知识分子与共和国知识分子；按身份，我大体将其分上下两辑：文人与学者，报人与出版人。现当代知识分子往往角色多元，不能绝对地分得那么清晰单一。我想如果一个人在专业“安身”之外，还有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就应该算是知识分子，这个不必多说。倒是说到民国 / 现代与共和国 / 当代，让我想起自己近年读书心路的些许变化，值得一说。

读书的风习多少是会带有代际特征的。对民国欲罢不能的喜欢，也许是我这一代“70 后”读书人的一种宿命。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此前所谓文化热与新启蒙风流云散，身边的同龄朋友一时间几乎都在读民国——说不清是殊途同归，还是跟风赶潮。其实如何看待似近却远的民国，特别考量着我们的眼光与定力，更考量着我们内心的人文态度。2011 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册《长沟流月去无声——重温民国人和事》。在序中我曾经写道：“对于民国，我的基本判断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重新接续的大时代。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者国民，对于国家以往的历史要保持温情的记忆，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真实历史的前提。我以为，对民国的历史，我们应该抱持这种态度。从政治上讲，民国是短暂的、纷扰的、混乱的、下行的、未完成的，但从思想自由、精神生活与国民创造力上讲，它是丰富的、多元的、活泼的、生气淋漓的。三十年间，这个国家基本上奠定了一个现代国家、一种现代文明制度设计的大致框架，确立了追求现代化的方向。这很不容易。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既承袭了传统士大夫身上的风骨，也在现代教育中学会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对常识的呵护、对理性的尊重，有着远比我们今天更多的丰富性与成熟度，因此格外让我们今天为之神往。”这大体代表了我对民国人与事的看法。就在这一年，我离开自己服务了十五年之久的出版业，回到母校做了一名大学老师。尽管大体仍是做着读书人分内的事，

但我对于今天的大学，委实有些陌生了。等到稍稍勉力适应过来，却发现自己的心境变化了不少。比如对于民国与共和国，与此前敏感于两者之间的“断裂”相比，近年似乎多少领悟到其间也未尝没有接续之处。再比如，今天常常被简单批判的共和国情境下的知识分子如周扬、丁玲、韦君宜们，我们何尝又真正懂得他们人生的复杂、厚重与担当呢？还有，人过四十，我已经不太在意今天的“民国热”究竟是不自觉的美化还是平实的追忆了。从为人作嫁的编辑到教书育人的老师，稍微多了些阅历后，我发现在今天，出版也好，教育也罢，两者有着太多相通的问题。对社会徒劳的批判与袖手旁观的感叹，毫无益处。虽不敢说途远而日暮，但人生实易蹉跎，我越来越认同民国张元济、胡适、蔡元培们所奉行的沉潜做功、契性建设与对社会负责任的卓荦识见，还有他们表面温和而内心却从不苟且的人生态度、光风霁月的人格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坚持，相信功不唐捐，这是在欲说还休的当下我们最需要汲取的民国精神。张元济与胡适分别是我最为敬服的出版人与学者、教育家。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他们那种人生境界了。但有时静默想想，自己曾经像他们一样做过出版，再有机会从事教育，加上年轻时曾经参与的一段新闻工作，读书人能做的事，大体也就是这些了吧。感恩之中，我又常常勉励自己，何尝不应该像温润如玉的民国知识分子那样，多一点尽心尽力的做功呢！

给这本随笔取名为《风流与风骨》，多少代表了自己对现当代知识分子人生境界的神往。士为国魂，斯文在兹。一个时代“时风众势”的移人之力，我相信最突出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为文为人之中。希望这册小书的出版，既给自己过往的读书生活留一份纪念，也借以寄托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

人生充满缘分与意外。无数次地出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却没有想过有机会在这里出版一本自己的东西。对于以张秋林社长为代表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同人的敬业与专业，我这个曾经的出版人经常感与惭并。谢谢并祝福他们。

作者 2015年11月

上辑　学者与文人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3
《巨流河》中的好老师朱光潜先生 /12
诗名应共宦名清 /19
世间已无叶公超 /29
吴宓与顾颉刚的身份尊严 /38
梅汝璈：“中国还得争气才行！”/41
何兆武：那个时代的书生为什么还有幸福感？ /58
胡适·王淦昌·许良英 /63
王元化笔下的胡适之 /68
于光远先生们的“一二·九”情结 /76
季羡林留德日记中的储安平 /103
季羡林：亦真亦假的追忆 /114
李长之的六十九岁 /119
学人乎？文人乎？ /123
夜读鲁迅札记三题 /128

旧时王谢早无家——熊式一们的生命骊歌与文化乡愁 /145
“两个丁玲”的冲突 /158
周扬与丁玲：欲说“左”右好困惑 /164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历史 /170
廖沫沙的打油诗：艰心出涩语　滑稽亦自伟 /174
同人群体·历史温情·常识理性 /181
无刺的马烽与多刺的时代 /191
王得后先生的“乡愁”与隐痛 /206

下辑　报人与出版人

张元济与胡适：有所不为方有所为 /215
书卷之外的张元济 /228
1949 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240
长沟流月去无声——旧年《大公报》人命运感怀 /254

《大公报》与燕京大学：民间报馆与教会大学的思想关联 /260
自由之身与自由主义的一种底线——漫说几位旧年的知识分子 /269
周海婴与王芝琛回忆父亲：豁显历史的真实 /279
舒新城：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288
韦君宜的思痛录：编辑的忏悔与价值守护 /294
从萧也牧到吴小武 /299
为他人作嫁衣者的“寿衣”与“小背心” /305
朱正：序跋文字的风骨 /310
“全集”古难全 /318
著作署名关义利 /323
且以后注改前误 /326
许觉民：更能消几番风雨 /331
曾彦修的良知与施燕平的软弱 /335
巢峰：出版家的思想家底色 /341

上辑 学者与文人

SHANGJI XUEZHE YU WENREN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



岱峻《发现李庄》

喜欢翻阅现当代学人自述、回忆录一类史料的有心人，常常会邂逅“李庄”这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字眼。这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东小镇，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使得她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1940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在这个小小边镇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里，在杜鹃声声的山坳深处，集聚了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重要的学术机构。傅斯年、董作宾、陶孟和、李方桂、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永、童第周、岑仲勉、郭宝钧、凌纯声、芮逸夫、曾昭燏、吴定良、劳干等一大批在当时就已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都曾经在小镇上经历过一段难忘的战时学术生涯。而当年在这个小镇上经受



李庄

战火淬砺的后起之秀，如周一良、梁方仲、巫宝三、汤象龙、屈万里、罗尔纲、夏鼐、马学良、何兹全、高去寻、王崇武、丁声树、全汉昇、李光涛、严耕望、任继愈、周法高、董同龢、王世襄、王利器、傅乐焕、李霖灿、逯钦立、张政烺、陈槃、周祖谟、石璋如、胡厚宣、罗哲文、杨志玖、刘致平等先生，数十年后大多成了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史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至于自然科学界，在李庄时期的同济学生中，走出了吴旻、唐有祺等十余位两院院士。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都有李庄同济人的身影。一部民国学术史，李庄可谓是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章节。在国家板荡、风雨苍黄的1940年代，小小的李庄到底为中国的读书种子提供了什么样的温情呵护？而一代学人又如何在这里坚持着他们韧性的学术担当与深沉的人文理想？岱峻先生在其《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一书中，通过文献钩沉与田野调查的“两重考证法”，为我们勾勒出了战乱岁月里中华文心学脉天行以健、弦歌不辍的一段历史，也为知识界后来者树立起了一道景行行止的精神标杆与人格参照。

如果说要用一个字眼来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年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之所以加上了“旧年”的限定语，是因为对比今昔，我们很难确定，今天的知识界是否还有像当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籍在舟车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暂栖他乡的乡思旅愁、时有发生的匪盗意外，连个人生活最低条件的衣食温饱，在李庄都成了莫大问题。至于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无疑更增添了生活的疾苦。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贫病的生活，宛如李庄时期砥砺读书人的一道试金石。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史语所的当家人傅斯年自诉：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这位一向对军阀政客睥睨笑傲的谔谔之士，

此时竟不得不向当地的保安司令写信求助，不惜打躬作揖："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我辈豆腐先生——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他还自我解嘲地说起上一次陪宴，因为难得的狂吃，致使腹泻一周。李庄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及梁思永一家人贫病交加，困顿至极。傅斯年在1942年4月18日写信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祈其向陈布雷、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至今读来令人动容。他说，梁家家道清寒，如今万里跋涉，"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政府应当给予梁氏兄弟补助，理由有三：其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有功于民国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家风不同"。其二，梁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夫人林徽因，亦今世之才女学士。其三，梁思永为安阳发掘之主力，"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傅还特意说明："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与傅终生谊兼师友的胡适曾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一口气用十余个"最"字对傅加以推许："孟真（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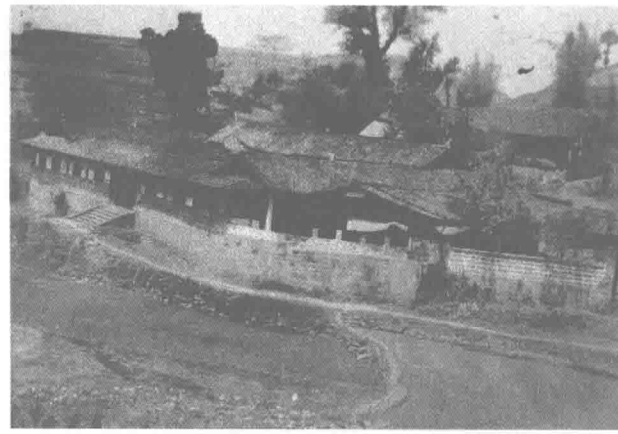


病榻上的林徽因

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一事，有力地印证了胡的这些评价。而林徽因知道傅的侠义之行后，“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她感激涕零地回信：“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这就是风雨同舟共渡危艰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当时的傅斯年，自身生活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河，最困难时每餐仅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甚至连稀饭都接不上，嗜书如命的他也只好卖书度日。

时穷节乃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如出版家王云五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口号，以复兴被战火创伤的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情境中发挥了极大的精神砥砺作用。而对于蛰处李庄的学人群体来说，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更增加了他们问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定力。在看似与时局毫无关系的学问生涯中，他们信奉“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环境之清苦，并没有使这

一群读书人放弃本分的责任，他们仍然抱持着视学术为生命的人生追求。梁思成“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却做出了与国外权威学者不谋而合的胚胎学实验。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里，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按他弟子的说法是“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其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殷历谱》，就是在戏楼的一张大门板上写成的。董同龢在农家的神龛上研究汉语音韵，其《上古音韵表稿》及《汉语音韵学》挑战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从昆明来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紧时间，开始重写因躲防空警报而丢失的《知识论》书稿。凌纯声、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学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撒尼倮倮语语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撑着硬脊梁，赶写着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战争与疾病夺去了李济两位可爱的女儿，但他仍没有搁下手头的殷墟考古整理与研究工作。夏鼐不畏故里沦陷、经费困窘等困难，完成西北科学考察。李光涛、王崇武与劳干开始整理明清内阁档案与居延汉简，《明实录》《居延汉简考释》是当时的重要成果。“东巴文化之父”李灿霖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陶孟和组织社会所的同人进行战时经济研究……偏僻的小镇上，“大家都安静地读书各不相扰。我荒疏了好几年，更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黎明即起，早饭后即去研究室。……每天读书抄材料。”（何兹全语）“大家平常欢聚，如一家人，若为一个小问题而互相争辩，必会面红耳赤，争个不休，最后推出一个‘真理’双方同意，才能停战。”（董



1942 年的李庄栗峰书院

作宾语）静虚的边远环境里，依旧流溢着深沉的学术热情与不绝的民族精神。处此国家板荡、民生凋敝之时世，虽说学者从政一度成为民国的潮流，但坐冷板凳专心问学仍是李庄知识分子的首选。中研院拟设民族学研究所，拟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执掌。闲云野鹤的李先生一向信奉“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对朋友傅斯年的敦请，他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听后立即对李躬身作揖：“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李对学问的专笃和傅对学人的理解，都令人肃然起敬。政府延揽熟悉民族文化和边政事务的知识分子，拟任命凌纯声为新疆省党部执委。朱家骅屡次来电敦促，蒋介石亦拟接见，而正忙于苗族调查的凌坚不为动，对朱“一切手续均已办妥，且总裁召见，何能中止，则损失弟个人信用”的通牒，凌不惜提出“引咎恳辞本职，以谢我公”，不惧权贵。他们抱着挽斯文于不坠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书案上焚膏继晷，播火传薪；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尽着一介知识分子的本分责职。

这种韧性的个人坚持，汇聚成中国知识界坚毅的力量。季富政先生在《一位伟大爱国者的情怀——四川民居研究的开拓与奠基者刘致平》中说：“一个学术团体，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另一个战场展开民族精神与文化博大精深的砥砺，如战士搏杀，废寝忘食，日夜兼程，拼命磨砺民族精神之剑，其闪闪寒光令侵略者胆战心惊。正是这批中华民族的脊梁以炎黄子孙的孝道、民族的责任与道义，用自己的专业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去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辉煌历程以及她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这是刺向侵略者灵魂深处最犀利的锋芒，是最动摇侵略者精神堡垒的重锤……漫漫长夜，孤单人影，寝食草草，路途艰危，如果没有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对民族文化海



1942 年 5 月国立同济大学在李庄举行三十五周年校庆（图为校运动会）

一般的眷恋深情，是不可能产生这钢铁般意志的研究行为的……”李庄时期知识分子的卓越表现，赢得了他人的敬重。1941 年，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到李庄做客，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梁氏一家艰难困厄中献身学术的热情，他由衷地赞叹：“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强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

“人文荟，歌壮烈。绩弦诵，声未绝。念李庄父老，萍水扶协。”知识界勇于为学术献身，为民族文化之命运担当；另一端的普通民众，也对知识界表现出惯有的尊重与礼遇。重教化、讲斯文的民间传统，使得当“中原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古镇李庄却在长江边为读书人热情地铺就了另一张素朴却不失温情的书案。“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李庄供给。”一纸求贤若渴、热情相邀的电文，流溢出小镇对“下江人”知识群体的信任与尊崇。中央学术机构迁至李庄的一个重要纽带，是以罗南陔为代表的当地开明乡绅。乡绅这个阶层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联系作用。更有意思的是，逯钦立、李光涛等年轻学人，因为时机与缘分，还成了李庄的“姑爷”。中国大地的广袤民间，永远像一处温情无限的林地，总能在艰难时世中为犹如惊弓之鸟的文化人撑起一方祥和的浓荫。

在几十年后，时为北大教授的周祖谟先生到南京史语所旧址寻访。陪同的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问道：“当年史语所的年轻人后来有没有没有太大成就的？”周回答说：“没有。”鲁问：“为什么？”周说：“进来时都是精

选过的。”傅斯年办史语所舍弃“浮华得名之士”，他相信，天下之大，总有真正的读书种子——即使是战乱时期。民国学术之所以呈现出“乱世中的辉煌”，除了归功于大批曾游学欧美、“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学术中坚，战时对年轻学人的遴选与培养，也值得今天的教育界深思。刚毕业的严耕望抱着“天真的做法”，冒昧给傅斯年寄去三篇论文，一个月后傅就将其聘为助理员；李光涛则是史语所招聘的书记员；王利器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考试，因避敌机轰炸一场也未考完，傅斯年告诉他“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并征询他愿去昆明还是李庄；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发现学生陈槃的一篇作业颇有新意，就邀其面谈且鼓励有加，在陈遭人诬告入狱后还设法将其救出，聘到史语所；董同龢与周祖谟同时参加史语所考试，原定只取一人，因为成绩突出，两人同时被破格录取；胡适将与自己相处数年的罗尔纲推荐进社会学研究所；罗哲文是梁思成为营造学社招募的练习生……战争年代，一切脱离常轨，但社会仍然没有断绝为读书种子提供的可贵机会与出路，没有关上促其成才的大门，这或许就是烽火时代也不失有情的一个侧面。当代学人谢泳在谈到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学术发展时，有一段平和而精当的论述：“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意外情况呢？我以为从大的方面说，要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完全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的。”（《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这并不完全是后来者对历史想象性的概括，其实当时的知识界对自己所经历的岁月就有过类似的评价，并自觉地以这种精神来惕厉自我。如哲学家贺麟1946年在昆明为自己的名



岱峻《消失的学术城》

作《文化与人生》作序时就说："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内，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内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与珍视。"应该说，李庄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充分承当、体现并弘扬出了这种现代学术品格与高昂的精神状态。可惜的是，因为此后国共战争的影响以及政治的鼎革，天地玄黄之间，随着史语所迁往台湾、营造学社被裁并入清华、社会学所旋即被改为经济所而取消社会学科、同济遭解体而独自保留工科，大批以欧美模式为主要参照的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与团体遭遇大面积挫折，数代人所致力的"学术社会"逐渐伤筋动骨、水流花谢，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斯文终于扫地。即使在战争年代也坚持不懈、历困厄而弥新的现代学术精神，竟在此后一度成为绝响，以至于需要后来者自八十年代起重新发掘接续，这是不能不令人叹息再三的。而从李庄走出的学人们，不少人离开大陆；即使留下的，也多在极左思潮中饱受政治折磨。曾经一度为中国现代学术充当过"保姆"与"奶娘"的小镇李庄，自然也被淡忘在岁月的尘封之中，直到有心人去重新"发现"，并由衷地为之而感动。

2004 年 9 月 20 日

《巨流河》中的好老师朱光潜先生

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三联书店，2012），是近年来一本读书圈内交相传颂的好书。除了出色的文笔与叙事，“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王德威语）的家国情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沧桑苦难，让读者读来无不动容深思。或许因为自己对富有特色的民国教育的特别关注，加上刚刚转行成了一名大学教师，我尤其留意抗战时期将齐邦媛塑造成了“这一个”的教育背景。真正注重人文熏陶、培育健全人格而不仅仅是知识灌输，是民国教育突出的特点，也是齐邦媛们一代青年即使在非常年代仍然成为有用之才的时代地气。而一个时代的整体人文教育生态，端赖一位位民众寻常所说的好老师来践行、来培育。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就是那个时代的好老师的突出代表，让齐邦媛念怀终生。



齐邦媛《巨流河》

说朱光潜先生是位好老师，首先在于他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并努力帮

助、促成学生的改变。1943 年，齐邦媛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放榜后不久，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来信说，南开看她的英语分数高，欢迎前往。但她当时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决心攻读哲学系。大一期末，齐邦媛的英语统考全校第一。第二天她突然接到教务处一份毛笔写的通知，让她去见教务长朱光潜。朱先生当时已经名满天下，齐邦媛不明白为什么会召见她这个普通学生。见面后，朱先生问她为什么不转外文系。齐说自己不是没考上，而是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武大的外文系；父母，则希望自己上中文系。朱又问她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哪些哲学书。听齐回答完，最后他对齐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经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暑假里经过仔细考虑，齐邦媛转入了外文系。事实也证明了朱光潜的眼光。此后，齐邦媛在台湾的外国文学教育与翻译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对台湾与西方世界的文学译介交流工作贡献甚巨。我们经常从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何兆武的《上学记》等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一辈学者的回忆录中，见出民国一代学生随兴趣转学之容易。那个年代教育制度之弹性、人性化、自由色彩固然是一回事，但在好的教育制度下让学生真正受益，还需要有人文教育理念的教育家来落实。仿佛需要雕琢成型的璞玉，年轻学子毕竟仍有其盲目与懵懂之处，需要朱光潜先生这样善于因材施教的老师来慧眼发现、负责任地指点。

课堂是师生最重要的交集，老师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上课。在武大外文系，朱光潜教二年级的英诗课。这成了齐邦媛们开学最企盼的事情。朱先生

上课，有自己的创意，讲究循序渐进。他从英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中选取诗歌作材料，但并不按固有的编年顺序讲授，而是按自己的理解来调整。第一个学期，他教提高文学品位的诗，“教我们什么是好诗”，如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第二学期，则教知性特色明显的诗歌，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谈短暂与永恒的意义。两个阶段循序渐进，让学生能根据自己的知识修养、心智进展逐步提升。对某一诗人，朱先生也注重让学生循序渐进地理解其不同风格的复杂性。当时的齐邦媛正与已经参加空军的青年张大飞热恋，无时不惦念战乱中恋人的安危。她剖析自己青春苦闷心情的最高共鸣，是雪莱《哀歌》首句“O World! O Life! 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朱先生说这不算太好的诗，但有雪莱本色。对于熟悉的《西风颂》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朱先生则说，自有白话文学以来，这已经引用到了令人厌倦的浮泛地步。而实际上，雪莱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全诗七十行必须一气读完，“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齐邦媛回忆，平时朱先生讲课表情严肃，手势很少，但讲到《西风颂》，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我们用 the mind's eye 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战事失利，重庆有可能失守的消息传来，学生惶恐不安，而朱先生上课时对艰难处境表面上一字不提，却在讲解济慈的《夜莺颂》时间接地表现出时局影响下的文学理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Romanticism 不是简单的“浪漫”。济慈历经包括父母、弟弟病逝等困境，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诗人坐在花果树丛，'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等到齐邦媛历经人世变迁，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她深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亦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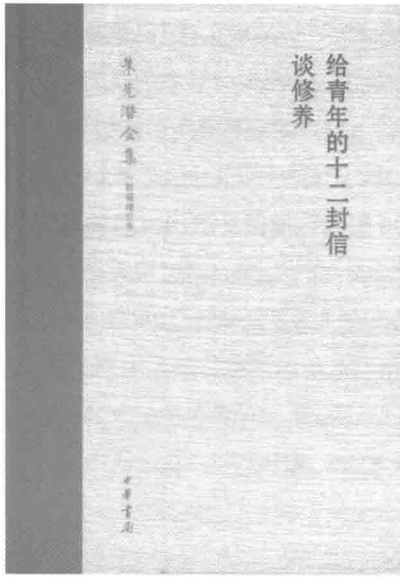
诗教首在背诵。像传统私塾一样，朱光潜先生要求学生将要学的英诗全都背诵。英诗班上不到二十人，背书无人能逃。但每首诗由生变熟，加上老师几句指引，齐邦媛由衷地说："确能得其真意。"她一直记得1945年2月极冷的早上，同学从宿舍出来，足履西南大地的薄冰，手捧手抄英诗课本，边背诵边去上课的情景。在西南三江汇流之地，她背诵济慈《无情的妖女》中的"在幽暗里，死亡勇士的瘪嘴 / 大张着，预告着灾祸；/ 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 / 躺在这冰冷的山坡"，竟因它的阴森感觉而匆匆跑回宿舍。既长又难且迷人的《圣亚格尼节的前夕》，诗句伴随着她青春迸发的诗思，"与那样的季节那样的天地融合成一种永远不能淡然处之的人生情怀"。

在讲授英诗时，朱光潜先生讲究会通中西，善于以中国诗词中的意境作比较参照。这种比较，当然以他中西贯通的修养作为前提。众所周知，朱先生是位大翻译家，但与亦步亦趋地拘泥于"信"的直译不同，他在翻译时追求用另一国语文和原著"那情感思想融成一个新的作品"（《谈翻译》）。比如，他曾以中文格律诗的体式翻译上面提到的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之一："幽人在空谷，结居傍明泉。知音世所稀，孤芳谁见怜？ / 贞静如幽兰，傍石隐苔藓。皎洁若晨星，孑然耀中天。/ 存在为世知，殁不为世惜？

幽明已殊途，予怀独戚戚。”这种感觉，可以看出他浸淫其中而又化之的功力。在英诗课上，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人的独子外出谋生，七年无音讯，她每夜隔着沼泽呼唤儿子：“Where art thou,my beloved son”，逢人便问有无人遇见自己的儿子。朱先生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Chain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时，他告诉学生，这与中国古诗“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相似。这时他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他取下眼镜，突然合上书，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齐邦媛感叹说：“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最高境界的读书，当然是以自家生活做底色，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联系，才不至于读死书、死读书，成为“四脚书橱”。乱世之中，颠沛流离的个人经历和山河沦陷的国家命运，相互激荡，往往给流亡中而又弦歌不辍的师生带来一份“万方多难此登临”的沧桑感。而这身边鲜活之人世，又与纸上沉默之歌行，互为感应，学生们自然体会深入，远非纯粹从书本到书本者可以相比。也正因为如此，朱先生的课堂，让齐邦媛们真正有气象庄严之感。她描写说，朱先生上课一进来，“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启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

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这也是一种缘分，曾在生命某个飘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倡导“人生的艺术化”的理念，将人生当作艺术品，让人生充满情趣，是朱光潜先生美学思想的核心。早在1930年代，他留学英国立意构思写作《文艺心理学》时，就追求将美学从哲学中分离，丢开一切哲学成见，而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来研究。在《悲剧心理学》中，他批判哲学美学“在抽象的形式中处理审美经验，把它从生活的整体联系中割裂出来，并通过最严格的逻辑分析把它归并为最简单的要素。问题在于把审美经验这样简化之后，就几乎不可能把它再放进生活的联系中去”。在生活中寻找审美，是朱先生一生思考的方向。这种理念，无疑也贯注到他的教育生活当中。1940年7月15日他曾在武汉大学进行关于美感教育的演讲，他说，人类知、意、情三种心理活动，事关真、善、美三种不同的价值，“人能动情感，就爱美，就欢喜创造艺术，欣赏人生自然中的美妙境界”。齐邦媛读到大三时，朱光潜邀请学生们去家中喝茶。深秋时节，朱先生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要帮老师扫枯叶。朱先生立刻阻止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到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这一年，齐邦媛正在读雪莱，印象深刻的她后来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想起济慈的《秋颂》，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感念他们对自己生命品位的启发。说到《秋颂》，齐邦媛有着一种别样的偏爱，乐于与人分享读后感：“它是温暖、认命、成熟完美的诗篇。麦子收割后的田垄，呈现季节的自然悸动，傻蜜蜂在夏末迟凋的花间，以为夏日永无止境，而蟋蟀低唱，燕子绕空飞鸣，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谈修养》

秋已深了——达到了完成之境。”

毫无疑问，宛如旧时月色，温馨永恒，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已经成了齐邦媛记忆中一道抹不去的人文风景了。说到底，朱先生这种融会言行感染的人格教育，上接孔夫子“从游”的教育精神，下启国难时期一代学子之纯洁心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今天的学术界经常追问民国教育之谜，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仍然有大师成群结队地出现。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个人情怀；而每一个个体都不是人性的残缺废品，当然就会组合、交汇成令我们羡慕、留恋的时代底色、人文生态。只是，时移世易，在今天外表光鲜、配置豪奢的大学校园，日益为课题、论文、职称等奔走诱蚀的教师们，还有没有人会性情率真地告诉学生们，自己“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还会不会、敢不敢、能不能在学生面前由衷地流泪——悲苦而又欢愉、幸福？

2012 年 7 月 28 日

诗名应共宦名清



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据智效民先生在随笔《朱经农：诗名应共宦名清》（见《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一文中说，“诗名应共宦名清”是朱评价他的朋友、现代地质学家丁文江时所写的一句诗。但智先生未录出朱氏全诗。查找书架上的《丁文江的传记》《丁文江印象》等书，皆不见此句。估计是出自智文中提及的朱氏遗著《爱山庐诗钞》（台湾商务印书馆版）。至于其大意，如果没有妄揣，应该是替丁文江学者从政，尤其是担任淞沪总办一职而广为后人责备一事辩诬的。对丁文江这一段经历的褒贬誉毁，可以说已经是现代知识分子从政史上的一桩公案了。了解丁文江生平行事的读者，笔者想大体会感觉这句诗所评是精当到位的。智先生还说，用这句话来评价朱经



朱经农先生

农的一生，倒也恰如其分。事实上，笔者想说的是，移用这句话来评价以丁、朱两人为代表的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又何其不可，何尝不当！做学问与做人并重，文章与道德兼胜，是现代史上那一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追求与价值取向。其中明显的一点，从智效民书中屡次提及的他们对待滥用公款、贪污等苟且之事的峻洁态度，大体可以看得出一点他们的精神风貌来。

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可以说是赢得了民国知识界所有人尊敬的学者。其缘由，除了他在现代出版史上筚路蓝缕的巨大贡献，重要的一点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清风人格。1949 年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坚持自己出电报费，拒绝大会补贴的零用钱；毛泽东邀其同游天坛拍照留念，张也坚持自己掏洗相费。智效民在《张元济的人格风范》一文中对此评价说：张元济“虽是科举时代过来的人，但对于金钱的态度，却让我辈无地自容”。熟悉张元济生平的人知道，这种洁身自好，并非其一时之做法，而是他一生奉行俭朴的为人原则。他写私人信件，不用公司的信笺。除了社交信件外，他坚持用纸边或用背面空白的废纸写信、拟草稿；内部传递文件，一个信封要用好几次。他上班时遇有身体不好，则自觉不支全薪。董事会认为此点于理无据，决议不扣薪水，张则坚决不拿。此后这笔钱被用作扶助公司职工子女的教育基金。1926 年退休后，张元济为商务编校古籍十余年，却完全是尽义务，分文不取。早在 30 年代就有文章说，商务有“先公而后私、轻利而重职”（夏瑞芳语）的好风气，都是几位前辈先生养成的。从细处看，如果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先生的风范还带有传统士大夫讲究公私分明、谨守品行操守色彩的话，那么比他晚一辈、以留学欧美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则似乎更凸显出“现代性”的自觉品格。一生对张元济敬重有加的胡适，其清廉、公私分明有口皆碑。他出任驻美大使时，正是经济上较为困窘的时期，但他并未把此作为敛财的肥差。他去世后，梁实秋在纪念文章《怀念胡适先生》（见

《梁实秋怀人丛录》）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卸任大使后，知道他经济困难的孔祥熙想资助他。胡适却复信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两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丁文江、傅斯年是与胡适最为声气相投的两位朋友。胡适在《丁文江这个人》一文中这样比拟说：“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丁文江最恨贪污，按胡适的理解，“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丁文江是个责任心很重的人。为赡养父母及接济兄弟子侄这一大家庭，他宁可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而“下海”担任煤矿公司的总经理来赚钱，也不愿意假公谋私。淞沪商埠总办本是一人所共知的肥缺，但他卸任后一度生活困窘，竟至于要靠一位素非知交的人来救济。“大炮”傅斯年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等文炮轰官僚资本的代表孔宋家族，则更是现代反贪史上荡气回肠的大手笔。智效民在《傅斯年与〈大公报〉》一文中着重提到傅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发表的《政府与提倡道德》一文，今天读来仍是意味深长。傅斯年认为，政府如果对提倡道德真有兴趣，就应该在立法上引进公民契约论等近代社会的思想理念，在执法上培养服从公义、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屏弃之”，才能在提倡道德上有所成效。而当今“国难之急，民困之极”，“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令人咋舌，“不相干的事”比比皆是，“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智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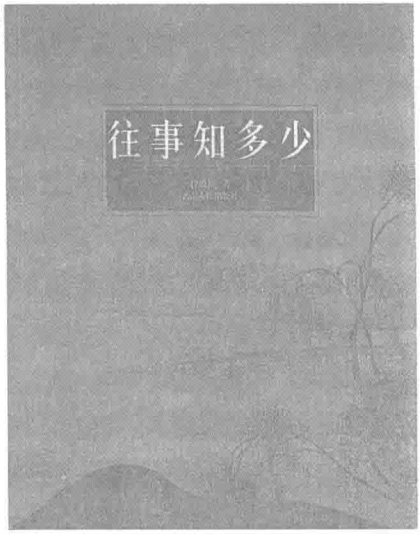
民说："我不知道所谓'不相干的事'是指什么，但如果把这几个字换成'公款吃喝嫖赌、公费出国旅游'的话，那岂不是一篇声讨当代贪官污吏的檄文？"智效民还有《亦儒亦墨亦真诚》一文记述段锡朋。这位当年五四运动中天安门大会的主席，如今大体被人遗忘了。他曾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等公职，却毫无一丝腐败习气，即使积劳成疾也坚持节省开支，只肯住三等病房，不肯过多吸氧。智先生还转述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老同学吴景超在学校循规蹈矩，后来在南京政府经济部任职，"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另一个老同学张心一在抗战时担任银行总稽核，"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梁实秋的这篇文章名叫《忆清华》，钟叔河先生所编《过去的大学》收录有此文）……确实，正如智效民在《张元济的人格风范》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非己有则一介不取、为官清正的人格取向在他们那代人中非常普遍。

前些日子重读教育家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我注意到作者作为一位出色的学者对贪污腐败问题的深刻看法。他说："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满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蒋列举了礼金、捐官、厘金等种种不正常的现象。看过清朝官员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的人，对这一点感叹尤多。但蒋梦麟认为，国民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在设法遏制政府中的贪污风气。到了抗战前夕，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以及银行、海关、邮政、铁路、盐务等部门"对公款处理的态度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判断，智效民亦是持认同态度的。笔者认为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胡适与银行家陈光甫的感觉。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载，1934 年 6 月 1 日，陈光甫对他说："现时各处建设颇有进步，人才也多有新式训练而不谋私利的人。"史学家蒋廷黻的

经历，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岳麓书社版《蒋廷黻回忆录》中，他谈到自己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湖南老家的人都知道他做了“大官”，亲戚朋友中要求差事的信像雪片飞来。蒋请在长沙的哥哥阻止他们。他请哥哥转告说，任何人他都不能帮忙，如果他们真来南京，他绝不招待他们。如果他们已到长沙，愿意回家而没有路费，则可以提供。“我认为他们要我给他们弄一份差事的念头是错误的，这完全是传统的观念。就亲戚关系说，我不帮他们忙，是欠了他们人情，但就公务员来说，我不能把公职作为礼物酬应私人。”他弟弟的小舅子到南京来讨个官职。蒋廷黻拒绝见他，背地里找个人借给他回家的路费。蒋坦然地说：“从我担任公职开始，就始终没有引用过私人。亲戚们均深悉此情，没有任何亲戚凭借我的力量获得官职。……因为我没有私心和家庭关系牵累，所以我做事可以没有顾虑，援引私人结党营私是不智、不实际的。”

士为国魂，斯文在兹。看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的品行大抵可以作为衡量的底线。现代知识分子在反对贪污腐败、激浊扬清这一社会责任上，有其群体的自觉性。《朋友们》一书收录短文《吴晗论贪污》，介绍了吴的《论贪污》《贪污史上的一章》《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贪污史例》等剖析贪污问题的文章。吴晗说：“内政修明，虽有敌国亦不足患；内政不修，虽无外患也会灭亡。”他解释道：“内政不修的涵义极广……如政出多门，机构庞冗，横征暴敛，法令滋彰，宠佞用事，民困无告，货币紊乱，盗贼横行，水旱为灾等等都是”，然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贪污”。与所述一系列现象相比，“贪污是因，这些实例是果”。吴晗以其史家的见识说，明代“后一时期贪污成为社会风气，清廉自矢的且被斥为无能，这一风气的变化是值得今日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这与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中认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

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大家“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这一看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陈独秀的一篇反贪檄文》中，智效民认同陈独秀所呼吁的起来赶走贪污官吏，以改变“奴欺主”局面的想法。可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贪污、公款等问题上，他们都深深意识到自己的表率作用与担当责任，有着毫不含糊的勇毅态度。众所周知的是，胡适、丁文江等人都以为，社会之所以纷乱，与知识分子不肯担负政治改良的责任大有关系。如丁文江说：“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胡适则说，“好政府”的条件，第一就是要有操守，要有道德。第二才是有能力。一种是“公”，一种是“能”（南开大学的校训，即是“允公允能”）。对于提倡“好人政府”的胡适看来，民国有新气象，就是因为“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而后来之所以乱象百出，就是因为“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有着书生温和的一面，却终生提倡峻厉的“扒粪精神”。傅斯年拼着身家性命，书生拍案，揭露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包括美金公债案在内的多宗贪污大案。蒋介石为拉拢他，告诫他要信任蒋所信任的人。傅闻此义正词严地对蒋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后来谈到自己“倒孔”的动机时，他一身正气地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者也。”所谓“维持纲常”，就是发挥知识分子不断批判社会，



智效民《往事知多少》

力挽世道浇漓的当然之责任。

以胡适为首倡导的“好人主义”及大量知识分子入闱南京国民政府的行为，常被后人诟病为“出山不比在山清”，理由是他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始终飘荡着传统的“圣王精神”这一道德理想主义，梦想着做政府的“诤友”，因此谈不上真正的、纯粹的自由主义。到底是否如此以及该如何评价这一问题，可待史家来深入理论。但不管如何，这一群士子精英，毕竟在欧风美雨中接受了现代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精神的熏沐，而并不完全依恃于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为资源。从他们对待贪污、公款这一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唯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节操。蒋梦麟认为破除腐败与陋规，“补救之道在于建立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他列举了近代以来依靠西方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关税制度、邮政制度、盐务机构、治黄机构、铁道管理等，使国人得以接近了良好的现代训练，“对于如何诚实而有效地运用公款，自然养成了正确的观念和良好的态度”。他提出以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经费从无私弊”的现代大学制度为典范。而且，那一代人在清理腐败这个问题上是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的。“中国已经革除了很多积弊。行政技术正与时俱进，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达到组织健全的现代国家的水准，征收赋税和控制财政的有效办法也会渐次建

立。”吴晗说，治贪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厚禄养廉，二是严刑峻法。但这些办法只能收一时之效，不能维持于长久。要根治这种社会痼疾，“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让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收入，能够在社会上“独立存在”，再加上法律的制裁、舆论的监督和“监察机关的举劾纠弹”，这才是“治本的办法”。当代史家袁伟时先生在《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载《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中曾精当地剖析到，制度缺陷是晚清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归根到底，贪污是政府垄断一切社会资源这一传统“官本位”社会结构所与生俱来的痼疾。今天看来，现代知识分子大量投身非政府组织以保持自由之身，从狭窄逼仄的庙堂转向更为开阔的民间，努力开拓“公众空间”，引进西方现代制度……“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这些现代知识分子所带来和建构的“现代性”，本来有可能逐步瓦解贪污腐败痼疾所依存的传统制度性环境。可惜，“当时内乱外患并乘，致使功败垂成”。这就是历史的遗憾了。

还有一层令人遗憾甚至是悲哀的是，在民国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这样一个系统性腐败的社会里，自由主义群体只能坚持个人的操守，而无法保证得到所在社会的制度性外援。章清在《“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中谈及这一问题时说：“权势集团所具有的腐蚀性，即便落在以‘独立’自诩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不能避免。”章清所说，更主要指公开的议论自由无法完全保证。其实坚持清廉，又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当腐败成为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转动的润滑剂时，知识分子想有所作为，有时也仍然不得不遵守整个社会所赖以运转的“潜规则”。那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生、曾经在何廉手下做过公务员的鲲西曾在其回忆性文章《图南追忆》中说：“官场是官场，他们也不可能不适应官场的一些人际关系。……那时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农本局治下川中各县都有合作金库，有四川最好的

柑橘运来，是时必以一筐送往孔府，这是我在局内亲见的作为学者的何氏也不得不照官场上的陋习行事。当然这里远远不是什么行贿。”（《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顺便可以提及的是，与《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同时，智效民先生还出版有该书的“姊妹本”《往事知多少》。按照作者的说法，大体前者专注于写人，而后者偏重于记事。在后一书中，也同样收录有关于贪污的几篇文章，如《关于〈退想斋日记〉》《耗羡归公与雍正治贪》《反贪与防“左”》《公布一下“两会”账目如何？》等，足见对“贪污”一事的关注，在作者心中并非偶然之事。在《反贪与防“左”》一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知识界流行的贪污腐败的产生是因为“左”得不够和恣意宣扬“代价论”“腐败有理论”的观点。他说，从危害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一贪一“左”，“还真是一丘之貉”，都要从体制方面找原因。“极左分子和贪官污吏就是这样一批无耻之徒：前者煽动主义的空谈，为的是独揽大权；后者依靠空谈的主义，也是要攫取私利。”

遥忆知识分子当年，往事知多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与《往事知多少》为一批以“庚款”留学生为主的近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群像式的素描。这些人物，都是胡适的同学、同事、学生，又是胡适最好的朋友，更是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奠基人，是一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与代表，他们有着相近的人格取向与公共关怀。这种相近点，单看是他们人物个体之剪影，合而观之则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品格的灵魂之所在。长期的史料研读，使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洋务运动中去欧美留学的那些人对专制统治者具有依附性；在戊戌变法以后去日本的那些留学生又多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相比之下，以庚款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其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在人格上更有独立性，在学术上更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可以说

他们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可惜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群体很快被人遗忘，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竟成了绝唱。这就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应该说，这种结论不是作者随意的印象，而是他对那一群体及他们所处时代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不是得之于常见的以主义或理论“贴标签”，而是通过作者对历史细节、往事的大量钩沉来逐步凸显的。他们对贪污的鲜明态度与细处的立身之严，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走出书斋，“学而优则仕”，参与行政，在政府中担任官职。这体现了当代社会对知识的尊重与对专业人才的信任，从大处说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之处。自然，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知识与专业并不能必然保证他们在从事公共事务中的公正廉明，关键还在于制度的完善与健全，自律与他律缺一不可。但是，对这些人员来说，想想他们的前辈丁文江、朱经农们对“诗名应共宦名清”的高尚追求，应该是不无警醒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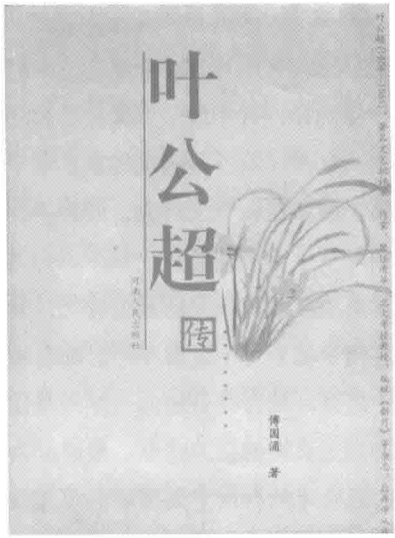
2004年7月19日

世间已无叶公超

他一生从来不写日记，但后人常常从胡适、朱自清、吴宓、浦江清、王世杰、周作人、柳无忌等知名学者的日记中窥见他活跃的影踪；他从不存留、悬挂照片，但看过他照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为那种风华俊逸、泱泱气度所倾倒——那是只有那个开阔的时代才能孕育出来的特有气质与风采；他终生服膺欧美西方文明，在美国是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最器重的学生之一，在英国与著名文论家艾略特亦师亦友，但这位“口衔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派头”的英美文学教授，一生钟情中国书画，直到晚年仍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在书画中寻觅精神寄托；如果以文字论英雄，除了不多的诗论，惜墨如金的他实在如传闻钱锺书所说，是个“太懒”的教授，但在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他作育人才，汲引提拔了包括钱锺书、杨联陞、常风、季羡林、李赋宁、卞之琳、梁遇春、吴世昌、杨绛、废名、穆旦、赵萝蕤、许国璋、曹葆华、许渊冲等诸多后来声名卓著的学人；他早年只是谈诗论文，纯粹学人本色，却因保护国宝毛公鼎而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折磨之刺激，决然离开文教界，投身于外交抗日的漩流，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文人从政的典型……他就是现代学者叶公超，“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说起来去年刚过他的百年诞辰，但这位个性鲜明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无情流逝的时光中差不多成了个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关于他的作品，以笔者寡陋的阅读视野所见，自 90 年代以来，仅有《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学

林出版社，1997）及《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两册在大陆问世；而在一本名为《新月才子》的专书中，则仅顺带在两三处提及叶公超的名字；以至于民间学人傅国涌先生撰写的《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竟然着人先鞭，成了叶氏的第一部传记。这真让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

《叶公超传》将传主明确定位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与胡适、傅斯年、储安平、梁实秋、罗隆基这些典型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热心论政，有着大量的传世文字阐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思想不同，叶公超尽管曾编辑过《新月》《学文》等重要的现代期刊，被列名为《观察》"特约撰稿人"和"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却认为这"谈不上有任何政治的作用"，早年甚至坚决反对胡适等人书生论政，反对《新月》刊载政论文字，在同人活动中相对低调，更不卷入文坛论争。在他留下的极少数文字中，多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只不过在文学批语中始终坚持文艺自由宽容的立场。比如1939年1月他在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经验》，开篇即说："的确，在文艺受统制的国家里，党国的威权也只做到了把多数成绩较好的作家排斥到国外去流浪，剩下一些糟粕在推行着奉公守法的文艺。在文艺里，独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文艺是一种自由发展的东西，一种知觉与灵感所到的艺术表现：不给它感觉的自由便没有它的存在与发展了。"鲁迅与新月派一向水火不容。1936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花了几周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了一遍，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高度赞扬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好像是感觉言犹未尽，他又接着在《北



傅国涌《叶公超传》

平晨报》文艺副刊发表长篇专论《鲁迅》，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主要的原因在于鲁迅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在鲁迅的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这种由衷的揄扬，连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看了都有点不高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灵魂人物责怪叶：“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丝毫不同意对鲁迅褊狭的看法，他坦陈：“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一派典型的文艺宽容风范与唯美主义立场。不过，叶公超之所以被后人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概与其所接受的英美教育背景及其此后所交游的以胡适为灵魂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大有关系。按照沈卫威在《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中的说法：胡适派文人多在国外受过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并以胡适个人的“超凡魅力”的吸引和凝聚作为结构形态的外在范式，以自由主义信念中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理性和秩序这六大参数为内在精神导向，立足文化/学术，并通过言论干涉政治。除了言论干政，叶公超一生的行事处世、出处行藏大体符合这种群体的精神

归趋。

回眸其一生，叶公超几乎经历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这个大时代所有的遭遇：少年经历五四运动波澜的初步洗礼；青年留学英美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回国在“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所构筑的象牙塔中优游问学、编辑刊物；日寇侵华后西迁南渡，颠沛辗转于大后方；而后“教授从政”，直至位居国民政府“外长”；最终不见容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孤岛上郁郁而逝。从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到在战火中书生从政，他“在政治舞台上空热闹一场”（卞之琳《纪念叶公超先生》文中语），直至像困兽一样在寂寞中逝去。回首叶公超的一生，总让人感觉到这宛如风雨苍黄之中传唱的一曲自由主义者的苍凉悲歌。最近看到几本书，包括杨金荣的《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范泓的《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等，都触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迁台后的遭遇。看叶公超的传记，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试图以其为个案，了解迁台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与国民党的冲突及其所导致的个人悲剧命运。1949年起叶公超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1952年的《中日和平条约》和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被台湾认为是他任上的主要“功劳”。他在1958年离任后接着“出使”美国。1961年，一纸电文将其召回台湾，他被冷淡地告知：另有安排，你不必再回美国了！而此后蒋介石竟不复召见他，并且不允许他再度返美，其“外交”生涯就此黯然终结。在最后的二十年，他虽有“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虚衔，但却是有“务”无“政”，他自嘲说是“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行政院”会议时，只他一人小便时有人随同“保护”。围困之中，他只好闲来狩猎，感而赋诗；怒而写竹，喜则绘兰，以书画自娱，了此余生。



叶公超（写字者）

他早年的学生鲲西先生在回忆性文章《叶公超与现代新诗》（载《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中说："叶的晚年看似平静和以绘画书法自娱，但总有一种沉重的挫折感。"从传记内容看，或许是因为生平史料的不易搜集，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显得过于苛简，影响了读者对叶公超晚年的"同情之理解"。书中有一节论及叶公超与蒋介石的关系，但只是寥寥百字谈及蒋将其弃而不用的原因在于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上两人之间的冲突。至于叶氏在台湾政坛上的其他重要活动及其与当局的关系，相对语焉不详。在其他专门章节中，作者谈及叶公超恃才傲物的文人脾气、率性而为的真性情在假道学充斥的官场上的格格不入；说到他对官僚虚伪至极的繁文缛节的极度蔑视，其身在需要韬光养晦的官场而仍毫不掩其文采风流，不敛藏其外语出众及外交能力强的一面，这一切使他时常犯忌。他对副手和部下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这种不拘小节的名士做派，潇洒倒是潇洒，但在宦海浮沉中的结果可想而知。早在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期间，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命发表《西藏事件宣言》，但随后"宣传部"又是电令停止。叶复电说："业已发表。""宣传部"再电："应予更正。"叶再复电："不能更正。"回台后他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蒋沉着脸说："《西藏事件宣言》发表了？""已奉委员长的命令发表了。"他坦率回答。"何以叫你更正，你不更正？"蒋严厉责问。叶直率回答："报告委员长，此事关系国家威信，是绝对不能更正的。"文人从政而不改士大夫风骨，这个当时只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小官，竟如此真言无忌。叶氏在晚年回忆性文章《病中琐忆》中哀叹："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总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但细绎之下，这些都可谓是表面的现象，说到底，这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权之间的内在冲突，或者说是有

着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意识仍停留在前现代的政权领袖之间的冲突。

在40年代末，一败涂地的蒋介石退守台湾。为了点缀政权，营造“自由中国”宽容的表象以赢得美援，国民党高调打出“自由”牌，笼络了一批多数有着英美留学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最大限度地容许了“自由中国社”的创立。这批包括胡适、王世杰、叶公超、雷震、吴国桢、孙立人等在内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一度接近了政权的核心。但他们终究是“过河棋子”，是台湾“自由开明”招牌的“样板”。随着国民党改造、情治系统整顿等措施的实施，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台湾纳入自己的防御体系，台湾风雨飘摇的局面稍有缓和，国民党建构威权体制的面目就逐渐变得有恃无恐，自由主义者与蒋家威权之间的抵牾不可避免地凸显、加剧。首先是驻外官员蒋廷黻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的活动被视为捣乱而扼制；1953年，吴国桢因议员被绑架案等而与蒋经国不可调和，愤而辞去“台湾省省长”一职远赴美国，并发表公开信揭露国民党政权一党专政、思想控制等六大特点，对国民党公开隔海发难；同年，“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因涉及“吴国桢案”触怒蒋介石而被究职查办，只得重操旧业当起了教授；1955年，有着自由派背景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被诬以“阴谋叛乱罪”而遭软禁，直到1988年才获得自由；1960年，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阵地《自由中国》杂志社遭遇剿杀，雷震入狱，其灵魂人物胡适也只能徒叹“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1968年，何浩若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上攻击胡适、蒋廷黻、叶公超、蒋梦麟、王世杰等，说他们勾结费正清，导致中国大陆之“沦陷”。“文人漫道自由笔，最是文人不自由。”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到，岁月苍茫，横逆之中的知识分子无地自由。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叶公超晚年的遭际，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群体在集权政治高压下共同遭遇的又一显例而已。1964年，美国学者费正清访问台湾，他在《对华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仍具有左

右一切、窒息一切的作用。我们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叶公超曾经当过清华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他完全凭自己的才能跻身于中华民国外交部，当了十年的外交部长，接着又任驻华盛顿的大使，但现在，由于他不愿顺着老头子的意思搞外交，结果他被羁留在台北任内阁中的不管部部长。”1977 年，费正清再度访台，此时蒋介石已不在人世，而费氏所见到的叶公超，“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美国邀请叶公超参加学术活动，蒋经国同意放行，但要求有人担保他按时回国，如此叶才得以在晚年短期赴美两次。美国的朋友要远道来看望他，叶公超说：“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他要朋友不要浪费车程。叶公超晚年的年轻朋友何怀硕感叹：“没有徐志摩、胡适之等一大群人物互相激励，又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为英雄软弱时的休养生息之所，公超老师的晚年，在寂寞中度过。”

在现代中国学者从政的群体中，叶公超、胡适之等人不乏书生情怀、才子脾气，更有着在欧风美雨中熏沐而得来的现代政治素养、行政能力与视野境界，而蒋介石所需要的，仅是与其暂渡“时艰”的“过河卒子”，肯为其卖命且驯服听话的侍臣。在蒋身边多年而深谙官场三昧的张群曾多次告诫叶公超，“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这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曾“学者从政”而后幡然醒悟重归学界的经济学家何廉，在其翔实的《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中曾几次说过：蒋介石要求部下对他的忠心和驯服，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



蒋廷黻签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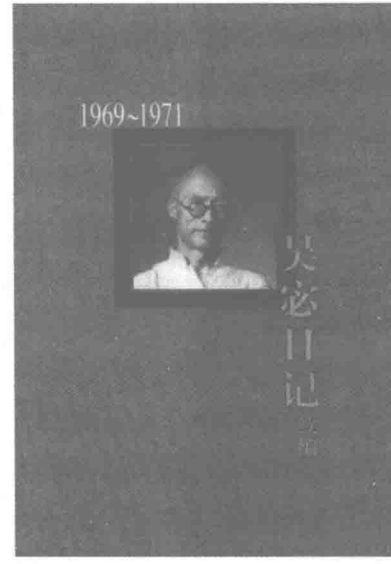
蒋介石所真正信任的，是以他当年“结金兰”为核心的CC系和讲究师生关系的黄埔系，而许多一时被奉为“座上宾”入主内阁的知识界精英，说到底算不上是他“圈子里的人”。同样的情形见诸何廉的同乡、同事蒋廷黻身上。蒋廷黻从一介书生逐步进入高层政治之中，但他曾说过自己从政的本意“倒不是我要弃学从政，实在是因为我希望会见一位伟人。在他方面，我想他只是不过是表示对学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人士对其政策的看法而已。事实上，他是正在全国设法发掘才智之士”。但蒋廷黻内心仍有着特别的感觉，他曾委婉地称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而有学者也评价说：“综观蒋廷黻的一生，无论作为大学教授、思想家或政府官员，他始终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他进入了“真正的政治竞技场”，“然而当他进入‘局内’，却发现他依然不过是个局外人”（查尔斯·R.里利《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虽然何廉与蒋廷黻所说的是三四十年代“学者从政”浪潮中的情形，但移来评价赴台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是恰当的。环境与时局稍有变易，但国民党与自由主义群体之间，则有其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不会因为时事的变化而消弭于无形。学者谢泳在《不能这样理解胡适》等文中曾认为国民政府邀请学者从政，“不能轻易说这是没有诚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可高估这种“诚意”——蒋介石固然曾经“看重”过他们，但何尝真正信任过他们！

傅国涌在《叶公超传》后记中说：“我更关心的是叶公超和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之外，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人文素养，以及渗入他们骨髓的现代文学因子。”想当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气相求，风云际会，激荡出黑暗时代里的一抹亮色。而在政治的高压下，终于如《红楼梦》所说，“呼喇喇似大厦倾”，“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对于在大变局作出渡海选择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台湾远非他们理想中的“民主国”。

叶公超早年反对文字议政，但因为抗战，因缘时会，最终书生从政，抱着民族情怀，充当起了“过河卒子”，而他却始终游离在政权之外。早在叶公超弃教从政时，学界朋友就多为此惋惜不已，“既为他一肚子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一个时代错误”（辛笛《叶公超先生十年祭》）。叶公超自己晚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殊为沉痛，以至于其好友台静农为其撰挽联道：“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他的学生王治平在叶氏九旬生辰时写诗抒怀，有感于叶氏一生悲剧道：“木铎长年酣笔墨，朝官半世瘁心坛。如痴似梦一悲剧，悲剧谁铸天下看。”这是不免令人再三叹息的。上古史专家李济先生一度问曾经与叶公超有着相同经历且同僚多年的史学家蒋廷黻：“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以他惯熟的外交辞令回答：“济之，现在是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尽管在无意间写下的薄薄一册《中国近代史大纲》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司马迁，但不顾朋友劝阻而踏上从政的不归之路，蒋廷黻似乎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并引以为豪。叶公超也曾说自己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这是他们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经世豪情、兴趣与抱负。但这个匆促局迫的时代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宽容度，他们对现代理性、秩序、民主的倾心，与外在的迫压之间存在着太大的错位与距离，这注定他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无法避免的命运悲剧。傅国涌写完传记掷笔长叹：“在经过长久的沉寂与遗忘之后，叶公超能重新回到读书人中间吗？”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世间已无叶公超。

2006 年 1 月

吴宓与顾颉刚的身份尊严



《吴宓日记》

闲时随意阅读一些中国近现代学人的传记年谱，总是让我产生像看旧年电影一样的感觉。他们那一代人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常常在浮躁无定、目迷五色的我们面前，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鉴的镜子。

近年来逐渐广为人知的吴宓先生，早年留学域外时与陈寅恪、汤用彤两才俊被誉为“哈佛三杰”，回国后在风云际会的近现代学术史、文学史上成为著名的诗人、学者、翻译家、教育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20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盛一时的中国现代学术圣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是由吴宓先生担任主任用心擘划、励精图治后达到学术顶峰的，名声卓著的“四大导师”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与王国维在那里开创了清华学派的黄金时代。此后吴宓先生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燕京大学、西南师范学



顾颉刚先生

院等地，桃李满园，培养出了如钱锺书、季羡林、王力、贺麟、曹禺、李赋宁等众多学贯中西、卓有建树的大学者。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教授之教授”，晚年的境遇却可谓是悲惨至极。“文革”中吴宓先生遭批斗致残，从四川被遣回偏远的故乡陕西泾阳，住在他年老的妹妹吴须曼家中。1978 年 1 月他含冤逝世，去世前双目失明，神志昏迷，却仍是问学不倦，期待再展当年风华之才情。他最后的话是：“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还是“文革”中的事。1966 年夏天，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的风暴开始刮起。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是首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之一，常常被押到批斗大会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按照通例，在批斗前，被屈辱地剃成了“阴阳头”等形象的被批判者出场时，台下的群众总会怒吼：“揪出某某分子某某某。”被批判者要照此大声自报家门“我是某某分子某某某”，常见的如：“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黑帮分子”……而有一次等到顾先生上台时，他却不甘屈辱反而自豪地宣称：“我是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顾颉刚。”在短暂的惊愕之后，台下洪水般的批判之声又很快将顾先生严正的抗议淹没了。

说起这样的陈年旧事，仿佛是在讲述发生于隔世前尘中的神话了。在今天，日益潇洒活络的学人们会觉得，像吴宓、顾颉刚这类旧书生严正申明自己身份的老做派，真是不合时宜迂不可及。眼下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教授、研究员多如过江之鲫，以至有人说：前些年在街上随意遇见一个就是老板，现在随意遇见一个就是教授、研究员了。教授、研究员就像印多了的钞票一样，有点通货膨胀起来，最终“泯然众人矣”。学人身份的被模糊化与边缘化当然有其社会原因，但学人群体自己不把自己的身份当回事，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缘由。学界抄袭成风，学术泡沫化倾向严重，为迎合量

化的著述指标只顾层出不穷地炮制学术垃圾而毫无学术新创，异常功利地把学术等同于获取待遇、物质条件的途径，学术规范底线大面积地崩溃……这些近年来暴露出来的令人忧叹甚至是积重难返的现象，常常让社会对学人人格的文化建设与道德担当能力丧失了信任与尊重之心，也使社会越来越看穿整个学界的“把戏”而有理由一改往日的神圣感并且学会了对其嗤之以鼻。在今天，恐怕没有人会像吴宓、顾颉刚先生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教授、一级研究员了。甚至当学人的身份和学术遭到某种形式的嘲谑或贬低时，今天的学人们也常常无法为自己的尊严说出些有力的辩护与抗议。像吴宓、顾颉刚先生那样底气十足地在乎自己身份的尊严，是要知识分子个人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洁身自好、律己自重作为前提和力量支撑的。

记得西方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最好的事物即，A 即是 A。”这话无疑是哲学味太重了些，但意思我们大体都明白。中国古代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正名”的传统。事情就是这样：当一个群体自己对自己的身份毫不在乎时，她的尊严也就可有可无了，怪不得社会的。这话说起来简单，但要做到这一点、达到这个境界，实在不容易。

2007 年 7 月

梅汝璈："中国还得争气才行！"

近年学界对日记的史料价值日益看重，最典型的表达即如谢泳先生所概括的："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基于这种认识，大量的日记尤其是近现代人物的日记得以顺利发掘、出版，可谓形成了一个小高潮。从当前的情况看，日记出版所需要注意的，不在于"锦上添花"地将已经问世的日记一而再、再而三地"升级"重复出版（除非是补遗），而在于"雪中送炭"地将一些仍受冷落的日记"捡漏"出版，这才是嘉惠士林、功德无量的好事情。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1946年至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现代法学家梅汝璈先生的日记，就是这样一册"捡漏"之作。像许多经过后人整理的日记一样，梅氏日记被整理者冠以《东京大审判——远东



《梅汝璈日记》

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这样一目了然的概括性书名；也像许多历经劫难、难存全璧的日记一样，这本日记只存留有从梅汝璈先生 1946 年 3 月 20 日抵达东京到开庭后的 5 月 13 日短短五十多天的文字记录，中间还有数日或残或缺。不能全景式反映东京大审判这一历史大事件，固然令人备感遗憾，但窥一斑知全豹，作为历史的全息性“切片”，这一文本仍然有着我们无法轻忽的历史价值。透过这薄薄五万余字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窥见作为一名代表正义与胜利的国家的大法官，一名法律理性与民族情感交织于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世界欢呼胜利而国事日趋蜩螗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心情。日记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除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成为“未来的灾祸”的戒惧之心，就是“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这一时常涌起的喟叹和“中国还得争气才行！”的急切吁请。咀嚼前者，其现实意义固然重要；但深入读解后者，亦有着我们今天重读梅汝璈日记时不应忽略的历史理性。

一

在从上海飞赴东京的途中，作为一个胜利国的代表，梅汝璈有着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日记开头就写道：今天的天气特别好，起身推窗一望，只看见一片蔚蓝天色，衬着一个红亮亮的太阳。二十多天连绵不断的淫雨停了，“这是最近三星期以来未曾有的景象。碧蓝天色日东升，大有仲春气象，和昨日阴雾重重的情景大不相同。事虽出于偶然，它却使我内心中觉着十分愉快，格外兴奋”。他与旅途中邂逅却对他尊敬有加的美国军官麦克乐谈笑风生，而对于同机的两个日本人，感觉他们“表现很卑怯和蔼，很想和我接近的样子”。以胜利者的姿态初次踏上八年来浴血抗战的敌人的本土，感想自

然很多。按理，梅汝璈应该有一种胜利者的自豪和惬意。确实如此，到达日本的第三天，他甚至抱着一种清闲的心情坐在洒满阳光的阳台上安静读书。“今天这样安静的环境，这样清闲的心情，不用说当然是我读书的好机会了。”但当暂时的轻松转瞬即逝后，另一种沉重很快无可抑制地袭上心头。除了审判程序的迟迟不启动让人“闲得有点难受”（原定 4 月 15 日提出起诉书，但直到 4 月 26 日起诉书千呼万唤始出来；5 月 3 日，也就是距日本投降签字的 1945 年 9 月 2 日已经八个多月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开庭），更为突出的是，身在异国，犹如置身于一组明亮的镜子前，更容易反观出自身的处境与形象，以及由此而生出的对祖国命运的深挚牵挂。为了争取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他“小题大做”地与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老法官威廉·威勃等作斗争，最终赢得了以受降签字先后为序排列法官席次，即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的胜利；在对战犯量刑时，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并声明若不严惩战犯唯有蹈海而死。这些浓墨重彩在历史上一向受到后人的铭记与称颂。但一些小事情，却如蚂蚁般不停地啮噬着梅汝璈的心灵。

首先是战事方休的纷纭之中，中国在对日本外交方面的马虎低效与缺乏通盘考虑。这位大法官想写封家信，也没人能带回去。“想到这里，我内心中愤恨而又惭愧。日本被占领已经半年多了，而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通信的办法！连在日本的中国官吏家信都无法寄递。这是何等的可憾！”过了几天，正在东京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中央大学校长顾一樵（顾毓琇）搭机回上海，梅打算请他带一批信到中国去邮发。梅汝璈再次发出类似的感叹：“提起中日通信，也叫人感慨万分。中国人在这里有这许多，日本投降也半年多了，而一个中日通信的正常方法都没有办出来。有的人来了两三个月，连一封家

信都常收不到。除了托朋友代投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可靠的方法了。”保侨工作还没有展开，华侨仍有许多不便之处。如果说这还算小事，那么代表中国来日本的政府官员的形象问题，则总算是要紧之事了吧，但似乎也难如人意。朱公亮将军作为中国特派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总代表，也就是中国驻日的最高长官，他抵达日本时，报纸上却一个字的消息也没有。梅汝璈看着报纸，情不自禁地发出“叫人愧愤、愤怒”的感慨：“我们的情报和宣传工作实在办得太差了！昨天在机场迎接的连一个中国新闻记者都没有。又何怪今天外国报纸上一个字都不提。”再如，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十五年之久，按理说中国可以提出的战犯证据应该是最多的，但恰恰相反，中国所能提出的证据实在太少，翻译更是人手少，很是让梅汝璈的同事向明思（即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痛苦，“牢骚很重”。

唯国家为重，虽生死未惜。身处异国，在胜利审判的特殊关口，如何利用战胜国的身份与地位，为国家争得应有的荣誉与尊严，是梅汝璈耿耿于怀的。梅汝璈深知，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应有的维护。为此他常常在日记中自我激励，表达自己的责任感：

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

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3月29日，在法官下榻的帝国饭店，顾一樵特意买了一把三尺长剑赠予梅汝璈，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献剑典礼。梅恭敬地接过了宝剑，谦逊地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一樵正色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闻听此言，梅汝璈激动地说，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惜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虽说如此慷慨激昂，但要真如此顺风顺水谈何容易？！在梅汝璈与同事的交流中，一个经常的话题，就是"对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都不胜感慨系之"。此类喟叹之声在日记中随处可见。顾一樵回国的前一夜，梅汝璈、向明思、顾三人长谈到晚上一点半钟，对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都不胜感慨系之，对战败的日本深存戒惧之心。"在感慨重重之下，我们互道珍重，互祝努力而别。""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主要是指剑拔弩张的内战和危机重重的经济状况。有一回，梅汝璈、向明思在中国驻日本的总联络官王淡如将军的房里深谈，至晚上十一点多。"我们谈到国事，尤其是东北军事冲突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大家都不胜感慨系之。八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梅汝璈与同事们也去各地参观，但国事日非，常常让他们没有好心情。到戏院小坐，"大家对于国事日非都是感慨万端。楼下舞厅里虽有日本歌舞表演，乐声铿锵，我们也没有心思去观光"。除了打太极拳，他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读报，但报上似乎总是没有让他高兴的好消息。在中国联络官办公处看东京中央社收录发布的电讯，这是除了两份英文

报之外他们可得到关于国内的唯一消息了，但“翻来覆去尽是些国共东北争夺和物价不断飞涨的消息”，“除了一些共军攻击某处，占领某处，和某人调长某厅……之外，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都不曾有。乘兴而往，败兴而回。其实这是我早应料到的”。要不就是如“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这样的大标题，小标题则有“三百万人在湖南等地要饿死、飞虎陈纳德将军组织空运队投发救济品”。此外还有醒目的中国新闻，如“国共两军竞赛占夺长春”“满洲大规模内战在发动中”“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内战”之类。“这些新闻看了真叫人泄气。处身外国的人，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对东北日益白热化的内战，梅汝璈时常想起在长春的内兄静轩和三弟汝璇。更可叹的是，国内战事不止，竟至于要美国马歇尔返华调停，报纸上刊出大字报道：“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自己的事要人家来干涉，这如何说得过去。”等到马氏调停无效，共产党攻下长春，蒋介石决定5月1日以前“还都”南京，除了担心亲友的安全，梅汝璈更担心5月5日的国民大会是否又因内战关系要延期了。在这位爱国者的心里，此时他前所未有地期望一向多难的祖国能够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口，化干戈为玉帛，走向坦途。国共问题丝毫无解决的征象，马歇尔似乎也没有多大办法。朱公亮告诉梅汝璈说，胡佛到东京曾与麦克阿瑟畅谈数小时，对中国事情颇表悲观，所以他对记者询问华事时严守沉默，仅说中国灾情惨重而已。一方面是战事未休，而另一方面却是物价飞涨，经济崩溃。“上海的煤已经贵到四十五万元一吨，而据方秘书说，鸡蛋也涨到了一千元一枚。这成了什么现象！”

战后的东京，成了战胜国炫耀胜利的舞台。胡佛之后，艾森豪威尔、英国海军司令福拉塞、美国对日赔款委员会主席保莱等各方要人都接踵而来，大搞阅兵、庆祝酒会等庆祝活动。梅汝璈写道：

可惜我国正在闹内战，太不争气，否则名驰全球、功播印缅的孙立人将军还不是照样可以大露锋头吗？写至此，我不禁为我国国际地位之日趋堕落悲，我真要投笔三叹了！

外患刚息而内战方炽的恶劣局势，实在让梅汝璈这位努力为祖国争荣誉的法官在外人跟前抬不起头来。“中国的倾慕者”、美国法官希金士憧憬于中国之游，对他印象极好的梅汝璈本该盛情相邀才是，但他觉得一定要有专机才行，“国内纷纷扰扰，谋交通工具一定很困难”。这位老希通过自己的关系弄到了专机，梅汝璈还不得不警告他：对中国之行“希望不要存太高，否则必定要失望的”。在帝国饭店，“懂得一点中国真相”的外国军官并不以报上大事渲染的“中国内战”“长春争夺战展开”“中国饥荒——几百万人在吃根叶和泥土”等问题相质询或作谈话资料；法官同事们天天看到中国糟糕的新闻却守口如瓶，绝不谈中国政局问题，也绝不谈任何足以引起不快之感的国际时事，梅汝璈感觉这是他们的“修养很好”，“大概就是所谓‘君子人’（gentleman）的特征吧！住帝国饭店有这一点好处。我想，在别的地方，修养差的人们一定不少，真是问长问短，倒是要使我们这‘五强之一’中国人难以为情了”。有一回，刘专员告诉他，刘和美军一位下级军官交涉华侨配给的问题，美军官毫不客气地说：“报上不是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吗？华侨又何必要比日本人好的配给呢？”刘专员对他进行了反驳，他又说：“算了，我们谈别的吧，中国为什么还要内战？我们谈谈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争的是什么，好吗？”这样的言论不绝于耳，而“止谤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心照不宣’吗？”在梅汝璈看来，当时的英美人士，“由于中国目前的纷乱，不争气，大都把我国八年浴血苦战的成绩置之脑后了”。麦克阿瑟“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似乎



梅汝璈先生

还不健忘”，苏联和英国报纸攻击麦氏扶持日本进行普选尚非其时，必无良好结果之可言，而“我国虽忝居远东四强之一，但是自己内战方酣，百废不举，对此类事自亦不暇顾及，只好装聋作哑，噤若寒蝉了”。这实在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战胜国的国际形象不相称。所谓弱国无外交，即使是战胜国也不例外。在战后，美苏之间明争暗斗，充满矛盾和对立。英国“一味捧美国”，而“我国地位很难处，无怪公亮将军遇事采取折衷态度，有时宁肯保持沉默”。

想到我国前途的荆棘和国际地位堕落的危险，梅汝璈常常半夜不能安枕。“‘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种危险在国外的人大概要比在国内的人看得清楚得多。”在一切以利益为转移的原则的影响下，即使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付出过惨痛牺牲、做出过决定性贡献的国家，都可能面临着被国际遗忘忽视的危险，这怎能不令梅汝璈扼腕长叹！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也常常刺激着梅汝璈在对比之中进行深长反思。住在帝国饭店，令他想起上海，日记中说：

这样一间套房，我想若在上海的大旅店，它的租金每天至少恐怕都要法币两万元。一个简任官的薪金，付一个礼拜的房金就光了，其他一切不必谈。

想到这里，又是不胜感慨系之矣。我们的政治真是要破产了吗？难道政府真的要让中国的一切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都穷死饿死吗？人家战败国事事都有办法，至少想办法。而我们这战胜国，号称“四强之一”的战胜国，竟是一筹莫展，真是叫人羞惭无地了。

真可谓虽然暂时身居华屋，但想起故园破败，总是坐卧不宁。在去外地游览的途中，梅汝璈看见日本的房子——无论是农村住宅或是街市商店，都用玻璃木板砌成，根本没有高墙厚壁，更没有门上加锁、锁上加栓之类。“表示他们以往的治安不成问题，不像我们兵祸连年，盗贼遍野，就是太平盛世也得各自检点门户。我感觉中国一向的政治只是消极的，只要没有人造反，推翻王朝，便是太平盛世，至于人民的教养、卫生，那只有委之天命和老百姓自己。只要‘风调雨顺’，自然会‘国泰民安’，政府是不多管闲事的。”“想到我国农村阴沉沉的情况，我不觉毛骨悚然。”坐专机在日本中南部游览，深受触动的梅汝璈有很深的感慨：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是我们从天空看看他们的成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事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阀不拼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反观我们，那倒真是问题严重哩！！

在横滨一带，他看见许多劳工团体的结队游行，秩序良好，男女工人衣着整洁，身体壮健，千万人群中毫无营养不足的现象。他真奇怪为什么美军还天天替日本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在东京，男女体格依

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而且红光满面：

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符。假使那样的话，何以日人吃得会这样壮健，而且穿得也不坏——至少比我国一般人吃得穿得好。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梅汝璈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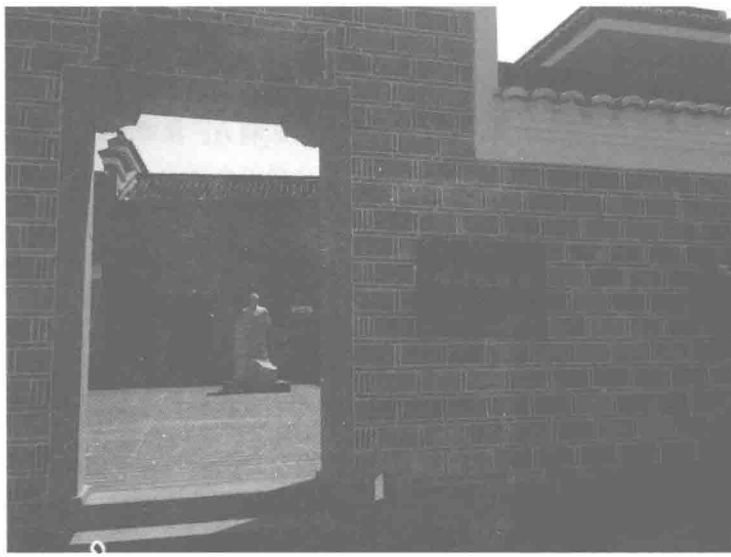
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提携政策，麦克阿瑟声称日本“已渐走上真正民主之途”。梅汝璈以为这虽未免过于掩饰，但“确使日本经济上占了不小的便宜而渐渐走上复兴之途。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与我们胜利的中国对照，使人怎能不感惶愧”。美国也有睿智之士对日本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如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美国著名政论家、远东问题权威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他以亲自到中国与日本考察的经历为依据著文警告：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拉铁摩尔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梅汝璈在《日本时报》上看到转载的这篇文章，认为“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拉铁摩尔还说，以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他主张，对付日本不能纯以美国的立场或眼光去看，而应该为远东经济落后的利益去打算。盟军应禁止工业原料输日，同时应鼓励日本的土地改革（使佃户渐能成为自耕农），使日本农业生产增加，自给自足。梅汝璈赞赏道：“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深获我心。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国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又铸成一个历史上的重大错误。”他把这篇文章剪下寄与他认为当时“最关心国际时事的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

虽然是战胜国，但真正的胜利还很遥远。最主要的是，中国要借助这一机会，努力自爱，自我团结，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对国内近况的感叹中，梅汝璈说：“我们的国际地位由于八年的浴血苦战，无比牺牲，已经赚得很多，倘使自己不争气，眼见这个地位就要堕落了。”在旅日华侨招待茶会上，华侨请他发言，梅汝璈郑重提出两点希望：第一，希望侨胞言行要特别检点，处处要保持大国国民的风度，以配合我们已经取得的很高的国际地位；第二，希望侨胞要保持团结，不可分裂，遇事要采取民主作风。事前充分讨论，自由发挥，但是一经公决，一定都要服从多数，大家绝对遵守，不可别立门户，法外生枝。二十年前他在美国留学时目睹欧美各地华侨不团结、爱分裂这一最普遍的毛病，所以在此特地强调。美国法官希金士对中国

表示友好，告诉他一般美国人最感亲切的民族是中国人，梅汝璈深知这并非虚伪，“不过我们得争气才对，否则仇者所快必然是亲者所痛”。日本币原内阁倒台，朱公亮向盟军总部提交说帖明确反对呼声甚高的继任人鸠山，“日本首相人选要中国人同意，这要算空前创举！愿我中国人努力自爱，团结建国，善保其国际地位！”英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福拉塞海军上将在新闻记者谈话会上说中国人民都愿意英国保持香港。中央日报社记者张仁仲君当场与他大事争辩，梅汝璈特意在日记中称扬：“总算勇敢露脸，可以稍微纠正这班帝国主义白人至上者的信口胡说。”有一回张仁仲与梅汝璈合影，并对他在法官座位次序问题上能够保护国家应有的地位表示庆贺，说必定打电报回国去宣传。梅回答说：

这是我国八年浴血抗战的结果，我个人实无功绩可言。只要我们国家努



梅汝璈故居

力和平建设，国际地位必可保持不堕。倘使国家不争气，我们的地位在任何国际场合中恐怕都会一落千丈。

二

作为赣地先贤，梅汝璈的身世之于笔者并不陌生。他出生于南昌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除他之外，其家族中百年间先后走出了清末学者梅光羲，茅以升先生的助手、桥梁工程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梅旸春等多位文化名人，可谓重檐深院、积厚流长的乡绅世家。但笔者更看重的，是梅汝璈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这一英美精英式教育的个人经历。正是这一教育背景，对梅汝璈日后立身处世以及对社会、国家的看法等方面，都浓重地打上了特有的“清华印迹”，也使他的日记充满“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和屡次强调“要自己争气才行”的深挚情怀。

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国势日绌的大环境，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与此前沉醉在“天朝大国”酣梦中的传统士大夫不同，许多有着开放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我反省，一种“耻不如人”的悲凉意识贯穿了整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早在19世纪，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中国除军旅之事外，还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而究其缘由，“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足，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可耻而有可为也”。及至民国，最为突出的是知识界的核心人物胡适之，20世纪30年代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系列雄文。其

中心思想，在于承认“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而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还提出了“五鬼闹中华”的说法，并强调：“我是不肯把一切罪状都推到洋鬼子头上的，中国糟到这步田地，一点一滴，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为什么外国人不敢去欺侮日本呢？我们要救国应该自己反省，应该向自己家里做点彻底改革的工夫。不肯反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1926 年 10 月 4 日胡适致徐志摩信）——同样是对“自己不争气”的担忧。胡适的这一论调，长期以来被视为百般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但百年的视野之中，我们不得不看到其中寻常中的深刻。而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学习的是，他们所提倡的“耻不如人”，并非一己之自暴自弃，更没有走入悲观的歧途，而是“知耻近乎勇”，慷慨自任，主动担当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冯桂芬立誓“知耻而自强之”；胡适坚信：“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废！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再论信心与反省》）“悲观与灰心永远不能帮助我们挑那重担，走那长路！”（《悲观声浪里的乐观》）针对国粹主义，他提出，真诚的愧耻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引起新的信心，民族信心必须放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上。民国以来，政治糟糕得一塌糊涂，目睹国家的“不争气”，知识分子痛感“抬不起头”来，这是民国年间的普遍现象，否则他们何尝愿意如此“百事不如人”。在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受辱，更是多有恨国民政府不争气的清议。在《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一书中，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杨公素先生曾回忆说，当时学生激起无限爱国热情，“觉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国民政府太不争气，中国军队太软弱，这个学校太不爱国”。而反躬自问，

精英知识分子常常痛责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如蒋廷黻愤愤认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知识分子与政策》，转引自许纪霖《瓷器店中的猛牛》，载《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因为中国的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太怕清议而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所以以倡导"好人政府"的群体为代表，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正是那种敢于担当与行动的经世之士；他们认为要拯救国家的贫弱，不要怪别人看不起自己，而要自己争气才行。实际上，很多读书人本来并不热衷于谈政治，但对此情此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书生拍案而起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承传了传统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精神流脉。梅汝璈所耿耿于怀的"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和"要自己争气才行"，正是民国知识分子这种"耻不如人"的责任意识与自觉警醒的折射。

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此后终生的基本价值取向。虽然人生道路可能各异，但我们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这些人最终价值理念的依归，都要回到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上。说梅汝璈"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屡次强调"要自己争气才行"，与他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清华精神"大有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在《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载赵建林编《解读清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一文中的说法，"清华大学精神"至少有三个特点，其第一者，即是耻不如人（另两个为讲究科学、重视实干）。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人的民族耻辱感，似乎较其他人更为强烈。作为预备留美学校，清华本身就是美国利用中国"庚子赔款"建立的，美国政府的用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代"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这种屈辱的身份，无疑令清华人的心境分外复杂。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

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人更表现出民族雪耻的激情。“‘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



梅汝璈在远东军事法庭门前

梅汝璈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直到八年后毕业赴美，在清华度过了形成他价值观的青少年时期。“明耻”意识，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中。据赵存《远东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曾任山西大学法学教授的梅汝璈》（载《党史文汇》2002年第4期）记载，1929年他留学归国后曾应聘在山西大学任法学教授。在执教期间，他不仅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而且经常以“耻不如人”的清华精神谆谆告诫莘莘学子：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想想看，有着这种现代教育背景的人，如何不会时时恨“自己不争气”，而拼命呼唤“要自己争气才行”。

说起来，我们已经遗忘梅汝璈太久了。网上有文章说，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20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他写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但未完）；而中日关系“良好”时，各方的人们则不愿提及他的名字。在中国法律向苏联一边倒的五六十年代，梅汝璈像大多数那一代中国法学家一样，遭遇了冷藏的命运，在孤寂和凄凉之中赍志而没。“文革”中，他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从东京“郑重将事”、不辱使命、天下称扬的审判法官，到晚年不为人知的外交部顾问，个人的升沉穷通，固然是梅汝璈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胡适之说：“真诚的反省，自然发生真诚的愧耻。”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不合理教育的影响，社会产生了一种思维倾向：遇到问题，大家不是去反思自己不争气的历史和这个民族误入歧途的动荡折腾，而总是简单地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外人。在世界风云变幻的今天，日本拒绝正视历史、时时抹杀历史的做法，给全世界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令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更是无法容忍。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这是一个经历过历史重要转捩大事件的智者的告诫。但面对此情此景，仅仅有民族主义激情是无济于事的，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像梅汝璈所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那样：“我们得争气才对！”“中国还得争气才行！”

2005年7月19日

何兆武：那个时代的书生为什么还有幸福感？

在很多读书人的书架上，都陈列着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声名赫赫的西方经典。这些嘉惠士林的文字，让多少软骨的读书人添了几许钙质！饮水思源，其译者，就是已经八十五岁的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老先生。

最近，何先生口述自传的前半部《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让嗜读现代文史的读者爱不释手，欣然会心。素以译书传经为大业的人，其思想与情感多曲折寄寓于译著中，而视自身的写作为余事。能看到何先生的自传——而且是本色鲜活的口述体，当然是今天读书人的一大快事。像许多学人自传一样，《上学记》记有先生读书的经历，记有闻一多、吴晗、冯友兰、金岳霖等旧年师友，也记有他对史学专业的理解。但稍有不同而大有异趣的是，在这本学人自传中，“幸福”成了一个被屡次提及的关键词。何先生多次谈及一介书生对幸福的理解，谈及他上学的时代“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他曾经与后来成为数理逻辑世界权威的同学王浩正儿八经地讨论“什么是幸福”，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们以为“简单的信仰不能等同于幸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而不是简单的信仰”；他甚至想写一本《幸福论》，阐述一下“人的愿望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欲望的满足”。有时，何先



何兆武《上学记》

生对幸福的琢磨甚至到了让人笑其迂哉的地步。抗战中，他从岳阳老家去长沙，坐火车只需两小时，结果上不了车，只能逆水行舟。深秋时节，坐着古老的帆船，欣赏一路风景，何先生不禁联想到“一个有点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怎么就算是进步？要说坐火车的话，我们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坐船坐了五天，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火车的优越性。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坐船不仅欣赏了景色的美，而且心情也极好，比坐火车美好得多，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到底应该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者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幸福，这一平民百姓念兹在兹的东西，多次出现在何先生的口中，让习惯了听学院派史学者谈玄说理的读者倍感亲切温润。著名学者葛兆光为这位前辈的自传写序，就精当地概括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与幸福”。自传的整理者文靖，在后记中也说：“何先生那辈人是不幸的，然而战乱、混乱、错乱之下，他却可以活得很释然，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无奈中发现的是有趣。”

在由衷地感叹何先生笔下那些近于“上古三代”旧事的同时，我常常想：何先生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大半生，万方多难，生民多艰，而那个时代的书生内心为什么还有如此丰盈的幸福感？

幸福的基石恐怕是自由。对于读书人来说非常简单，首要就是读书与问学的自由。何先生小时候就习惯“无故乱翻书”。到晚年，他更是感悟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后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何先生说自己国学根底非常差，但他中小学所读，除了四大名著一类，文学有《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译书有梁启超的书、严译《天演论》、林纾《说部丛书》，野史如《清稗类钞》，艺术如丰子恺《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还有“开阔眼界与思路”的科学著作《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入大学，他更是无所不窥，如《国史大纲》《金瓶梅》，勃朗宁与济慈的诗，《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新理学》《中国哲学史》，金岳霖《逻辑》，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独立宣言》《法国独立宪章》《罗斯福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圣经》，等等。有一阵子想学音乐，他甚至借抄过《世界名歌选粹》等。有过这种五谷杂粮垫底的人，体质还会差到哪里去！何先生读的大学，是迄今为止仍属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就因为那几年生活的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教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学生呢，“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可以不去”，因此有了逃课、凑学分和趴到窗外聆听的美好记忆。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睡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



何兆武《自由是一种状态》

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在这所今天已经几乎被传奇化了的大学里，何先生读过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自由转系的制度，让他来去自由。在那个时代，真正为学术而学术，让人毫不觉得矫情，而有一种纯粹感。有一次，何先生路遇物理学才子杨振宁与黄昆，听见黄问杨有没有看过爱因斯坦最近的一篇论文。杨说看了。黄问他感觉如何，杨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 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有人问出身联大的邹承鲁院士：“为什么当时条件这么差，却培养出了那么多人才？”邹先生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散漫的学术氛围，才培养了联大学生的独立之精神，铸就了那些群星闪耀的名字。何先生感慨道：“‘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自民国讫于现代，时代的底色无疑是灰暗的。但风雨苍黄中的书生，其精神状态似乎一直没有泯却其乐观、昂扬与亮色。何先生说，抗战时期，“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却是振奋，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意在日本的统治下做亡国奴”。“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地、天真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对未来葆有希望，赋予了他们内心的幸福感。按何先生的理解，“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

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的确，八年抗战，除了汪精卫、周作人那些糊涂虫，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始终坚信中国有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希望。他们执著于永恒的理想，追求普遍的真理，自觉地把个人的志业与国家社会的进步联系起来。这样才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为之一扫而空。记得哲学家贺麟先生1946年为其《文化与人生》作序时也曾说，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这期间，不但高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是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了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何先生在自传中就深深地咀嚼过这种大时代里的个人幸福感受。士为国魂，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没有失却希望，他们才有真正的幸福感可言。这个民族，也才有生存的底气与生机。

有意思的是，当我从书店购回《上学记》时，书店的小姐在里面夹了一张书签，上面写着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我比你们幸福 / 它们比我幸福 / 在湖水中游的鱼 / 甚至没有衣服。”我不懂诗，但却觉得这诗写得真好。知识分子的幸福与自由，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吧。

2006年11月

胡适·王淦昌·许良英

盛夏，在赣东北安静的小城弋阳参加《教师博览》首届读书论坛，有机会听到傅国涌登台讲“人生最美是相遇”。

傅国涌追述了自己一生中遇见的三位师长，不断推动着自修成才的他开启人生的窗，走向更远更寥廓的思想天地。前面两位，是他故乡温州本地的学者，虽然同样值得我们敬重，但很抱歉，名字我真的不熟悉。在今天知识界经常习惯性深情回望的1980年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如此平凡温良的普通老师。在不经意的呵护鼓励间，在传统的耳提面命中，经由书信往来这种古典的方式，他们让一颗颗读书种子获得成长的力量，从民间脱颖而出。这样的接引与度化，功德无量。第三位师长，我多少还算有些了解——著名的科学史家、思想家许良英先生，那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人大多熟悉的绿封皮《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者。

9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远在杭州的傅国涌意外地收到许先生的来信，除了对一篇文章中具体学术问题的指点，另附有两千元人民币——傅国涌说，大体相当于同时期杭州市中心一平方米房价吧。当时，傅国涌的妻子住院，信和钱托人送到医院的病床上。傅国涌与许先生素昧平生。远在北京的许先生只是偶然读到傅国涌的一篇《民主阶段论》，听说这位在底层自由写作的

年轻人生活拮据，就像他曾经资助过不少其他读书种子一样，马上伸出援手。也许是怕年轻的傅国涌心里不安或不愿，善解人意的许先生在信中特意说明，钱是一位离休老干部在工资中节约下来的，赠给需要的人。此后，两位年龄相差很大的学者，忘年相交十八年。2013 年 1 月 28 日，许先生去世。在几天前还去医院看望过先生的傅国涌，在杭州家中听到这个噩耗，当下大哭着对妻子说，自己今天不能吃晚饭了。他一边恸哭，一边写下两篇纪念性文章《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没写完的民主思想——初忆许良英先生》。后一篇刊发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没写完”，是实录——当晚，傅国涌就登上赴京吊唁的飞机。

年近五十、名满读书界的傅国涌在台上讲起两年前的往事，仍然无法自抑地哽咽而泣不成声。座无虚席的五百人大礼堂，刹那间突然变得安静无比。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老师，静静地体味着当年那份思想长者出于良知公义而萌生的对贫寒读书人的关切之心，还有今天后辈恸怛追思中无尽的感恩之情。认识傅国涌多年，也读过他写许良英先生的文章，我知道他对许先生的敬重与感激，但当场听到他情难自已的言说，我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思想相通，无私帮助，许先生如此高洁的人格与情怀，值得每一个后辈感恩与致敬。在思想被无情代际与所谓派别冲刷得无比隔膜甚至对立的今天，两代人如此美好的相遇，称得上当代思想史的佳话。

傅国涌在讲述许良英追求民主、理性的思想渊源时，特别提及许先生的师长、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抗战开始那一年，许良英进入有着“东方剑桥”之称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很快成为王先生青眼有加的高足。但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精英的人生选择一样，历经抗战、内战，被王先生视为可造之才甚至有可能拿下诺贝尔奖的许良英，却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在据说“告别革命”的口号都已经吹响的今天，我们仍然很难说真正理解了“救亡压倒



许良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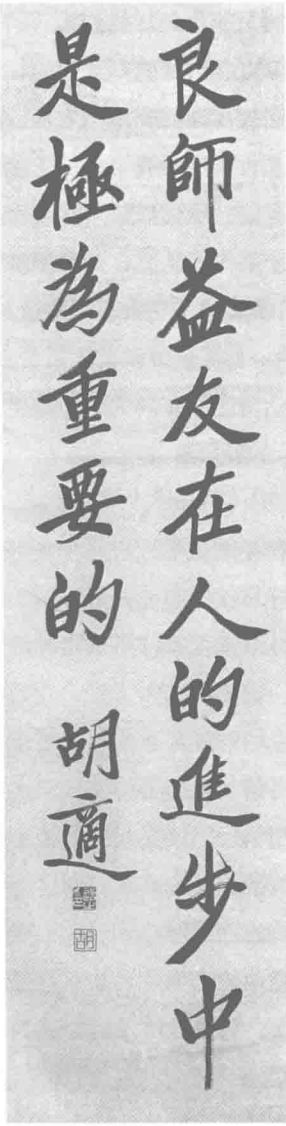
启蒙”这一时代性洪流中上一辈知识分子个体选择的是非得失。我们痛心的是，当代革命没有走出吞噬自己儿女的吊诡逻辑。1957 年“反右”风暴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许良英列名“极右”，被发配回故乡浙江临海当农民。在乡间，他潜心翻译《爱因斯坦文集》。70 年代，正忙于原子弹事业的王淦昌得知当年心爱的学生许良英生活艰难，立即给他写信，承诺以后生活费由他包下，要许良英安心完成《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从此，身处国防机密岗位的科学家王淦昌，每个月以化名从四川给许英良这个在农村“改造”的“阶级敌人”寄送三十元生活费，直到商务印书馆给许良英恢复发放生活费。

每一种美德，都会传承。许良英先生此后对包括傅国涌在内的很多陌生读书人的资助，多少与他自己当年受惠于王淦昌先生的经历有关吧。

我想起光风霁月的胡适之先生。

1919 年，已经崭露头角的北大英文教员林语堂在美国留学，遭遇经济困难。他向当时的北大红人胡适电报求助：“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一千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胡适很快如期如数给林语堂汇款。胡适给林语堂说，这笔钱是北大给林语堂预支的工资，学成后一定要回北大工作。拿到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林语堂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不料，学习经费又遇到了困难。林再次向胡适写信，希望再为他到北大借支一千美元。胡适又给林语堂汇去了一千美元。四年后，镀金归来的林语堂向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致谢，并商定还款日期。蒋梦麟一头雾水。到这个时候，林语堂才明白，北大根本就没有资助留学人员的这笔经费。那数千巨款，是胡适个人无私资助的。胡适去世时，人们整理他的遗物，余款只有寥寥一百五十三美元。众人说起胡适生前资助过很多人，林语堂才说出胡适为自己慷慨解囊的往事。在场者无不动容。

1940 年代末，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学生陈之藩，偶然听到时任北京大学校



胡适书法

长胡适的广播演讲，有感而发，写了封信《提出一些疑问与感想》给胡适。两人由此成了忘年交。1954 年，从台湾大学毕业的陈之藩，打算留学美国，但连买机票的钱都没有。胡适知道后，立即从美国给这位青年才俊寄来支票，资助陈之藩留学的保证金，使他顺利留学。陈之藩后来不负期望，成为物理学家。学成归来后有偿还能力时，陈之藩立即把钱如数还给胡适。胡适复信说：“之藩兄，谢谢你的信和支票。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付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陈之藩接到信后，大为感动，说：“这是胡先生给我的最短的一封信，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一封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岗，你要振衣；忽临万里之流，你要濯足。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的污浊。他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我每读此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在散文名篇《在春风里》里，陈之藩用他优雅的笔法说，并不是自己偏爱胡适，“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

忘了从哪里看到一种这样的说法了：在思想剧烈冲突的当下，“新左”经常高调吁请平等，一再自称为底层利益请命代言；而真正践行社会公益事业者，却多是口头上追求效率与竞争、尊重市场、法制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者。细察今天诸多公共事件可以发现，这样的说法未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从胡适到王淦昌再到许良英，这些我们敬重的知识分子，都凭着自己有限的经济能力，无私地资助过许多有着向学之心的年轻人——或相知已久，或昧平生。从思想的底色来说，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都是真正的五四之子。在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突出的美德：因为识人爱才，人心存朴素的救济惠泽之心；又因为有着建基于人类普世文明之上的视野与胸襟，所以有着“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高洁思想、卓荦识见。更重要的是，因为心灵的相通与人格的尊重，尽管事关知识分子不愿言及的“阿堵物”，救济者却不以之为高高在上的施舍，受赠者亦不因之而轻贱自卑。在成全自己、服务社会这一点上，这些以知识与思想为生活的人是平等的。

如此相遇，如此美好，如此纯洁。

2015 年 8 月 31 日

王元化笔下的胡适之

清园主人王元化先生，是当代学术界与思想界当之无愧的重镇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清园书信集》《九十年代日记》等书，以其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中的思想相结合的鲜明特点及其沉潜往复的问学之风，在出版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热读浪潮。对严肃深思的学术著述来说，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此可见先生思想的影响力。因为编辑同人的邀请，笔者有缘参与三卷本《清园文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的编辑工作，得以有了一次接受思想熏陶的机会。



王元化《清园文存》

恰好因为同时陆续在读胡适著述的关系，我注意到王先生对胡适的理解与评价。这些年我常常感觉到，胡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时代学林士风的风

向标。是否能够心平气和地评价胡适以及如何评价胡适，可以见出一个时代思想的进步开放与清明理性的程度，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风貌。我注意到，在寥寥几篇的“人物篇”中，元化先生连续写下了三篇写胡适的文章：《读胡适唐注自传》《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胡适的日记》，比写鲁迅还要多；在其他多处地方，他也不时提及胡适。众所周知的是，王元化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百年来的激进主义多有反思，引发了学界极大的争论。异议者认定是知识分子从思想启蒙遁入学术研究的“转向”，誉之者则称之为“另一种启蒙”。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自由主义灵魂人物胡适的评价问题。先生认为胡适的成就在于开创学术风气，著作风行一时，但可传世者不多。但在以激进主义为主潮的近现代史上，胡适体现出一种独立不依、“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先生对此种峻伟人格极为服膺。汪丁丁《再谈“启蒙”》（载《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一文中记：1998年9月，天则经济研究所、《读书》编辑部主持戊戌政变失败百年祭，特请元化先生首先发言。有感于知识分子普遍的失落、普遍的无视自身的社会职能、普遍的道德意识瓦解，他指出“我们倘若能够做到当年胡适先生讲的‘不降身，不辱志’，已经很不容易了”。次年接受李辉的访谈，谈到激进主义时先生说：“当时连一些性情温和的人如蔡元培，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胡适在日记中，记述他（指胡适——引者注）在那时读到梁启超说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这种激愤的话后，深为感动。不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很快地采取一种清醒的态度。也是在日记中，胡适记载了他曾劝告青年，在无政府主义蔚然成风时，不要去赶时髦。这是胡适使人敬佩处。我最为服膺的是他对自己生平为人所说过的这几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关于“五四”



胡适先生

的再认识答客问》）先生1998年访台时冒雨前往胡适墓地参观，当时又想起胡适的这几句话。他还说自己每次在大学演讲后，都要背诵这几句话作为献辞。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被包括唐德刚在内的后辈指为空疏浅薄，但元化先生则坚持认为胡适一生是贯彻了其自由主义思想的。胡适晚年在雷震“《自由中国》事件”中的表现，招致时人诸多非议。而元化先生则平和地指出，胡适抄录杨万里《桂源铺》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赠雷震狱中六十五岁生日，这说明胡适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他在日记中记下此诗，并说“正好用来表达一种看似弱小，却终将排除重重艰险的不屈精神。我读此诗时，感到一深沉的暖流在胸中升起，激动不已”。胡适倡导个性解放，追求“健全的个人主义”。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的定义就是：“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易卜生主义》）元化先生认为“五四”的主要

成就在于个性解放，他在倡导新启蒙时经常引用“为学不作媚时语”那句诗，他还对王国维、熊十力等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孤注”精神表示激赏，其中蕴含的都是提倡个人要有见解担当、独立人格的意思。王先生晚年的言行，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与对社会批判的主动担当，应该说这是对胡适精神的一种承续与弘扬。

赞赏胡适的人格，但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胡适的思想。近年来，元化先生一再认为五四启蒙运动中有四种观念值得注意：庸俗的进化观，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使学术失去自由独立；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对“五四”的思考》)以此为准则，先生对胡适启蒙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些缺陷，多有理性的批评。胡适青年时很喜欢京戏，但成为新文学的开山大师后，态度有了根本性改变。他晚年在日记中说，京剧音乐简单，文词多不通，不是戏剧与音乐，也不是文艺，所以不看京戏。王先生在《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一文中分析说：“‘五四’以来新文艺阵营的人多持这种态度。我本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几达十余年之久。主要原因就在于以西学为坐标去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采取一种偏激态度，认定凡是新的都比旧的好。就以力求公正持平的胡适来说，他纵使说到自己所钦佩的乾嘉诸老时，也仍以西学为标准，说他们的成就远远逊于懂得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西方学者。他对京剧的批评，正如他对《红楼梦》的批评一样。他说《红楼梦》还不及《海上花列传》，因为前者没有西方文论提到过的 plot，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它赞一词。他认为京剧不值一顾，是因为没有西方戏剧‘最讲究经济方法’的三一律。”王先生对胡适这样一位好学深思、谨慎稳重的学者信奉“三一律”理论感到惊讶，他认为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所致：“我感到奇怪的是，五四时期曾有推倒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口号。从来被轻视的民间文艺，小说、山歌、民谣、竹枝

词等等，受到了倡导新文化的学人的重视，可是为什么对于同是民间文艺的京剧却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态度呢？是因为它进过宫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任何时代都会出现自我相违的偏差。那是一个暴风骤雨、来不及仔细思考而急促作出判断的时代。今天距离那个时代已七十多年了，已经到了可以平心静气回顾过去，对它作出公允评价的时候了。”读胡适日记时，王先生再次以此为例，批判胡适在新旧文化之争中表现出的以西学为坐标的庸俗进化观。他同时再次强调：“在三四十年代，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也是如此。”（《〈胡适的日记〉》）可见他对胡适庸俗进化观的批判，是同时包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在内的。胡适还从进化论的角度研究先秦诸子；用实验主义评估古代哲学，他批评黑格尔因为生在达尔文之前所以不懂进化论，但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胡适竟撇开韩非的君主本位思想而将其拔高为“活在达尔文一两千年前的‘一个极相信历史进化的人’”。对此王先生极为困惑：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扬言白话文的问题不许讨论。胡适在日记中认为，陈独秀的“不许讨论”使白话文的推行提早了十年。王先生拥护白话文，但他要问：“为什么不许讨论？”他把这种有悖于五四时期所倡导的学术民主的独断态度称作“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对当时倾向自由主义的胡适也未能识别它的偏颇，王先生多有质疑：“陈的强制办法，使白话文的推行提早实现了。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似乎也应考虑一下，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原则的放弃或斫伤，会带来什么后果？纵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会不会有得有失，甚至是得不偿失呢？我认为这对于继承五四的启蒙是不利的，但其影响不但至今未绝，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

的。”不仅要求“实质正义”，还有倡导“程序正义”；不仅追求工具理性，还追求价值理性的完成，王先生深刻揭橥出，胡适的态度，仍是一种功利主义。仍要启蒙但又要克服启蒙时可能出现的扭曲的“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是王先生晚年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他认为这种心态特点有三：以为人的理性力量万能；以为真理在握则必不容反对，否则即是异端；由此形成崇高的伟大的可以为之牺牲一切的狂热与激进。不论哪种意识形态化，必将导致一叶障目，遮蔽真相。在百年的思想史上，胡适算得上是一个以理性为践行准则的人物，对陈独秀的激进思想，他一直有所警惕与反拨；后来他倡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更是其超迈时流的深刻认识。但王先生仍对其功利主义提出批评，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苛求，但毋宁说是后一代的启蒙者对前一代认识的超越。

对胡适激进的文学观，王先生也明确提出异议。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倡导：“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因为把明白清楚作为第一要义，胡适反对文章用典，无论古典今典他都反对，因此他在评骘陈寅恪的时候，认为陈的文章写得不好。王先生说：“既然提倡明白清楚，要求文章使读者可以一览便知，因此也就谈不到含蓄与蕴藉了。”胡适又提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因此才有他嫌“丁文江传”的书名不好、改用“丁文江的传记”来取代这样的事。王先生说：“照他看，只有后者才是合于口语的白话文。但是我感到奇怪，难道‘丁文江传’就叫人不懂了么？”（1998 年 3 月 3 日日记）对贯彻废汉字，用拉丁拼音，采取方言，将言文一致推到极端，要求达到言文同一等激进的语言改革，王先生也有一定的反思。

可以看出，王先生评价胡适，主要基于他近年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和对思想自由的呼吁这一立场。但在“胡学”泛滥成时尚的今天，与诸多学者不同，



《胡适思想批判》

王先生并没有陷于以胡为旗、完全拜倒的从众境地；而对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等五四思想遗产，王先生多次指出，它不仅体现在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身上，而且在杜亚泉、陈寅恪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这种态度看似寻常，但实不易。

关于胡适之，不少学界长者都写过文字。季羡林先生 1999 年访问台湾参拜胡适之先生墓后写下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还被当年的《散文选刊》杂志排在散文排行榜之首。刚刚去世不久的李慎之先生，晚年屡次表达过对胡适的重新理解，明确地提出“能够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毋宁还是胡适”。“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现在看来，我们是错了。”这一看似平实的话语，可谓是沉痛之言。王、李两先生虽然被学界中人简约化地相提并称为“南王北李”，其实如他们本人所表示的，实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与思想。但在对胡身上所体现的自由主义之精神的理解上，我想还是有其共通之处。1955 年，在胡适批判浪潮中，时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的元化先生曾在 2 月 5 日《解放日报》发表《胡适派文学思想批判》一文。而令人慨叹历史无情的是，文章墨迹未干，王就从 1955 年 6 月开始被隔离审查，直到 1957 年底才拖着一身病归家，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而开除党籍。笔者曾经见过《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三联书店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1955 年 4 月出版），其第 95 至 106 页原先即是王先生的那篇批胡文字，但印就后竟被临时抽去而“开天窗”。在人人自危的年代，昨日的批判者转瞬就连批判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王先生近年来屡屡著文坚持对个人价值的呵护，与他当年的自身遭遇不无关系。不久前，有一位办报纸的朋友在电话中邀请我参与编辑一册胡适思想批判的文章。他的想法是，将当年那些学人的胡适思想批判文章与今天他们写下的胡适研究文字辑在一起，立此存照，使人从中看出他们思想的变化。我一开始想，这是一

个不错的点子。但转念一想，又很怀疑这样做的意义所在。主要因为，当年胡适思想批判的文章，没有人把他作为一回正经事来说，多是敷衍应付之作。身与其事的曾彦修先生曾在《立此存照》一文说："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证明：当时王子野与曾彦修二人始终半篇批胡文章也未翻读过，一来时间决不允许，二来二人对此等文章均毫无兴趣。……开始编书时，就已谈过，编选原则是，代表性的问题与代表性的人物。至于说些什么，没时间看，也管不了。因此，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批判选辑》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样的批判文字，实在很难反映出当年学人对胡适思想的真正理解。海外学者许冠三指责王元化先生批评胡适。元化先生 1993 年 3 月 20 日致邵东方的信中说："许冠三责我批评胡适，他并没冤枉我。那时只是盲目地听话，按照指示去做。这情况你可理解，许不可能理解，这不能怪他。但他不知我在'四人帮'后才有忏悔机会，才有可能在为此而自劾。搞批评的人多苛刻，但在理解对手时则粗枝大叶，我过去常犯此病。最近我在广州乡间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恰好有一篇是论胡适的。这是代表我对胡的较公允的看法，而不是为政治服务搞意识形态化，自然这不能掩饰过去的错误，只能说自己借此进一步清算自己的错误观点。所以我对许的责备不觉恼恨，不管怎样，他说的是事实！他不知道，在批胡文中有些观点，我是从胡风那里抄来的。胡风批胡适更凶，且发生在解放前，这种曲折的经历，复杂的历史，不去了解，永远搞不清楚真相的，这是大陆年纪较大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当年的年轻一辈人看不起胡适的思想是有的，但如批判中所说的那样，则大家都知道这只是应付交差而已，连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当时虽然留意细读批胡文字，但都只是呵呵一笑了之。要拿当年的"胡批"文章来印证作者的批胡思想，恐怕难免厚诬前贤了。

2003 年 6 月 10 日

于光远先生们的“一二·九”情结

一

当我在与居处比邻的省图书馆看见于光远先生所著《朋友和朋友们的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两册书时，它们已经被读者翻得有些破旧了。对着它们看上去有点粗头乱服的模样，我不免有些讶异：在这样软性阅读大行其道的年头，于先生的学者随笔还有如此之多的人读么？抱着几分好奇，我借回了它们。它们给我带来了几天充满阅读乐趣的时光，更让我又一次走近“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


于光远先生

于光远先生是个极有趣味的思想长者，《朋友和朋友们的书》是他的一套极有意味的主题作品专集。于先生在前言中就颇有意思地先引据词典给“朋友”下了个定义，书末还编制出一份《朋友姓名索引》——写有关朋友的回忆文章，

竟到了编制索引的地步，你说这是不是别致的稀罕事？！回顾自己交友结构变化的历程，于先生分七大类：一、少年时只在学校和亲戚间有极少朋友；二、参加“一二·九”运动，认识了众多革命者，改变了自己的交友结构；三、成为职业革命者那些年，只和党内同志及工作对象接触，加上战争环境，几乎完全中断了其他社会关系；四、在作为执政党的党机关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工作，同僚成为交友的主要渠道；五、在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组织中结识了众多学者；六、十二大后结交众多民间朋友——学者和退下来的领导干部；七、因写散文，与作家交友。但通读完全书，让人印象最深刻、易生感慨的，是于先生笔下属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朋友，以及他们一代人身上所具有的“一二·九”情结。在于先生写到的朋友中，大体因第二类因缘而结识的，即属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数最多，计有黄秋耘、韦君宜、冯契、力一、黎澍、陈翰伯、李昌、王元化、吴华、蒋南翔、胡开明、杨述、杨学诚等，自然还包括运动中的老师辈人物如张申府等；而且群体形象最为鲜明，在追忆这些人物时，于先生特别有话可说，他甚至为其中好几位每人接连写了两三篇文章。在《读罢韦君宜〈露莎之路〉》一文开头，于先生说：“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入了民先队（即“一二·九”运动中成立的全国性青年群众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或者还成为党员的清华同学之间，不论交往密切与否，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样的同学本来有好几十个，也许上百，可是现在屈指数出的只有三十左右了。”大概是抱着人生命运相近因而心灵与思想特别相知这样的情感，他才对“一二·九”朋友有着特别的历史记忆。在文中，于先生总是不由自主地以“一二·九”为坐标来论定一代人。如写韦君宜：“今年是‘一二·九’运动的六十周年，我已过了自己八十岁的生日，她低我两个年级，恐怕也快满八十了。”（《多么坚强的人！——与病床上的韦君宜的一次晤面》）写黎澍：“黎澍长我三

岁，他参加政治活动、文化活动都比我早，但总算得同一时代的革命者，都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受教育者。”（《从黎澍同志的著作中学习》）在《黎澍逝世四周年——他对病和死的一些观点》一文开头，于先生的文字更是深情可见：“今天是‘一二·九’，偶然抬头看到挂历，不禁说了这么一句。这时触发我情感的是好友黎澍的逝世。他是‘从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中走上革命道路和先行者，又在“一二·九”运动纪念的日子离开我们。’”甚至是在涉笔写及非“一二·九”群体中人，于先生也是不自觉地以“一二·九”为参照。如《告别济泽》一文写温济泽，于先生写及自己与温在工作上发生联系：“‘一二·九’后，特别是抗战后，许许多多青年向往延安，奔向延安。其中原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来到延安的多起来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新的现象。学过自然科学的人中，到延安后有的做与他们所学的专业有关的工作……也有不少原先学自然科学的人，分散在延安学校、机关里面。于是就提出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叫做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群体团体，结合他们的特点来进行革命教育，开展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研究他们共有兴趣的问题，和尽量动员他们归队。……温济泽对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和科学普及工作有很大兴趣，说他写过不少科普文章。于是我就在会内提聘书一定要吸收温济泽参加这个团体。他很高兴地就成为我们这个团体的积极分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汇流的具体历史细节。“一二·九”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像一根鲜明的主线一样，牵系着于光远先生那一辈知识分子的记忆与情感。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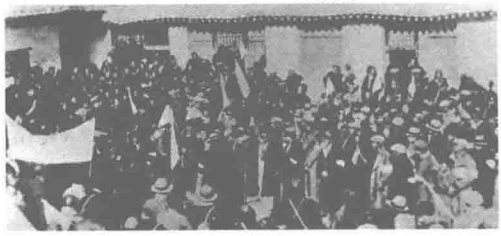
从代际划分上讲，“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大体介于“五四”一代和



“一二·九”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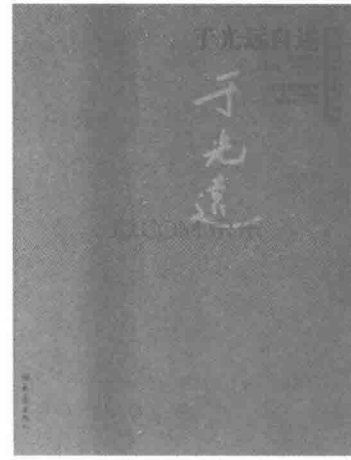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之间。以抗日救亡和反内战为主要任务的时代风云，在他们身上镌下了挥之不去的人生痕迹。最为明显的是，个人学业与国家危亡之间的冲突，在他们一代人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以于光远先生为例。1934 年他从上海大同大学凭特招转学到清华，就是通过了物理学大师吴有训暑假在上海举行的口试入学考试而脱颖而出的。尽管在《关于淡化家庭观念——记有训师生前的一次谈话》一文中，于先生记述这件旧事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自己用了一点小诡计而通过吴有训先生的考试，但无论如何，于先生并不是庸碌之辈，而是可造之才。《恩师和战友——祝培源师九十寿辰》一文，记述了周培源先生指导对万有引力颇有兴趣的于先生从事《坐标系在引力场中的作用》毕业论文写作一事。于在周的指导下自学了 Riemann 几何，掌握了研究问题的数学工具；同时还自学了荷兰文初步。后来周在普林斯顿大学将论文给爱因斯坦看，爱氏提了些意见。周要于根据意见修改后由于、周二人署名发表，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于先生在物理学上的学术造诣。至于哲学方面的兴趣与修养，则更是从日后于先生成为知名哲学家这一成就可以见出。但是，于先生没有成为一位物理学家，甚至没有成为一位物理专业工作者。突如其来的学生运动打乱了水木清华里的平静有序，他无法完成周培源先生要他修改论文的任务，学业之梦暂时中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形势日趋严峻，我也越来越不能安心学习。在‘一二·九’游行后，我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更下决心



“一二·九”运动后组成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放弃自己多年想在理论物理学方面有所成就的理想，以全部精力投身革命事业。因此也就没有在写论文上继续下大功夫。那篇论文虽然在培源师的指导下最后完成了，但我一直有一种对不起他精心指导的思想。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没有过几天，卢沟桥炮声一响，我没有能再去找培源师。这又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直到八十年代，他告诉我，国际物理学界在与这有关的问题上有些进展，他也正带了一名研究生在研究。不过我早已荒疏，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做什么工作了。”到后来，那位研究生也没有完成这项研究任务，接着由于先生的师兄、物理学家彭恒武先生继续。此后的岁月里，成为科学研究管理者的于先生还一直对此论文多有牵挂。等到论文写出来，彭先生复印一份给于先生，于先生对“它的实质性内容，特别是他作的计算，已经全然看不懂了”，而只有一份惘然的追忆了：“彭师兄给我寄来的一共只有十多页的材料，却给我带回了1935年至1936年那些岁月中经常在脑子中考虑的问题。那些多年来不用的术语想起不少。这也算是对自己早已过去的六十五年前的青年时代的一次回忆吧。”（《彭恒武师兄实现了培源师的一个愿望——从与自己的毕业论文告别说起》）平淡的言语之中，分明可见他对物理学业的深情挂念。在《三强与我几个时期的交往》一文中，于先生记述说，1937年，他因革命工作暂时遇挫北上，想去考约里奥·居里的研究生。到北平后他知道同学钱三强已经报考，就有了借口：“我不愿意与三强争。”结果钱考取了出国留学。出国前于在给钱的纪念册上题写了一段有意思的话：“你出国深造钻研科学，我在国内干革命工作，等你学成回国，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你用你学得的知识为革命服务。”这种平实而深含青年人抱负的寄语，仿佛“一语成谶”，结果，“我的物理学是荒废了，而三强和泽慧成了真正的物理学家，我们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到一起来了”。在读于先生写下的这些旧年追忆时，从他对自己物理学业的荒废而多有负疚的感慨，我们



《于光远自述》

可以隐约地感觉到隐藏于其内心的一丝遗憾。很多年后，台湾学者、清华校史研究专家苏云峰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三联书店，2001）一书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一节特别指出，于先生“是当年参加学运有成的少数人之一，唯所任官职都与其所学物理无关”。

于光远先生对专业学习的放弃，在“一二·九”一代人中并非特例。国难当头，个人的志业，往往受制于国家、集体与时代的诉求。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在水木清华，越是学业卓异、条件优秀者，越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政治运动，回应着时代宏大的吁请。上述苏云峰书中记载：对于1934年前后清华园中左倾浓厚的情形，当年的清华中人、美籍华裔历史学者何炳棣先生回忆说：清华女生毛梅、孔富瑛、魏蓁一、陆璀、张韵芝等人，都是富家之女或出身西化家庭。“这些人都是越富裕越看不起钱财，要革命。”何后来问过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张韵芝：“难道当年用功读书就不爱国了吗？”张承认她们当年见解太褊狭。何炳棣所说的“魏蓁一”，即后来以作家、编辑家名世的韦君宜。韦的父亲是第一批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革命阵营的人士，后来成为一个富有的铁路局长。他坚持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个栋梁之材，一定要送她赴美深造。但这机会却被清华高才生韦君宜弃之如敝屣，在运动之后，她不顾关山阻隔，义无反顾地奔向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被视为知识分子背叛资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在其影响深远的回忆录《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中曾记载：1982年，一位留美的中年人告诉她，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在美地位极高。其中一位科学家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

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韦君宜说：“我间接地听到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韦的女儿杨团在为《回应韦君宜》（邢小群等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重提此事：第一位留学哈佛的法学硕士唐先生“曾亲口告诉母亲和我，他在美国曾遇到很多位华裔教授，不少人是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当谈起那一段历史，一位教授告诉他，他们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在学校拔尖的全都投奔了共产党；而且当下就算真的点出几个人了，说是这些人如果来美国发展，那一定会有辉煌的成就”。韦君宜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却因参加救亡运动而缺课超过三分之一，按规定只能不及格，要重修。但她“再没有心肠念线装书，读外语了”，“开会、接头、写宣传品、组织群众活动，还要躲警探的追捕，忙得经常旷课。虽然选了朱自清先生开的宋诗课、刘叔雅先生开的庄子课，但是我已经失却了研读这些典籍的兴趣”。自己感觉“实际上已经和职业革命者差不多了，学校不过是个旅馆”（韦君宜《我的文学道路》，载《回应韦君宜》）。在革命救国与个人志业之间，这一代人当时都有着一种毅然决然的态度：“为什么当共产党……我并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最简单的一点爱国心使我对国民政府产生了反感。……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入党的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向美国，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

放弃了这一机会。我在学校本来是很不错的学生。在中学屡次得奖，入大学读哲学，也觉得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什么的很有味道，实在。而休谟的人性论，使人深思，得一种思辨的快乐。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常识肤浅的战斗者……我由此成为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思痛录〉缘起和开头》）于光远先生说到自己参加革命，也几次用了“下决心”这个词。

同样为“一二·九”一代人的胡绩伟先生，1935 年考入华西大学数学系。当时的他“以为救国的道路很多，埋头读书将来作一个好教师，教出一批好学生，也是爱国。还是想走读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但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发展，“在我和朋友们的讨论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把谋求个人的出路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谋求国家民族的出路放在第一位？究竟是钻研数学，将来当一个好教师，当一位有名的学者，还是投身政治，做一个救国救民的政治活动分子？脑子里的思想天平，慢慢地向后一种主张倾斜。我对七八年热爱数学、钻研数学的痴情，开始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最终，他选择了全力投入抗日救国的政治运动，为此放弃华西大学这所教会学校所能提供的优渥的求学条件，而重新考入需要自己承担费用的四川大学政治系。放弃对数学的探奇，尽管感情上有些依依不舍，但胡先生还是从理智上考虑问题，“横下一条心”，“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在川大，他结识了南下的“一二·九”运动的骨干韩天石、王广义等人，创建了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使川大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策源地。因为频繁参加革命活动，胡先生经常逃学，经常深夜翻墙入校，成了一位逃学的“浪子”。到了最后，他甚至无法在上课前制造假象、伪装读书，无法拿出时间来突击复习以应付考试修满学分，干脆在 1937 年退学，成了职业革命者。他分析自己“思想上的来龙去脉”时说：“在很长时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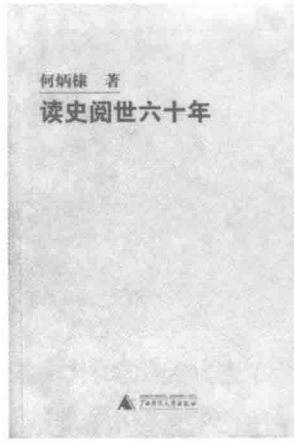


《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

我都以为民国建立以后，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35年我决定报考华西大学数学系时，不只是因为在中学时受数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喜欢数学，还因为我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而科学又是发展实业的有利武器，所以攻读数学是很好的选择。‘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爆发，我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国家的革命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就没有振兴实业的起码条件。这样我才下决心从华西大学的数学系转到四川大学的政治系，从实业救国思想变为政治救国的思想，认识到抗日救国是振兴实业的先决条件。”在“文革”中，有朋友和胡先生开玩笑说：“你当年如果走出国留洋当数学博士的道路，也不会落得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下场！”胡风趣地说：“如果当年成了洋博士，很可能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早就当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式的‘右派’了！”（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很难分得清，胡先生所答，是一种隐隐的遗憾还是一种自我的解嘲。国破山河在，热血书生拍案而起，这是每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学生运动的风云由此骤然打断了这一代优秀人才的学习历程和成才之路。在“华北之大，已经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蒋南翔语，《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的紧急氛围中，他们抱着一种特有的时代使命感，意气风发地离开菁菁象牙塔，

走向了更为开阔的时代舞台，汇入了更为激烈的时代洪流之中。

对于学生参加救亡运动，当时的教授阵营中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对学生们抛开学业，总是感到几分惋惜的。周培源先生知道于光远和另一位专业出色的学生杨学诚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之后，曾感慨："这个行动是共产党搞的，怎么我们系的郁钟正（即于光远先生在学校时的用名）和杨学诚也去了。"运动中学生长期罢课，想请政治态度较好的冯友兰先生来讲讲救亡，学生派韦君宜去请。冯见到韦，劈头就说："你们这次抗日的表示，也表示得有声有色了。现在怎么还未回来上课？"曾任学生会主席的陈其五先生在回忆录《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载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中说：12 月 8 日夜清华大学救国会决定次日发动学生游行请愿。"半夜十二时左右，校长梅贻琦叫人敲钟，全体师生员工都到大礼堂紧急集会。梅声泪俱下，劝阻我们明天不要去游行。说你们上街一定会与军警及日本兵冲突，是要流血的；说青年是国家的财富，爱国我很同情，但爱国也要爱校，这样闹下去学校可能被迫停办，清华传统就要中断了。当时，国民党搞的'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还有影响，清华同学中不少人还有出洋留学回来当教授的美梦。梅的讲话对中间派学生是有影响的。我曾跳上台去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梅校长是出自好意，但爱校首先要爱国，国之不存，也就没有学校了；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爱国青年不怕断头流血。我的讲话，得到同学们的鼓掌支持。"12 月 13 日，蒋梦麟、梅贻琦、陆志韦等北平高校校长联合发表《告学生书》，认同何应钦的慰问语，要求学生"埋头努力于学问之研求，更不必涉及课外之活动"，"努力培植自己，以为有用之材，将来在救国事业上一定可以收最大的效果"。但很快就被讥为"啼笑皆非""腐朽的'读书救国论'"。政治思想上偏于"威权主义"的学者蒋廷黻、胡适等人，更是支持"读书救国论"。胡适在《大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鲲西《清华园感旧录》

公报》12 月 15 日、《独立评论》183 号（12 月 29 日）分别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再论学生运动》两文，认为运动是“空谷足音”及“天下皆知的壮举”，学生遭受军警镇压是“最不可恕的野蛮行为”，但他以为学生应该复课，应当“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去寻求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青年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力量、方法和时代，“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的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永生即在《大众生活》1 卷 6 期（1935 年 12 月 21 日）、1 卷 9 期（1936 年 1 月 11 日）分别发表《为胡适先生“进一言”》《再为胡先生“进一言”》，反驳说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理由是“因为学生的救亡运动，并不是学生们无中生有的多事，而是客观的现实环境逼迫而成，要使学生们‘心悦诚服’必须对于这一点有适合需要的明确指示。胡先生却不顾客观的现实环境是怎样，在敌人飞机大炮威胁之下，一味硬劝学生‘复课’，这一种劝法，等于在大火烧的场上，硬劝消防队员抛却水龙头不要救火而回到家里去看小说！”

胡适的思想，明显沿袭了他对学生运动既同情肯定其爱国动机而又不赞成采取激烈行动的一贯看法。早在 1915 年他留美期间，留学生发起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胡适独立不依地在《致留学界公函》中说：“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对于五四运动，胡适也认为这“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它又是很不

经济的不幸事”，因此忠告学生今后应“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五卅运动后，1925年9月5日胡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说：“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一向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和斯铎曼“白血轮精神”的胡适，引用易卜生所说“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有时候我觉得这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劝导学生：“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国家主义的惟一大道。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我们须要明白了解：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认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的预备工夫。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他大声疾呼：“我们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近现代以来，学生运动此起彼伏，青年学生群体一直在国家急难与个人学业之间徘徊抉择，“一二·九”不过是这一冲突再一次更为紧张的重演。以自由主义灵魂人物胡适为代表的教授阵营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而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则无法平静地坐下来沉潜问学，这是两代人因年龄与阅历不同而生出的思想代沟，

但更是时代的矛盾与冲突在他们身上的映现。可以看出，师生两代人之间尽管有着共同的爱国之心，但其采取的策略与所选择的道路则截然不一。思想史家李泽厚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提出过“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此种概括是否恰当，至今还存在争论。但对于“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来说，这却大体可以看作是一种近似的概括与写照。

三

或许是因为某种微妙的历史差异，相对于“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研究的深入与丰富成果而言，对“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研究至今仍有其明显不足。除了诸如《一二·九运动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等简要史论及《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一二·九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1）等史料外，从知识分子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深入研究“一二·九”者，几乎难得一见。出自清华1934级的学者鲲西（王勉）说：“一二·九造就了大批青年，他们无论在抗战时期，在解放战争中，和后来建国阶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代许多研究中国近代青年运动历史者还没有对这特定的一群作详细的研究。这是一批不仅有觉悟而且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是建国中不可忽视的骨干力量，相应的说也是意识形态战线上有力的队伍。五四之后那一代青年就不具有如此鲜明的倾向和凝聚力。”（《读同龄人书后》，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清华园感旧录》）相继问世的《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韦君宜著《思痛录》（另有此书修订本与《露沙的路》的合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赵俪生著《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另在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赵俪生文集》有补充）、

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刊《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2期，后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等书，对此都有程度不一、角度各异的涉及。在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和合著《思想操练——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中，都收录有高增德、谢泳、智效民、丁东四人的对话《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对“一二·九”群体有深入的剖析。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这是对“一二·九”知识分子思想变迁作出全面论述的唯一一篇。高增德先生说，“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法，最早是何家栋先生在《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一文中提出的。何说：“‘一二·九’一代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却要晚得多。顾准是这一代思想家中的骄子。……杜润生、于光远、李锐、邓力群、胡绳、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邵燕祥等均可列入‘一二·九’一代，虽然他们在年龄上有十来岁的差异。”智效民特别提出要注意这一代人“有足够的丰富性”。谢泳则概括性地将1910年到192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划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三大类型。“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复杂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群“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他们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40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50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

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走向了延安，却又并未在思想上与典型的延安知识分子完全重叠，历史在这里体现出了它复杂而深沉的内在逻辑，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体味。

今天来看，“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的差异，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对集体组织的认同和对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左”倾的警惕程度不一，或者反过来说，是对自身个性坚持与守护程度的不一。于光远在《一个有关程淡志的故事》一文中记述过一件旧事，很能说明这一点：“这个时期在北平这些青年党员之间有一个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做民先工作的人强调在众多的青年组织中间要有一个骨干组织，这个组织就是民先，它是青年组织中的左派团体。我是站在这个观点立场上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这样的左派团体会受到反动派的镇压，必然变成狭小的地下组织，起不到好的作用，因此不主张去发展这样的组织。”从《忆蒋南翔》一文中可知，持后一种反对意见的主要是蒋南翔、杨学诚等人。该文转述《蒋南翔文集》所说：“大约在1938年7月间，党内有一次争论。民先总队部李昌强调民先队的作用，要用民先来统一全国的青年组织。王明不太了解情况，以为‘一二·九’运动是民先队领导的，主张发展民先队解散其他团体。针对国民党正在搞三青团，王明要以民先与之对抗。对此，我和杨学诚等不赞成。民先在‘一二·九’运动中确有其作用。我们也是民先的发起人，但是当年在北平学生中体现党的领导的是北平市委学委。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自学委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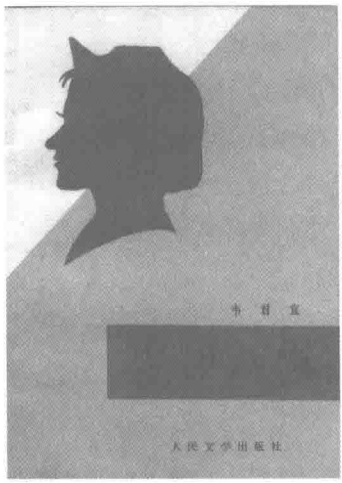
出来了，学委领导着大中校，中学有一个支部，大学由学委直接领导。在王明召集的长江局青年干部会议上，我发言表示不同意，认为青年人的组织应该多种多样，青年救国团在武汉有基础，民先在北平有点‘左’了，如果搞全国性的民先，当局会不会让其合法？王明听了很不高兴。”于先生尽管在文章中补充性地认为蒋对当时的情况了解得不确切，但他承认：“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局作出这个决定的确没有很好估量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因为不久以后，国民党不但宣布民先不合法，同时也宣布青年救国团（外加一个蚂蚁社）不合法。”

说到蒋南翔，80年代末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曾提及他作为“一二·九”运动领路人的一些表现，可以见出他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的一些冲突。如1937年后，北平学生开始流亡。当时北方局的领导人刘少奇主张学生，特别是学生骨干都要留在华北抗日；而一向钦佩刘少奇的蒋南翔在这一问题上却有不同看法：大批学生留在北方抗日当然重要，但不能绝对化。“许多学生是南方人，他们自然会回南方。至于干什么应加以引导。其中革命学生要到北方抗战，人家爸妈来叫，也得先回南方转一转再来干。另外党组织也需要一批学生骨干回南方开辟工作，因为当时南方城市地下党被破坏得很严重。”结果蒋受到批评。1938年，蒋在武汉开全国学联大会，他认为南方无人主事，主动跑去了。结果刘少奇致信南方党组织，批评蒋擅自跑到南方。直到1985



蒋南翔先生

年撰写《一二·九运动史要》时，对这种与组织之间的分歧的定性还让编者们棘手，只好将两种做法据实叙述而未下结论。吴承明曾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在抗战开始后脱离了救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杨述写文章还提及吴只顾家而不想干革命的事，蒋反对说："这何必？何必现在在报刊上来批判小吴？他总还是做过工作的。"韦君宜指出，这是蒋在讲原则时又讲感情的另一面。这一点，也反映在蒋对其他事件的看法上。1943 年蒋南翔上书中央，指出在延安用运动方式审干是错误的，说以"抢救运动"成绩为主是错误的；只知要工农干部而歧视知识分子干部，更是错误的。蒋因此受到党内批判并被发配东北。80 年代蒋病危时，还执意将意见书拿出发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一次团中央讲话中对党团工作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表示激愤，说："与其宁'左'勿右，还不如宁右勿'左'好。"这些，我们都能看出早年清华经历对蒋南翔的深远影响。



韦君宜《露沙的路》

运动之所以出现脱离救亡活动的游离者，原因多在于这些人对运动中过"左"思想的不适应。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黄华在回忆录中也曾说及当时学生运动中的思想分歧。他说：南下扩大宣传团中由天津同学组成的第四小队，"对于扩大宣传团印发的宣传材料有意见，他们不赞成《时事打牙牌》小调中的'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　'五年计划真伟大'等语，他们说我们是出来宣传抗日救国的，你们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听这些不相干的东西，有什么必要呢？我们喊'拥护政府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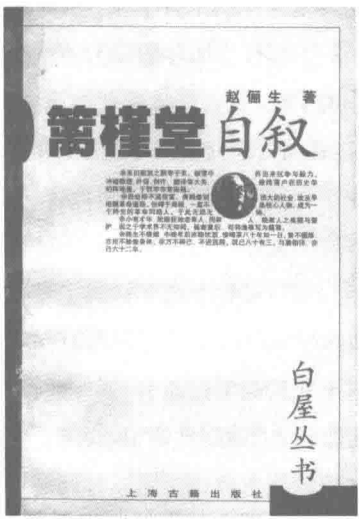
日’的口号，你们有些人为什么用‘拥护抗日政府’的呼声把它压下去呢？”此外，他们还对《打回老家去》剧本中某些台词不赞成。意见一提出来，立刻引起另外三个小队的驳斥，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谁也不能说服谁。黄华反思说：“‘一二·九’运动是一场来势迅猛推动抗日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就讲不清国民党军队见了日本兵就后退的原因；如果不透露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不谈论共产党，就看不到‘停止内战，共同对敌’全民抗战的光明前途。抗日和团结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大时代必然带来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巨大变化。许多进步同学受压抑已久，今天能够结成一个队伍喊出自己心里的声音，很自然地要歌颂共产党和苏联；在沿途交谈和同声歌唱之中影响了很多中立的同学，促其转变，壮大了左派的力量，这正是扩大宣传的一大成绩。但也应当看到另有一些同学，他们自幼生活饱暖，一直受了国民党统治思想的蒙蔽，对于共产党非常陌生，对于进步同学热烈赞颂共产党感到不习惯，对一些新口号新观念骤然之间接受不了，性急的左派同学操之过急，对他们缺乏耐心的等待和帮助，并给扣上‘落后’甚至‘反动’的帽子，就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第四小队的同学们返校之后受到在校同学的欢迎与慰劳，请他们报告扩大宣传的经过，他们看到校内有些同学在做近郊的抗日救国宣传，他们也去参加了。后来南下扩大宣传团被军警逼迫返校，党组织在南下归来的积极分子中建立先进青年的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把第四小队的同学视为老战友，其中有很多同学也参加了民先队组织。在以后的救亡运动中，他们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参加了八路军，大多数表现得都不错。1961 年出版的一本有关‘一二·九’运动的书上说：‘燕京大学就有少数学生在大会上提出不同意歌唱共产党和苏联’……‘这是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1980 年出版的一

本有关‘一二·九’运动的书上说：‘燕京大学就有少数学生在大会上提出不同意歌唱共产党和苏联’……黄华‘在会上反复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必要的批评’，这些说法都与事实有出入，当时我只能和同学们商量，谈不到‘教育’。对于统一战线之中的朋友，需要求同存异，固然也可以批评，但是也不必对于某些人思想转变以前的曲折抓住不放，一直作为文章中的反面事例，失去对待抗日战友的风度。‘一二·九’运动是一次极其广泛的青年运动，发动千千万万的学生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才把共产党的政策和影响扩散开来，如果光记着一些先进分子是一贯正确的，那也不是‘一二·九’的精神。”（黄华《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学会革命》，载赵荣声、周游编《“一二·九”在未名湖畔》，北京出版社，1985）应该说，黄华的观点是符合历史主义的。

但与蒋南翔、黄华等运动参加者对组织运动中“左”倾思想持警惕态度相比，“一二·九”运动中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对组织本身即有不适应之感而最终归依为学者，典型的即是赵俪生与王瑶两先生。赵自剖说：“我和我的许多同学走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是拿革命热情在搏斗中去经受考验，从而产生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又在组织中经受考验，逐渐成为组织中低层和高层的头头，后来成为大人物的。”运动后期，赵因表现积极而被组织相中，蒋南翔找到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的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赵“明白了，他是在启发我，要我提出参加党的申请”。但经过认真考虑，赵认为自己受不了布尔什维克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表示他只愿意做一个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大学·一二·九学生运动》，《篱槿堂自叙》）抗战前夕，“民先”派赵到山西参加牺盟会的训练，但这位书生仅因为手头正在翻译一部苏联小说，

便推迟了半年行程。到了太原后，先到一步的清华同学已经是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了。不久，他在山西抗日前线因遭遇日军而撤到延安。在这个革命圣地，他也“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紧迫要求”，遂取道西安返回二战区。赵的一生尽管始终围绕着组织在转，并在晚年还被美国同行讥为“特务”，可是他本人对组织却似乎一直持游离之态。在回忆录中，赵俪生数次对“左”的政治痼疾表示出反思，并认为“论它的根源来说，它来自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过分强调，唯恐出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等”。

王瑶先生在“一二·九”运动前后由运动积极参与者到埋首书斋的学者的转变，更是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一个典型个案。运动中，王先生激情四溢，1936 年先生撰短文《一二·九周年》，提到大学生自“一二·九”运动后“不再念死书了”，但“从考试的成绩说，好学生逐渐变成了坏学生”——这自然是从学业而论。在运动中，王瑶因游行而数次遭军警拘捕；加入中共的他，担任《清华周刊》第 45 卷主编暨清华文学社刊物《新地》编委，以笔为枪大声疾呼。有一则日记体小品《这一天》，记下了他 1936 年 11 月 11 日（周三）的活动与心态：“礼拜三是发言论和新闻稿的时间，同时周刊副刊的校稿也定得是这天送来。早起后急忙预备发言论稿，一边拿红笔批着‘两栏’，‘四号仿宋’，一边还计念着第二时有课，但结果不觉得又把课误了，‘诗经’也没去听。十一点就吃了饭，骑上车子巡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

视了园内一周，看有没有甚么特殊事件，怀着‘唯恐天下无事’的心情……下午给大学出版社打电话凡四次……都是催赶快送来校稿的。下午写了一千多字的杂文，有一点体育也没有去，今天整天就没上课，五点时又去催促两位同学让赶快交稿子。晚修书两封，读《世界文学史纲》一章，听两位同学辩论中国政府抗敌的可能性问题约半小时。”——那是一副雄视天下的革命者姿态。及至1937年间，当他的老师闻一多、吴晗等一向埋首书斋的学者拍案而起时，王瑶却悄然隐逸脱党，没有去延安、瓦窑堡，而是关山辗转，走进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乾州，他与清华同窗赵俪生“合盖一床”，不眠“畅谈”：“经过几昼夜的畅谈，我们认为，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那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一个在1937年前并不欣赏亦不理解魏晋风度的左翼理论家，到1942至1948年，竟沉潜问学，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中一待就是五年，完成了至今仍是典范之作的本科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王瑶先生当年曾经因清华教授劝同学静心读书而气得跺脚；及至数年后，自己却一心在学术中优游涵泳。这种反差，令所见者惊讶。何善周说，朱自清在联大为研究生开专题课，“曾有一门课程只昭琛（即王瑶）一人修习。朱先生如同上大班课一样，站在讲桌后面讲……昭琛坐在讲桌前面听讲。师徒相对，朱先生一直讲解两个小时”。很难想象先生读本科时亦有此耐心且循规蹈矩。季镇淮先生晚年忆起王先生复学之认真则是动情：“上朱先生的课，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当时坐在后面听没动手……特别觉得王瑶学长这样老实地听课抄笔记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1946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去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夏中义研究王瑶的长文《清

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先生书》（载《九谒先哲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一文，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是难得的好文章。夏以为王先生由经世从政而遁世治学的转变，是“从‘革命崇拜’向‘个性本位’的价值偏移”。自认为是“一二·九”运动培育出来的代言人的王瑶，因为思想稍显个性化的倾向，所以和清华组织关系紧张，他想到上海借党的力量编一本杂志，做一个文化人，而不想随时遵命，不愿去农村工作。这就犯了组织体制之大忌。夏中义的描述颇为有趣：“先生当年对组织之苛求，并非‘献身’，而近似‘入股’。‘献身’是无私地把自己整个儿交出去，不图酬报；‘入股’则永远是以个体身体身份参与某格局之协作，占个地盘，企盼于己于他皆有益，适则宜，不宜则撤，且抽回先前之投资。”在犹疑之中，他最终选择了个性本位的魏晋文学。王瑶对个性的守护，直到晚年仍真诚流露，有文章曾记述他说：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一要有“知识”，二是个“分子”，有独立性。没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会成为姚文元式的痞子。

从对待以徐高阮、蒋弗华等为代表的“转向”人物的不同态度，也可以看出对集体的认同程度。随着运动的发展，阵营中出现思想分歧。1936 年 10 月 10 日，徐高阮发表《论无条件统一》一文：“我们应该提出来的口号是要求无条件的统一，我们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的统一起来。”蒋则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一文，提倡“切莫让我们知道你们是一些左派或右派”，“莫再傍人门墙，好回到自己的天真，认清自己的愿望，树立自己的意见”。他们与王芸生《大公报》上提出的以国民党为中心“团结建国”的口号相响应并得到国民党的支持。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北方局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文章对此提出了批判。在《记被〈一二·九运动史要〉说作是“右倾投降主义者”的一伙人》一文中，赵俪生对在《一二·九运动史要》一书第十章第三节《反

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中对以徐芸书(即徐高阮)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提出异议，对“半路从小站上下车”的革命者被扣上“投降主义”的帽子作出同情之理解与辩护：“加一百倍说，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上在半路小站上下了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青年，聪明绝顶，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真如朱德元帅所说，革命如次列车，有从起点上、终点下的，有半路上、半路下的。这两种人中间在价值上自然有很大的差别；但只要不是预先带了炸弹上边来搞破坏的之外，就总是‘同路人’吧。”赵先生并进一步分析说：“除了这些‘同路人’主观方面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有的甚至是很严重的弱点外，在革命队伍本身，也存在着更严重的弱点，那就是‘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正如少奇所说，它长期残留在革命队伍之内，缺乏对它的揭发斗争，使它千百次地重演，损害最大。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领导者们对搞关门主义的有奖，对联系群众和同盟者的给处分。在组织上，他们深深惧怕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进入先锋队里来。因此，那些已经进来的必然日子很不好过，心里很不好受。久而久之，一些阶级觉悟不够坚强的人就有可能游离开革命的总轨道，有的终身坚持自己的‘民主个人主义’，有的就不免有了‘失足’的行为，事情的原过程说到底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说到底，这是个双方都有责任的事，不能片面怪罪这些‘坏家伙’‘混进来’又‘滚出去’，一块臭肉搅浑了一锅汤。”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无疑有赵先生自己的体会与写照在内的。赵先生将这种意见告诉韦君宜，韦回信说：“以今日视五十年前，何妨若一百年后视今日？”赵在文章说韦只是“不拟深论，略打马虎过去”。80年代的韦君宜，毕竟还不是写《思痛录》时代的韦君宜，当时的她，还是无法细论这一代人。鲲西先生对此亦持赞同意见。他强调说当年青年队伍中出现的思

想分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思考。“当年清华园出现的这小小的裂痕所以没有发展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在近代西方文人的转向是屡见不鲜的，著名的如纪德，这本书也提到了。西方有宗教上的改宗，这是由于他们宗教史中有过激烈的冲突，有宗教迫害等等。中国没有，儒家是太过于宽容，不具有激烈色彩，所以从澎湃的革命形势来看，清华园中少数几个人的声响自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当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在以后走过漫长而曲折的路程时，人们会不会反躬自问少数人的话有没有可供思考的地方。许多当代回忆录所缺少的正是作者这种坦诚的反思……”（《读同龄人书后》）对此持同情态度的，还有运动中人、后来以散文名世的黄秋耘先生。他在《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内部斗争》一节描写了知识分子运动中的分歧。民先队内部分裂成少壮派与元老派两部分。清华民先大队长吴之光“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并且有点罗曼谛克色彩的人，文章写得相当漂亮，很有演讲天才，但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他是不能胜任的。他当时正沉溺在爱情的纠葛中，情绪低落，无心工作。这就引起了民先队队员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后来重选李昌为大队长，于是就分裂为两派。少壮派与元老派在政治上的分歧，“大体上是少壮派重视发动群众（指广大大中学生），而元老派则重视联系上层工作（指对二十九路军将领、教授和社会名流多做统战工作）；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而元老派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少壮派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倾向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当然，随着矛盾的激化，元老派就越走越远了。例如徐高阮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党的独立自主路线，主张无条件的统一；还有个别人也写文章宣传取消左派与右派之分，要搞‘统一的’救亡运动。后来元老派中的不少人都自动离开了党，或都被开除了党籍，虽然他们是清华大学最早的一批党员”。黄秋耘在政治主张上倾向于少壮派，但他

坦承，“由于我的‘调和派’的天性，我总觉得让一些有才能的人离开了革命队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不过像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公开说出来。当时在大多数民先队员看来，元老派当中某些人是必须清洗掉的，否则就不能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独立性。我不是政治家，对这样复杂的政治问题实在搞不清楚。对于‘内讧’，我感到担心，但又无能为力”。

政治与文学、个体性格与革命集体之间的冲突，一直是知识分子面临的两难选择。鲁迅先生《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中所说的“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进在冲突之中”，是众所周知的论述。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06）一书论及鲁迅晚年思想时说，在20世纪，集体与个人的内在紧张关系，是最富于现代性的问题之一。黄秋耘先生在散文《两条道路》开首即引马门教授所言：“应该斗争的时候不去斗争，这是比什么都更大的罪恶！”在文章末尾他又结论式地说：“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向罗曼·罗兰学习，向闻一多学习，在未做成功一个文人之前，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战士。少许的天才和一两件艺术作品又算得什么？假如对苦难的人世毫无裨益。”但他同时以理解之同情承认：“知识分子是敏感的，同时也是脆弱的；是锐进的，同时也是勇退的；是自尊自傲的，同时也是自恕自怜的。他一忽儿可以如醉如狂地耽溺在革命的狂飙中，为着地球辽远的一角所发生的一桩违反正义的事情而怒嗥狂吠，呼唤着暴风雨的降临。但曾几何时，当革命遭逢了一再挫败，大家都碰到了一场焦头烂额的苦难之后，他就会像彼力脱一样，赶快在统治者面前洗净了双手，悄悄爬回‘艺术的象牙之塔’里蜷伏起来。幸而这个红外线岛倒是安全不过的堡垒，可以收容任何战败的心兵，当创伤养好的时候，仇敌早已忘却了他，他也早已忘却了仇敌。至多在三两杯老酒到肚时，对人们发发牢骚，‘寄沉痛于幽闲’罢了”（《两条道路》）；在《革命的机器和革命的人》一文中，他辩证地批评了对现实



黄秋耘《丁香花下》

麻木不仁的厌倦态度和冷酷无情的“革命”态度：“人是有血有肉的，假如绝对的放逐了感情，否定了感性生活，那就只有变成‘机器’，不成其为‘人’了。……总之，对于一个健全的人，理智和感情不是一个矛盾体，它们可以统一起来，不会互相冲突，可以平衡发展，不会一个远落在一个之后。……是的，我们今天不需要悱恻缠绵的少年维特，也不需要哀伤沮丧的屈原，他们只会让热情烧毁了自己，而不会用它来征服外界的苦难。但，另一方面，从痛苦的热情里面生长起来的罗曼·罗兰，永远爆发着生命的火花的贝多芬，他们壮热的精神、伟大的梦想和英雄的心愿，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肉中的肉，我们的血中的血么？”今天读这样的文字，很容易让人想起黄先生个人的历史。革命者瞿秋白在忏悔文本《多余的话》中慨叹自己参与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这种回首自伤的言语，透露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沉喟叹。

四

韦君宜在为其亡夫、同是“一二·九”中人的杨述的旧稿《一二·九漫语》出版所写的题记《老一代有什么难懂的呢？》一文中说：“成书之后，重读一遍，依然不能不被书中所写的情景所激动，偏偏回到了我们的青春时代。……它勾起我无数的回忆。……他写的是近事，是他的亲爱的朋友和同学，因而无所顾虑，尽其所知。写这辈青年怎么走进革命队伍，怎么掀起这一场轰轰烈烈运动的真实情况。人，谁是天生的完美无缺‘高大全’的人物呢？这小书告诉我们：什么人也都有过自己青年年少的时代，也曾‘常见男生追求女生，又看电影又滑冰’，而同时，它又告诉我们，年轻人如何自然而然地、英勇地走向斗争，抛开家庭，离开学校，舍弃生命……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终于成为一代英雄。”但是，对于参与历史而又因自己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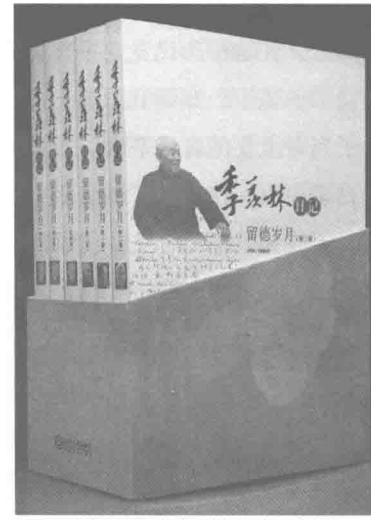
造的历史而饱经折磨的那一代人来说，当怀着一种情结重审当年时，他们毕竟多了一份反思，而不再是空洞地喊着“青春无悔”。如在“反右”运动中，韦君宜私下对好友黄秋耘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思痛录》）以至于当后来韦君宜审视比她更年轻一辈的历史创造者知青作家时，就发出了这样的质问：“这些胡闹了二三年的学生们，最后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贵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岁时究竟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一切，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对自己参与“一二·九”与后一辈的青年参与“文革”，毕竟不是可以相同而论的事情。但对“运动”这一校园外活动本身的审视与深层思考，则多少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1994 年，韦君宜在《我对年轻人说》一书后记中曾感叹：“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一二·九’的青年，都已经到了这辈子该划句号的时候了。”及至今日，胡绳、王若水、韦君宜、黄秋耘、黎澍、李慎之等都已经远行，一代个性鲜明、元气淋漓的知识分子群像渐渐隐去，但关于“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探索，则才刚刚开始。

2004 年 3 月 7 日

季羡林留德日记中的储安平

季羡林1935年8月31日离开北平，1946年5月19日返回上海，在远隔万里的德国留学十年。十年羁旅，万里投荒，1988年他回首写下《留德十年》来记录这一人生经历。在国外，季羡林经常接到国内同学朋友寄送的书报，如清华大学同学李长之代订的《大公报》、许大千寄送的《北平晨报》等，帮助他了解国内的消息，慰藉异国求学过程中的艰苦与寂寞。以至于季羡林说：这让他“进一层了解了友情的可贵，家庭已经不能给我任何安慰。能在我寂寞的心上滴一滴甘露，使我在人生的途还有勇气走上去只有Freundschaft(友谊)了”（1935年12月29日日记）。其中，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论家、新闻人储安平



《季羡林日记》

给季羡林寄送《文学时代》杂志并约请他撰稿的一段经历，给季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最近出版的《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946）》（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对此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可以见出20世纪中国这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年轻时的交往与情谊。

季羡林1930年至1934年求学于清华大学，储安平1928年至1932年求学于光华大学，一在京一在沪；按当时京海文化圈的划分来看，一为京派一为海派。尽管经老师徐志摩等人引介，储安平成为京派名刊《新月》撰稿人，而身为“清华四剑客”之一的季羡林与京派圈子多有接触；1931年2月，在光华读大三的储安平曾一度转学入燕京大学，在北平生活二十多天后重返光华，但储与季两人何时开始有了直接交往，现在从他俩的文字来看，不太容易确定。

1932年大学毕业后，储安平进入南京《中央日报》。从1933年到1936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央公园》《文学周刊》和《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有意思的是，在这份国民党党报努力倡导“三民主义文学”以服务于国民党思想建设的情境中，其副刊思想上却体现出一定的弹性与宽容的色彩，成为知识分子当时重要的言论平台。1935年11月15日，刚到哥廷根大学半月的季羡林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储安平的身影：早上，季接到储的来信，告知“《笔院》（应为“笔苑”——引者注）改名为《时代文学》（出刊时改名为《文学时代》——引者注），已经同时代公司签了一年的合同，希望我多多写文章。我给他的信，他预备在《中央日报》文学副刊上发表”。“时代公司”，即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日后以言论与思想著称的储安平，这时仍是一位典型的文学青年，致力于散文与小说的写作，其文字体现出“河流般的忧郁”。一方面，出于对当时海派文学大面积商业化的不满而想办一纯文艺刊物以维护文学的尊严；另一方面，虽说有纯文学副刊《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但

毕竟版面小，容量有限，不能完全施展文学编辑的抱负，所以储安平一直想办一份纯文艺杂志。杂志原定名为《笔苑》。几经联系，邵洵美、张光宇等人合资在上海成立于1933年10月的时代图书公司答应接手。这家图书公司旗下的《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等几家杂志皆以“时代”为名，因此《笔苑》改名《文学时代》。从下面论述时要引证的季羡林日记可以看出，在停留柏林的1935年10月4日，季羡林曾经给储安平写过一封信，告诉他途经莫斯科与到柏林后的初步观感，最后说：“在半个月里走了几万里路，几个国家，这是我生平最长的一次旅行。我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看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怪人，同时还有许多令人悲喜交集的困难，终于平安到了柏林。我有许多文章要写，但因为想要学习的太多，只好暂且储存着，等将来写。异邦寂寞得很，希望抽暇写信给我。”储回信给季，并告诉他杂志的新消息，约季写稿。这时，季羡林已经离开柏林，选择了在德国西北部的哥廷根大学留学。在去大讲堂上课的路上，季羡林就开始构思写作的主题，想先把自己对哥廷根的初步印象写一写。“哥廷根的确有它的妙处，只就每天来往走的那一段古老的城墙来说，就是一首美丽又凄凉的诗。”但刚到哥廷根，上课读书，满脑袋里装满了拉丁文、德文，实在没有写文章的余裕，一直到一周后即23日，正是周六，窗外是阴沉的天，下着蒙蒙的雨，正是季最喜欢的时候。他决定把自己“对这小城的印象同我的寂寞全写一写”。但写得并不顺利，后来决定“寂寞写一篇，哥廷根写一篇。回来就写寂寞，而且把题目改成《忆故国》”。从以后《季羡林文集》等集子收录的情况看，《忆故国》不仅写成了，而且还是以《寂寞》为名。至于写哥廷根那篇，反复几次，仍然写不出来。一天大好的光阴白白掷掉了，只好预备过几天心情好转后再来写文章。12月2日，季羡林写了一篇《表的喜剧》寄给储安平，并附上信说：“来信要稿非常恳切，只好寄点去了。但《表的喜剧》写得并不好，也只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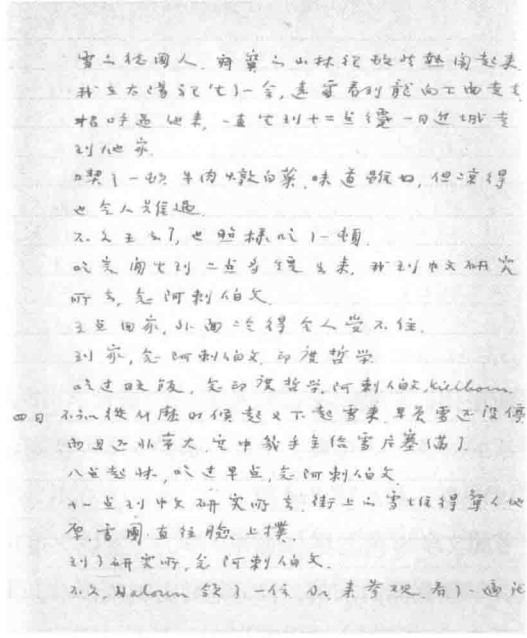
这样了。”转眼到了1936年1月9日，季羡林收到储安平寄来的《文学时代》创刊号，同时杂志的出版单位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也寄给了他一份。刊物封面上标“纯文艺月刊”，印刷不坏，内容也还过得去。他读了一点就去上课了。下了课回来，心里烦躁，看歌德的诗，他根本读不下去，仍以《文学时代》消遣。13号，季又收到储寄来的一份《文学时代》创刊号。在空白页上，储还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们隔得这样遥远，而我们的心灵又像这样的挨近。我读了你的信札，我们感情很冲动。”季读了这短短的几行，感情也很冲动。他同储安平还没有见过面，“然而在我的心里已经给他留了一个角落。我因而又想到别的朋友，我真觉得朋友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若我没有朋友，我从什么地方得到安慰呢？我没朋友，我一定会死。我在世界上所有一切值得留恋的就只有朋友了。我预备写一篇文章，就叫《朋友》”（1936年1月13日日记）。储安平在信中还告诉季，他的《表的喜剧》与来信拟安排在《文学时代》第三期发表。这又引起了季创作的兴趣，在去上课的路上就构思了一篇关于哥廷根的文章。（14日日记）16日，季羡林给储安平写回信，表达他的感谢。季想起自己的创作心路。在清华读书时，季曾经做过文学梦，也发表过一些散文、书评等，但他对自己的创作才华不太自信。师友看了作品，却多为季叫好，如叶公超说他很有希望，吴组缃读了《母与子》竟至于大哭，沈从文主持的天津《大公报》副刊一口气刊发季的《枸杞树》等多篇散文；而现在，又遇到了一位储安平这样喜欢自己的文章的人，虽说只大两岁，但毕竟是已经成名的中央党报的名编辑，热情地向季写信约稿，把他的信发表在《中央日报》文学通讯上，当然令季羡林感动。“这次寄了稿去，他把别人的稿抽掉排入我的，还把我的信发表在编辑后记里。这都是小事，然而也可以证明他对我的文章有相当的爱好的。我以后要多写，才对得起爱读我的文章的朋友。”（1936年1月16日日记）



《文学时代》创刊号

整整一个月后，季收到储寄来的《文学时代》第三期，《表的喜剧》与季 1935 年 10 月 4 日在柏林与 12 月 3 日到达哥廷根大学后给储的两封信都刊出来了。在后一封信中，季除了向朋友倾诉独自在哥廷根学习的寂寞，最后说："离开了中国以来，确乎看到了许多东西，得到了许多感触，时时要想写点东西出来。最初因为生活不安定，没能写得成，近来生活安定多了，但又有许多书要读，而脑袋里填满了拉丁文单字，搅乱得乱七八糟，仍然写不出东西来。上星期日对着稿纸坐了一天，但脑筋里一会想到故国，一会想到头一天听过的堂课，一会又想到应该写的信，任着幻想飞来飞去，一天也没写出一行来。你既然要我写东西，当然得写。想来想去，只好在百无聊赖中仓卒中写成的一篇不成东西的东西寄去应命。倘若不能用的话，丢到字纸篓里好了，这玩意儿也不值得保存。然而写的虽然是不关重要的一件小事，但也可以看出初到外国的傻像，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可以先后媲美了。"《表的喜剧》所记述的，正是季羡林初到大都市柏林后，"简直像在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里摸索"而发生的一幕小小的喜剧。1935 年 9 月 17 日，刚到柏林的季羡林，将在途中碰碎了玻璃罩的手表送去康德街上一家钟表店修理，并约定第二天去拿。可是初到柏林的季羡林，很快迷失在高楼大厦丛林中；自己又不愿意再麻烦朋友带路，第二天就凭着隐隐约约的记忆信步进了一家表店。结果，店员老头夫妇找了两天，仍然找不到手表。第三天，在玻璃橱里翻腾了半天而满头大汗的老头细看发票，才说这不是他店里的发票！季羡林也恍然大悟：是自己找错了门！"当我想到两天来演的这一幕小小的喜剧，想到那位诚挚的老头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的神气的时候，对着这大海似的柏林，我自己笑

起来了。”在杂志的“编辑后记”里，在对宗白华、杨丙辰等知名作者进行简介后，储安平特意说：“最后，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辽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本答应在去国之前赶一篇文章给《文学时代》，可是他竟然走得那样匆忙，他穿过那荒凉的西伯利亚，取了那顶短捷的路程，直奔柏林。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之后，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当我们接到了他这篇《表的喜剧》，我们有说不出的感动。”学者谢泳对季羡林的这篇散文本身没有发表意见，却注意到储安平同时安排发表的季的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特意指出两句话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谢泳《储安平与季羡林》，《厦门集》，知识出版社，2010）这句话，是季在柏林向储写信介绍赴德途中经过莫斯科停留一天的情况生发出的感触：“下去随便看了看。因为领导的人是俄政府派的，我们不能随意乱跑，所以我们的参观是被动的，只参观被指定参观的几个地方，实在乏味得很。”“他们似乎特别不欢迎旅客”，刁难签证者，入境后限制自由，外国人只能用美金，如果用卢布被发现要入监狱；物价贵，“俄国政府真有她的怪劲”。很明显，俄国并没有给路过的季羡林留下好印象。储安平在给季羡林的复信中说：“我们虽没见面，但从你的文章和信札中，我却对你产生一种感情。所以常常会无理由地想到你。”而季羡林也常常想念储。上一封写在创刊号空白页上的信，让季几乎要流泪，“彻悟了朋友的意义”（1936 年 2 月 17 日日记）。26 日，季的日记再记：“安平每次来信，总提到稿子，而且自己也真有许多东西要写。只是因为工作太多，实在抽不出工夫定期写，所以便迟拖下来。”他决定写篇《听诗》，仅一天写了四千字。第二天，季的心一直陷在那篇文章里。“想寄给安平，又想改一改。但现在



季羡林日记手稿

刚写完了，自己再看一遍也看不出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坏。放下不看，心还是照旧向那上面转。最后下了决心，写好了信封，又写好一封短信，将文章纳入里面，封口了事。也总算去掉一件心事，好坏管它去了，登出来再看一遍再说”（1936 年 2 月 27 日日记）。一直等到 1936 年 8 月 11 日，季羡林接到储安平寄来的《文学时代》第六期，上面有他的《听诗》。而这期杂志，也正是《文学时代》的终刊号。

可能因为受储安平约稿的鼓励，已经打定主意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古代文字并进入了状态的季羡林，对写文章搞创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在清华园读书、济南高中教书以及准备留德时，季羡林虽说一直对写作有兴趣，且已经被视作名作家，但他对自己的创作才华一直没有自信，写文章从来不像老朋友如李长之那样倚马千言，而更像老农一样惨淡经营苦不堪言，经常被折磨得神经衰弱，头昏脑涨，怀疑自己不是块写文章的料。1934 年 2 月 20 日，他在日记曾写道：“我现在总觉得，一切事情都可以不去做，但却不能不写文章。我并不以为我的文章是千古伟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只不过我觉得这比一切都有聊，都更真实而已。”（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而到了 1936 年，季羡林却“始终觉得自己能写出极好的文章，写出的那些也不比任何人坏。说自己有天才，未免太狂妄。但除

了这两个字，还能用什么字呢？我每次想写一件东西，一个人，一个情景，眼前立刻有一片活的幻象浮动起来，我只是用这支笔把这幻象写下来，这就是我的文章”（1936年3月8日日记）。

不过，储安平的文学编辑之梦与他对文学的“发烧”很快就告结束了。1936年3月9日，季接到储的来信，告诉他要去英国读书，向季咨询西伯利亚铁路的情况。原来，1935年，储安平作为《中央日报》的特约记者，利用采访1936年柏林夏季奥运会的机会，考取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季看了来信，“心直跳，很久以后，才能再把心静下来读单字，念文法”。第二天他就给储回信，告诉储出国的情形。17日季羡林又一次拿出《文学时代》来看。“真怪，我老想到安平。我同他虽然还没见面。他来信说：‘常常会无理由地想到你。’我现在不也是会无理由地想到他吗？我想他一定是很可爱的人物。”1936年5月14日，正在苦读梵文的季羡林接到储安平的信，告诉他下月将放洋，季为朋友感到非常高兴。此后，储安平赴英留学，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自由主义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写出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等思想与观察双美的名作。当年曾经热烈地做过文学梦的青年，开始转向深刻的自由主义思想建构。但此后，季与储仍然保持着联系。1941年12月11日季记日记：“吃过晚饭，看安平《给弟弟们的信》，Kielhorn（基尔霍恩），杜诗。”12日记：“吃过晚饭，看《给弟弟们的信》，看杜诗。”1945年6月19日，正在德国等着回国的季羡林日记仍留下这样的记载：“七点多回家来，吃过晚饭，看安平的《给弟弟们的信》。”《给弟弟们的信》是储安平写于1932年、1936年4月由夏丏尊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的一本小书。作者以虚拟“给弟弟们”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青年人道德修养的一些看法。这也是储安平的诸多著作中，容易被人忽视的一本（2013年，笔者承谢泳先生的帮助，促成该书在江西教育出

版社再版）。不知何时，储寄赠给了远在国外的季羡林。季的翻读横跨四年，可见他对这册小书的看重与偏爱。

1946年，季羡林学成归国，5月19日抵达上海。该年9月1日，储安平主持的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刊物《观察》在上海出刊。适逢“开学季”，这个时候的年轻海归季羡林，由于陈寅恪、汤用彤等师友的帮助，已经被聘为北大东语系教授兼主任。自然，他被列名为《观察》杂志七十八位撰稿人之一。直至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前，季羡林在这份影响深远的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谈翻译》（第1卷21期）、《西化问题的侧面观》（第2卷1期）、《邻人》（第2卷5期）、《论现行的留学政策》（第3卷7期）、《论聘请外国教授》（第4卷3期）、《忠告社民党和青年党》（第4卷13期）等文章。文章通过西方器物进入中国生活的变化谈西化问题，通过对邻居生活方式的描述来批评中国公共道德的缺失，批评中国教育与政党政治的无操守、不接地气，等等，话题广泛。从中可以看出，留学归来的季羡林，在以言论政、进行社会文化批评这一点上与储安平息息相通。这些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留学问题的关注。1947年9月23日，有感于胡适的“十年学术计划”反对政府花太多的钱送学生去国外镀金，季羡林在《观察》第3卷7期发表《论现行的留学政策》一文，表示赞同胡适的看法，批评政府留学政策存在的弊端：学生留学动机不纯，找学校、导师追求容



储安平《给弟弟们的信》

易通过，确定论文、送礼，只求早点结束学业拿到文凭回国求职而不是由此走上艰苦的研究之路。季因此建议不如多花钱、严格选择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国外学者到中国来教学，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得到学习。季羡林这种对待留学的看法，是他结合自己留学经历所得出的切身体会。1946 年 11 月 11 日，季羡林曾经在自由主义报纸《大公报》发表的《论自费留学》一文中也曾对中国留学生的丑陋进行批判："这些人物（纨绔子弟）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中国，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么？"因此，季十分赞同汪敬熙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自费留学万万不可开放的主张"。在《留德十年》等回忆录、散文中，季羡林一再描述这个现象，可见他对留学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这与他在



在德留学的季羡林



在德留学期间，季羡林（右）和乔冠华合影



在德留学期间，季羡林（右一）和友人合影

留德日记中常常对所见留学生不争气的观察与批评，是相一致的。《观察》1950年复刊时，季羡林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第6卷3期），不过，那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文章，已经流露出“人民大众的创造力”等“人民话语”了。

“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从季羡林与储安平这两位相差仅两岁的同代知识分子的交往看，在季成为著名学者、储成为著名报人之前，他们都曾经有过一段文学青年、做过文学梦的岁月；而此后的远赴欧洲的留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后来以一介纯儒身份赢得“国学大师”盛名的季羡林，早年亦曾表现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质；只是1949年之后，与储安平不同，他很快适应了这个时代（季曾经在其散文《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说：“新社会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储更多表现出不羁的思想者气质，而季则更追求成为纯粹的学者。在风沙扑面、思想运动频仍的20世纪，埋头学术（更何况是古典语言文字与文化！）当然比动辄得咎的思想探索更有其合法性与保护性：储因为思想探索的异质性、超前性而遭受劫难不知所终；而季，则在通儒大家的学术光环下赢得文化泰斗的礼遇得享天年。不同道路的选择，铸就了不同的人生结局。回想早年隔着欧亚大陆茫茫白雪的书信来往与文学交流，未免不为这段留德日记中反映出的青葱岁月的美好一叹！

2014年10月19日

季羡林：亦真亦假的追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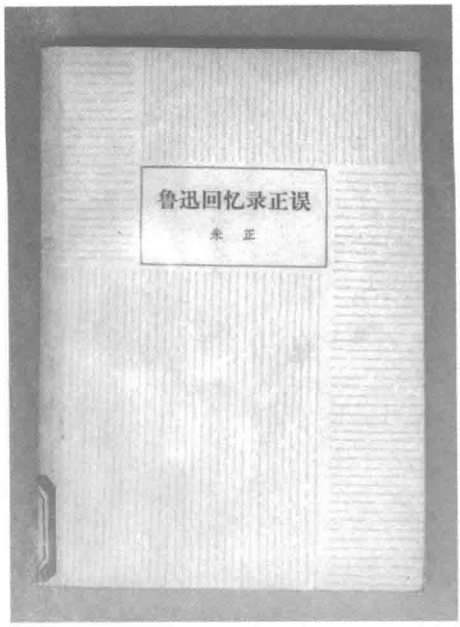
作为旧年北大的同事和受其知遇之恩的后辈，季羡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关于胡适之先生的文章，表达自己对这位自由主义的灵魂性人物与“我的朋友”的追忆与理解。其中最让我喜欢的，是季先生1999年访问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时参拜胡适之先生陵墓后写下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印象中该文还被当年的《散文选刊》杂志排在散文排行榜之首，想来是名副其实的。周末里借着读胡适的机会，又重读了一遍这篇深情宏文。正文开头，描述了1948年12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孑民堂参加北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日的事情。当时正处在解放军围城的气氛中，季先生写道：“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满面含笑，做了简短的讲话，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在文章末了，季先生又加了一则后记，坦承自己对纪念日的事情“脑袋里终究还是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颇有一点自信的；但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他托学生查当时的报纸，知道胡适已经于12月15日离开北平南下至南京了，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了北大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季先生说“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怎么办呢？一个是改写，一个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季先生采用了后者，理由是“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胡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



1948 年 6 月 15 日季羡林（前排左一）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北平孑民堂合影。前排右六为胡适。

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曾经读过不少学界长者的回忆性文章，在文章后面加补正、补遗或正误之类也不在少数，但附加如此“知错不改”的后记“以正视听”的，印象中只有季先生这一篇。这里，我想对季先生这样处理自己追忆文章的做法无论表示赞同与否，都并无太大的意义；令我感兴趣的是，这里涉及读者该如何对待与阅读学者的回忆性文章的问题。世纪之交前后，随着一代世纪学人的花果飘零，后辈学人怀念旧人旧事的追忆性随笔一时蔚为壮观，大行其道，凸显为随笔大军中的重要一支。这些文章以其历经沧桑的丰富信息与“庾信文章老更成”的笔法，给一个世纪的学术文化总结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照与尘埃渐定后的历史读解。令人惊讶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全方位深入与史料钩沉方面的“拨乱反正”，许多回忆录都被证实为存有一定程度的误记或臆想。小到对钱锺书先生在牛津留学时是否获得过文学副博士这一类小细节引发的持久争论，大到朱正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一鲁迅研究旧作在 90 年代末的重版新出，都说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修辞立其诚”，想来这些学识积厚的回忆者不会不懂这样的道理，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回忆录失真的现



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

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杨正润先生在《回忆的缺陷》（刊《文汇读书周报》2002 年 3 月 8 日）中从外国文人学者的回忆录入手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回忆录大多是人到中年以后对过去的回忆，这时，人们的思维活动已经形成一个'意义结构'，人们不但依据一种价值标准进行思考和判断，也在无意识中依据这种标准进行记忆和回忆。"他援引心理学家的理论说："回忆的故事化常伴随着理想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通过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心理可以得到安全感。"以卢梭的《忏悔录》为例，卢梭自己说过："我十分惊异自己竟然编造了这么多的谎话。我记得当时是把它们当作真话来讲的。"杨先生文章还说："当代一些卢梭研究者则认为，卢梭有两个自我，一个是自然赋予他的自我，一个是他自己创造的自我。两者在《忏悔录》中同时出现。卢梭写作是为了忏悔，也是为了自我歌颂，为了达到这双重目的，他把自己的过去故事化和理想化了，真真假假，自己也搞不清了。"

类似精当的剖析，还记得有许锡强先生在《"人是一切中最复杂的"——唐弢〈琐忆〉的文体性质和社会影响新论》（刊《书屋》2001 年 5 期）一文。作者通过对史实深入全面的钩沉与索隐，认为现代学者唐弢先生在鲁迅研究上卓有成效，对鲁迅其人其文的了解可以用"滚瓜烂熟"来形容。因此，"难

免的，他的记忆就会将他和鲁迅的接触和对鲁迅的阅读混淆起来，在记忆上产生某些疑似之处”。作为回忆鲁迅的名篇，《琐忆》“所‘忆’的内容相当部分来自他对鲁迅的阅读，而不是来自他和鲁迅的接触。……它其实不是一篇回忆性文章，而是一篇回忆兼研究且有虚构的文章；它的内容固然不少是来自和鲁迅的接触，但相当部分是来自对鲁迅历史和著作的研读；唐弢本人则为此而在《琐忆》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即创造了一个迥异于30年代初期他的真实状况的、能够和鲁迅平等对话甚至动辄俯视鲁迅并大发议论的叙述人——‘我’”。

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诸多回忆录，由于承受着外在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回忆者往往左顾右盼隐约其辞，甚至无意或有意地改写历史事实，以迎合随时可能变幻莫测的外在标准。而在今天，我们仍然不无遗憾地看到，不少学界长者的回忆性文章存有一定程度上的失真。客观地说，到了常人所理解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出现这种情况，倒不完全是由于屈服于外在压力而主观故意地说谎或改写，而更多是牵涉到上面所说的心理记忆机制的问题。而一旦产生这种心理倾向，在此后的信息吸纳与人生回忆中，回忆者则会不断地认同、强化这种近乎无中生有的“旧事”。季羡林先生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真假两种“回忆”，一类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另一类是“我脑筋里的回忆，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并且不回避后者对前者可能出现的覆盖与干扰，但又不因无视后者的意义而对其进行彻底的清除，认识到“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胡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胡适之蔼然仁者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在季先生的记忆中，即使大兵临城，一向有着“我的朋友”式笑容的胡适之，也是“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论史料，其中论伪事之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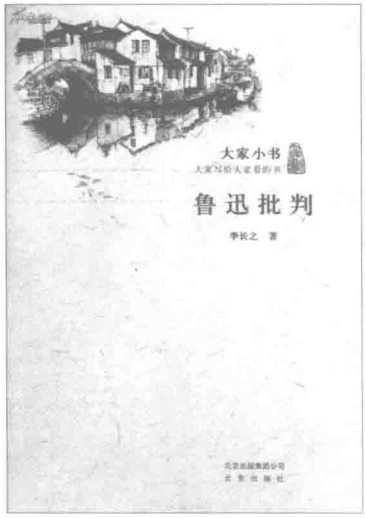
就是“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这说的大概与此有相通的地方吧。这种认定“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的心理，折射出了回忆者对回忆对象的一种特殊的感情联系。同理，我们阅读与使用这种回忆性史料的时候，也不妨借用季先生的处理办法做出区分：一类作为学术史的史料来读，另一类则作为学者的情感记忆来读。前一类可以看出被记忆者的历史，后者则可以看出回忆者的情感史。我们尽管无法引用这一“回忆”作为确凿的史料，但由此可以看出回忆者与回忆对象之间的隐幽关系以及荷载在他们这一关系身上的学术思想传承与接受关系。这就好比是历史上常见的伪书：伪书固然没有史料价值，但由伪书可以见出伪书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情况和他个人的心理状态。只不过，伪书多是有意而伪，而回忆录则多是出于心理安全的需要无意而伪，只是在不自觉之中受了前定“意义结构”的蛊惑，是“理想化的自我意象”。

2002 年 10 月 10 日

李长之的六十九岁

金正日去世后，网上疯传着一个冷笑话：萨达姆、卡扎菲、金正日终年皆为六十九，而中国住房产权七十年制度的设计，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巧合也好，附会也罢，众声喧哗的网络化时代，网民们的言说总是让人哭之笑之。

今天随意翻读，看到一桩关于李长之先生六十九岁离世的学林旧事，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大名横跨“清华四才子”（陈铨、李长之、张荫麟和钱锺书）、“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和吴组缃），鲁迅“揶揄”他为“李天才”的批评家李长之先生，生于1910年，1931年进入清华大学，正是那一代风华早慧、天才绝艳人物的代表。50年代以前创作留下的作品，总计五六百万言，批评领域纵横古今中外，有《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鲁迅批判》《西洋哲学史》等名作传世。他的文字最大的特色，是作者之理性分析与心灵激情交融，与研究对象产生思想共鸣，一旦下笔则不能自已，常恨“书被催成墨未浓”。犹忆多年前在大学校园读到《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不禁为李长之飞扬文采、充沛激情之下表现出的司马迁、汉武帝所凝聚的浪漫精神心驰神往。李长之先生还是最早翻译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人物，有译作《德国的古典精神》等。他的论著多有模仿康德以“批判”为名，如《红楼梦批判》《王国维文艺批评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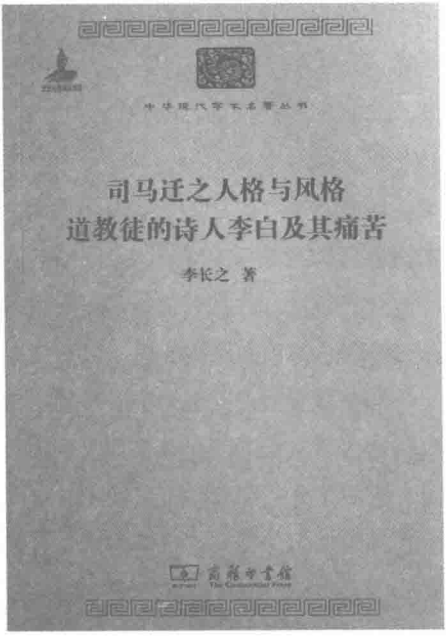


李长之《鲁迅批判》

作批判》《鲁迅批判》等。命运最为坎坷的当数《鲁迅批判》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1935 年出版后，国民党统治时期把它视为左派读物加以查禁；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1957 年李长之被划为“右派”后，《鲁迅批判》即成为“黑书”，不许读者借阅。“文革”中，一“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大骂：“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其实李长之先生对这本 25 岁就写出的旧作并不满意，几次表示有意“另写一部鲁迅再批判”，“对于本书，愿意重写”。及至 1976 年“四人帮”倒台，某出版社曾找李长之接洽再版《鲁迅批判》事宜，提出的条件是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分析”之类寻常话语。说来这正是“自我批判”与悔过的大好时机，但李长之却断然出言拒绝：“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此为意气之词，却实为沉痛之言，他确实因此书遭了一辈子罪。发自内心的热爱鲁迅，期望从学理意义上“批判”鲁迅，在那个荒唐的时代终不可得，使李长之被打成“攻击鲁迅的反革命老手”。文坛打手们以惯用的“大批判”来对待李长之先生的理性“批判”，以“武器的批判”对待“批判的武器”。书生遇到兵，自然有理说不清，结果斯文扫地，玉碎昆冈，令人长叹。花自飘零风尘中，自 50 年代末起，李长之即被剥夺研究与写作权利，刚知天命，即沉默无声，此后艰难度过二十余年被侮辱与被压抑的漫长岁月。对自己的风烛残年之身，李长之常吟“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等老杜

诗句，沉郁悲苦。及至拨乱反正后，转暖春回，他仍雄心未已，甚至对前来看他的北师大校领导表示有生之年想写完一直构思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但饱受折磨之下，李长之的身体已经是如风中之烛，很快就病倒了。去世前，他的同事聂石樵先生去探望他。李长之对他说："王安石六十九岁死的，汤显祖也是六十九岁死的，我今年六十九岁了。"说完，悲从中来，凄然泪下。（聂石樵《怀念李长之先生》，刊《古典文学知识》2002 年第 10 期）当年 12 月，李长之先生即与世长辞。虽说有皇皇数百万言，但对于李长之先生来说，仍是千古文章未尽才。

李长之先生在《德国的古典精神》一书序言中自称平生对三个时代最为向往，对三种思想不能妥协。三个时代即古希腊、中国的先秦、德国的古典时代；三种思想是唯物主义、宿命主义、虚无主义："唯物主义的毛病是不承认（至少是低估了）人的价值，宿命主义的毛病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虚无主义的毛病是关闭了理想的通道。"而他所向往的三个时代的思想主脉是与唯物主义、虚无主义、宿命主义相对抗的理想主义！在他看来，理想主义是如此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人和浑浑噩噩的猪狗不同，人总想着明天与将来。人生毕竟不是材料，人生的价值乃是在这些材料背后的意义。遥想从《诗经》的"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到西方的"人是万物之灵长"，渊渟岳峙的古典文化的核心，即在于李长之先生所服膺与坚执的高贵的人本理想，推重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抑的；人生在世的意义，在于善待生命的美好，尽性使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天才早慧而创造丰沛，可谓是对这种人类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最为尽性使才的发挥与践行。只是在 20 世纪的中国，很长的时间段里，都在以诸种荒谬的反文明的方式践踏着这种理想主义，无情地蹂躏着这种价值观念，也摧折与侮辱着李长之先生这样的精英天才。郜元宝在 90 年代编辑完李长



李长之代表作

之批评文集后，曾感叹其“奈何赋命不辰，天不假年，绝大的愿力，罕见的才华，终归于虚无”（《追忆李长之》）。1941 年，名动天下的大公报人张季鸾先生去世，李长之先生悼念中有言：“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一曰与愚妄战，一曰为理性争自由。先生往矣，先生之人格，将时时予吾以信心和勇气。汉时李将军死，天下识与不识，皆为痛苦。吾不幸，未能于先生生前接杯酒之欢，今姑置于不识之列，为先生哭！”（《悼季鸾先生》）想到李长之先生风华卓颖的早岁与喑哑屈辱的晚年，吾不禁亦为先生哭！

2012 年 1 月 9 日

学人乎？文人乎？

随意读书，近年常常看到人们将学人与文人相提并论的文字，且往往又是褒扬学人而贬抑文人。这种时风性的“价值观”，好像与李泽厚先生所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知识界风貌是相一致的。知识分子对时风的归纳与品评，有些说法往往犹如孔夫子修《春秋》，寥寥数字而深意玄远，褒贬之情寓焉——“学人”与“文人”两个概念的使用及对身份的认可，就给我等读书人这样的感觉。两者区别究竟何在，看似并无明确界限，但真要深究细品起来，我想大概就是学人以研究为业，治学偏于严谨，必欲积累有年将冷板凳坐热后才下笔为文，最忌流于空论无据。著述呢，不以发行量论英雄（有时甚至是越阳春白雪，则越是可能被称誉为“绝学”），为人风格不事张扬而习惯于蛰居书斋沉潜问学。文人则相反：他们的看家本领是才情辞章，读书常常拿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做借口，而偏偏心高胆大，敢于痛快淋漓地轻薄为文放言高论，动辄会作替一个世纪的文学“写份悼词”之类的文字。而且以高产为荣，产品一旦洛阳纸贵，就会立即名利双收声动天下。

如果再进一步追究就会发现，知识分子严于学人、文人之别，并非今日的新视点，而可以说是历史性形成的一种“身份论”。在谈及这一话题时，学者们常常引用来批判文人的一句话，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里的说法：“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以朴实学风称誉后世、作则垂范的

顾炎武，深自鄙薄明末以来袖手谈心性而无济于时世的士风，因此以深刻的反思精神倡扬修己治人之实学。但要顺便指出的是，今天的学人们未必有着学人所必需的严谨性。如“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一句，就并非如引用者常常所说的是出自顾炎武之口，而是他借用宋代刘挚之言。顾炎武在《日知录·文人之多》中写道：“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气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由引文这一小事情，也可以见出要做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人实在不易——最起码，引文这种基本功就得过关，字句出处不可不讲，更不可乱讲。唐宋以来，读书人以辞章时文而非考据学问为进身之阶，所以顾炎武感叹“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经学家王先谦在《葵园》中的一封信里说：“近日士大夫多不读书，乃至奏牍陈词，亦皆肆口乱道。……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敢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独立孤行，不求闻誉。”守旧的王先谦出于对晚清学风的不满，把“读书人”与“名士”、“正人”与“道学”对举，大概也是今天的学者、文人之分的意思。在他的心目中，“读书人”应该是真正有兴趣踏实地做传统考据学问的学人，而不是大要花架子名士气炫弄辞章的文人。及至民国前后，随着科举制度这一“指挥棒”的崩溃，传统的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变，中国的读书人一时有点恍恍惶惶六神无主，社会身份与心理感觉都发生着巨大的跌宕变化。当时流传较多的一句话，便是对知识界的慨叹：“近世诗人多而文人少，文人多而学人少。”这种说法，仍是一脉相承地延续着学人高于文人的“价值等级论”。

记得在一篇随笔中曾经读到，精于唐律之学的当代学者杨廷福先生，80年代在北京校注《大唐西域记》期间，曾登门拜访钱锺书先生。钱先生以默存自处，素不喜与外人交往，加上对杨先生不熟，起初自然不会有好眼色。

刚开始交谈，钱先生就对杨先生正颜厉色地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对此，修养极好的杨先生丝毫不以为怪。他专门“班门弄斧”地与钱先生谈起了宋诗，并指出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里的几处讹误。至此，钱先生才感觉到自己面前的来客，不是一个他内心极为排斥的文人，而是学问精深的学者，通过交谈还知道杨曾经是自己父亲钱基博先生在无锡国专的高足。从见面之初的相斥到知情后的相投，这则学林逸事的意思，大概是说钱先生推重学人而排斥文人。根据钱先生的诸多传记之类，知道他的言行也有些老派学人的处世习惯，但我很怀疑这则随笔所言钱先生自称是“学者”的真实性。青年学人李洪岩先生在《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一书里以为：“在钱锺书那里，‘学人’的声望并不妙。……钱锺书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学者。为了表明这一点，他甚至只承认自己是作家，而从来不说自己是学者——貌似自谦，实则自负。”钱学专家郑朝宗先生在《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一文中指出，《管锥编》树立了不少新义，第一条就是“学士不如文人”。学士包括经生、学究、注家等；文人包括诗人、词人、秀才、小说家、戏剧家等。“学士不如文人”，钱先生的感觉是“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秀才读诗，每胜学究”，“词人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十言”。经生不通艺事；经生之不晓事、不近人情几如不通文理；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歪。有不少研究著作凭着俗世常情“抬举”钱先生，冒充“知音真赏”，将他的《围城》称为“学人小说”。以钱先生在《谈艺录》中论钱载的诗作时痛骂“学人之诗”的态度来看，他对“学人小说”一说大半是不会认可的，甚至会觉得是佛头着粪——在敏感而高傲的钱先生的内心，他厌恶将《围城》视作学问的展览与无聊的獭祭，而自期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的真正的艺



钱锺书《管锥编》

术作品。他在手札中写过："苟拙著为'学人小说'，则萨克莱、乔治、爱略脱、弗罗拜、马赛尔、普罗斯脱所著以及《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皆得称此名矣。此如见人家稍有像样家具陈设，即划属'资产阶级'，或架上有几本线装书及原版洋书，即断定主人'学贯中西'也。"在"学士不如文人"这种价值判断中，很难设想钱先生会对杨廷福先生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

人们将《围城》称作"学人小说"，或者津津乐道于钱先生自称"我是学者"之类的逸事，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见出钱先生之超轶流俗，这种判断标准多少反映了"学人高于文人"的心理，也可见出传统价值观的惯性。在日渐开阔通达的当代社会，虽然再也不大会发生以月旦时评之论寸铁杀人的事情，但面对儒林文坛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品藻评鉴，知识分子对学人、文人之别似乎都还是有所顾忌、有所讲究的。至于"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一句，在某种意义上则犹如一种道德戒律或是无形的紧箍咒，动辄成为学界中人对文人圈讥评讨伐的口头禅。其实平心而论，这种近于清流的毁誉，可以说是当下知识界一种极不正常的心态罢了。就好像"唯成分论"的不合理一样，在今天这种欲说还休的时代语境中，学人、文人的区分实在不好一概而论。一方面，我们看到有王蒙等大作家极力提倡并以丝毫不逊色于学院派的学术著述在践行着"作家学者化"的潮流。近来又陆续有王安忆、格非、马原等作家走入大学象牙塔教书育人，担任硕导、博导之类，似乎也有点"文人学者化"的意思，为此还发生了一场作家上大学讲台利耶弊耶的争论。学者王

彬彬曾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担任西北大学硕导的贾平凹学术分量不够。但作家文人多读书，多长学问，总是一桩好事情。另一方面，我们见到学人群体也有大面积文人化的倾向，比如学术问题常常被纷纷扰扰地事件化，或在表面众声喧哗而真知灼见缺席的气氛中被话题化；学者逐渐走出书斋而追求在电视等大众传媒中“混个脸熟”，社会也逐渐习惯于按世俗的声名来评估一个学人的学力与贡献；虽然有书生学者在静心问学修行，但亦多见有人在奔走竞逐，就像唐宋流行的投刺求见、拜师入伙，或是晚明的结社会讲，耸动风习；学界本身呢，大多令人难以理喻地按照工业管理的量化指标来论定个人的学术成就，以致有学人的学术著作比一般文人的作品要多得多，浮在学界面上的只是一堆迷乱的泡沫，底下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实在不好说。顾炎武在晚年的《与人书十八》中自况：“《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弟子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换了是当下活络的学人，他听了刘忠肃（挚）的话恐怕会说这是守节般的旧教条，早该过时了。我们目睹学界常常是非不断风生水起，有时甚至比文坛还热闹。而且根据读史书得来的一点感觉，就是知识分子苛严于学人、文人之别的时候，往往是学界的现实有所不正常而易惹人非议的时候。所以说，学人抑或文人，都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是其中各有其不同。两者都不好绝对地说何者有道德优势何者处道德下风，而都要具体而论才是。如果“必也正名”，则文人未必低于学人，学人亦未必优于文人。记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最好的事物即，A 即是 A。”这话听起来哲学味太重了些，但我想意思我们大体都能够明白。中国古代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正名”传统。事情就是这样：学人也好，文人也好，名称为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浪得虚名，才能无畏于时论之毁誉。

2002 年 6 月 2 日

夜读鲁迅札记三题

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

像任何一个伟岸的身影都是以寥廓的时代底色为其背景一样，鲁迅先生也来自一个伟大的时代。

从身份上讲，鲁迅较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无疑有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他曾经沉迷于抄写古碑、辑录古籍多年，奉献出纯粹的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等，是一介典型的书斋型学者；他曾经创作出纯美的散文《朝花夕拾》与《野草》，将中国现代散文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谁能否定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呢？但更重要的和更丰富的内涵是，鲁迅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他所特有而广泛的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对社会发言，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大众的思想与认识。用时下学术界的话来说，就是在他的身上，充分地体现出了一个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分析鲁迅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可以清楚地窥见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性和命运。

像那个时代的诸多新派人物的脑后依然拖着一条古旧的辫子一样，鲁迅初始的生存空间是在传统的官场。1926 年论敌陈西滢曾经讥讽鲁迅说：“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



鲁迅

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就叫人有些恶心了吧。”（陈西滢《致志摩》）一向对陈西滢的反驳根本不费气力的鲁迅，这一回却落到了少有的辩诬的境地，他只是支吾无力地解释说，自己在张勋复辟和章士钊主持教育部时都曾脱离过。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使得鲁迅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从早已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北洋政府中撤离——在初期的“《新青年》同人”中，除鲁迅外没有一个人在政府与议会中任职；在 1918 年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中，第二等会员的“五戒”之二就是“不作官吏”，“不当议员”。在“《新青年》同人”与“《新潮》同人”中，除鲁迅以外的全部人物，都入了会。鲁迅曾经自剖过自己“太不像官”，也曾无数次在日记中记下了独坐办公室的枯索无聊和应付差事时的悖违心性，他甚至一度在几个大学里兼职，试图体验别样的生活滋味，但他最终没有辞去“佥事这一个官儿”。是历史的惯性？也许吧——中国文人群体一向不就是官僚的后备军吗。是为了一份养家糊口的薪水？也许吧——鲁迅自己就写过，娜拉出走以后，没有钱，就会陷于再次无路可走的困境。更何况，自己从小就尝尽了困顿的滋味，深知“经济权”的要紧。

总而言之，无可讳言的是，从 1912 年民国成立时进入教育部，鲁迅先生还一直遵循着旧时代的轨迹，一直做了十多年民国的官。——如果没有意外，也许鲁迅先生也会像他的前辈旧文人一样，将自己的生命蜷缩枯萎在闲散无聊的官署之中，碌碌老死于数不清的文书案牍之间。

但毕竟，时代已经改变了许多。自晚清以来的近代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疑来到了一片空前宽阔自由的生存地带：封建王朝宫墙终于在革命的炮声中轰毁坍塌，使传统文人的视野开始有机会从狭窄逼仄的庙堂转向开阔得

多的社会江湖。朝廷与帝王不再是知识分子单一的合法使用者与购买者，而发育日渐成熟的现代社会，为他们提供了更好地施展自身才华的公共空间。他们逐渐从拥挤的仕途上游离出来，兴办新学、创立报馆书局、翻译西籍、发展实业……这样一个王纲解纽政权松散的时代，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是生活的乱世，但对于一向被禁锢在窒息沉闷的封建牢笼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是一个风云际会、鸢飞鱼跃的百家争鸣式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所焕发出的激情与创造力，为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许多呼吸视听的新通道，推动着他们的人生偏离了既往的轨迹。

鲁迅先生把握住了这个时代。当传统中国在世纪之交走向新的地平线时，最明显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具有现代品格的学院高校与报刊传媒以双峰对峙但又互动相连的姿态激动潮流，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以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文化力量和以胡适、陈独秀等主持的《新青年》为代表的传媒文化力量，创造了一个风起云涌的文化公共空间，激活了惯常的千年死寂。鲁迅这个闲差小官，正是逐渐通过现代大学与传媒这两个新兴的时代舞台，使自己与社会建立紧密的有机联系，将个人融入时代与社会。在北京的几所大学里，他与青年学生们共呼吸，从学生们活泼的脸上感受着年轻的活力和时代的新生气息；一走入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所建立起的“思想场”中，他就一扫在古槐树下静坐苦读的止水心情，而是在这些同人刊物上像抛出一把把投枪匕首一样发表了大量的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文字，寻求着一种以文化思想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一个不甘于在灰暗的时代中泯灭自由知识分子气质的官员，终于开始走上了摆脱旧束缚的求索之路。

不像传统文人一样做官很难生存，走向作为现代文化力量的教育与传媒又何尝容易？在民国的时空中，大学与传媒实际上也不会是净土一块。它们

毕竟还是在形形色色的政府控制之下。由于军阀统治的本性，社会越来越呈现出武力化的倾向，风沙扑面之中的大学在昙花一现般的五四高潮之后日益被边缘化。欠薪、随意逮捕师生、强令尊孔读经等事件不断发生，从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引领反动军警粗暴地进入学校，到刘和珍等学生死于“三一八”凶残的枪口，学院文化显得风雨飘摇脆弱不堪；激动一时的现代传媒力量，也并没有保持它们前进中的恒久与理性。——《新青年》的转型与分化，寓示着一个短暂的风云际会时代的收场。到了 20 年代中期、30 年代初，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消退、《新青年》与五四同人的解体，知识分子经历着一次历史的反复与回旋，在灰暗的时代底色与严峻的现实考验下“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传媒的力量在无形之中被大大削弱。

但鲁迅在这一时代考验之下并没有退却。在一阵犹疑之后，他果断地从思想专制高压的中心北京撤离，南下到厦门，又辗转至广州，以边缘为阵地，谋求在中心之外呼吸新鲜的空气。在这一过程中，他一直没有割断与大学、传媒的联系：在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他保持自己的独立紧张的思考，影响着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发展，努力地守护着现代学院文化的生命力；在《新青年》解体后，他努力集结新创起《语丝》《莽原》《奔流》等同人刊物，开拓着自己传达批判之声的渠道。与吴宓、陈寅恪、梁启超等遁入水木清华的学术之塔不同，与胡适等昔日同人高喊“整理国故”诱使青年躲进故纸堆不同，也与陈独秀等以书生之身投身于革命实践不同，鲁迅一直坚持在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重要之所大学与传媒这一互动的生存空间：在大学里形成自己独立沉潜的批判性思考，而借助传媒将思考的结果传播到社会上，以此发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作用。

随着军阀混战局面的结束，国民党逐渐建立起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成



鲁迅一家

立于 1927 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家能力上大大强于割据纷争的北洋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它对教育与传媒施加起日益峻急的高压。以教育界的状况来说，在北伐胜利之前，政府逐渐借用在广东成立的中山大学的模式相继由南向北建立了四所“中山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这一模式的共同点，就是大学受国家的控制，为国家直接服务。对于有着五四传统的学校，政府也开始加以改造。如清华，1928 年 9 月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纯粹的书生吴宓敏感地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参加校长就职典礼的印象，说是“一切如党国新仪”。——此后的事实就是罗家伦推行的军事化管理。再以鲁迅本人的遭遇为例：1927 年“清党”之时，中山大学的十几名学生被抓走。担任国文系主任兼教务长的鲁迅，主张积极营救，并召开教授会讨论办法。——很显然，他是想象当年在北京大学与女师大一样，在学潮中对政府表现出有力的制衡与抗议。但在由朱家骅、戴季陶主持的中大，毕竟不是当年的北大，而是由国民政府主办的大学。校务委员会最终否定了鲁迅的要求，理由很简单：因为学校是政府的大学，就必须服从它的领导；政府抓走学生，学校理应配合。一句话，知识分子在高校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在另一方面，在乱世缝隙中生长起来的民族工商业却越来越显出了它的力量（在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一直长时间处于高速增长的态势），社会呈现出大面积的市场化、商业化倾向，知识分子从学院走出，转向投身到社会大市场逐渐有了可能性。在这种内外作用之下，鲁迅最终宿命性地选择了流亡：这不是指当日寇犯境时，鲁迅多次被迫离家别所外出避难，在动荡的时局中度过了一些真正的肉体流亡岁月，

而是指他坚定地走入了上海这个现代中国最为广阔无边的市场汪洋大海，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了自由之身。以 1932 年 1 月国民党教育部革去鲁迅的“特约撰述员”职务为标志，鲁迅完全脱离了与政府的一切干系；自离开中山大学后，除偶尔外出演讲，鲁迅不再去大学兼课。晚年一直生活在上海的鲁迅，纯粹过着“卖文为生”也就是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完全依靠稿酬、版税与编辑费为生。也就是在上海，鲁迅不再像当年在北京时在年关日暮时苦苦地等待欠薪的发放，而是拿起了法律武器与书商们打起了版税官司，义正词严地以经济权利的形式维护了个人的尊严。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天生的平等派。鲁迅的声誉和写作能力，使他在无所凭依的状态下也能保持自己的“韧性战斗”。在他的身上充分地说明：对于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有形的生存空间的失去，可能意味着获得更大的无形的生存空间。

从鲁迅先生所居留的城市来分析他的生存空间，也是一个有意味的视角。在世纪之初的中国，由于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速度与方向不一，不同地域的城市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从虽经新文化浪潮洗礼但仍是暮气沉沉、官僚气息浓厚的北京撤出，到“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再到现代市民社会发育最为充分健全的上海，鲁迅的生活轨迹在数种不同的情境下创造出了耐人寻味的生存空间。这种人与城市间的选择看似偶然，其实有着它内在的必然性。对于保守的北京，鲁迅内心深处多次流露出他对这所古都的留恋——在 30 年代初他还考虑过重新回归到她的怀抱之中，但鲁迅最终没有：他峻急的个人生活态度与这所城市大气之中的庸碌闲适太大不相适应了；对于陌生而革命的广州，鲁迅曾经抱着美好的愿望而来，但结果却是让他失望地离开了；对于上海，鲁迅先生屡次掩饰不住自己对这座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暴发户城市的厌恶，但他却在此终老。鲁迅实在不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近官者留恋古城，想在革命中捞资本的青年兴冲冲地南下，想发财的才子流氓投向了上海这个

大染缸；而鲁迅，却一次次地与自己过不去，一次次地寻觅着生命与心灵的栖留之所——他永远不愿离开中国这片土地，但在这片土地上却似乎一直没有他的存身之地。没有哪座城市让他满心欢喜，先生一生似乎都没有学会与现状和解：也许他永远在追寻的路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经与他在五四时期一起并肩作战的弟弟周作人——自从 1917 年鲁迅将周作人介绍到北京，周作人就终生没有主动离开过这座古都：在那里，这个喜欢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与朋友们喝苦茶说闲话的人，有着自己惬意的生存空间。

从体制内的公务员到大学里的教书匠与传媒的参与者，再到最终成为自由流亡者，鲁迅的一生辗转于官气笼罩的北京、革命的南方、商业化的上海，经历了传统体制、大学与传媒、流亡这几种多样化的生存空间，将自己的生命气血发挥得淋漓尽致，个体的尊严与时代的可能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契合——这就是为什么说在他的身上最大限度地凝结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复杂性。这个过程，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代里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过程。而在鲁迅自己，却是他不懈地追求个人自由的过程。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学院与传媒这两种新兴力量都在社会动荡中经受了挫折、磨损，文化革命被革命文化所取代，商业气息铺天盖地而来。但不管在任何一种个人情境中，鲁迅终生都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姿势：在官场他与反动官僚保持着距离，最终走到了与之对抗的一边；在学院与传媒中，他酣畅淋漓地倾泻着自己的思想认识，利用传媒将学院文化扩散到社会之上，使象牙塔与社会保持着沟通；在流亡的生存状态下，他依靠自己的经济能力，超越了官的威胁与商的羁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考——甚至于拒绝了来自集体的召唤，与左联等发生冲突，骄傲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与以创造社、新月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存有程度不一的隔膜不同，也与民族主义学者、复古派学者等和传统的国家力量有着

本能的合流趋势不同，鲁迅先生的生存空间使他寻找到了一条恰当地接近、理解这个多难的民族、国家与大众的途径。

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从总体上说当然是大大地更为开阔了：以被强化地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单位制度为典型特征的体制化生存空间逐渐有所松动，自由职业从各个角度浮出地表。但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似乎并没有变得自由轻松，反而是日益艰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一个与上一世纪之初相似的环境。来自社会市场化等方面的力量，对知识分子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异化作用。在喧嚣时代里知识分子的选择，往往显得惶惑不安把持不定。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所到底在何处，还是一个有待追索的问题。真正的自由不仅是拥有外在的消极自由，还需要内在的积极自由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的生存方式，仍然在为我们这代人提供着最好的参照，以及历史深处最为深沉的警醒。

选本视野中的鲁迅先生

在我居住的这座城里，读书人要淘到一些旧年好书，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一类读物例外，那就是鲁迅先生的著作。——自然，这是当代中国人读书史上的一段特殊经历的结果：在那些荒谬的日子里，鲁迅先生的文字是唯一可以公开大量阅读的非领袖全集。我就在让人寻寻觅觅的旧书摊上，几乎补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1976、1980 年版三种鲁迅作品的单行本。但让我注意到，更为常见的还是要算那些形形色色的与鲁迅相关的“碎片”式选本：《鲁迅批孔反儒文辑》《鲁迅艰苦奋斗生活片断》《鲁迅谈传统文化》《鲁迅对古典文学的看法》《鲁迅文摘》《鲁迅谈民间文艺》《鲁迅言论选录》等。在那些日子里，这些读物以其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与神圣性，



《鲁迅批孔反儒文辑》

大面积地覆盖着中国人的头脑与心灵。它们的影子几乎出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袭击着每一位大众的眼睛。但时过境迁，往昔满天飞舞的小册子，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落寂地流散在各个书摊与角落里，只有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少数人，才会有心来抖落岁月变幻中的尘封了。至于有多少这类读物早已重新化为了纸浆，恐怕谁也不清楚。说起来这些读物的命运真是令人感喟不已：在鲁迅研究的学院派看来，与一直是显学的鲁迅研究界所产生的叠床架屋的高头论著相比，这些选本显得过于轻薄无物，不值得让人再次提起——尽管这些读物实际上有很多就是出自时下一些早已名声赫赫的学者之手，但他们仿佛都深悔少作，巴不得与这些读物完全脱离干系，就像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查旧帐》里说的韦庄那样，穷困的时候做过激昂慷慨、文字通俗的《秦妇吟》，“直弄得大家传颂，待到他显达之后”，却不肯认账了；而在大众的阅读史与心灵记忆史上，这些读物又纠缠了太多的、不堪回首的特殊历史场景与印迹，在宽容与健忘盛行的今天，人们对鲁迅这根“老骨头”，酷评家与骂派学者们早就是“轻薄为文哂未休”，唯恐弃之不及以便更加轻松地狂欢前行，有谁还会再去捣鼓那些与今天的流行读物风马牛不相及的旧年“流行读物”呢？

作为一个对鲁迅先生的文字保持着一种内心的偏爱的年轻人，不可否认的是我对这些读物有些陌生——我很庆幸当自己懂得用眼睛来观察、用头脑来思想的时候，这些读物的流行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偏偏是这份陌生感，让我产生了探究这份陌生的敏感与好奇。甚至我常常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一类与鲁迅相关的碎片式选本读物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我们至今都还没有理清的历史。在这种碎片式的阅读与理解中，蕴含着中国人意味深长的记忆。

这类选本式读物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们的“匿名式写作”。与今天的著述封面上堆满了过多的“作者”以便大伙在评奖求职称时都可分一杯



鲁迅 1935 年在上海

羹的情况相反，在那些选本式读物如今早已泛黄甚至漫漶不清的封面上，大多没有编著者姓名。即使有，也是一个与集体相关的名字：某大专院校、工矿厂房、街道办居委会——甚至是出自于农村田间地头的某小组、生产队。在这些集体中，仿佛一下子就涌现出了许多对鲁迅“有话要说”的群体——诸如红卫兵，他们以“写作组”的名义，或者干脆就是“石一歌”之类的符号代名词，开始了对鲁迅的读解。在这里，个人的一切都悄然地退场了。而在这种退场中，阅读与理解最大的歧路便发生了：对于一个以知识分子个体启蒙意识为立身之本的伟人的作品，在那个一切都被公共的“共名”所侵袭的特殊时代，人们偏偏采取了一种最为集体化的喧闹甚至是粗暴的接受方式。在这种集体式的狂欢中，谁能真正保持自己个人化、独立的理解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回头去看看就知道，当年对鲁迅真正的认识与理解，往往不在这种闹哄哄的选本式阅读中，反而更多地在于那些沦落于偏僻的草莽江湖之中的孤寂的心灵里。

与特殊时代语境的明显关联是鲁迅选本式读物的又一个特征。在这些读物的正文前面，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毛主席论述鲁迅先生的名言开宗明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或者干脆就是以大号黑体字将主席语录特意标出。毛泽东与鲁迅这两个称得上是最懂得中国而终生没有机会见过一面的伟人，在这种奇异的历史场景中“邂逅”了。想想当时几乎人手一册的《毛泽东语录》与这样的鲁迅选本齐飞共舞的情景，再看看在鲁迅选本中主席语录与鲁迅文本之间这种“互文共生”式的安排，谁都会感觉到其间的耐人寻味。在今天，人们对“毛泽东与鲁迅”这样的题目，早已写出了不止一本专著了。在鲁迅选本式读物所构成的这个特殊的文化空

间里，学者们理应对“毛泽东与鲁迅”这样的问题获得别样的思考与启示。

为我所用、实用主义的阅读逻辑，是这类鲁迅选本读物的普遍性特征。从接受学的角度讲，“改写”一个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的整体分解为断章取义式的选本。鲁迅先生作品的遭遇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在那种接受逻辑的支配下，人们出于种种为我所用的目的，对鲁迅文字的拆解，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为了适合“革命要求”等不同目的，人们对鲁迅的完整文字或掐头去尾，将与环境不协调的文字隐去；或移花接木，抽去具体的文字语境，将片段径直腾挪安放到另一处风马牛不相及的标题名目下。就以我手边的一册《鲁迅批孔反儒文辑》为例，从鲁迅那篇著名的演讲《无声的中国》中摘录了一段相关的话：“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们的话。”对照鲁迅原文就知道，省略号是编者所加，所省略的是“韩愈柳宗元”——韩愈、柳宗元是归于法家的“改革派”之列的，在“批儒评法”的时代氛围中，《文辑》就只好对其略去不提了。在另一篇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中，鲁迅曾经举了一个例子：非洲土人开始反对西洋人来修铁路，而后听说要修的铁路“简直就和古圣人的用意一样”，就很高兴，铁路很快就修起来了。先生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上面所说的观点：“现在听说又有很多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在利用！”然而可能是因为非洲与中国一样，同属第三世界，以她为例有丑化之嫌疑，《文辑》摘录这段文字时也以省略号将其省略了，只留下了上下文干巴巴的论说。至于将鲁迅写于20年代初的“呐喊”中的“听将令”的那段著名的文字，安放在论述鲁迅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标题、类目下，则更是在多种选本中屡见不鲜——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鲁迅强调说过“那时革命者前驱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我们也知道当时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李大钊、陈独秀没有

给鲁迅下过任何的“将令”。记得鲁迅先生在《集外集·选本》一文中论述过自己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选本”传统的意见：“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的意见为一集”，或者“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的意见为一新书”，“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取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予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他之所以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一年后他在《且介亭杂文二编·“题未定”草（六）》中又写下了近似的意思：“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他举了陶潜为例，说他除了“悠然见南山”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不幸的是，鲁迅先生没有想到，他用心血浇铸而成的文字，会在日后的岁月中遭遇到一场比任何时代都要更加面目全非的“文人浩劫”，在这场铺天盖地的碎片式“选本”运动中，鲁迅先生的形象变得前所未有的支离破碎、模糊不清。

鲁迅先生说过，《诗》排得那么齐整，“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最古的诗选”（《集外集·选本》）。从被删选之《诗》到著名的《昭明文选》，“选本”真可谓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之一。“文革”中鲁迅的选本读物，只不过是被荒谬的历史遴选拼凑得最为荒谬至极的一种奇景而已：作为当代中国人精神史、阅读史上的一段特殊记忆，它像镜子一样折射出了个人在历史中的境遇，以及历史本身的复杂与真实。到了今天，恐怕再也不会有那样的选本浪潮了。但像以“鲁迅谈××”“鲁迅××文选”之类的名目拼凑的册子，在经典文本的阅读与接受中还是层出不穷。对这样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在平常的阅读中我常常下意识地保持着自己的警觉与质疑。

都和我有关

每次读到这一段文字，我总是抑制不住一个后学者的感动与悲伤：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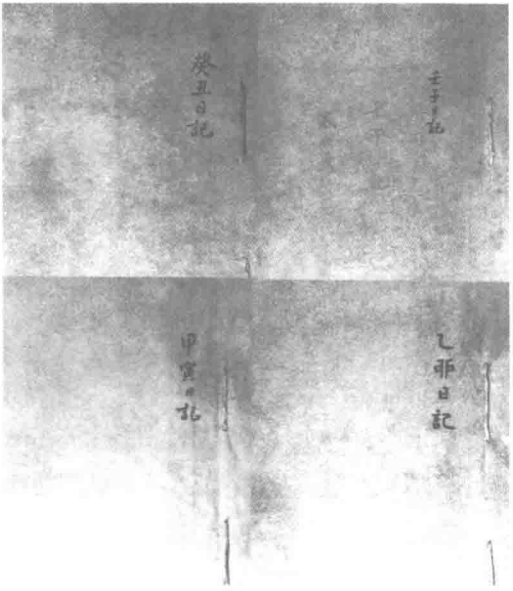
“哦……”她走过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石一歌《鲁迅艰苦奋斗生活片断》

我知道她没有懂我的话。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这是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中描写的一个片段，写于



鲁迅日记封面

先生逝世前两个月差四天。对生活真切的留恋与热爱之情，在这位战斗了一辈子而今疲倦至极的知识分子的笔下，赫然可见。即使分明“感觉到在死亡到来之前那致命的疲劳”，但他依然在喊叫：我想生活下去。

更让我感受到一种力量的，是这位垂死人所再一次声明的人生态度：“都和我有关。”尽管我们知道，二十年前，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启蒙的晨曦已经渐渐撩起窗外的黑暗时，先生一度将自己隔绝在铁屋中与古槐树下寂静无声的拓碑与古籍世界中，拒绝朋友们的邀请长达八个月之久。即使在定格为历史特殊日子的“五四”这一天，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日记枯燥简单地记道：“昙。星期休息。”此外就是某某来，给书某某。——仿佛窗外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涉；尽管我们也知道，二十年后，在风沙扑面的世界中颠踬了半生而伤痕累累的先生也曾经哀鸣：

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这也是生活”……》）

尽管我们更知道，先生所生活的世界，常常对他表现出难以想象的绝情，让他陷于无穷尽的绝望。

但终其一生，先生都在用自己“抉心自食”的心力阐释着这一人生态度：



鲁迅遗容

“都和我有关。”

写文章，他说：“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社会去！”（《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弄翻译，他说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30年代，当周作人上溯晚明的性灵文学、林语堂移植西方的个人主义，在喧闹的时代十字街头建起象牙之塔，以便“得体地生活着”时，先生却不遗余力地批判起了许多文人对时代与社会的冷漠——对这种风气的批判，是先生持久的论战生涯中仅有的主动进攻并且不依不饶的一次——坚定地选择了一种“心事浩茫连广宇”的人生态度。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世界不可能与自己无关，而自己也不可能超脱这个世界。这就如他所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居’。……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二心集·序言》）所以他宁愿“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华盖集·题记》）。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过江之鲫的隐士与绅士们曾经虚幻地宣布“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最好还是坐在阁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上吆喝几声，以出胸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周作人《雨

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他们幼稚地自信在个性主义中可以独善其身。

而先生的气质注定了他不可能像绅士们那样超然社会之外，像隐士们一样不闻世事。不要说是自己所追寻了一辈子的文学，自己沉浸了一辈子的书籍，就是“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因为如此，隐士绅士们仅仅止于成就了自身的个性主义，而也是个性主义者的先生却走向了更远，在与社会与世界的广泛联系与深沉触摸中把握到了中国最为内在的命脉，感应到了他所处的时代最为本质的跃动。这种差距，不仅仅是个人探索心路历程之远近的差距，而是方向性的差距：奉行独善其身的人“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只是沉浸于一己的超脱与游戏；而信仰“都和我有关”的人，始终保持着自己对生活的热度。他们所各自迷恋的以自言自语为特征的小品文和以向社会发言为特征的杂文，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对不同文体的好恶，实际上深刻地蕴含了一种最为本质的精神分野。

也是在鲁迅先生写下“都和我有关”这段文字的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几年后，对这场内战颇为关注的美国作家海明威为此写下了著名的《丧钟为谁而鸣》一书。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海明威抄录了一段16世纪英国玄学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语：

>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岬，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缺损，因为我与这个世界难解难分。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敲响。

如果不是我的理解过于牵强，那么我想说海明威所引用的话与鲁迅先生的表达，二者实在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我与这个世界难解难分”与“都



1936 年鲁迅殡仪

和我有关”，说的不就是同一个意思么。海明威的用意，是在反思经历过战争摧残的欧洲的命运；而鲁迅先生的感受，更多的是来自一个中国人乱世生活的贴身感受。两位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关注世界与社会的命运这一点上，不约而同地达到了二者的相通，都在悲悯之中表现出了他们所服膺的人道主义的力量。

中国古代文人一向有着在入世与出世、仕与隐之间寻找心灵平衡的传统。在中国的近代，从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每一次努力，都在激越与希望中回荡起一番舍我其谁的旷世豪情，又很快在屡起屡仆的失败与绝望中造就了一些“神州袖手人”。在轮回般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中，近代文人的性情一时间变得乖戾无常起来。自杀、逃禅、遁佛、佯狂、自弃，种种厌世的身影一次次掠过这个时代灰暗的天幕。在这种传统影响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常常在伤心之中对身外的社会侧过脸去。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甚嚣尘上的“私人化写作”、向内转等个人化思潮中窥见这种情绪的秘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必须学会与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也有着选择不同生存方式的权利，但更加无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绝不应该对社会转过头去。因为任何时候，一切“都和我有关”，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性选择，也是知识分子得以为知识分子的根本性依凭。这一点，是鲁迅先生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之一。

2000 年 10 月

旧时王谢早无家

——熊式一们的生命骊歌与文化乡愁

一、世人谁识熊式一？

经常在故纸堆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沪上学者陈子善先生，如毛尖女士所说，“在愉悦的发现后，还能好整以暇，星星点灯，子善出门，去接见全世界的善男善女”（《子善老师》）。去年初冬身瘦衣单地翩然东来，到南昌青苑书店与读者分享由其推动出版的熊式一所著小说《天桥》中文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的阅读体会。书友会的主题是“世人谁识熊式一？”南昌是熊式一的家乡，在此情境中发此问难，颇为准确，如果深入了解熊式一的命运，难免更多有沉痛之感。



熊式一像

说其准确，是因为这道出了今天大陆读书界“世人不知熊式一”的尴尬。通过近年推出的《八十回忆》（海豚出版社，2010）、《天桥》等书，

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生于1902年、逝于1991年的熊式一，一生几乎纵贯整个20世纪。其“墙内开花墙外红”的生平，典型地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去国知识分子这一边缘群体的复杂遭际。熊式一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1930年代在《小说月报》《新月》等著名新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译作，包括英国大剧作家萧伯纳、巴蕾的剧作，哈代的小说等；出版了独幕喜剧《财神》等。徐志摩推崇他“对英美近代戏剧，很有造就”（引自《八十回忆·〈难母难女〉前言》）。熊式一本来可以受聘去武汉大学任教授，但“按照中华民国教育部严拟的蠢规定，我的资格决不可以受聘为国内任何国立大学的正教授”（《八十回忆·出国镀金去，写〈王宝川〉》）。像当年刘半农受刺激远赴法国留学镀金一样，“土鳖”熊式一在国内南北各大专院校担任九年教师、做了五个孩子的父亲之后，毅然万里投荒，于1932年底远渡重洋到英国深造，由熊式一变成Shih-I Hsiung，也由此开启了他在海外双语写作的序幕。概括地说，他的海外写作，大体有两次高潮。1934年，在英国莎士比亚专家聂可尔（A. Nicoll）教授等人的鼓励下，熊式一将中国妇孺皆知的王宝钏故事剧《红鬃烈马》，按照西方文化习惯对戏剧内容、主题和戏剧形式进行适应性改写而成英文话剧《王宝川》。剧作由英国麦勋书局出版，一时洛阳纸贵。由其亲自导演的同名话剧，连演三年九百多场而不衰，玛丽皇后携儿媳和孙女（即伊丽莎白女王）八次亲临观看，外交大臣以及各国使节陪同；当年的英国各家报纸或称其为“小名著”“一本精巧雅致的书”“一本可用以馈赠特殊人物的好书”，或将其喻为“争艳怒放的花朵”“轻盈的蝴蝶羽翅”“妙不可言的日落”“清新的草上露珠”等。评论家则认为《王宝川》“具有一种精湛文化的标志”，其作者为丰富英语文学做出了贡献。跨海到纽约百老汇上演，美国剧坛也为之轰动，上演一百零五场，罗斯福总统夫人亲自接见作者并合影留念（《王宝川》中英文对照本代序，商务印书馆，

2006）。话剧还在七个国家用四种不同语言巡演。在当时如拉斐尔（James Laver）译、名导演丁氏（Basil Dean）执导、明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主演的元剧《灰阑记》亦受观众冷落、只好“美其名称为艺术上的大成功”（熊式一《八十回忆·出国镀金去，写〈王宝川〉》）的惨淡情况下，《王宝川》可谓开华人在西方戏剧界成功之先河。该剧甚至入选英国中学教材。英国著名戏剧研究专家、《中国戏剧史》作者杜为廉（William Dolby）教授说，他中学一年级时所用英文教材就是《王宝川》，“看后留下深刻印象”（朱伟明《英国学者杜为廉教授访谈录》，《文学遗产》2005 年第 3 期）。不久，熊式一又将《西厢记》译成英文出版。

抗战前夕，像许多共赴国难的文人一样归国的熊式一，与宋庆龄、郭沫若等一同被推举为上海文人战地工作团主席团成员。但在“七七事变”后又肩负宣传抗日的使命重返英伦，再次进入英语写作的兴奋期。40 年代，熊式一在英国出版了皆以中国近代历史为背景的英文话剧《大学教授》（1939）、长篇小说《天桥》（1943）。尤其是《天桥》，英国大文豪 H. G. 威尔斯誉之为“比任何关于目前中国趋势的论著式报告更启发的小说”，“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画图，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转引自《〈天桥〉中文版序》）。1945 年秋，同为江西同乡的史学家、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先生应英国皇家学会和牛津大学之约，到英伦治疗目疾，获赠《天桥》。羁旅天涯、异乡寂寞之中听读消遣，史学大师感慨不已，先后题赠二绝句和一首七律。其绝句之一云：“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虽然说有同乡情谊这层特殊关系，使陈先生不喜“北都旧俗”而“爱听天桥话故乡”并大力揄扬，但《天桥》当时在海外确实影响广泛。小说在伦敦首印后三年间即再版十次，被译成法、德、西班牙、瑞典、捷克、荷兰等多国文字，畅销欧美，将它与林语堂英文名著《京



熊式一《天桥》

华烟云》并称为“卢前王后”，洵非客套虚誉。

只是令人不解的是，与林语堂及其《京华烟云》等早已为文学界所耳熟能详不同，即使询之现代文学研究者及江西文化界，对熊式一也多茫然不知，犹如失踪于须洞的历史风尘之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历经抗战、内战、新中国成立及此后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等，而熊式一辗转欧美、南洋、香港等地，先后供职于英国剑桥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以及加拿大圣诺伦斯大学，并于1963年移居香港创办清华书院，于1982年退休。尽管1988年终于重履北京叶落归根，但他的著作在大陆几乎湮没无闻。即使以江西籍作家为论述对象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也未见著录其名。其散篇“八十回忆”系列文章，发表在《香港文学》杂志上，大陆读者长期未能得见，直到此次以单行本结集出版。译本满天下的《天桥》，则直到英译本出版二十年后的1960年，熊式一用中文译写，才由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1967年又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而按照陈子善的考证，迄今为止的各种香港文学史，都未提及《天桥》，唯独《香港文学书目》给予其一席之地，认为这部小说“无论写人写事都写得活泼风趣，破除成见”，“想写出中国和西方的真貌，而不欲互视对方为稀奇古怪的国家和民族”。直至去年作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前夕，其中译本才翩然回归大陆——说来未免太过姗姗来迟！

二、世人谁敢识熊式一？！

至于说“世人谁识熊式一？”一语沉痛，则必须放长20世纪的历史来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熊式一其人其文外热内冷的遭际，以及在他身上所折射出

的流散知识分子（Diaspora intellectual）的生命骊歌与文化乡愁。

在南昌书友会上，出现了动人的一幕：当熊式一的嫡孙、北京大学 MTI 教育中心客座教授熊伟介绍其祖父的生平文章及熊家旧事时，同样名为熊伟、居留南昌的熊式一侄子特地从郊区赶来与亲人相认。叔侄当场拥抱，温馨感人。令人感慨的是，叔叔大熊伟年过七五，侄子小熊伟亦已五十有二，这竟是叔侄二人首次见面！当年熊式一滞留海外，于开罗会议后奉命为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领袖之一蒋介石立传，成为与新政权对立的“反党反人民的反动作家”。大陆封闭时期，有着复杂海外关系的熊氏族人噤若寒蝉，不敢联系，因此出现了后辈两代人异处而重名的奇事。大熊伟无限伤怀地对陈子善说：作为学者，你问“世人谁识熊式一”；作为家人，我要说的是，在当年海外关系被视为畏途、高度政治化的特殊年代，“世人谁敢识熊式一？！”他回忆说，有关方面曾经几次审查他是否与海外的叔叔熊式一暗中联系。大熊伟举出反证辩解：自己如果与叔叔联系，就不会出现熊氏第二、三代重名之不合情理的现象矣！此种令人哭之笑之的罕见经历，未免让人心酸唏嘘。大熊伟介绍说，因为熊式一这种特殊身份，熊氏十余人，很长时间不敢相互联系。1986 年，熊式一在回忆文章《出国镀金去，写〈王宝川〉》中谈到自己因文凭限制被逼出国的事，说自己对教育部“严拟的蠢规定”，“却以为德，反不以仇，我一生实在要感激这种岂有此理的部令！”原因是，假如没有这种规定，自己“就决不会冒险跑到英国去，留在国内，等到‘文化大革命’时，谁能免受辱于红卫兵？不让他们弄死，一定会自杀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其中有对民国教育规制的愤懑，更多有对大陆此后政治运动中世事变迁的沉痛慨叹。

事实上，熊式一及熊家的这种命运，在现代中国绝非孤例。“世代蝉嫣先泽永，百年家世水萍留”（俞平伯诗）。在 20 世纪动荡的大时代，残酷



蒋彝《儿时琐忆》

的战争、政治运动裹挟着时代特有的粗粝风暴，无情地摧毁了大多数聚族而居、静水流深的传统士大夫家族，最终铲除了盘根错节、重庑深檐的世家大族，终致改变、恶化了传统中国自由发育成熟的以世家为主体的文化生态。

陈子善在大陆版《天桥》的序言中总结说：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位是林语堂，二是蒋彝，三就是熊式一。有意思的是，后两位为江西同乡。蒋彝曾就读于东南大学，试图以学习炸药增强国防，不料毕业即失业；曾参加北伐，希望通过革命救亡，革命失败后旋即失业；曾任民国首任九江县长，很快因不愿意将土地非法售与美国企业而被上司勒令辞职。“管宁浮海非逃世，梅福辞官岂近名？我挈孤怀成独往，冰轮初辗海天清。”（《船中漫吟》）从学、从军、从政皆碰壁，可谓报国无门，蒋彝终于在1933年5月愤而远赴英伦。在国外拼搏多年，蒋彝成为海外闻名的书法家、作家，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而就是这样一位爱国者、艺术家，直至1975年才有机会从海外回国探亲。其女儿蒋健兰在父亲去国时不满两周岁，两人分别四十二年后才重新相见。在为蒋彝回忆录《儿时琐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所作前言中，蒋健兰记叙了海外父亲这一因素给她大陆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快交代！你父亲逃到外国去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在那黑白颠倒的日子里，造反派头头喊叫着让我交代。这可真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我父亲蒋彝在一九三三年离开祖国的时候，我还不满两周岁，连他的容貌我也毫无

印象，我能为他的出国干些什么呢？等我刚明白事理，我的家乡九江就已经解放了。说实在的，我还真是不知道当年父亲为什么出国，也不知道他在国外究竟做了些什么。只知道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努力与这位在海外的父亲划清界限。其实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界限，我十几年也闹不明白。不过经过这些过程，不论是政治上还是感情上，都使我那样地希望有一天能够了解我的父亲。”而相见时刻，“不禁令人心酸而又那么富于戏剧性。我们是亲生父女，然而却互不相认。我接到父亲将于四月间回国的信，心里充满喜悦，又感到忐忑不安。要知道，那还是阴霾蔽日的年代，是祸是福难以预料。然而毕竟是要见到既陌生又亲切的父亲了，即使就是‘阶级敌人’吧，那我也可以弄个明白，黑锅背得也不冤呐！”她不断地拿出照片辨认父亲。在机场见面，“我冲口喊出一声‘爹’，这是四十二年无数次在我心中回荡的声音，今天终于喊出来了。老人的正在四方找寻的目光，转向了我们这里。我们见到了，一时相对无言。四十二年，两个世界，他是父亲，可他又是‘外宾’。接待人员一再告诫我们要注意内外有别，嘴下可得留神啊！”这种因海外关系而导致亲人生离死别、生活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境况，与熊式一家人何其相似乃尔！

再举一例为证：1966 年八九月间，时在香港的历史学者牟润孙寄赠其著作《魏晋以后崇尚诡辩之由来及其影响》一册给时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先生。此前 6 月 6 日，“文革”在广州开始。陈先生助手、护士被红卫兵赶走，造反派将大字报贴到床头。妻子唐筼被迫代写了六次检查仍不得过关。处此情况之下，陈寅恪在当年 11 月 22 日复信牟润孙：“数月前奉到大著。‘乌台’正学兼而有之。甚佩，甚佩！近年失明断腿，不复能听读。敬请以后不必再寄书为感。”复信甚至有些无礼谢绝的意思。据学者胡文辉在《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南方周末》2007 年 11 月 8 日）一文中分析，“‘乌台’



熊式一《八十回忆》

正学”表面为恭维之语，实则一语双关，可以说是“答海外友人的一通密电”。“乌台”借苏轼旧事指文字狱，“正学”为明初方孝孺（字正学）被株连十族事。处于当时草木皆兵的政治形势之下，陈氏在信中请牟氏不必再寄书，“显然，那是因为害怕‘里通外国’的罪名啊”。

三、何限天涯祖国情

近年来，“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与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尤其关注流散写作者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这一中心问题。简单说，“流散”意指与某种文化中心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从20世纪初华工、商贩移民，到抗战和国共内战前后的移民潮，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在外部势力进逼、传统社会结构瓦解、人文历史脱序的时代命运中，一个多世纪以来，华人移民仿如历史的碎片，一次次流散于四方，也一次次承受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总的来说，中国移民的身份焦虑受民族文化整体危机难以克服的决定性影响，其流散便具有生活价值全盘失落的潜在意义。”（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流散的命运给写作者带来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恰如有着流散经历的当代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所说，“流亡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因此，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

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1 期）

“每惭父老说微功，偶抚创痕涕泪中。合眼乡关推不去，西风到处有哀鸿。”（蒋彝《却忆九江》）对于承受着文化认同危机的流散写作者来说，一方面是对被故国放逐的怨恨，一方面却在情感上积聚着无尽的乡愁，在理性上更有着为祖国被强势异国误解和丑化的真诚辩护、努力正名的深层诉求。熊式一在《大学教授》一书的序言中总结创作经历时说，当年写《王宝川》只是试试自己卖文能否糊口；译《西厢记》则是宣传中国文化；至创作《大学教授》与《天桥》，则“完全出于爱国热忱”。改变、纠正西方主流对中国人的错误观念，让西方公众对中国现代的社会状况有客观的了解，这种今天看来近于宣传式的写作，成为熊式一的自觉追求。1939 年，他在《大学教授》剧本长长的后记中，明确指出此剧的目的是促成“西方人既然已经看见过中国旧舞台及其他旧的一方面之后，也可以看看我国现代的一鳞半爪，我们的新话剧、新生活”。他愤慨地批评说：“自从欧洲的冒险人士到过那个远在天边的中国以来，一班想象力特别丰富的写作家，以之为他们乱造谣言的最理想根据地。它真在千万里之外，你随便瞎说八道的捏造任何荒谬绝伦的事情，说它经常发生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安安心心相信，绝对没有人会指出你的破绽。”而普通的欧美人，则大都认为中国人“多半是心地阴险的怪物，差不多随时可以运用魔术”；不仅外表如眼睛半开半闭、齿若獠牙、脑后长辫、指甲如鸟爪，而且，“他最痛苦也好，最快乐也好，他总是脸上无一点表情，永远仿若无事”。因为这种怪异的印象，西方的恐怖剧本与神秘荒诞剧的作者，总是把不近人情的角色当作中国典型人物。如好莱坞的恐怖片，“最可怕的

杀手，大都是吸鸦片的中国人。写戏本，或是制作影片，其中唯一的中国人，便是其中的主要歹角，未免不近人情”。在社交场合，主人总是对熊式一抱歉说没有为他准备好鸦片烟。见到熊夫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定是她的脚，结果每个人都免不了因看不到小脚而失望之至。无论熊式一怎么解释，西方人也不相信，且认定熊氏夫妇过于洋化了，算不上是典型的中国人。熊式一还痛心地记述了他偶然在一本地理教科书中看到有关中国人的胡言乱语——该书竟称中国人因为崇拜古物，所以好吃腐烂的臭鱼。这种荒谬绝伦的观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更不幸者，“西方知道我们中国的时代太不巧了”。鸦片战争、义和团、颟顸的满清政府，袁世凯恢复帝制，以及北洋军阀、国民党时代的战乱，此后近一世纪，国事日非，鱼烂河决，更让西方人对中国印象极差。种种耳闻目睹，使饱受刺激的熊式一下决心要纠正被扭曲了的中国人形象。在香港高原版《天桥》序中，熊式一亦作出类似自述，“我从前觉得西洋出版关于中国的东西，不外两种人写的：一种是曾经到过中国一两个星期，甚至四五十年，或终生生长在中国的洋人——商贾、退职官员或教士——统称之为‘支那通’，一种是可以用英文写点东西的中国人。后者是少而又少，前者则比比皆是。他们共同的目的，无非是把中国说成一个稀奇古怪的国家，把中国人写成了荒谬绝伦的民族，好来骗骗外国读者的钱。所以这种书中，不是有许多杀头、缠足、抽鸦片烟、街头乞丐等的插图，便是大谈特谈这一类的事。”正是抱着这种为改变旧中国病态形象的偏见的目的，他不仅在英美讲演时，“总是告诉他们现在中国人大多数都不抽大烟，不缠足，不留长辫儿，不蓄妾，不杀头”，更“决定了要写一本以历史事实、社会背景为重的小说，把中国人表现得入情入理，大家都是完完全全有理性的动物，虽然其中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的，这也和世界各国的人一样”。为了让西方读者感觉可信，他甚至特意将“真爱中国，真是好人”的英国传教士李提



熊式一与友人合影

摩太安排为小说中的洋主角，将他与另一位心胸狭窄的传教士对比。此种为改变迎合外国人病态的好奇心而丑化中国人的书写、让外人理性认识中国的做法，可谓用心良苦。

几乎与熊式一同时代的蒋彝，在海外读了诸多关于中国的游记，书中记载让他十分愤怒不平——那些外国作者描写中国，不是女人裹小脚，就是男人抽大烟，以及乞丐、苦力等社会病态。作家们是为了把不健康的好奇心理渗入读者的心，出版商则为了畅销赚钱。这些书在英国人心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是落后、愚昧、低能。他决心撰写游记，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写英国，但是他要求自己做一个公正的作家，要从各色各样的人们当中寻找他们的共同点，而不是追求他们的差异和怪癖。在这种心理推动下，他完成了《湖区画记》《伦敦画记》等十三册画记，而冠以“哑行者丛书”之名。时人不明书名用意，实则“哑行者”即表明他被迫抛妻别子，远走异邦，犹如一个游方和尚，有言无处发，有冤无处诉，形同哑巴——说的是一己之处境，又何尝不是濒于“开除球籍”的近现代中国无声喑哑命运之文化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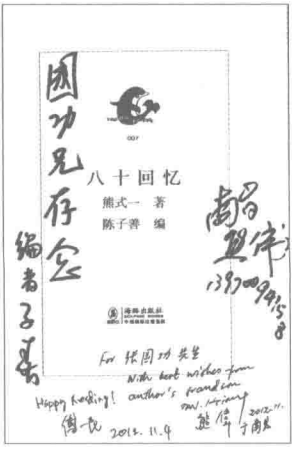
“名列仙班目失明，结因兹土待来生。把君此卷且归去，何限天涯祖国情。”（陈寅恪赠熊式一绝句之二）即使因种种屈辱与不快而被迫离乡去国，但“何限天涯祖国情”一语，足以用来概括流散写作者的深层追求。身虽早为他乡之客，杳渺的故国山河却无时不在梦中，这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无法根除的家国情怀。

四、旧时王谢早无家

陈寅恪先生赠熊式一七律说："沉沉夜漏绝尘哗，听读伽卢百感加。故国华胥宁有梦，旧时王谢早无家。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此诗题目极长，为《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巷故事自况也》。诗题所记，为1902年事。当时陈寅恪随兄长陈师曾游学日本路过上海，遇到支持中国变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李用华语对陈氏兄弟说："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虽说陈寅恪"非敢以乌衣巷故事自况"，不愿自夸世家身份，但如其挚友吴宓先生所说："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陈宝箴——引者注)受知于曾文正(曾国藩——引者注)，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深湛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噪，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道教所托命者也。"(《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作为一贵族史家，陈寅恪深信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堕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崔浩与寇谦之》)《天桥》曾述及戊戌政变旧事。陈氏之祖湖南巡抚陈



《天桥》扉页



《八十回忆》扉页

宝箴、父吏部主事陈三立在政变时都遭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因此，天桥旧话，在世家子弟陈寅恪读来，不仅是纸上小说家言，实则恍如自家前尘旧梦，因此油然生出“故国华胥宁有梦，旧时王谢早无家”之叹。1972 年，蒋彝到香港大学讲学时，遥望一河之隔的罗湖对岸，曾写下两首竹枝词：“年年海外说还乡，未到乡前港已香。遥望白云依旧是，白云下有蒋家庄。”“贾公车我到罗湖，文锦渡头口直呼。不见神州四十载，神州记得哑夫无？”

“万里投荒已自哀，高秋寓目更徘徊。”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历经不堪回首的流散命运，当年“神州记得哑夫无？”这种近乡情怯式的自我探询也罢，今天“世人谁识熊式一？”的后辈沉痛反问也罢，当中国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纷争，渡尽劫波，在故国家园同入梦、中华文化血脉相连的感召下重新携手亲近时，给了饱尝离乱的后死者些许温暖，给了本为一家的中华儿女无限安慰——尽管已经迟到多年！只是，“旧时王谢早无家”，历经半个世纪的无情摧折，风景不殊，而多少有山河之异。

在读书会上，我挚请熊式一家人为迟归故土的《天桥》与《八十回忆》签名留念。熊式一侄子大熊伟署下“南昌熊伟”，而嫡孙小熊伟则用流丽的英文签名，两代人称得上中西合璧。而偶然重名命运之背后，却隐含着两代人在特殊岁月的身世沧桑。遥想一些赣地先贤的人生境遇，以及江右乃至于神州各地诸多世家大族在近现代风流云散、斯文不再的命运，我还是禁不住一声叹息——为这无情的政治，为这有情的国民！

2013 年 2 月

“两个丁玲”的冲突

存在仅七年（1950—1957）时间的中央文学研究（讲习）所，被视为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但即使对今天的当代文学专业研究者来说，这也是一个被忽略了其意义的机构。实际上，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之初的产物，它对今天的作家协会等文学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人把它称为文学界的“文艺党校”或“黄埔军校”。女学者邢小群在对文研所进行解剖麻雀式个案研究的专著《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中，转引了一组意味深长的数字：据1984年的一次统计，文研所四期264名学员中，在中国作协、文联工作的干部有18人，约占总人数的7%；担任省级文联、作协主席或副主席的61人，约占23%；任国家级刊物、出版社正副总编的19人，约占7%；任省级刊物正副主编的38人，约占14%；专业创作人员36人，约占11%；教授、研究员11人，约占4%。学员中成为著名作家的较少，成为文艺干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

部的较多。

不知道当时仍然在世的丁玲是否看到了这组数字。这种成果，对一手创办起文研所，甚至想将其办成“研究院”的她来说，并非其初衷或所期望的。长期在文研所工作的王景山在接受邢小群的访谈时说：“丁玲好像不仅要把中央文学研究所办成培养作家的所谓的‘文艺党校’，还准备提供条件有计划地组织一些作家和评论人员，从事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形成教学、创作、研究三者互补互促的局面。”但即使如此与体制运行相一致的秩序建设，还是给丁玲这位革命者的后半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与此前延安时代性质相似的鲁艺命运迥异，丁玲主持的文研所似乎未能得到来自体制的足够支持，而是屡遭非议。丁玲时而伤心学员没有生活体验，拿不出作品，时而担心跟不上“运动”，“一方面让大家多看书，写出作品来；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个改造思想的场所”，三年后她就辞去所长职务；随后文学所缩小规模，更名为文学讲习所；七年后终于无疾而终。更令人无法逆料的是，“丁玲的小集团势力”，“在学员中间散布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离开文学的党性原则”，“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独立王国”“个人崇拜”“提倡骄傲”“一本书主义”等无端罪名，始料未及地炮制出了名动天下的“丁陈反党集团”，将早年激进革命、晚年一度被文坛士林目为“左派”的丁玲打成大“右派”，流放入狱近二十年。到今天，历史早已证明这些罪名的虚妄。——如果一定说有“个人主义”之类，那至多如李辉在《往事已然苍老》一文中所精当概括的，是丁玲喜欢因文学而产生的“明星意识”而已；或者如王蒙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中所说：“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对于文学服务于新时代，丁玲没有丝毫的怀疑，而且投入了自己的激情。据作家徐光耀回忆，解放不久，毛泽东找丁玲去谈话，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



1951 年 3 月 8 日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女学员合影

听了连声说“很好很好”，很是鼓励了她一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记载，刘少奇找丁玲谈话说：“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的作家的学校吧！”丁玲是一百个赞成。应该说，丁玲的选择，是由衷的。来自国统区与解放区两大阵营的文化人合流后，旧年自由的、个体性的文人生存方式面临着统一纳入新政权的要求，建立机构培养自己的作家，就成了一种时代性的吁请。丁玲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应和了这种新的政治需要。成名极早，坐过国民党监狱而后又有过延安革命经历，还获得过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奖金的丁玲，应该说是这一位置的最好人选。尽管丁玲明知自己从性格上说“不适宜办学校，又怕做行政工作”，但出于参与新政权建设的热情，她还是表现出了一种服务大局的责任感。与丁玲相濡以沫数十年的陈明说：“丁玲有一种感觉：这些同志，在战争年代就开始写东西，但是战争环境中读书的机会很少，看作品的机会很少。如果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给这些同志们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就好了。……丁玲也觉得对他们有一种责任，就决定搞一个一边学习一边创作的环境。并向组织反映了这些想法。”

在这里，仿佛有着一种历史的悖论：出于服务体制初衷而建立的机构，却最终成为体制否认与批判的对象。在邢著中，作者试图追索文研所何以成为丁玲的“滑铁卢”这一问题，特意探讨了“两个丁玲”这一令人深思的现象：

“从丁玲在文学研究所获得的声誉看，丁玲是一个很有个性魅力的作家。她本来执行《讲话》精神很坚定，文学实践成果也很突出。为什么她会给人造成‘一本书主义’这类‘个人主义’‘艺术至上’的印象呢？”作者的解答是：“丁玲现象给我们的感觉，她首先是一个作家，其次才是她努力争取做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她的遭遇告诉我们，在她身上始终有着自由主义作家与共产党员作家角色矛盾着的困惑。……从丁玲的作品和她的一些言论，从丁玲的遭遇、经历来看，我确信有‘两个丁玲’的存在。一个是革命作家的丁玲，一个是自由主义作家的丁玲。她始终在两种作家的角色中矛盾着，甚至无意识地经常转换着，以致构成了‘两个丁玲’的无处不在。这‘两个丁玲’矛盾而又统一地体现在她身上。她自身的矛盾性，也在为党内斗争所利用。”这种结论，应该说是极精辟的。（有意思的是，丁玲批判萧军时，也是将其定位为“个人主义”。《萧军批斗》一书收录的丁玲的文章曾记下其所说：“萧军的个人英雄主义在群众面前已经彻底垮台了，纸老虎已经拆穿，人们看到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堕落的、反动的东西。那么，今后他是否有前途呢？我说只要他有决心改正错误，向工农兵学习，跟着共产党走，他就有出路。否则就没有前途。”这些话和1957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周扬他们劝丁玲的话基本一样。）丁玲内心深处的个体性思想，与这种体制的建构有着一种隐幽的内在冲突。自从30年代投奔延安而成为“今日武将军”后，丁玲逐渐成为左翼革命文学树立的代表。但是，从本质上说，写过《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的丁玲并非是一个地道的政治人，而是一个本色的作家与文化人。尽管她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延安，但她与典型的延安知识分子还是有着一丝细微的差异。在为革命牺牲的同时，她一直试图保持着一份自我。从延安时期的《“三八节”有感》事件，到暮年雄心操持起《中国》杂志却频遭非议，都是这一性格冲突的结果。就像有人开玩笑说，丁玲失败

在于缺少一个政治高参，常常让自己“左”“右”得不合时宜。

当然，说丁玲是“自由主义作家”，并不表现在她在当时的环境中，需要像萧乾等典型的自由主义作家一样，写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一类的社论，而是体现在一些与具体情境稍有不协的细微现象，以及这给他人造成的一些不和谐感觉上。邢著体例别致，在自己的论述后附有与论述篇幅相近的、对文研所参与者如徐刚、邢野、徐光耀、朱靖华等人的访谈笔录。这种“立此存照”，为作者的立论提供了一种更加全方位的参考，也使读者可以在一种“互文”的立体方式中窥见历史复杂而真实的本相。从这些鲜活的访谈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丁玲的性格与大环境之间的一丝丝冲突。比如就“个人崇拜”而言，丁玲的秘书张凤珠谈到文讲所学员对丁的爱戴时就说：“这是基于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她在为人处事上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她很大气，无论她的声望、地位有多高，她始终是一个作家。她真正懂文学，又会讲话，听她谈创作，分析作品，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丁玲被学员或作家崇拜，并非出于她本人的号召，而只是她自己有着“明星意识”魅力而已。从丁玲得知学员自发将自己照片与鲁迅等挂在一起而意识到事态严重，要求马上取掉这一事情看，她甚至是有意识地淡化自己的形象。但在刚性的政治现实中，作为一个服务于文学体制建构、政治一体化话语建设性质机构的主持者，不仅需要丁玲暂时放弃自己的创作而为甚至错别字连篇的学生奉献自己，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她无限可能地收敛自身的人格光芒，将自己无限降低到一颗螺丝钉的位置。在这样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如果说容许个人魅力的张扬，那也并不属于文人，更不属于有过“自由主义”历史的丁玲。就像她早在1942年所说：“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张凤珠同时说丁玲给人以骄傲的印象——这在今天顶多算是文人个性的评语，但在当时所

有的文人处于被改造地位，文讲所“有一个知识分子不吃窝头，工农们就大不以为然”（王景山记丁玲语）的气氛里，这已经足够将她定下“个人主义”的罪名了。丁玲的对手周扬后来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应该说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看法。丁玲试图坚持自己，这自然是不为人容忍的了。

作者在著作中用了一专章，试图解答到底是“谁整丁玲？”这一“丁玲挨整之谜”。作者认为：“1955 年的丁玲事件，是包括周扬在内的作协与中宣部掌权人，利用毛泽东搞高饶、潘扬、胡风的经验方式，主动出击，把丁玲推上了审判台。”这不知是否能说服对周、丁之间“宗派主义”这一公案一直迷惑不解的当代读者。也许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没有确解。重要的是，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仅仅是一点点文人式的个性，就会上升为莫须有的政治问题？丁玲性格中自身的矛盾性，为什么会被宗派主义扭曲成弥天大罪？在中国的文人史上，这样的问题并非丁玲一人的特例。

就像当年鲁迅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一样，同样具有文人禀赋的革命家瞿秋白在 20 年代曾说友人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今天看来，这确实是气质相近者以己推人的知心之言，也都有着一语成谶的悲剧意味。在 20 世纪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中，要论一生的传奇性及其所荷载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分量，恐怕无出丁玲之右者。其中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通过丁玲这位革命者、文人的坎坷命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文学这一老问题在 20 世纪中国这一特定情境中前所未有的剧烈冲突。

2003 年 2 月 25 日

周扬与丁玲：欲说“左”右好困惑

自从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在1993年出版并风行海内外以来，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晚年日益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吴宓、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等近现代学人的晚年，都被写成长文宏论甚至是专书。就像秋天宁静的田野蕴涵着过往季节里的深沉气息一样，知识分子的晚年，往往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与可供深度阐释的思想空间。尤其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运动无休的情势，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在晚年往往体现出反思一类的人文色彩，以及他们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冲突，从中更易折射出时代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这正如顾骧先生在《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一书的跋中说：



顾骧《晚年周扬》



年轻时的周扬

“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个急剧变动的转型期，置身于这个历史潮流中的人物，往往显出前期后期的差异，分为早年晚年的不同。”杨金荣在剖析研究胡适晚年的价值时也作类似说：“至于胡适晚年的命运，不仅因其早年难以预料，而且，更具有某种悲剧性。在戏剧舞台上，悲剧是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社会生活中，研究悲剧性的命运，也无疑能揭示命运主体‘最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能够借助于角色理论，揭示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下，胡适这一特定的人所作出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与角色主体的命运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整个胡适研究将不无裨益。”（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应该说，这些说法，是很有概括性的。静夜里将《晚年周扬》与《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王增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这两册关于知识分子晚年的著作对读，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周扬》与《无奈》两书有着太多的相似性。两书的作者都是与传主关系极为密切的人士，都是书中所记历史事件的当事者。顾骧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曾襄助周扬甚至是代笔捉刀撰写《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文艺八条》等文章；更因一同起草著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而与晚年周扬过从甚密。王增如则是丁玲晚年的女秘书，曾在丁身边工作五年，直至丁玲逝世。由他们来写周、丁这两位现代史上的复杂人物，可谓是最佳的人选。两书都是作者思考多年的结果而非一时随意之作。《周扬》一书的主要内容，在作者2002年接受学者徐庆全的访谈中已经基本阐明（见徐著《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无奈》一书，则是在作者的同名文章基础上修订而成，主要内容早已收入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现时代面影丛书”之一）。两书都是依据十多年前的个人笔记来写，既有着局外人

所无的可信度，又体现出一定的可读性。其写作的出发点，也大体相近，旨在为历史存真，予后世启示，就如顾骧在书前所言："我有责任以亲身经历，将我所知的那场文坛公案的种种，公之于世，供人辨析。"或如王增如开首所说："丁玲去世已经十五年了。作为十五年前一些事件的当事人，我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写在这里，依据笔记把当年发生的事情如实记录在这里，借以表达我对死者的悼念之情，或许也能给生者以遐想和某种启迪。"

而不知是否更属巧合的是，周扬与丁玲都是来自湖湘的文人，性格上都秉承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和倔强不阿的特质，表现出来即坚定的政治性。他们两人的命运，都与对另一个湖南同乡毛泽东的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一度为这位领袖所激赏，也曾一度为他所批判；30年代，他们在一起斗争，一个攻理论，一个搞创作，被视为左翼文学的旗手，都深怀着为新时代的文化创造而奉献自己这一忠诚坚定的信念。在延安时期，他们都是延安文化的创造者。但令人深思的是，这两位最有可能成为知心朋友的同乡文人（他们的家乡益阳与常德相邻），却在后来成了两种若有若无的对立与抗衡力量的中心（1979年，周扬接受记者赵浩生采访，自认分为主张歌颂光明的鲁艺一派与主张暴露黑暗的"文协"一派），至死都抱持着无法弥合的隔阂（关于丁玲1981年访美时是否说过对周扬"我不饶恕，我永远都不饶恕，直到我死去那一天"这样的话，还在文坛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笔墨官司，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所收《我宁肯相信黄秋耘》一文对此有详述）。丁玲的老伴陈明说，1978年，周扬解放出来后，丁玲女儿蒋祖慧去找他说起丁玲的问题，周说："你妈妈历史问题的疑点可以排除，但污点仍然存在。"他拒绝在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上签字。1979年丁玲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丁玲向作协、中组部等打报告要求恢复党籍，在作协党组进行讨论时，周扬第一个表示反对。1984年中组部下发给丁玲恢

复名誉的文件，周扬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先和我商量一下？"陈明认为，老账不算，就说1979年丁玲从山西返回北京后，在给丁平反、恢复党籍等问题上，周态度始终消极。因此在确定丁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时，陈明坚持反对有周扬出现，因为"这次再也不能让周扬给人以假象，似乎他对丁玲很好"，"政治影响是要考虑，但如果治丧委员会中有周扬，许多老同志都会寒心的"。《无奈》一书对丧事颇费周折、跌宕起伏的安排与争执，譬如是否搞追悼会、悼词的写法、遗体是否覆盖党旗等等，都有着详细的记述，这真是就应了丁玲生前的说法："死，是这样痛苦啊！"读来令人感慨万千。作者的意见是："陈明对周扬的意见，主要并不在于50年代他在将丁玲打成'反党小集团'和'右派'问题上所起的主将作用，更在于三中全会之后他对这一错误行为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过道歉。丁玲期望于周扬的只有三个字：我错了。但她至死也未听到。"但"文革"前后担任周扬秘书多年的露菲在接受李辉的访谈时说："我的印象中，他（周扬）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丁玲与冯雪峰）的坏话。……'文革'后丁玲从山西回北京，也是周扬给胡耀邦写信要求的。"（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历史是如此复杂，存在着各异的面相，让后人欲说还休。

历史面相为什么如此复杂？到底是什么使心结总也解不开？如果一定要在纷纭的历史中追索一个答案，我们只能说是由于"左"和右的交织。丁玲二次平反后，贺敬之上门看望并对自己在批判"丁陈"运动中的做法表示歉意。丁玲对贺说："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那时候我是右派集团的头子，现在反'左'又把我说成'左'派集团的头子。其实我丁玲没有变，整我的主要还是那些人，是他们在来回转。我看，这件事倒是值得我们党注意的。"（引自贾漫《关于丁玲平反》，《左右说丁玲》）1983年9月，包括丁玲在内的作协作家支部进行了两次学习《邓选》座谈会，并将包括拥护邓小平关

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精神等谈话内容整理成简报，交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及邓小平办公室。恰好几乎同时，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上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引发风波，逐渐升级为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此丁玲的发言被传成诬告周扬、落井下石的“诬告信”，丁玲遂又被戴上“左”的大帽子。1985 年 6 月 30 日，丁玲写信给她在文研所的学生陈登科：“你自然还是会知道我的情况的，我又有一点落在 1957 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帽子是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掉左的又来了。过去是大张旗鼓，现在又改变了手法，是窃窃私语，谣言满天飞……”她还对王增如说：“1957 年打我右派，还知道是谁打的；现在封我为左派，我连封我的人都找不到。……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引自《无奈》第 137 页）这让人想起周扬对其女儿周密说的话：“他一辈子先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误解。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自己信任的人所怀疑，被自己尊敬的人打击。”“左”和右，对于周扬来说，同样亦是一个难以参透的谜。周扬一向被人视为“左”，而晚年却被人批为“右”。他在写成于 1981 年而后因会议打断而未能宣讲的报告《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学习讨论会小结》中明确地说：自 50 年代后，“二十多年，文艺战线‘左’和右的错误都有，但就主体和主导思想而言，是‘左’的错误”。他甚至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文艺战线指导思想上‘左’的表现”。周扬晚年想做的三件大事之一，就是制定出一个“新的文艺条例，八条或十条”。按他的设想，其中要谈的问题之一，即“左”和右的问题。“左”和右很容易成为一顶大的政治帽子。顾骧在书中记录了周扬在 1983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举行的中宣部部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周屡次强调，对“左”或右的估计，要“慎重一点，谨慎一点”，“不要下这个结论，说现在主要危险是右的，



汪洪编《左右说丁玲》

还是‘左’的”，“在定性问题上要慎重”。深受“左”风之苦的周扬，这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思性。但他最终未能走出“左”与右交织的迷宫。说起来，周扬与丁玲两位在晚年被他人目为“转向”的文人，都是在“无奈的涅槃”中度过他们最后的人生的。“左”和“右”这个圈，让他们一代人钻得太过苦太过累了。

林贤治在《左右说丁玲》一文中说：“总之，袭用左和右这样的大口袋去套丁玲，是明显不合适的，过分狭窄的，含混的，甚至是荒谬的。”对于周扬与丁玲来说，任何简单化的定性与戴帽子，都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解读新中国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周扬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复杂性，也是众多史家所公认的。这种复杂性，甚至让许多史家望而却步，以致在时下叠床架屋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著述中，至今都还没有出现一本说得过去的《周扬传》。30 年代因参与革命而身陷国民党囹圄的丁玲，此后一直招致来自本阵营的责难，使其一生充满了精神的冲突与身心的折磨。她出众的才华、传奇的人生以及所荷载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分量，在 20 世纪的女性知识分子中，恐怕无出其右者。因为这一点，丁玲一直是 20 世纪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个案。而周扬与丁玲命运的复杂性相通之处，就在于通过他们的人生沧桑，后人可以看出政治与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这一特定情境中的剧烈冲突，以及环境的严峻与人性的复杂。

2003 年 11 月 24 日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历史

随意翻书的时候，常常从内心生出一些无法抑制的感慨来。这回要从几个著名的现代文人说起。

1964 年，在周总理的批示和齐燕铭的推荐下，不再从事写作的沈从文开始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集体项目，系统编选关于中国古代服饰工艺的图书。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又是历史学、考古学权威的郭沫若早早地就为期待中的成果题签了书名《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还为之作了序言。80 年代初，已经调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任研究员的沈从文在同事的帮助下，最终将工程完成，只是成果出版时书名改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的题签自然无法再用了，就由古文字学家商承祚重题，但郭的序言还是照旧用上了。沈从文的书由郭沫若来写序言，稍稍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很让人感慨世事无常的历史细节。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就在《沈从文转业之谜》中写道：“事隔三十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早在 40 年代末，新政权即将建立，受命于斯时的左翼文人就开始以“革命”的名义对自由主义文人群体进行批判。1948 年，作为左翼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反动文艺”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种，列名于首位的就是“桃红色的代表”沈从文。郭说沈“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作文



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有过这样的历史性“过节”的两个人，却通过序言的方式在这个时候“邂逅”了——历史的通道竟是如此之狭窄！汪曾祺的“这也是历史”一语蕴含了多少的意味！——是说历史弄人？还是说人有负于历史？要说明的是，郭沫若当年写序，他根本没想到会用在沈从文的著作上——否则真不知道他会抱着怎样的心情写出怎样的文字来，或者是干脆避开不写。那时的沈从文仍然身份未明，郭以为这是为国家集体项目而写——以他的身份，当然是题鉴、写序的合适人选了。但此后的历史是当事双方都无法预料的。还可以揣测的是，敏感的沈从文对郭沫若的序言，在内心恐怕多少是难以接受的，理由是他在这本专著的引言与后记中对此序只字不提。

现代文学史上与上述情形相类似的一例，还有鲁迅与周扬。

周扬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复杂性，是研究者与史家公认的。理解与剖析这种复杂性的难度之大，以至于偌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界至今都还没有拿出一本过得去的《周扬传》。周扬思想复杂性的内容之一，就是他与鲁迅思想谱系中人的冲突与纠葛。30 年代鲁迅与包括周扬在内的“四条汉子”等，就“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发生思想上的论战。这场在今天看来并没有太大的原则性分歧甚至有着互补性的“两个口号”之争，最终没有按照理想的预期走向和解与协同，而是在令人遗憾的特定情绪与意气支配下衍变成了大是大非的冲突，结果之一就是鲁迅与周扬的格格不入。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雄文和书信中对周扬等人有力地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公开的厌恶，将周扬

说成是“奴隶总管”“手执皮鞭”的“工头”，“任意诬人的青年”，“将败落家庭的妇姑勃溪，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解散“左联”也被认定为周扬的一大罪过。在此情境下的周扬明显处于被动的地位，心理上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周扬的好友于伶在与李辉的谈话中说，周扬去延安时负担很重，认为鲁迅相信胡风的话，使他与鲁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但历史偏偏有其自我运行的轨迹。在上海很难存身的周扬选择去了延安后，他与已经辞世的鲁迅的关系却发生了令后人感叹历史奇巧之至的变化。1938 年，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后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学院）。1939 年 11 月周扬被任命为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为吴玉章），实际上由他主持工作，在推动鲁艺的文艺由正规化、专业化向大众化、实用化方向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所“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鲁迅），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的院校，却由鲁迅生前所斥责的周扬来主持，这是一种怎样地巧得出奇！而这时，为鲁迅生前所信任的冯雪峰却与党失去组织联系多年，远在老家浙江义乌的乡间孤独地写着他的长篇小说。被鲁迅赞赏说“鲠直”的胡风这时流亡在香港。此后的周扬由于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等有关文艺政策思想的大力推动，使他很快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逐渐奠定了他作为党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地位的基础。顺便可以说一下的是，50 年代兴起对胡风、冯雪峰等鲁迅传人的批判案，不好说就是周扬的罪过，但周扬在此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则大体是可以肯定的。而到了后来，极“左”路线又报应了周扬：“后起之秀”姚文元将周扬打成“反革命两面派”。让人感叹的是，这一次“四人帮”竟是以鲁迅的名义舞起大棒：“四条汉子。”80 年代初周扬曾经在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过，与毛泽东一样，鲁迅是“天才”。与毛泽东稍有不同的是，他在五十六岁时死了，

没有犯下错误，因此还算是“完人”。后来周扬对异化问题等作出沉痛的反思，从思想理路上讲也可以说是体现了鲁迅思想的内在影响与传承。

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劝人和解时常说，算了吧，低头不见抬头见。其实在史书上一向显得寥廓宽广的历史大道上，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一旦到了心里感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境，当事人无疑就有着一份脱不开的尴尬了，而历史也在这种戏剧性中显出了它的一丝丰富性来。作为对历史有心的后来人，我无法轻松地沉迷于对这种戏剧性与丰富性的回眸与体味之中，我也不认为当事人可以轻易地“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这种复杂的情景，又岂是简单的“恩仇”两字可以概括。我想说的是，我们最需要琢磨，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在宽阔的历史大道上常常遭遇如此“冤家路窄”的尴尬？“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汪曾祺先生说得固然深沉，但将历史简单地归于人事，未免显得轻巧——在这一种无常甚至荒谬的人事之下，难道不是深深地蕴藏着一种历史本身的秘密与逻辑？！

2002 年 5 月

廖沫沙的打油诗：艰心出涩语 滑稽亦自伟

秋凉渐紧的静夜里，最宜于散淡读书了。这一晚，顺手从书架上抽出翻开的，是廖沫沙先生的《瓮中杂俎》单行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这本久藏而未读的好书，由北京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赞助出版。——当年在扭曲的政治年代里让人避之不及的“三家村”，如今却在商业大潮中翻新出落成了弄潮的旗帜与品牌，历史这样令人猝不及防地变换着它的容颜。著作收有廖先生“文革”的各类交代材料《瓮中杂俎》，另有诗集《余烬集》以及新补入的《劫后文存》等其他文字，面貌极其芜杂，是了解“三家村”遭难后廖沫沙先生生活及思想的重要史料，也是当代思想史上难得的文字见证。当年《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的责编李筠先生在名为《人性的真善美》的序言中释题说：“‘三家村黑帮’嘛，全国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专政对象，自是在瓮中，无处可逃。俎，音阻。椹板也，椹同砧，切肉之荐曰俎。《项羽本纪》：‘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其义不言自明。”其实，这是李先生的误解。“杂俎”一词，一向与杂记、随笔近义而并非“切肉之荐”，古人常将无可归类之文称为“杂俎”，以“杂俎”命名的笔记不在少数。早在1984年廖先生尚在人世时为自己编选文集，就曾在自序中对这类“特殊的写作”解释说：“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有叙、有议、有检讨、有申辩，在文章体裁中，这是特别的

一体，无以名之，就称为‘检查交代体’吧。”（《廖沫沙文集·自序》）不过，李先生的望文生义，多少也真实地写出了廖先生撰写这类文字时的特殊境况。不伦不类的年代，留下了这么多不伦不类的文字，可谓是时代性的“立此存照”，读来足以令人感慨思之。

《瓮中杂俎》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为数不少的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口一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有这首《咏雪》传世的唐朝人张打油，据传是打油体的始祖，在诗为余事的传统文化视野中，等而下之的“打油诗”一直被视作俗趣文章的代名词。习惯于以文章经世、以立言不朽的中国文人，一向没法轻松挥洒打油诗中的一丝谑笑与游戏。即使偶尔有那么几个性情还葆有着几分天真幽默的文人，在退朝卸装或挂冠归隐后难得一见地嬉趣轻松留下了几首打油诗，也很少有勇气把它收入个人文集传诸后世。尽管廖沫沙先生在《余烬集·自序》中曾自谦说“我不是诗人，所写的五言句、七言句，也都不能算诗；即使要称之为诗，也属于唐朝张打油的‘打油诗’，只算诗体的变种”。但他远非一个不通诗理、诗才驽钝的人，入世极深、曾经位至高官的他一生留下的大量古今体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1979年，劫后余生的他曾写诗痛悼亡友、“三家村”中另两家吴晗、邓拓：“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



廖沫沙《瓮中杂俎》

凤化悲音。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悼念邓拓、吴晗同志》）其雅炼文字、沉郁诗风，读来令人心惊骨折、苍茫百感。但在《余烬集》中，廖先生的五、七言诗绝大多数都有打油诗痕迹。晚年廖沫沙整理文集时还颇为自得地说自己自 60 年代开始写作的打油诗出过专集，大概即是指这册《余烬集》吧，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文革”之初，廖沫沙蒙“莫须有”罪名，时常遭批判之苦。在打骂呵斥此起彼伏的批斗台上，廖沫沙却举重若轻浑然无事般默念着旧体诗，念着念着就有感于自己遭遇，拿《千家诗》头一首“开涮”仿写成了一首打油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弯腰曲背舞台前。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这是写实，逼真地留下了那个荒唐年代里知识分子遭遇群氓践踏侮辱这样一幅啼笑皆非的时代剪影。廖沫沙自称这种苦中取乐，是一种人皆有之而他也未能免俗的“阿 Q 精神”：“我清楚地自知，我问心无愧：既没有反对过党和社会主义，更连做梦与发疯都想不到要反对毛主席。我的罪过，至多不过是多写了几篇杂文，写得不好，或许还有点小差错，而那些‘帮们’却越批越离奇，给我戴上大而高的帽子，高冲云霄，戴上一顶，被风吹落一顶，总套不住我这个小小的脑袋；等到他们动手扭胳臂，迫使我低头弯腰撅屁股的时候，我更觉得，这哪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在开玩笑，耍恶作剧。当我一想到这些，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于是，廖沫沙不无惊喜而又饱含辛酸地发现：“尝到这个甜头以后，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开辟了一条新出路：背诵旧诗词，改作旧诗词，不但可以驱愁解闷，而且乐趣无穷。……悠悠岁月，何以解忧？于是我把挨批挨斗时背诗与改诗的乐趣，又向前发展一步：在读书读报中，取出其中有趣的俚语，凑成打油诗。”（《余烬集·自序》）1976 年 7 月，正是黑暗将尽的前夜。被下放在江西分宜芳山林场达数年之久的廖沫沙，居住地苦有蚊虫扰人，但年近七十的他仍苦中作乐，打油一首《扑



马南邨《燕山夜话》

蚊》道："黄昏举拍冲蚊阵，四壁纷然献敌俘。莫道平生非勇士，居然此刻大丈夫。"余兴未尽而诗兴犹浓，又有一首："一战歼俘三十六，人间毕竟有英雄。诸公自此长眠后，枕罩清凉送晓风。"这里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时事隐喻，有先生身陷囹圄却直面生活苦难的坚毅，有先生对跳梁小丑猖狂一时的嘲讽，更有着他对国家命运乐观以待的欣然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廖沫沙先生写打油诗并不仅仅是在精神与肉体受到迫害而以示抗争时，他对打油体可谓是一向情有独钟。早在50年代，廖沫沙患腰椎结核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躺在石膏床上长达两年之久。他与病友张文松同住一楼，却无法面谈，只好笔谈问讯，互相打趣，靠白衣护士传递打油诗消遣度日。如其中一首"迎文松兄由东房子迁大楼病房，吟打油诗一首以志庆"的五绝说："且喜张公近，相邻四五家。双双行不得，咫尺竟天涯。"为病所困的无可奈何之中，又有着一丝人生的达观与通脱。张文松后来回忆说："在平淡生活中自寻乐趣，在病魔缠绕的大劫难中保持乐观，使我们先后从病床上站了起来。"待到历尽劫难，迎来欢愉晚年，廖沫沙依旧写了不少打油诗来表达自己对一个时代的理解。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万元户"迭出。廖先生"感而作打油诗一首以志之"："瘦子居然成胖子，贫农亦变富家翁。人间奇迹无穷尽，世道如今大不同。"（《偶感》）有朋友送他一

张老友聂绀弩及其夫人周颖的合影，廖沫沙在其上题打油诗说："聂公与周婆，一对铁公婆。八卦炉中坐，情真老不磨。"（《题绀弩与周婆合影》）这样的打油诗，连公认为打油诗行家的聂绀弩也赞赏不已。可见嬉笑自嘲，自是廖公本色。

在1967年的一次批判会中，廖沫沙与吴晗一同被揪往某矿区批斗，大会前被同囚一室。吴晗一直愁眉苦脸难以解忧，廖沫沙为了安慰他，自嘲式地劝他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像梅兰芳、程砚秋似的，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就唱不成了。"吴晗问他唱的是什么戏，廖说叫《五斗米折腰》，因为挨批斗时总是被人扭着胳膊低头弯腰。挨批结束，廖沫沙在回程中还"在默想中凑成一首歪诗"："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嘲吴晗并自嘲》）"喷气舞"是其时俚语，就是指挨批者在革命小将逼迫下作低头弯腰的"喷气式"认罪的姿态。廖先生以此入诗，可谓是妙用时兴之语。引人深思的是，同属"三家村"之列，更多具有政治家情怀的邓拓先生为人熟知的文字，是《燕山夜话》式的随感；而更多具有学者气质的吴晗，传世的著作则是明史方面的学术性论著如《朱元璋传》等，在他们两人的文集中，都极少有打油诗之类的文字。只有在政治生活与文化兴趣、社会担当与个体人格之间做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与中和的廖沫沙先生，才会如此乐此不疲地喜欢"打油诗"。也许是应了"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我想，邓拓、吴晗两先生恐怕永远无法理解廖先生的打油诗。对比邓、吴与廖身遭惨痛时的不同表现，我们多少可以明白为什么邓拓、吴晗会在"文革"中不堪其辱地"玉碎"，而独有廖沫沙先生能幸运地活过来。这有偶然，更有必然。病友张文松说廖沫沙与自己"在平淡生活中自寻乐趣，在病魔缠绕的大劫难中保持乐观，使我们先后从病床上站了起来"。其实，在"文革"这场远甚于病魔缠绕的大劫难中，也正是这种深藏



《廖沫沙文集》

于打油诗背后的坚毅与乐观精神，使廖沫沙最终从苦难中站了起来。后来，张文松就意识到了这点。1985 年，廖沫沙送给张文松嘲讽诗集《余烬集》一册，张戏题三首道："折腰那似笑弯腰，斗罢归来喜自嘲。蜗庐居士偷寻乐，小诗堪比雁翎刀。""天真益寿可延年，愁肠默咏解心烦。妙在扑蚊真勇士，庄谐并作也开颜。""老翁不倒七十八，打油犹自笑哈哈；历尽劫灰余烬在，藏书何必觅石匣？"张文松有一次访日，在日本见到有关"三家村"的短文，特意剪下寄给廖沫沙，并附有诗一首说："近代文学海外吹，九霄无日烈魂归。自嘲笑泪应余痛，唯有一家独自飞。"应该说，这是对廖沫沙先生的相知之论。

说起来，在现代文人作家中，写得一手打油体诗词、联语的文人为数不少。如聂绀弩、杨宪益、黄苗子、流沙河、启功诸人，都是其中奇文与警语齐飞、机锋共幽默一色的佼佼者，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存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打油体"现象。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这些以打油诗名世的文人，都不是地道的蛰居于书斋之中不问世事的学者书生，而可以说是入世极深的知识分子；人生大多经历过坷坎沧桑，而能劫后余生，不屈不挠、忍辱坚毅地走到承平之世。他们上承传统士大夫惯用的文字游戏智慧，而又熔铸以现代文人个人身世浮沉里的丰富感受，而最终出之于这种看似平仄不协、诗律不通却常常惊为神来之笔的打油诗。很难断定，打油诗于他们而言到底是一种人

生的智慧还是苦难生命中无奈的暂栖地，是一种含泪而笑的喜剧还是欲诉无言的悲剧。可以断定的是，当现实变得荒谬怪诞时，廖沫沙们选择了打油诗在一定程度上麻醉解脱自己，而在这份麻醉解脱中又寄寓了他们对现实清醒的针砭和蔑视。当代学者陈思和说，当代旧体诗写作中，好的诗作都不在公诸报端的诗词之中，除了如陈寅恪先生等人曲折隐晦的“潜在写作”之外，另一类可堪玩味的就是打油诗。“不怎么讲究平仄音律，但其敢于直面人生，在诙谐的语言背后寄托了沉痛的心情”（《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0 年第 1 期）。事实就是如此，中国文人表面上的解嘲之文里，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轻松与纯粹的游戏。打油诗其实是廖沫沙们含泪而笑之后的结晶，是苦难撞击内心后的一种深沉抒发。

记得文学史家程千帆先生评聂绀弩先生的打油诗，曾以“艰心出涩语，滑稽亦自伟”来誉之。其实，这何尝不可移用来评价中国现代文人中所有的打油诗？！随意翻书的时候读到这些散落于各处的打油诗，我常常想：在承平盛世，亦庄亦谐、无伤大雅的打油诗，或许是一种人生智慧的自由展示；而在艰难时世中留下的这些文字，却是一份荒唐历史的见证和对这种历史有力的抗议与“解构”。

2002 年 10 月

同人群体·历史温情·常识理性

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思想史研究这类带有自我追问性质的公共话题——的活跃与进步，固然取决于大时代人文生态的清明与通达，但也和小环境的营造与熏沐、和身边同人的相互砥砺与激荡分不开。如果说纯学术尚可以在书斋里孤独的求索中推进，那么思想的萌芽却更需要公共空间里的交流来催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人或准同人性群体，往往是酝酿思想的温床。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蔚为风气的知识分子研究和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山西学者同人的群体性成果，是一个值得读书界关注的现象。这其中，最长者是年过七旬的高增德先生。早在80年代他主持《晋阳学刊》时，就别具特色地开辟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开现代学术史研究与现代学者自传整理之先声；而后又在这沉潜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纂出十卷本《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并续编同名大辞典，又编成六卷本《世纪学人自述》，总字数逾千万，成就了一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嘉惠学林、沾溉后学的大工程。（记得前年《中华读书报》以一则题为《谁来抢救这三百万字》的消息，呼吁出版尘封在高先生书柜中的另外数百名学者自述材料，最终使得这项因经济效益而为出版界一度冷落的工程得以再次推进。）这种坚持与努力，与今天许多沦为职称论文地盘的社科刊物相比，一眼就可看出追求境界之高下分别。可以想象，这种注重现代学术档案积累



丁东等《思想操练》

的做法与长者之风对同人们研究生涯的影响与意义，不仅在于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持，更在于其确立了一种纯正的学术规范与人格风范——在一座学术思想资源相对稀缺的普通省会城市里，这一点尤其重要。与高先生重在学术档案、史料积累稍有不同，与他声气相通的年轻同人则更重在思想的掘进，体现出思想的活力。丁东，一直是学界与出版界的活跃人物，近年对当代民间思想问题情有独钟，作为一位出色的学术“二传手”，编辑出版了顾准、遇罗克、王申酉、孙越生等诸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文字。谢泳，则以“一个人（储安平）、一本杂志（《观察》）、一所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心一步一步地推进其个案研究，其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资源和人格遗产的梳理尤为学界所叹服。智效民，近年对胡适、陶孟和等民国人物时有研究心得。除此之外，在笔者有限的阅读中，看到常常就类似问题发表看法的山西学人至少还有李国涛、马斗全、韩石山、邢小群、赵诚、祝大同、阎晶明等几位。颇有意思的是，这些学者尽管多栖身于社科院与作协系统，但都不大喜作高头讲章，不撰写四平八稳的所谓“学术论文”，而钟情于更为随意洒脱的学术随笔，文章也多发表于《书屋》《老照片》《东方文化》《博览群书》等不能供评职称之用的非“学术刊物”、非“核心刊物”上。当前些年知识界在“北京后，上海新，南京旧”的浮躁中折腾不休时，自处边缘的他们却不温不火地埋头梳理着一些近现代史上的旧人旧事，文字极少时尚、花哨之气，更不玩理论的“深沉”，也不太在意是否与以西学为准绳的规范化、形式化相“接轨”，而只是在傅斯年式的史料主张、实证方

法与平和的叙述中用心地咀嚼着有意味的史实，一点一点地展示着其思考的深度。谢泳曾说自己“只是业余时间凭兴趣做研究，是真正的野狐禅”。而高增德先生则谦逊地说自己“学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进入学界的时间不仅很晚，而且从事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属业余爱好，并无师承可言，完全处于一种自我感觉、自我摸索之中”。在这种不太“专业”的定位中，却体现着一种在学术体制化、功利化倾向积重难返的情境中日益难得的学术“业余精神”。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们早年多有从事文学研究的经历，但后来却集体转向更为广泛的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相对苍白的当代文学研究似乎不足以承载他们的思想言说。从这种个人兴趣的游离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当代学术思想风习转移之一斑。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相对集中于一些旧人旧事（如谢泳所说：“想来想去还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这可能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过去的事情总能唤起另一种情感。”），举凡如梳理中国的近现代教育、新闻出版制度；审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探索现代史的写法；等等。与诸多思想激进者常常持有的批判姿态迥异，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抱着当代学人的温情与敬意，向历史深处“逝去的年代”“招魂”，习惯于温和地聊着一些“学人今昔”的话题。但在这种温和与平易背后，却有着一种别样的思想震撼力度。我们不好断言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但如果凭着一个局外人的阅读感受，至少可以说因其相对较为集中的主题、相近的文风、相通的人文追求与价值取向，而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形成了一个具有同人或准同人性的学术群体。可以说，在 90 年代以来风行一时的知识分子人格研究和现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山西这几位默默耕耘者的沉潜与努力，格外值得学界学习与敬重。

在《思想操练——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一书中，我们可以更为集中、清晰地看到这一同人群体的学术追求与思想特色。这是一

册由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五人参与的十次专题对话的口述实录。十次对话依次是“日记的价值”“重写中国现代史”“关于清华及清华学人”“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与重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九十年代以来的学人与思潮”“拓展民间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这些话题，我们大多在对话者的个人著述中阅读过，有的甚至引发过读书界不小的议论。但这种相互启思的对话，却相对更多地保留了个人文本所没有的原生态，读者可以在你来我往、各抒己见中看出思维延展的过程，看出思想碰撞与沟通的轨迹，因而更有其可读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喜欢“看热闹者”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当代人文社科界的消息，如关于一些日记等文献的出版情况，“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们的命运波折，90年代以来由重要学人与思潮交织的“学界地图”，等等。再进一步说，则可以读到一些精彩的思想交锋。五位对话者，包括20世纪30、40、50和60年代生人，但年龄跨度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思想共鸣。在这种共鸣中，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如对日记文体的关注：他们将学人日记上升到“另一种学术史”的认识高度，认为对研究者来说，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日记意识”，即学会将同一时期与相关人物的日记加以比较性阅读，以最大限度地厘清当时的历史本相。按谢泳的概括性表述，就是“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档案”。这种学术方法，与高先生很早就重视学者自述史料整理、丁东近年注重打捞民间思想与口述史料（去年他开始主持《口述历史》丛刊）、邢小群对知名右派的访谈记录，以及他们在对话中对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徐友渔《蓦然回首》等口述史学著述的高度评价，都是有其相通之处的，那就是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自觉，对历史第一手文献、私人文本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既往的近现代史研究普遍忽略细节、感性

的不满，对突破既定的框框、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弄清史实并最终写出真实历史的渴望。

更多的共鸣，则是具体的思想内容、观点上的。如对近现代史上反帝与反专制这对核心关系的梳理，智效民与谢泳从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之关系切入，做出了精当的言说。这些看法从思想史的线索来说，无疑是胡适所一再提倡“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你想要有利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一“易卜生主义”和斯铎曼“白血轮精神”的“接着说”，或者说再一次强调与叙述。关于中国现代史上是否形成了自由主义传统，曾经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停歇的争论。在这一点上，上述几位山西学人有着接近的判断。194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人选推荐不拘政治成见而能做到兼收并蓄，是他们常常引以为证的重要事例。对 40 年代蒋介石邀请胡适入阁及大批学者组成“好人政府”的这一段历史，史家一直持负面评价较多。而高增德先生则认为“对此要先有了解之同情，不能因为对于蒋介石固有的评价，就先入为主，以为他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虚假的，一点诚意都没有”。智效民的看法则更为直接也更理性：“许多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看法的人，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定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性，以为他们那种独立性是虚假的。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一看见他们和政府合作，就以为他们是卖身投靠了，更要看他们给政府出的是什么主张，这些主张与他们一贯的思想是否相符。”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一波三折，在天地玄黄间终归中绝，而至 90 年代又稍为浮出水面。对话者们对这一过程及其间的历史得失进行了梳理。重新发现哈耶克，接续中国第一代政治学者张慰慈、社会学家陶孟和以及包括李宗恩、黄万里、任鸿隽等在内的“科学家集团”的精神传统，寻找遇罗克、孙越生、王申酉、陆兰秀等 50 至 70 年代这一特殊时期的“学

术思想史上失踪者”，重新审视失去的学统与道统之关系，等等话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来言说的。对以清华学人、新月文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话者们大多抱着一种敬意与认同，甚至不乏一种偏爱。在对胡适、王瑶、冯友兰、钱锺书、董时进、黄万里等人的评说中，读者可以看出这些旧年人物的人格风采之独特与精神资源之丰厚。

在这种史实梳理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对话者们对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呵护，一种追怀，和基于自身判断而油然生出的一种历史温情。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曾引钱穆先生话说，“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经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所谓“客观的标准”，可以说是以欧美现代学术主流为参照的标准。可惜旋即为战争所毁。张东荪20世纪40年代说，中国虽然受西方文化影响不足五十年，但在思想文化界却养成了一种“自由胸怀的陶养”，也就是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这种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是植了一些根基的。山西同人基本赞同钱、张的判断，这是他们对那个逝去的时代的基本评价。但对话者并不满足于停留于钩沉往事、就事论事的层面，而是怀着一种问题意识将求索推进一步。在“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的对话中，他们分析说，当年这种学人群体与人文气象的出现，是与当时的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学习自由等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分不开的。“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要有好的设计者，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

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增加效率。”而在人文教育缺失、博士教育异化、学术腐败等问题突出的今天，“教育却只是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只给学生灌输非人文新知识，学生压力太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了‘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会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智效民）。至于现代文化政治精神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现代政治精神是现代文化精神在政治上的体现。现代社会从政的人，多数是从大学里来的，他们的现代文化精神和气质应该是在大学里培养的，如果大学里都没有了这种精神和气质，还能指望它在政治上有所体现吗？现代政治精神的养成是依赖于现代文化精神的，是先有了现代文化精神而后才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还要先在思想文化界训练大家养成尊重异己的习惯，慢慢培养容忍异己的气质，时间长了，也许这种精神就从政治上体现出来了”（谢泳）。这些看似平常的思考之言，流露出对话者内心对历史的敬意。

山西同人对历史的评判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温情，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人常见的怀旧，而是缘于他们所持的一种普通评价标准，以平常心看历史。我们会很容易注意到他们对话中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常常提及与强调的“常识”二字。他们很少引用或新潮或惯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述观点，而更多地希望在常识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在常识的层面上来立论。智效民谈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之艰难时说：“无论大事小事，自己不争气就会落后，这是常识。”关于重写近现代史，谢泳主张“第一步，就是要先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先用常识去看那些曾经被我们否定了的东西”。他们评说胡适一代的气质和风度，多是从平常的言谈来感受。对自由主义的常识性，他们更是不约而同地提到。高增德先生说：“说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从许多历史事实看，

它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就比强制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赵诚说：“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有时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记得谢泳在其他文章里也曾多次重申，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新思想，它只是一种常识；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构成的。这些年，我们不时可以听到知识界对“常识”的重申。被山西学人高度评价的思想家王小波的智性文字——就像他屡屡说的“常识告诉我”——说穿了只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当代知识分子在用良知普及一些公认的现代常识而已。《南方周末》的记者问“人文学科到底有什么用处？”葛兆光教授回答：“人文学科说起来就是让人适应常情，理解常理，具备常识，现在的时新说法叫‘素质教育’。素质说来很玄，其实一个人的素质是在种种日常生活和常识上表现的。”另一位山西学人韩石山，一向文风嬉笑怒骂，但在《回到常情常理》一文中他却难得地表现出一份深沉。他说，要是对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有什么感慨的话，就是希望回到常情常理。回想近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开始他们对传统中国的启蒙之旅时，也多是从常识入手的。常识是他们那一代人判别事物合理性的标准。早在 1901 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普通学报》，“普通学”这一当时的流行词语，就是常识的意思。梁启超常以“常识”相号召。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追记 1902 年创办《新民丛报》的初衷即是“稍从灌输常识入手”。1910 年，梁创办《国风报》旬刊，《申报》登出发刊广告说：“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1911 年，张元济为“以普通政治常识灌输国民”，与沈钧儒、高梦旦等二十余人发起创办了《法政杂志》，“上助宪政之进行，下为社会谋幸福”。至于胡适，更是

一个极其重视常识的学者。留学归国以后，办学者向他请教，他说：“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甚么，须先问这块地方最需要的甚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归国杂感》）至于方法论，他说“推理思想并非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所专有，那只是人类常识上的法则。……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处，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胡适口述自传》）1926 年前后他给商务印书馆策划，推出了后来影响深远的“万有文库”丛书，首一种的名字就叫“常识丛书”。他希望以一两万字的规模，以浅切的白话文、活泼有趣之文风，介绍“日本”“银行”“盐”“法庭”等“常识”。至于在《新青年》群体中，更常常痛陈缺乏常识乃是国民之大患。可以说，在深怀启蒙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心中，对常识理性的尊崇，是他们与旧传统相区别的根本特质。说起来令人感慨，在刚刚过去的问题杂出的 20 世纪里，知识分子摸索了这么久，费了这么大精力，也开出了不少的药方，但更为核心与直接的，是平实地回到“常识”这个基本的原点上来，认识到从细微小处而不是从文化大词做起、在根部留下建设性起点的重要意义，而不是追求高调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进步。

有意思的是，与山西同人对常识的重视相表里，也反映在他们对平易的表达方式的追求中。他们在对话中屡次说到，学术著述的文风，其实是一个时代政治和文化精神的体现。现代学者中不乏留学域外者，但回到中国来，做研究时不仅重视本土化问题，写文章也以明白、简洁、清通为标准，他们知道文章是给人看的。“凡是对一门学问真正有了解的人，总可以把深奥的东西说明白，凡那些说不明白的人，多数是不大会的。只有会的人，才能说得少，说得好。”（赵诚）记得谢泳在《书生私见》一书的序言中说：“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要写得明白晓畅，有一点议论，有一点激情，还有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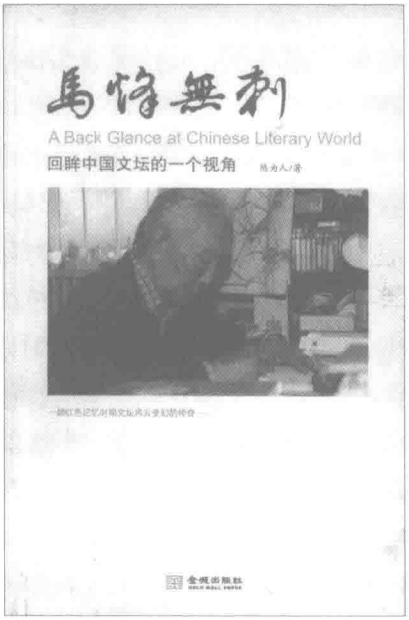
人和事。”这让人想到唐弢先生对书话品格的定义。学界对谢泳、高增德等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诸多看法或许有不认同者，但对他们平易的文风与态度，则大多是赞许的。

对话是一种古已有之的问学方式，也是当下一种常见甚至是泛滥的方式。与当下诸多出于媒体强拉硬配的炒作性对话不同，同人之间的对话，往往更能引导出一种深度，更有利于思想操练——《思想操练》虽然没有放开来谈，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对话者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深度。记得丁、高、谢三人此前曾经出版过一册《和友人对话》（长春出版社，1997），但好像未引起读书界足够的注意。高先生在《鸿儒遍天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一书序言中说自己“周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群体，常在一起碰撞切磋，给予了我研究写作上的诸多启示”。想来这对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人来说，都应该有着同样的感觉。这也是山西同人能够在相关问题上成一定气候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在于，对话更能够表达同人群体一种超越专业囿限而走向公共空间的态度与立场，更能看出他们参与公共空间的努力与自觉。相对于仅在专业领域发言的专业知识分子来说，山西同人似乎更明确把自己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丁东在序言中引述其《失职的年代》一文中所说，当今的知识界从整体讲失职的现象触目可见。除了专业领域中学术严肃性与独立思想的丧失，在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普遍对公共事务习惯于沉默不言，在整个社会舆论中，良知缺席。因此，除了专业领域的尽职自律，知识分子还应当向公共领域尽职努力。本书即这样一次尝试。记得朱学勤在《风声·雨声·读书声》一书中引述现代学者梁漱溟所言：“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作后一种人。”上述几位山西同人，与此立场庶几相近乎。

2004 年 2 月 23 日

无刺的马烽与多刺的时代

马烽非蜂本无刺。乍看之下，“马烽无刺”是一个有些别扭的书名，但如果结合副书名“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把作家马烽“无刺”的个人品格置放到中国现当代文坛斗争史、运动史这一大的场景下来审视，就会让人顿悟到陈为人先生这本传记的精彩之处、深刻之处，也可见出一部现当代中国文艺（运动）史的复杂与良可浩叹之处。



陈为人《马烽无刺》

一

《马烽无刺——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陈为人著，金城出版社，2011）一书之所以特意把马烽的“无刺”拈出作为一话题，分明是感觉其在政治化的现代中国文坛近乎异数的特质。1955 年夏，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痛

批丁玲、陈企霞。会议开了七八次，批评越来越升级，但马烽从头到尾没吭声。“这是什么态度？我压力越来越大，不能不表态了，我只好说两句。我对人家丁玲、陈企霞了解个啥，和丁玲好歹还在文讲所待过几天，对陈企霞干脆啥也不知道。琢磨着说，心里没底，手颤抖那是心在跳。”结果，马烽说了几句比较客观的公道话，却马上遭到攻击，被批为“右倾，说你脚底板站不稳。弄得你在后来的会上还得补上个自我批判，提调门加温”（唐达成语）。感到委屈的马烽回到家，竟然忍不住倒在床上哭起来。在一个粗粝的时代，柔弱的女性往往更为坚韧与洒脱，夫人段杏绵就以女性的淡定劝马烽说：“历来的整风大会上都是过火言论，由他们去批吧。”自己没法开口“正义的火气”一副批判的嘴脸，而对在“丁陈事件”中被后来人视为反戈一击、落井下石的作家康濯，马烽也能轻描淡写地理解与宽容：“每个人的一生，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人无完人，瓜无溜圆，有时候逼于形势，有一些无可奈何的违心之言。我们都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我想也是可以给予宽谅的。”——不苛求他人“壮烈”地自我献身，马烽的这种温和态度，与相当多的同代人的做法迥异。1965年“四清运动”中，马烽担任工作队队长所在的施家野村，没有“逼、供、信”，没有折腾出期待中的“辉煌战果”。上级工作团不同意，批评马烽“太右了”。他顶着压力说：“你们别怕，有我这个队长顶着，大不了撤我的职。”马烽硬是坚持不整人，直到后来中央纠正了这一极左偏差为止。村长临死前写信，以老百姓纯朴的话评价马烽是个“好人”。“文革”中，批斗盛行。处于潮流中的马烽，依旧敦厚老实如农民。他与因作品《三上桃峰》被打成“大毒草”的作家杨孟衡促膝谈心，声明可以出面证明其创作态度是严肃的。身为“文革”小组组长，每次开批斗会之前，马烽都去与被批斗的西戎通气，劝他吃饭宽心。马烽自己，遇见并记录下了特殊年代中的一些好人：“在那个混乱的年头，我所接触到的人并不都是凶神恶煞的造反派，也曾遇到过一些好人。我所说的好

人，并不是对这个人的政治结论，更不是对这个人的全面评价，而只说在某些场合下显示了一些通情达理或善良的本性。这曾给予我精神上极大的支持。”而对“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造反派人物，马烽在文字中流露出难以抵制的厌恶，甚至在晚年仍画大仙人球上长长箭、开大白花，并题字“刺儿头上浮白云”以为讽刺与批判。还是在“文革”中，马烽曾因受命到大寨修改电影剧本《山花》，而与当时炙手可热的江青有过一场奇特的“交道”。2001年，马烽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大寨奇遇记》一文记述往事。省报转载时，将题目径改成《目睹江青的丑恶嘴脸》。马烽不满地说：“我本来是要把那一段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现在改成这样的名字，就有了感情色彩了。回忆录应当是有什么事说什么事，不要从人格上侮辱人，尽管江青后来成了反党集团骨干，也不能故意丑化。”

在“丁、陈反党小集团事件”后，马烽痛感“京华虽好，却是是非之地。惹不起咱还躲不起？三十六计走为上”，毅然离开京城回到山西。在最火最红的时候离开文坛权力中心，这种选择，类似传统士大夫在政治高压之下自求疏离中心以全身避祸的故技，更有其宁愿退处边缘也不愿违背良心良知的自觉选择。二十余年后的1989年冬，马烽突然阴差阳错地接到指令，命他进京接替自己的忘年交、数年前从流放地山西返京的唐达成，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以处理作协系统“八九风波”中的遗留问题。因为此前多年曾经两次风传马烽有可能上调进京，但皆因故作罢。因此，这次，马烽仍以身体不好相推托。可事不过三，这回“我这小萝卜头，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这才知道反对也白反对”，只好应命。但他仍是有意将自己定位为一京华过客，主动给中组部打电话，说明不要房子、家属也不去、行政关系也不去——这分明是一种应付性的态度。对于如何“处理人”，前此一步到京的清查组组长、作家玛拉沁夫认为，“守住一条，中央有具体规定，很细致，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按这个面下来，作协有百十来号人要处理”。马烽则“因为过去

搞过这，叫‘甄别工作’，搞肃反的时候。三查，组织些人查，打成特务什么的。最后还得给人家落实、平反。许多都是似是而非的，以讹传讹的。我说这个事不能热处理，虽然中央有文件，中央也没有人说哪个人非处理不可呀”。按中央“清理文件”，中国作协够得上处分的九十九人，马烽感觉两难，“一家伙处分三分之一还要多的人，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啊？可是不处分又怎么办？真是个两难的事儿。我是一把手，大主意得我拿呀。我说，咱们不要着急，咱们冷处理，他们催他们的，咱们拖咱们的”。他向当年晋绥的老领导郁文请教，郁文启示他：“知识分子问题比较复杂，还是温和点好，急急忙忙处理，闹不好将来又要纠正。”马烽不把政治大帽子乱扣，而借鉴1946年在延安“甄别”工作的做法，“让受处理的人自己填表，自己说存在什么问题”。学者丁东认为马烽当时的做法，可谓“绞尽脑汁，下了很大技巧了”。他的思想观念“还是属于‘左’的”，但他不整人，“从做人的观点看，也无可非议”。当年受处理的人事后都认为：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马烽能实事求是，难能可贵。“做到不整人，与其说他有政治远见，不如说他是心地善良，天性使然。……你可以说马烽老脑筋，说他的思想观念基本有点‘左’，但你不可否认，马烽是个关键时候不整人的好老头。”尤其是对于处于风口浪尖上被免职的唐达成，马烽“确实动了些脑筋”，一片苦心，几经斟酌，上下斡旋，劝唐为保留级别和待遇，申请提早离休，淡化处理。

对现实问题如此宽容为怀，对于历史问题，马烽亦表现出其本性“无刺”的一面。马烽晚年念兹在兹的一件事，就是电视剧《吕梁英雄传》的改编。在此过程中，马烽曾对当年晋绥边区开明地主毁家纾难参与抗日、担任维持会长“两头挨巴掌”的做法直接表达自己的理解与同情，认为应该还他们一个清白，给他们应有的评价乃至表彰。这种态度，陈为人认同马烽女儿的说法：《吕梁英雄传》的改编，是马烽这位老作家对战争的重新思考，对自己

创作道路的回顾与总结，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拷问与追求。个性突出的山西作家张石山从个人的角度为山西当代文坛写一部回忆录作为信史，其中特意以“马烽，对人是不错的”为节名记述说：马烽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后，许多人都在谈论：马烽，对人还是不错的！事情最终证明，马烽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但他决不整人。早在“文革”前后，丁玲、唐达成、公刘、丛维熙等著名作家都曾发配至山西，马烽都尽可能作了安排调动。“马老的政治观点包括文艺观点可能老派一些，但他作为个人，却赢得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称号、口碑和评价：老马，那是一个好人。”（《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二

“无刺”也好，“好人”“不整人”也罢，对于寻常百姓来说，这种品格可能只是一种人性的常态与自然流露、一种道德的底线；而对于一位身处一个“多刺”时代的著名作家、文艺官员来说，这些却意味着一种以良知良能缓和文坛尖锐冲突、以和风细雨抚慰时代斗争神经、以迂回曲线应对政治压迫的艰难努力。《马烽无刺》所勾勒与反映出的，正是身处20世纪红色旋涡中的一位天性善良的老革命作家个人坚持葆有“无刺”品格与粗暴时代之间的剧烈冲突、矛盾、煎熬及其难能可贵。

自古儒冠多违心。身处政治化的时代，做一位“无刺”之人，洵非易事；尤其是身为文艺界领导，更容易在通身贯注着斗争哲学的庞大体制中被无情异化。陈为人在为唐达成写传时，曾愤怒于周扬对唐达成的伤害。唐反而通达地以当事人的理解之同情说，我们文艺界的领导，似乎都有这么一种共同现象：“内心和外在往往不一致。个人的兴趣和喜好是一回事，对领导意图

的揣摸和对不理解的政策的贯彻又是一回事。他们组织性很强，个人的意愿要服从组织的大局。这是政治的需要，也是一个领导者政治素质的体现。”在给陈为人扳指头历数多位文艺界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后，唐达成反思说：“这些人，个人被打倒，受到的伤害是一层；他痛定思痛，由己及人，想到假自己之手曾伤害别人，他良心上产生的愧疚，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受害。所以我说，其实他们是更大的受害者。我看这似乎成了文艺界领导的一种职业病。”（《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幸运的是，老作家马烽恰恰以其朴素与天性的善良，个体性地消解了现代文坛上常见的职业病，而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心地赤诚与坦荡。众所周知的是，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催生与哺育的文学家，党性是包括马烽在内的“山药蛋派”作家的最高精神追求，可谓浃骨沦髓。“反右”期间，有人攻击马烽“不鸣不放”，马烽说：“当时我们只是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何必贴大字报呢？”传记作家周宗奇评价说：“这绝对是‘角色语言’，自己清楚自己首先是党的人！不参加大鸣大放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本能表现，而不是胆小怕事，更不是预知了这个大‘阳谋’。”知夫莫若妻，马烽夫人段杏绵亦曾说：“马烽这个人有个特点，即使他自己再不愿意的事情，只要一说，组织上已经做出决定，他就没辙了，他就是自己受天大的委屈，也要服从组织纪律。”马烽曾对山西作家赵瑜说：“我不去干涉你们年轻人走什么道路写什么书，但是我这辈子能走出来，是共产党给的。共产党好比是我的老板，你每月领着老板的饭钱，就要给老板做事。”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自认是一个作家，这是马烽内心深处纯洁的价值抉择。因此，学界甚至评价说：“‘山药蛋派’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功利色彩、宣教目的极其浓重，也极易陷入浅白直露或趋时的境地，很难获得高层次的艺术突破和恒久不衰的文化价值。”（张恒《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

学的回眸与审视》，《山西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尽管马烽为此进行过诸如为避免“大跃进”中说假话自己亦曾创作《刘胡兰传》历史题材、为避免歌颂共产风而撰写通讯、特写之类的辩诬，但好像无法改变文坛学界对这一群体根深蒂固的印象与看法。

事实上，与其说功利色彩是马烽们一种需要辩诬的弱点，不如说这是他们那一代人以农村为主要题材、以《讲话》为皈依、自觉愉快地服务于政治的一种朴素、真诚的作家本色。1990 年，有香港记者突然袭击，质疑马烽“算不上作家，而是中共的宣传员”。马烽在简要说明自己的创作情况后干脆坦然以对：“说我是中共宣传员，这没错。我从小参加了革命队伍，当了四五年宣传员，要说现在仍是我们党的宣传员。我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是毛主席《讲话》教导出来的，我不听党和毛主席的听谁的？我说你们都是某个报社、刊物、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你们港澳叫访员。你们写文章敢不听老板的？如果你们的文章反对你们的老板，你们还能生存吗？恐怕早就让老板炒了鱿鱼啦！”如此本色的党性，使马烽即使对自己饱受折磨的“文革”，亦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当我们的母亲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总是家丑不可外扬，回到家，悄悄地劝劝母亲。有谁会跑到大街上去大喊大嚷，揭自己母亲的短？”当然，品格上的坦荡与赤诚是一回事，而具体的表现策略又当别论。当党的政策与现实矛盾冲突时，马烽不能正面质疑党的政治正确性，却又无法完全泯灭自我彻底投身其中，只能以拖延、“和稀泥”、犹豫、曲折迂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矛盾的方式来应对，“不像赵树理、孙谦们那样气壮山河、义无反顾、不计后果，他更讲究一些斗争策略，比如搞一些‘以退为进，以守为攻’‘避实就虚’、打‘持久战’之类的花样儿。这可能就造成人们对他‘作家胆识’方面的某些误解也未可知”（陈为人引周宗奇语）。

三

忠诚与善良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对个人品格的褒扬，并非作家传记的全部目标。对令人欲说还休的20世纪个人与国家、文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思，才能体现出作家传记的标本意义与价值。马烽一代作家的内心纠结与精神焦虑，在于他“无刺”的人生哲学与斗争时代之间的尖锐冲突性。陈为人用“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作为《马烽无刺》的副书名，正隐微地表明他为马烽作传的深层用意，正在于通过追寻“无刺”这种个人品格与时代的斗争性、“红色旋涡”之间的扞格不入、左支右绌，来叩问一个时代的秘密与症结。具有典型知识分子气质的革命者瞿秋白，曾经在《多余的话》中深深感叹党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曾多次强调“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与“仁慈礼让，避免斗争”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意识在我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责备”自己的天性始终不能适应“革命”，“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其实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此起彼伏的斗争史与政治史。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坛，到延安时代对立复杂的宗派，到50年代进京后的座次论定，再到新时期的重新整合与洗牌，魔幻般的“红色旋涡”一直笼罩着文坛，构筑起了一道道无以摆脱的“鬼打墙”。尤其是1950年代以后，文学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文学研究由当年的流派研究更多地转向强调文艺斗争，将文学历史理解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史。1952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定性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首次出现“斗争”字眼；历经胡风文艺思想批判、“丁、陈、冯反党集团”批判，所有的文艺论争都被看成文

艺思想斗争，认为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文革”中，“思想斗争”更是全面升级为更严厉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话语成为一种势如破竹的理论力量，日益裹挟、碾压着个人的血肉之躯。而对于当年斗争的残酷，身历其事者皆有心惊胆战之感。比如对丁玲、陈企霞案，作家徐光耀在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感叹，“干脆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以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得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陈企霞本人则说，在这场无休无止的翻烙饼中，多少血肉之躯被烧成了“大木炭、小木炭”，“这个派性斗争害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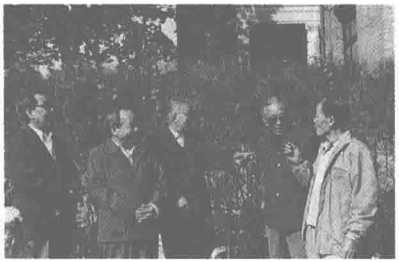
不仅在宗派林立的文坛内部，20 世纪文坛的斗争性思维，甚至已经渗透进了俗常的家庭生活，敏感的当代文人笔下对此多有记忆。沈从文在 1949 年 12 月 25 日写下的《政治无所不在》一文，其中有些说法可以印证那个年代浃骨沦髓的斗争性时代特质。其次子沈虎雏当时在读初一，有一天把申请加入少先队的自传材料带回家请沈从文签字。材料中有这样的话：“父亲在解放时神经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沈从文见后告诉儿子，“‘斗争’这个措辞不太妥当”，“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正如妈妈，即再进步些，也不相宜”。多年后长子沈龙朱还对作家刘红庆说：“家里头怎么谈得上斗争的问题呢？但那个时候它是有这个问题。教育你的就是这样，即使在家里头也有逐步形成阶级斗争的问题，也有思想斗争的问题。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刘红庆《从文家事》，第 273 页，新星出版社，2012）沈虎雏《团聚》中记载说，他请父亲参加扭秧歌。沈从文不扭，但说可以学打鼓。沈虎雏发现：“好像是蹄声，细碎零落，由远渐进，时而又转折方向远去。我以为它会逐渐发展成千军万马壮烈拼杀的战场。没有，他这样打，轻柔的鼓点飘忽起伏，像在诉说什么，随意变幻的

节奏，如一条清溪，偶尔泼溅起水花，但不失流畅妩媚品性。他陷入了自我陶醉。我听过京戏班子、军乐队、和尚们以及耍猴打鼓，熟悉腰鼓和秧歌锣鼓点，那都是热执闹闹的，从没听过这种温柔的打法。”沈虎雏还回忆，课堂上，老师大讲鲁迅的战斗精神，提到鲁迅怒斥父亲沈从文——在一个风沙扑面的时代，需要的是急鼓繁弦、杀伐之声而不是温柔抒情的轻音乐。及至“文革”，国家成为“全面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仅仅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片面的、不够的，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就是个体心灵领域也实行斗争与专政、暴力革命，才是全面的。

1980 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主旋律的改革开放，才让国人慢慢走出紧绷神经的斗争生存状态，重新步入正轨。直到 1990 年代，李泽厚与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就是试图走出“革命神圣”“革命必然”“革命天经地义”的历史迷宫，告别大规模流血斗争这一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告别群众专政、心灵专政等对革命战争经验的迷信，把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搬用到和平建设时期，尤其是处理文艺思想领域问题的泛暴力性方式。说起来，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人最为深切的痛感。在为《思痛录》修订本题词页上，曾彦修先生说：“把知识分子看成异类或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点，正是我们几十年来（包括解放以前在内）很多难于收拾的特大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另一基本原因就是必须内部‘天天斗’）。邵燕祥先生则简要概括为：“肃反 + 反智：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未能超越这个模式。”

四

当斗争性异化为一种社会的基因时，身处其中而又良知未泯的个人，就尤其敏感于世道人心的恶化与堕落。陈为人在《马烽无刺》一书中，通过马



1991 年秋，文坛“五战友”在山西省作协机关大院内亲切交谈。左起：胡正、西戎、李束为、马烽、孙谦。

烽的命运，剖析了现当代文艺界派性斗争、宗派主义对人性的摧折、对人文生态的污染。山西文坛人所共知的“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五位“山药蛋派”代表作家，少年结识，晚年共事，战友、文友加朋友，共吸一支烟，甚至曾经共穿一条内裤，可谓百年风云中的人生知己。而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原本温情脉脉的五位同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弥漫起火药味。《马烽无刺》花了较大篇幅来记叙马烽与李束为这两位山西文坛核心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陈为人说，马与李之间的矛盾纠葛，无关乎个人品格，两人都是正直正派、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领导；而之间的恩怨是非，却折射出了非常丰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内容。除了两人职务地位的升降沉浮，李束为曾经对马烽有过邻人偷斧式的误解，怀疑是马烽的“报复”使得自己在“文革”后期“清查三种人”时身陷囹圄。而他们共同的朋友、作家胡正在二人都已经逝世后，痛心疾首地对陈为人说：“党内的一次次路线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本来挺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给搞坏了。五个人以前都不错，就是从 1964 年文艺整风开始，把人的关系弄坏了。以后一次次运动，更加剧了这种紧张。”虽说“恩怨忘却，且将真情从头说”，但从马烽周围人与人之间深深的误解中，可以看出人文环境在一次次的文艺运动中遭遇到了何等严重的污染与破坏，一切从头说真情又谈何容易！ 1976 年遭遇地震，唐达成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地球人，我们必然处于各种板块的挤压冲撞之中。”1978 年，以“右派”之身被逐出京华二十年的唐达成寻求回京之路，问教于马烽。马烽劝他不要重回是非之地：“反丁陈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文艺界太复杂，你说里面有宗派吧，他说是路线斗争。他说是路线斗争，你就信？”而当马烽自己受命重返京城主政中国作协时，他即以其特有的历史感意识到，自己“由人不由人，我是被夹到了丁玲和周扬两人之间”。1979 年 11 月作协代表大会上，丁玲以其当事人的感受一针见

血地指出："文艺界的问题之所在，就是宗派问题。"她深知正是因为这种可怕的宗派主义，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1987 年，马烽在中顾委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上发言中沉痛地说："我们党内，我们文艺界派性太厉害，我们好多精力内耗了。我们文艺界三十年代从上海弄起，弄到延安两派，再弄到北京两派。'文化大革命'都打倒了，都受了罪了，这就应该醒悟过来了。可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又复活了。我说这样下去，不是别人把我们中国文艺界打垮，是我们文艺界党员自己把我们自己打垮了。"

对于斗争哲学对民族道德水平的戕害，从现代革命道路上走过来的长者有着极多的反省。著名的老报人、出版人曾彦修（严秀）先生九十多高龄时回忆平生，用"微觉此生未整人"来概括自己的一生。延安抢救、整风运动中，曾彦修坚持只自我批判而不整人："我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我承认我是特务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害任何一个人。我是右派我自己认，但我绝不说人家一个字。要人人检举，搞的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但是，等到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身与其事者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如此通过斗争来表白自己。"为什么延安'抢救运动'，说人人是特务，这个教训还不接受呢。我就不懂了，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呢，越搞越厉害呢？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搞倒刘少奇、搞倒陶铸。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国民党登了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这是知道的嘛。还要整他，这干什么啊？而且还至死不放。国民党的话讲，精诚团结。借用他的两个字，没有'精诚'，就没有'团结'，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周恩来也不信，刘少奇也不信，只有我一个人了。只有江青可靠。这样，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了，中国的正气道德全部败坏，彻底败坏，把我们后代也败坏了。败坏了什么呢？就是迫害人家，不以为耻，



曾彦修先生

反以为荣，迫害人家求得上升。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人，你就看他是不是害人家，迫害人家、诬蔑人家。诬告人家使得自己上升。这样的人是最坏，最卑鄙的。我们现在做青年思想工作能够这样去做吗？……把自己国内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你报告我，我报告你。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红旗招展，但全民的道德哪里去了，一个国家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苏联就是这个样子。……特务工作绝对要在党内、在青年人内取消。这是毒害青年的心！不能干，绝对不能干。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以为去监视别人、去报告别人就是对党忠心。这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们广大青年的精神思想迫害了，人于是变得卑鄙起来。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人格没有了嘛。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解放劳苦大众，就要特别注意别伤害人类的道德良心。没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么算共产主义？假的！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监视人、报告人得到提升，这是最可怕的。”（曾彦修《微觉此生未整人》）

五

陈为人在为唐达成作传时，特别服膺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史学追求：“撰写历史，不仅要写出组成历史的一连串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写出形成这些历史事件的历史因素。”除了展示文坛遍地荆棘、斗争相续的残酷性，陈为人更进一步追索马烽“非蜂本无‘刺’”的原因。令人慨叹的是，他也只能朴素地归之于个人的天性善良、良知良能。陈为人认为，正是由于马烽的宽厚待

人，使他“出自本能地丧失了‘阶级觉悟’（或曰‘党性’）”。性善之人，总带着理想主义色彩，把人往好里想；性恶之人，则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马烽的潜意识中，政治的坚定性残酷性和本能的良知良心时时发生剧烈的矛盾和冲突。他总在力图把道德的维度融入思维之中。也许这正是造成马烽内心困惑和痛苦的根源。马烽是天性善良之人。”至于天性善良性格的培育与形成，陈为人在书中引用谢泳《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和周宗奇等文章，分析了马烽母亲“让人一步自己宽”“有仇要用恩解”等儒家观念对马烽的影响。尽管马烽在回忆母亲儒家式的善行善举时说，“这种为人处世的哲学，如果用以对付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当然是错误的；如果用以处理家庭、邻里之间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倒也无可厚非”，但陈为人认定，“一个人终生由恶向善的品德走向，关键取决于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而母亲的言传身教尤为重要。对于马烽来说，虽然早早就参加了革命，沐浴‘三春晖’只有短短十六年的时间，但是母亲的儒学道德，已经深深镌烙在马烽的心上，一生从未磨平”。从马烽的记忆可以看出，母亲身上自尊自爱、自强不息，隐忍宽容、与人为善，主持正义、正直公道的美德，渗透在马烽的血液中，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世。陈为人书中曾记载，在马烽家中，挂着“无谓纠葛忍为高”“安详是处事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清静是养心第一法”等条幅。在晚年，马烽甚至相信“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周恩来临终前曾在病床上说出自己心中的疑惑：“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来斗去，就能斗出一个共产主义的明天？”他说自己服膺周恩来平衡中庸的领导艺术，“中庸就是掌握分寸，适可而止；中庸就是与人为善，不走极端”。这种信念出自于一个从解放区走出来的老作家、老革命之口，听来你甚至可以责之为犬儒，当然更有一分反思色彩、一分悲凉气息。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自从洪子诚先生提出用“一体化”的概念为钤键来

理解当代文学生产和组织方式后，“国家文学”“超级文学”“全能文学”等概念相继提出。这一史观相信，1950年代起的当代文学界，承接战争状态中的延安时代，建构起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与管理，形成了这一时期国家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效果。这种史观的提出，无疑对高屋建瓴地理解当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有着贯通之感。但我们也要警醒的是，这种貌似客观的“历史的自信”，其实也有着将复杂历史简单化的嫌疑。即使在一体化的当代，国家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宰制社会空间与民众思想，也不是一桩不可以讨论的事情。比如就当代文艺制度这一成规来说，它固然是国家居高临下贯彻的产物，但何尝又不是来自领袖、党的文艺领导、作家、读者等等各种力量在实际的写作、传播、接受活动中进行“谈判”“博弈”、调和的混合物！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一体化的过程中，服从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固然是一种主旋律与无法逃避的时代吁请，但各方力量的斗争、渗透、介入、妥协，也深刻影响甚至消解着过度政治化、一体化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的社会运作来说，人更有着相对于制度的灵活性、优越性。文坛大大小小势力、圈子的形成及其形成的摩擦、较量，影响着制度的建构。也正是在这种复杂情境中，再臣服、懦弱的个体，也有可能对僵硬的文学体制、国家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缓冲与消解。在多刺的时代，马烽们以一种“无刺”的个人品格应对出处，其可贵之处与莫大意义正在这里。只是，对于荆棘遍布、斗争哲学主宰一切的20世纪文艺界来说，仅仅依赖马烽们出于天良的个人力量来消解时代的剑拔弩张，以求得一方安宁的绿荫，又无异于是一种苛求与悲哀。想来时代真是大有可悲可叹之处，中国人在“多刺”的战争状态下生活了那么多年！而时代又毕竟有其温情之处，毕竟还有人性未泯、“无刺”的马烽们。

2012年9月13日

王得后先生的“乡愁”与隐痛



赵园《易堂寻踪》

十多年前，有机缘在江西教育出版社与同道朋友合作，编辑一套“寻踪丛书”，有幸担任赵园老师《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的责任编辑——在出版社为人作嫁十多年，我对这本小书有一种莫名的偏爱，虽然那只是赵园老师力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副产品，但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册非常出色的随笔（后来这册小书先后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北师大出版社再版，也可见出它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写作过程中曾特意邀请赵老师南来，到明清易代之际的士大夫群体“易堂九子”当年生活的地方江西宁都县翠微峰“寻踪”。见到赵老师时，我有些意外：她孤身一人飘然而来。记得此前曾邀请她先生王得后老师一起

来。席间问及，赵老师淡淡解释说，王老师不愿意回家乡啊。2014 年底，宁都召开“易堂九子”学术研讨会，赵园老师被当作嘉宾受邀参加。恰好此前不久我在北京，力劝得后先生同行，回家乡看看。一开始得后先生似有心动，但几经考虑，还是作罢。赵园老师在电话中的解释，是得后先生怯寒——我不知道，是怯于冬季气候还是心底无法排解的隐痛？

赵老师所说的家乡，是得后先生的家乡江西永新县——按现在的说法，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喜欢看鲁迅，我经常有机会读到得后先生的文字，不仅有《两地书研究》这类考据校勘之作，更有《鲁迅心解》那种思想阐释之书。我偶然注意到，得后先生是江西人。那个时候的编辑，多少还有点可以满足自己兴趣的主动权，还有点学术理想，经常利用传统的乡缘关系组稿，邀约外地的赣籍学者回乡——事实证明，这是编辑开展工作中有效的一招。赵园老师一答应撰写《易堂寻踪》，我即怂恿编辑同人：有机会，请得后先生与赵老师一起回来看看。

我没有想到，“未老莫还乡”，得后先生竟至于不愿意回乡。我更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简单的犹豫背后，竟至于隐含着他的身世之痛，亦折射出社会大变革时代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哀痛。

其中的原委，可以在得后先生的随笔集《垂死挣扎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中读到一些线索与答案。按得后先生的说法，书名“垂死挣扎集”除了怀念恩师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晚年多次表达“多写”以“垂死挣扎”的说法），另一原因“是此时此地实写我的心境，没有任何故作惊人之语的意思，也没有丝毫模仿古人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雅兴”。心绪总是压在纸背后的，开卷展读，我还是能感受到得后先生内心的苍凉与忧愤。尤其喜欢其中的“感念师友”“残生碎片”两辑。“残生碎片”，说的即是先生的身世之痛。父亲原为黄埔四期毕业，曾参加北伐，但“打龙潭打怕了”，

辗转回到家乡当镇长。“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他竟忘了“兵败如山倒”的旧训，不知国民党气数已尽，重新穿上军装，组织一群乌合之众，退入井冈山。而很快，听见解放军几声炮响，乌合之众就一哄而散，剩下几人在崇山峻岭中东躲西藏、夜行昼伏。而作为独子的王得后，被作为传家宝带在身边。得后先生在那里经历过一段传奇而紧张的山野生活。走投无路之际，父亲决定化装出逃。就在快要走出永新地界时，父亲决定返回。“一定是胆怯，不敢冒险吧？”若干年后，得后先生在《我一生中的五个偶然》一文中将父亲的胆怯归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五个偶然之一：“‘假设’父亲在途中被发现，被逮捕，我会怎样呢，在那兵荒马乱的时期？被株连？被收容？被遣返？还是任我逍遥，也即流浪，‘漂泊如转蓬’了？‘假设’漏网，像他的上司，同僚，部属，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四十年后既往不咎，竟然衣锦还乡，我又会怎样呢？我是谁？”但总之，命运无从假设。1949 年那个寒冷漆黑的冬至前一刻的夜里，解放军将在深山大沟里东躲西藏的王得后一行六七人搜捕归案。一年后，父亲被镇压。在羁押中，一位看守的年轻战士轻声细语地告诉十五岁的王得后：“你年纪小，还可以去读书。不要怕，不要跟他们走。”回到省城读书的少年王得后，进了私立赣省中学，“一个学生也就是按部就班准备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干部。我就这样参加了革命，成了干部。‘假设’解放军战士没有对我说那句话，‘假设’我不信或将信将疑，



王得后《垂死挣扎集》

疑惧参半，迟疑不决，一过年就是春耕，就是减租减息的斗争，我在家中是唯一的男子，长子，想走也走不掉的。我将是另一个我，是可想而知的。在中国，‘子承父业’‘父债子还’的传统，不要说我这一代，就是再有两三代也不能淡化，消解吧？”就这样，如退休后的得后先生在“迁延而又迁延，已经大半年了”而终于写成的《写给故乡的自述》中所说，“解放的欢乐，民主的氛围，使学校焕然一新，社会发展史的教育，立即吸引了我，开导着我。我毫无困难地接受了党的教育。我心里有家有太多的阴冷与恐怖。我信任‘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阶级政策。我坚决与家庭划清界限，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尽管背着地主阶级和反动军官出身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王得后仍算是“长在红旗下”了，读完初中、高中，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没有经济来源，党和政府一直给他人民助学金，走向新生的王得后此后感念不忘。

虽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大时代天地玄黄鼎革易代，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毕竟都无可逃避地承受着一份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更何况像得后先生这样身世复杂者。对于家乡永新县澧田镇王家里，得后先生有着一种爱恨交加之情。他曾在文章中回忆自己 1959 年大二暑假，在离家九年后回乡探望老母幼妹而后匆匆离去的感受：“澧田街不像我记忆中那么大，澧水不像我记忆中那么清，村子后面的树林砍光了，据说土屋里的也砍光了。这是故乡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舅舅在深山伐木烧炭——当时正“大炼钢铁”，亟望一见而不可得。而且，当时正服从分配支援边疆在青海工作的得后先生还没回到西宁，检举他的信已经飞到了学校。“啊，故乡，故乡，我在你身边做了什么错事？你为什么像梦魇一样压在我的心头？然而，故乡，我忘不了你，而且奇怪，我只在你怀里生活了几年，我至今忘不了故乡的方言，而我漂泊于异地，待的时间比在故乡长得多，几种方言不是没有学会，就是一

离开就忘得一干二净，故乡与人，有什么魔力吗？还是与我有特殊的缘分？”再后来，历经复杂的人事，由大学而入社会，由一腔热血支援边地青海，辗转调回天津教书而遭逢“文革”被劳动改造，最终重又回到北京鲁迅研究室，长期受鲁迅文字的熏陶与影响，得后先生的思想自然沾上了一份凝重，亦沾上了一份决绝。“故乡那么遥远。禾川、澧水、狮子山、红石滩，真的、真的牵着我丝丝怀念。可我从不愿踏上故乡的热土，在那里，历史的包袱太沉重了。也许，也还是‘不若相忘于江湖’好吧！是的，只要故乡山清水秀，生活丰裕，政通人和，21 世纪也就真是新的世纪了。这比什么都好。独在异乡的游子、孤魂，都会感受到她的平和、温馨、无限的可爱。我这样祝福我的故乡。”

这种既恨且爱的心理，不仅表现在对旧日青山绿水的怀念，还体现在对今天故乡的理性关切。2003 年，老家的堂哥来信“集资”，说全村五十户、人口二百二十、男丁一百五十的王家里，要盖礼堂了，每个男丁六百元。得后先生想起四十四年前最后一次回乡时，一位老人拉着他愤愤诉说“反对三面红旗”的“反动”言论：“种了一辈子的田，没见过稻子熟了不收，烂在田里，把人都拉去炼钢铁，这是造孽啊。要遭报应的。”而今两百多人的村子，竟至于要盖礼堂！联想到当下的中国到处充斥“大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凡城市皆要建“中心”，乡村皆要城镇化，得后先生感叹，“我怕的是：我的故乡头脑发热了。像当年‘升虚火，发高烧’，‘大跃进’这瘟疫又来了。”（《我怕故乡又发烧》）不仅担忧家乡的农村建设“发高烧”，对赣鄱一地的学术动静，得后先生也未能忘情，担心其“仓促”。2009 年 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登出消息，说江西“滕学”专家陈江公布，根据日藏唐本研究结果，《滕王阁序》中传唱千古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中，可能是“孤雾”而不是“孤鹜”。因为，落霞、秋水、长

天等都是自然景观，冒出来动物“孤鹜”一词，不是那么对仗。“自北宋《文苑英华》本以来，两宋、明、清，历代官、坊诸本均作‘孤鹜’，惟见此日藏唐本作‘孤雾’。雾、鹜音近，正伪难分。日藏本写于唐景龙元年(707年)七月，距王勃《滕王阁诗序》面世不足32年，应最接近王勃原著原始面貌。”得后先生对此很快写出《“孤雾”是什么东西？》(刊《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3月19日)一文表示质疑。在提出五个可疑之处后，得后先生在文末说：“以上五点疑问，不知‘滕学’的‘一些专家’研究的时候，排除了没有？恕不知情，敬谨献疑。并敢请在向日本朋友商借这件‘国宝’的时候，千万别仓促发表这样的‘研究成果’，借以增加‘国宝’的分量。拜托啦，我梦中的乡亲而又专家。”——看到“我梦中的乡亲”寥寥数字，我有些心酸。乡亲而梦中！这样的“今典”，分明凝聚着一个学者个体在大时代洪流中“走异地”而终生望乡情怯的深沉感受。

得后先生说自己对于故乡有一种“愈大愈近，愈小愈远”(《写给故乡的自述》)的心理。对于父亲，他甚至说自己“从记事起就不喜欢他。因为什么？跟着感觉走。一解放懂事就憎恶他。这回，不言而喻，因为他反动”(《我一生中的五个偶然》)——跟着感觉走固然是人生大多数时候的常态，问题是，“感觉”亦是后来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塑造的。就如得后先生在《鲁迅心解》开头所叙写的，人是一棵文化树。无论是贬谪逃归的宋之问真情流露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还是当代伟人豪情满怀的“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如同古人所云“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每个个体都注定有着自己的出身、来路与乡愁，这些都给自己一生思想情感的延展作了“路径限制”——只不过，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更愿意在自我流放中坚持自我。赵园老师曾经问得后先生：如果有来世，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得后先生回答说：中国。“我生在旧中国，你们叫我‘少爷’，我有莫名的



王得后《今我来思》

厌恶与恐怖。十五岁我在新中国度过我的青春，中年和壮年，以迄于今的垂暮。我背叛了我父亲，我不愿意回去看看我的故乡。那里有我祖居，有我六家的祠堂，有我朝夕相对的狮子山，有我夏日戏水的红石滩，有我捕捉小鱼的碧绿的稻田。我不愿意看到它，但我还是甘愿生长在拥有它的中国。我没有仇恨，只有憎恶和轻蔑。我感到无所不在的恐怖，不愿倾诉的苦痛：人心叵测的可怕。我不会‘少小离家老大回’，但我不愿意离开这个故园。哪怕它是这样的。”（《垂死挣扎集·写在前面》）就如流寓的思想史学者余英时先生所一再申说的，“我没有乡愁。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从出生在乡间旧军官家庭的少爷，到一度仓皇的草野“流寇”，再到20世纪下半叶的新生与磨难，而今归于晚年的“垂死挣扎”，得后先生的一生，虽说不上惊心动魄，但大时代里小书生的命运，也算是丰富典型了。以此看来，历经如许人世沧桑，终生浸淫于鲁迅文字，“垂死挣扎”惊回首，暗风吹雨入寒窗，得后先生的此番心绪，不知是否可以以今天已经浮泛化的“乡愁”一词简单言说？

2012年7月23日

下辑 报人与出版人

XIAJI BAOREN YU CHUBANREN



张元济与胡适：有所不为方有所为

一

自晚清以来的近代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无疑迎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开阔自由的生存空间：封建王朝的宫墙终于在革命的炮声中轰毁坍塌，传统文人的视野开始有机会从狭窄逼仄的庙堂转向自由得多的社会江湖。朝廷与帝王不再是知识分子单一的合法使用者与购买者，而发育日渐成熟的现代市民社会，为他们提供了更好地施展自身才华的新式公共空间。一向是作为封建官僚后备队伍而萎缩于单质化生存状态的旧式文人群体，逐渐从拥挤的仕途上游离出来，开始筹划兴办新学、创立报馆书局、翻译西籍、发展实业……这样一个王纲解纽政权松散的时代，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然是生活的乱世，但对于一向被禁锢在窒息沉闷的封建牢笼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是一个风云际会、鸢飞鱼跃的百家争鸣式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所焕发出的激情与创造力，为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许多呼吸视听的新通道，推动着他们的人生偏离了既往的传统轨迹，使他们的人生绽放出了迥异于前辈知识分子的夺目光彩。

但话又得说回来。外在的社会环境毕竟只是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如何使个人在变幻的大时代浪潮中把握好自己，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个人



张元济 1910 年穿西服标准像

的主动抉择。20 世纪初（或者说“五四”前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在今天后人的记忆中，总有抹不去的阔大宏伟的人生气象和非凡的人格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群体清醒而理性的人生抉择所演绎出的精彩人生。在世纪之初的地平线上，新式的新闻出版业日益扩展、成熟成为一种思想家丁·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为一代知识分子和公众提供了一个宽阔的平台。从张元济与胡适这两位著名知识分子对待现代出版业——具体地说，是对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代表性、奠基性机构商务印书馆——的不同选择来看，就很可以得出在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的一丝启示来。

二

1898 年，在维新变法的潮流下，京师大学堂成立，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当时的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是朝中名臣、“帝党”人物孙家鼐，他看中了在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张元济的才华，就极力邀请张出任大学堂总办一职。总办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这在“咸与维新”、动辄以创办新学为时髦的他人看来，也算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位置了。更何况，张元济一向以开启民智为最大抱负，以热心扶助新学教育为当然己任，并且因致力于创办通艺学堂等新式教育而早已颇著名声，但当时却不得不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职位上无聊度日。对于这种情形下的他来说，京师大学堂总办的位置，更可谓是一次实现平生理想、一试身手的绝好机遇。但张元济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孙家鼐的邀请。张元济这位前清的翰林，在激荡时代大潮的淘洗中敏锐觉悟、与时俱进，此时已经逐渐拥有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在总理衙门任章京不长时间，衙门内的官僚作风就已经使张元济深深地意识到了封建末世的官办机构的不可合作、无可救药之处。早在 1896 年，

正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文的张元济，对朝廷封杀强学会书局、杜绝言路的专制做法极为不满，为此事他曾特意上书于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结果是“曾有书上之，后屡谒而不得一见。观其行事，亦终难扫除朝贵习气”（1896年6月8日张元济致汪康年札）。刚进入总理衙门官署时，张元济就隐隐担忧说：“深恐一入樊笼，将来必成废朽……”（1896年11月19日致汪康年札）这一回，当孙家鼐邀请张元济加盟大学堂时，张就不再对官场办学这一沽名钓誉行为稍感兴趣、抱一线希望了。1898年七月的《国闻报》上说，大学堂总办是兼差，张元济认为学堂各员应该一律开去本衙门差使及兼差，以便一心一意专办学堂，孙家鼐不同意此举，张元济就果断地拒绝了孙的邀请。——丢不下官员的身份，而只是在留恋官位的同时追逐办学堂的时髦以便获得一个维新的好名声，这是张元济所坚决不同意的。他在私下给汪康年的又一封信中说：“大学堂事寿州（即孙家鼐）派弟充总办，业已奏准。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可叹！可叹！”（1898年7月27日致汪康年札）汪康年与张元济为同科乡试举人，皆为新派人物，两人互为知音。张对康所说之私语自然是真心之言。可以看出，数年沉浮郎署而终无所成的无聊经历，使敏感的张元济对封建官场行事之陋习弊端已是多有领教，对于无所成效而徒耗华年的官场，他早已萌生疏离之心，而维护思想独立、以实业救国的信念逐渐在他的头脑中孕育成形了。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张元济从政治旋涡中心北京撤离，南下来到了新兴的口岸城市上海——这是他由官向绅、从庙堂走向民间的重要转折点。在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有着三次因社会动荡而引发的群体性大迁移，他们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格局。第一次即是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张元济、蔡元培等维新派文人精英南旋，开始疏离清政府。每一次知识分子群体的迁移，就带来当时的文化生态某一方面的变化。对于出版业而言，

这次间接导致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作坊到现代出版重镇的质变与跃起。1901年，张元济走进官办商捐的南洋公学，担任南洋译书院院长之职，倾力埋首于自己心仪的翻译事业，颇为见重于当时长袖善舞的头面人物、南洋公学的创办者盛宣怀。但他很快就对这种栖身官办机构、事业“无可展布”的状况产生了不满。1902年，当排字工人出身、只有普通中学文化程度、还是一个小型家庭式印刷作坊小老板的夏瑞芳冒昧邀请他加盟商务印书馆时，他却在对方的勤勉务实作风与民间文化实业的巨大空间中，深刻地洞察出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一下子就认可了这桩“双向选择”，与几个创办商务的职业工人意气相投，毫不犹豫地在次年辞却了译书院的一切“公家人”的位置，而入股商务，出掌商务编译所。一个体面荣光的堂堂进士、赐前清翰林，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袭象征着显贵等级的翰林长袍，而弯腰走入弥漫着油墨味、充塞着嘈杂声的印刷作坊之中，与一群出身低微的排字工人走到了一起。在深入人心的功名意识仍是主流观念的时代，这真可谓是一道别样特出的新奇风景，是需要足够的勇气与见识的。

事实上当时的张元济已经完全坚定了远离宦海仕途的决心，这从他日后一再拒绝政治的相招就可以看得出来。1904年，汪康年转告说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有意保举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在回信中明确告诉老友：“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他还说自己现在在商务忙于编撰小学教科书，“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1904年8月14日致汪康年札）。——在民间勤勉创业而不是在官衙消磨时光，这种生活很是给张元济一种踏实的人生感觉。1907年，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保举张元济为邮传部丞参上行走，三次电召他入署，张两次电辞。他表面的理由是养病，他说自己接到上谕，“跪诵之余，莫名惊悚。伏念元济备员外（务）部，陨越时虞。去岁呈请备资出洋，

藉扩闻见。行抵上海，猝婴脑疾，正在就医调理。渥承恩命，不次超迁，悚惧交并，恐难报称。兼之轮路邮电诸政夙未讲求，疾疢在躬，尤虞贻误。窃维量而后人之义，深懔信斯未能之怀，伏乞代奏开缺”（致清政府邮传部）。这明显是托词。期间他在与京中友人的信中谈到此事说：“来者志在利禄，所谓国家思想涉渺无所知。若辈在官，安能与之共事！……明知于事无裨，而虚与委蛇，问世问心，能不自疚！……既出为国家任事，而又一无事权，身在局中而坐视其日就败坏，无术挽救，则不如不在其位，心犹少安也。”（1907 年 5 月致林绍年札）这种直指官场弊病的文字无异于是一纸与官场诀别的宣言。1913 年（民国二年），北京政府总理熊希龄组阁，有意邀请已经是商务董事的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元济在复熊信中承认，在自己的心目中，“吾国民若不亟施以教育，后此将何颜立于世界？……无论从何方面着想，终不能不从教育入手……教育则根本中之根本也……虽十余年来未尝舍此他事”，但他又说“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民国二年 9 月 12 日致熊希龄札），而最终谢绝了熊的延揽。“自维庸劣”显然是托词——对暮气沉沉的官场的极度不信任，对正在向知识分子显示出广阔天地的现代民间公共空间的由衷喜悦，才是张几次拒绝再入政治激流中心而自甘退居社会边缘的深层原因。在做事还是做官这一别人看来根本毋庸考虑权衡的问题上，作为一介由旧向新过渡的知识分子，张元济的思考远远地超越了那些思想尾巴还滞留在传统境地的同时代人。这种由仕进而实业的思想，并非张元济所独有，而是戊戌后诸多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从心向庙堂而转向更为开阔沉实的民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如蔡元培，自此之后即知清廷不足与谋，因此请长假回故乡绍兴办教育，充任中西学堂校长。而严复，此后则专心以翻译为业，充当思想“二传手”。他在 1899 年给张元济的信中说：“弟近灰心仕进。……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

事，但觉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仰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此后正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以饷一世人。”在深思熟虑后得出的以出版推动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信念，使张元济轻松而果决地放下了一个传统翰林的架子与面子，而与一群有着务实精神的下层工人为伍，联手开创出了一番不朽的事业。“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为主，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三

与张元济投身现代出版业的人生抉择相反的，是和他平生风谊师兼友的胡适：他毅然抵制了现代出版业迷人的相招。

1921 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进入了她的高潮时期。当时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龙头老大并且是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却走到了它的一个关键性的发展时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馆里的高层领导迫切感觉到自身跟不上蓬勃发展的新文化潮流，明显感受到来自北京、以《新青年》与《新潮》同人杂志为代表的激进文化力量的指责与压力，而力图改变商务稳重有余、趋新不足的惯常形象。当时身任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认为时局日益革新，编译工作应适应潮流，站在前线，而自己“自审不适于新潮流”，“不适于编译所所长，当为公司觅一适于此职之人以自代”（庄俞《悼梦旦高公》）。他主动急流勇退，开始谋求一位能够顺应时代形势、更具号召力的人物来代替自己。



胡适先生

商务把目标瞄准了正处在新文化运动浪头上的名人胡适。胡适留学美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思想并不激进而有温和开明之风，不至于使商务倏然走上极端，当然是主持商务编辑业务的最佳人选。当年4月，高梦旦亲赴北京，几次力劝胡适辞去北京大学之事而到商务主持编译所。高坦诚地说自己不能胜任，故要胡去“帮他的忙”。高梦旦说得极为客气：“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胡适4月27日日记）这种出自一个商务领导者口中的话语，分明流露出求贤若渴的至诚之意。起初胡适几次婉谢了。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高梦旦先生小传》）看到胡适实在不答应，高梦旦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个不得已的调停办法，邀请胡适“到上海去玩三个月，做他们的客人，替他们看看他们的办事情形，和他们的人物谈谈”，帮商务出谋划策，指导一下工作如何开创新局面。一向忠厚的高梦旦这次带着半诳骗的口气劝说胡适将家眷一起带来，想以此将胡适“拖留”在上海。胡适最终没有“中计”。在这年暑假胡适只身一人南下。抵沪时，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商务要人都亲自到车站相候。这种隆重的礼遇在沪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当时的《商报》还在一篇名叫《胡老板登台记》的花边新闻中将此种情形大大炒作了一番，说是“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胡适在上海张元济的居所对面住了一个暑假，轮流与商务编译所的各部高级编辑和各杂志主编等人进行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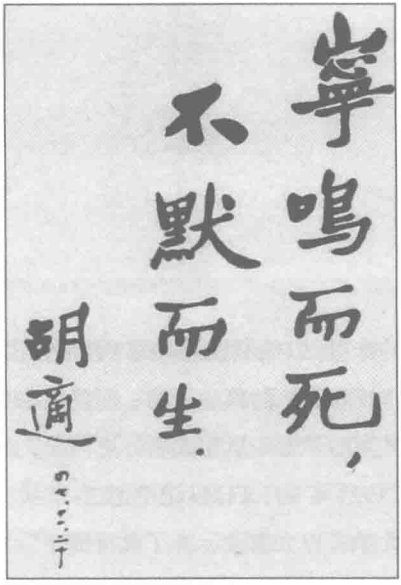
通交流，并以自己的看法对商务的经营发展提出了一大堆意见，写出了详细的考察报告。最后，考虑来考虑去，他还是没有留在商务上演自己的好戏，而是推荐了他的旧年老师王云五代替自己。——由于胡适的举师自代，王云五后来在商务别开新局，留下了一段佳话，这当然是后话了。

要说起来，风云际会、长袖善舞的胡适当时自然知道商务印书馆在现代新文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性。刚从国外回来时一切以美国为观察国内事情标准的胡适，一度对国内的出版界状况十分失望，但不久他就对商务刮目相看。他在 4 月 27 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胡适对商务的文化影响力，是确信无疑的。更何况，从经济上比较，商务与胡适所在的北大当时可谓是形同天壤之别。商务经济雄厚，而当时包括北大在内的高校多已欠薪数月，甚至发生索薪风潮，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极为紧张，教职工亦人心思迁。当年正在商务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先生，事后就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揣测过，不排除胡适当时对商务有点动心，因为论薪水商务编译所所长比大学教授高出数倍，论权力也比大学文学院长大得多，又可以"网罗海内人才，或抛出夹袋中物"。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适此前停写日记十年，至 1921 年 4 月 27 日才恢复，其开笔记录的就是关于商务邀请他加盟一事，可见他对此事的看重。但胡适考虑的是："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要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因此，我几次婉转辞谢了他……"当商务决策层再次向他提出要他留下时，他又考虑："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我现在所以迟疑，只因为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8 月 13 日日记）——把商务看作"一种教育大势力"，与张元济把教育看作"根本之根本"的信念，何其相似！但在胡适的心目中，

做编辑出版事业始终有点“完全为人的事”的味道。以他不甘人后的个性而言，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幕后人物，而是主张慷慨自任，追求让自己成为一个领衔时代风尚的学者与思想人物。更何况，他所在的是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胡适在1921年8月8日日记中说过：“我走到南方，才知道现在中国止有一个北京大学可以大有为，弃了真可惜。”

在早年，胡适曾经说过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想做的事情是以自己的著述去引导大众，开启众智。待在上海的7月27日晚，他被邀请与郑振铎、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在高梦旦家中聚餐。席间商务编译所东文部主任郑贞文说：“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不但没有长进，而且从此毁了。”胡适对这番话显然是心有戚戚焉，特意在当日的日记中郑重地记了下来，还提出了派人留学、创办图书馆等四条避免这种危险的意见。当时，在胡适的心中，学问无疑才是他“自己的事业”和第一选择。更何况，当时他已经是在学界与文化界登高一呼辄从者云集的风云人物了。这位北大的名教授，此时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转型期之中。面对《新青年》从思想文化类刊物向社会政治类刊物的转折变化，他还想重新另起炉灶，继续自己的文化思想革命之路；他还刚开始过起“整理国故”的学术之瘾，对《红楼梦》《章氏遗书》《水浒传》之类的考证以及《读书杂志》《国故丛书》等的编选，兴趣犹浓；年纪轻轻，他就有资格开始选编《胡适文存》了；他还忙于欢迎哲学家杜威，将他的“实验主义”引进……“文章千古事”，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正为自己前途无量的学术事业奔忙，一切都围着这个中心展开。至于其他的，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比如说，当时已经离开北大的陈独秀将信寄到上海，邀请胡适回故乡安徽任教育厅厅长，胡适也敬谢了。（见胡适8月27日日记）

在后来的岁月中，胡适尽管涉足政治，甚至被“拉夫”客串了一下“玩



胡适书法

票性质”的驻美大使，但他对学问的一往情深仍是丝毫不减。在离开商务的次年（1922），胡适筹办了《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张元济等好友担心他成为“梁任公之续”而劝他“专心著书，那是上策”。胡适在日记中特意记下这段话，还将“著书为上”四字写下送人共勉。1947 年蒋介石希望胡适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去美国访问，以为渐渐失去美国信任的国民党政府挽回一些信任；还想让胡适参加总统竞选，以造成民主的假象。胡适为此事特意去了一趟南京。返回时他给旧友、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愿再去做大使的原因：一是刚刚受命办一个学校，还未见成效，就中途改辙，对不起国家、学校与自己。二是“我今年 57 岁了，此时若改行，便是永远抛弃学术的事业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有点不甘心”。三是自 1942 年后自己全力“理旧业”，五年不注意国内外形势，实已是外行了，一时不容易恢复从前的自信力。末了他又特意注明：“此三点之中，第二点最要。”——即使如此世事纷扰，他还是牵挂着自己的学术。时代的动荡，固然使胡适常常扮演多样的社会角色，但终其本真底色，他毕竟是一介学人。

事实上，到了 1936 年，当胡适为故去的高梦旦先生写《小传》时，旧事重提，他就将自己不愿就职于商务的缘由和盘托出了：“我研究的结果，我始终承认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这句谦逊话的潜台词无非是说，自己去商务从事编辑出版之事，有点不值。陈原先生在《读〈张元济年谱〉》一文中谈到此事时说：“胡适来馆虚晃一枪，却不理解（或不屑做）这项工作，荐了王云五入主商务。”（《张元济年谱·代序》）——“不理解（或

不屑做）”，这样的断语，我以为陈原先生真可谓是知人之至，更是文字高手，能表达得这般圆满！

四

张元济没有为京师大学堂总办等诸多官职所诱引而再入官场，结果转向民间开辟草莱，在商务成就了一番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实业，使中国的出版业真正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他的加盟为商务注入了一份深厚的人文色彩与精神底蕴，商务由此获得了文化上的提升，在经营实践上从单一的经济行为转变为一种复杂多元的文化行为，在规模与地位上由传统的印刷作坊跃升为现代的出版重镇，成为世纪之初在新文化建设进程中与北京大学互为呼应、联手上演精彩好戏的双子星座般的文化重镇；胡适思前想后、慎之又慎，终于抵制住诱惑而没有去主持商务的编辑工作，结果将自己的学术事业与“立言”追求推向进境，成了一个在新文化的诸多学术与思想领域“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现代学人。

张元济是出身于旧式学苑而稳健开明的传统儒者，胡适是沐浴过美国文化风习的新派人物，两人是那个新旧更替的时代里两类受教育背景不同的士人的典型。从个人交往上讲，两人背景殊异，年龄有别；但从精神气质与思想信念上讲，两人都是谦谦君子式的文化人，在那个“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张元济 1901 年 10 月致盛宣怀书中语）的时代里，对社会都奉行着低调的文化改良主义、开明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稳健切实的建设性姿态；对自身则坚决地维护个人的思想独立与学术自由。以这种共识为纽带，两人之间终生都保持着诚挚的友谊。（在 1953 年为军政委员会填写干部履历表的“人事关系”栏时，张元济首先就这样写道：“安徽人胡适……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

余颇重其为人……时相过从……间书不断……”，而当时的胡适已经逐渐成为大陆学界批判的箭垛，连他的得意门生顾颉刚也“陆续发见了胡适的种种毛病，交谊也由枯萎而死亡”。）两人都从传统的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与空间中与时俱进，在时代的转换淘洗中完成了自身的蝉蜕涅槃，成为中国现代的新型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说出两人的区别，则张元济更多有着一种自甘“外围人物”位置，憎恶庸碌无为但又始终避免被关注、被强调成为焦点中心的澹淡情怀；而胡适则更多地有着一种天生的领袖群伦的风流气质与精神魅力。前者偏于沉潜，内敛自守；后者偏于外烁，不甘寂寞。前者更适于充当“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幕后功臣；后者则更适于成为激动潮流、扼据要津的前台人物。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他们各自选择了各自适合的道路，超越了传统文人仕 / 隐、在朝 / 在野、出世 / 入世这种二元对立式

的简单生存模式，而在纷乱的时代背景下淋漓尽致地抒写出了个人的人生内涵。进退行藏之间，两位智者深深懂得如何把自己的个性长处、志向追求与大时代的需要、可能性结合起来。有所不为方有所为，这是他们成功的内在道理之一。道理说起来当然很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实在不容易，尤其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动荡纷呈、歧路迭出的时代。

到了今天这个开阔的大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自由度无疑有了一种较大的进步：以被强化地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单位制度为典型特征的体制化生存空间逐渐有所松动，许多自由职业从各个角度浮出地表，各种个体化、多元化的生存方式也已为人们所接纳。但知识分子群体生存方式的选择似乎并没有变得自由轻松，反而是日益艰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一个与上一世纪之初相似的环境。来自社会市场化等方面的力量，对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异化作用，知识分子群体中弥漫着浓重的浮躁之气与喧哗之声。在喧嚣时代里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惑不安与心神不定。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所到底在何处，还是（永远是？）一个有待追索的问题。与任何时候一样：个人的生存方式永远需要自己的主动抉择。真正的自由不仅简单意味着拥有外在的消极自由，还需要足够的内在的积极自由为精神资源。想起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些旧人旧事，作为一个编辑与读书人，我就常常感觉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仍然在为今天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提供着一种极好的参照、一种有力的警醒。

2000 年 8 月 20 日

书卷之外的张元济

至今为止，林林总总的张元济传记中，至少有两种直接以“书卷”为名来概括传主的生平：《张元济：书卷人生》（周武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汪凌著，大象出版社，2002）。至于其他论及其书卷人生的论著，则更是数不胜数。毫无疑问，对于张元济这位自称“我是书虫老蠹鱼”，一生以读书、爱书、访书、藏书、购书、藏书、编书、校书、出书为乐，以“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为人生主旋律的现代出版第一人来说，平实的“书卷人生”四字无疑是对其最好的评价。但是，身处由晚清向现代的大转型时期，书业巨擘毕竟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不是一位只是孜孜矻矻于出版、埋首书斋而不问纷纭世事的传统书生；相反，我们要真正理解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丰富的人生，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维的角度。近年，在论述张元济的出版思想及其相关的文化思想、学术思想、教育思想等之外，我们越来越注意到其书卷之外丰沛、坚韧、淑世的人生内涵。



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

既生此土，终觉未能忘情：出版人的政治情怀

戊戌变法的失败，成为包括张元济在内的维新人士个体人生的转折点，也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与价值观发生变化的“危机时刻”。由近官的北京南下近商的上海，由向上致君转而向下泽民，由传统翰林蜕变为现代出版家，由当年沉浮于狭窄的庙堂出走到更为开阔的民间，由企盼自上而下改革的人生追求转变为致力于开启民智而选择教育与出版，张元济的人生总体上讲画出了一条自觉疏离政治的轨迹。

值得进一步认识的是，此前的张元济，虽然如诸多研究者所论，是维新派中的稳健派，不赞同康有为等人的躁进，而认识到“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法欧美，变易一切，诚非易事”，但其亦有“革命”之处；在变法失败投身出版之后，其政治激情虽然逐渐消退，却仍有其终生未能忘情之处。

1897 年农历三月廿五日，张元济复信给挚交汪康年，对其来信中“力顾大局数策”逐一分析，认为其中“有难行者，有可行者”，“一，保全局一条，必同志有多金者、有居高位者，然后可图。多金者或有之，居高位者必无其人也，则难行。若仅赂要人，使同志能办事者速得大权，则无不可。一，第二条，苦无资本，则垦荒难。隔阂不通，则结外援难。义民多系虚骄，不足与有为也。且无事之时，亦不可得见，事亟而已无可措手矣。则此事又难。一，第三条最为上策。然十八行省，谁能当之？南皮诚俊杰矣，其能见及此否乎？若仅捐道府，恐仍无用。一，第四条即吾辈今日所当办之事，无论其成否，惟尽吾之心力可耳。一，吾兄办事，从报入手，最为中肯。今天下未尝无有心人，苦于隔而不通，散而不聚耳。今渐通矣，聚矣。凡有同志，或至馆相访者，或以文字相赠者，吾兄宜加意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洽焉，终且为我所用矣。一，贵报似宜多论西人有益之事，以

歆动群伦。……”（《张元济 1897 年 4 月 26 日致汪康年信》，《张元济全集》，第 2 卷第 175 页，商务印书馆，2007）细心揣摩其中所说的“赂要人，使同志能办事者速得大权”“结外援”“捐道府”等数种策划，明显体现出其激进甚至危险的思想。新出的《张元济》（汪家熔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认为这个计划风险极大，“被泄露是要被满门抄斩的”，但这是研究张元济人生的一个段落、一个绝不能忽略的方面。“从菊老以往和后来的活动看，他似乎是非常谨慎和稳妥的，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去设法找能办事的同志用贿赂的方法获得大官职位，再进行某种在当时为国家所不容、而不可告人的事。要‘结外援’；对陌生人中的‘有心人［要］加意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洽焉，终且为我所用矣’。……现在，社会巨大的变革已经有好几次了，今天谁也不敢去追究菊老对清廷的不忠而给予惩罚，而是应该褒扬菊老在清季具有变革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菊老的变革思想，与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兴中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不约而同，稍晚两年多一点时间而已。”（汪家熔《张元济》，第 289—290 页）

在遭受“永不叙用”的处分，“以被罪逐臣侨居海上”，张元济隐晦处世；已经投身出版，当形势变化，他却积极分心于时事，利用自己与上层关系密切的便利，屡次介入时局的策动与运作，“心系东南民众生死，忧国忧民之心未泯”（张人凤《戊戌到辛亥期间的张元济》，《史林》2001 年第 2 期）。1900 年夏，义和团事起，东南各督抚联合在东南外国人士，斥责清廷向各国宣战诏为伪诏，抵制义和团向南方蔓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南互保”。消息甫一公布，张元济立即致书盛宣怀，“援匹夫有责之义，贡千虑一得之愚”：“祸乱之来，虽关天意，人力未始不可小有挽回。……惟现在事变更急，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我公负天下重望，且为各国所引重，似宜速与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以维持东南大局。”（《张元济 1900 年 6 月 18 日

致盛宣怀信》，《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201页）东南互保成功后不久，张又致信盛氏，直言“公正宜破除成说，统筹全局，毋泥人臣无将之义……嗟乎，祸患至亟，事变之奇，固非寻常举动所能支此危局也”。国家危急时分，当然可以采取非常手段，张元济鼓动盛氏不必拘泥于人臣之分。对“八国联军”进犯，张元济在同一信中认为其原因“实在我顽固政府。我既不能遣兵靖难，致外人受此荼毒，复劳各国兴师动众代平内乱”；南方督抚不能仅以保护为事，而应犒劳外兵，对各国“有以飨劳之”，“明知巨款虚糜，然未始不可少平外人之气”。张元济向盛宣怀建议：“至各国调兵，现以日本为最多，似宜暗与联络，由是而英、而美，以为外交之根基，以为后日斡旋之地步。”他认为在此情形之下，李鸿章不宜离粤入京，自失凭借；他从大局出发，放弃对袁世凯既有的成见，高度评价其出抚山东可为江南屏障，建议东南各省宜并力支持袁氏。（《张元济1900年7月14日致盛宣怀信》，《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202页）在东南督抚和维新士人在“互保”一点达成暂时共识的大前提下，张元济认为“剿团匪”为当务之急、主张“飨劳”外人的言论，以此后的中国民主革命逻辑、民族主义立场等来论定，很容易被冠以“反革命”或媚外等罪名。但长信慷慨陈词纵论时局之中，一位理性爱国知识分子的忧国之心，跃然纸上。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元济认为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重要契机，在2、3月连续三次致信盛宣怀，陈述利害与干预的方法，认为前年东南共保成于盛氏之手，因此希望他能再“维持大局”，而张元济自己愿为其“效一得之愚，不知能许其进而面陈否”。…… 汪家熔对张元济多次致信盛宣怀，在时局动乱纷扰之时鼓动其取得分外实权的做法进行了深层发覆，认为“除致汪康年信外，张先生致盛宣怀信，应该承认是菊老的一个重要的闪光点，亦颇值得研究或记录”（汪家熔《张元济》，第290页）。晚清以来，国事糜烂，士林万念俱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

三立诗）。政治遭受挫折，已经转身出版，却终不能忘情政治，除了传统读书人“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这种不甘于以纸上文字自限的本能，张元济在信中自剖此中实有其深层原因：“元济迁谪余生，本不当再谈国事，惟既生此土，终觉未能忘情。”（《张元济 1904 年 2 月 11 日致盛宣怀信》，《张元济全集》，第 3 卷第 205 页）“在身受着政治不公的时候，还未能忘情家国，这就是他的家国情怀，也是爱国情怀。……菊老在忍受政治不公的时候，在一个不值得爱的政治笼罩下，对家国未能忘情，这就是他一生始终不懈努力的原因。他传承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情是他终身行动的动力。”汪家熔在后记中总结说，以前的张元济研究著作，多从其著名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入手，剖析张元济从主张英才教育、关注专深教育、培养高级人才转而关注普及教育，“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投身出版的这一思想变化；对《修身教科书》等教科书，亦多从其思想结构、布局、文字技巧上着眼。而如果以“元济迁谪余生，本不当再谈国事，惟既生此土，终觉未能忘情”为钥匙揭橥其人生动力正在于其家国情怀，我们能够更深层体认这位出版人的人生境界。

作为“戊戌党锢孑遗”，民国成立，张元济在书札中即以民国纪年；对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他明显表现出反对，如挽蔡锷说“为争人格不得已而用兵，败弗亡命，济亦引退，砥柱中流，先生庶无愧矣”。1930 年，面对国民党的变化，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现在……要将那二千年前的故事扮演一回，而且人人想做孔子，诛诛少正卯，恐怕‘革命成功之后，统一的专制局面又回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仍旧无望’。”（《张元济 1930 年 4 月 16 日致胡适信》，《张元济全集》，第 2 卷第 546 页）“近人好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张元济 1932 年 1 月 13 日致胡适信》，《张元济全集》，第 2 卷第 549 页）抗战爆发后，张元济一改此前的相对沉默，而时时

以愤懑之情公开批评政府。苏州法院审理“七君子”案，他亲往旁听；财政部官员操纵上海纱市投机，他致信《大公报》，直指其“全无心肝”，要求严惩；1947年5月南京学生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而遭捕，张元济联合十老致信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要求速行释放学生，理由是学潮“推源于内战，此要为尽人所同情。政府不知自责，而调兵派警，如临大敌……”1948年9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代表院士致词，发表“刍荛之言”，沉痛回顾由甲午以来的伤心史，忧内战，念和平，引发批评政府的浪潮。蔡元培对张元济在抗战后关心时事表示讶异：“此后久不干涉政治问题，近逐渐热心。”胡适则致信《大公报》高度评价说：“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以使我们年轻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如果人人都能像张菊生那样爱打不平，爱说正话，国家的政事就有希望了。”1956年，张元济隔海致信蒋介石，劝其“继钱武肃而起”，促成两岸统一……张元济这些政治参与，人所熟知。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既生此土，未能忘情”的人生情怀，支撑着这位出版人在激进/改良、革命/保守、新/旧交织的大时代中顺应潮流，以出版为安身立命之本业，而又能时时关注国事，尽一己之担当，成为纷扰的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幅“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记名，吴方著《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丛书”之一）。

致民于生：出版人的民生思想

作为一名以出版活动开创智民之路的文化人，作为一名从国弱民贫的晚清走向现代的知识分子，张元济一生追求国富民强，有明确的济世主张，对民生疾苦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铁路、矿山向为经济重心。近代以来，列强侵华，“各国皆以铁路为割地之媒”。张元济深刻地认识到：“水利与民生相关，铁路为新政之要。”《续修滕县志序》，《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第293页）1904年，浙江绅商与德商合资兴修墅浦铁路，在主权日削、外力增进的情况下，“不忍目睹桑梓之邦沦于虎狼之口”的张元济，写信给盛宣怀等要人，最终挫败了德商计划。1905年，美资协丰公司谋求修筑浙赣铁路部分，英国谋求苏杭甬筑路权。张元济参与发起成立全浙铁路公司并担任董事，进京谈判，积极拒借外款，维护苏浙路权。这一影响深远的运动，体现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爱国热情，也推动了近代民族经济的发展。

近代中国，农村破产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张元济对此十分关注。他认为中国农村破产，在于外国货挤占国货。（《关于农村破产》，《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212页）美国花旗橘子原由中国种子改良而成，却在中国畅销。张元济有感于此，担心农业发达的日本也会如此效仿。我们应吸取教训，否则会“流出不少的金钱”（《花旗橘子》，《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224页）。为了改变洋糖侵入而国产糖锐减的局面，张元济积极参与实业家马玉山兴办的中华国民制糖公司——尽管最终因种种原因，难免颓势，悲壮落败，却为其此后商务印书馆管理提供了教训。对江南地区尤其是浙江故乡的民生，张元济多次发表意见。1925年，有感于海盐“停棺”这种陋习的封建迷信与厚葬礼制，他发起兴建公墓，移风易俗。1936年，海盐县政府借口发展公路而强拆民居，张元济立刻上书蒋介石，请他干预；还上访浙江省府，当面向省长朱家骅抗议；又亲往现场调查，撰文批评地方官员“只图敷衍新政门面，于地方民情全不体会，一味蛮横，真无异于虎狼”；又致信好友蔡元培，详告民间疾苦，请他利用与朱家骅的旧谊，劝朱“于吏治民生特加注意，勿再任作纸上政绩”；又致信新任海盐县县长，提醒“不为病民之政”。1937年

1月9日，张元济返海盐两日，故乡事令他不吐不快，写下《在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对政府拆毁民房造路入城事，剖析利弊，痛斥其非民生主义之建设；还对练童子军、放婢女、设菜市、辟公墓、禁私厕、购蚕种等所谓“新建设”中之病端逐一分析。（《在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213—215页）1937年5月，上海商会以“产地羊牧户贪图厚利，不顾残忍”等为由，要求禁止浙北农村小湖羊皮生产；而熟悉下情的当地官员此前竟以同样理由报请禁绝。对于这种不顾民生昏聩做法，张元济峻厉地写出《农村破产中之畜牧问题》一文，逐一驳斥所谓“贪图厚利”“行为残忍”“有碍牧畜蕃育”“影响农村经济”等无知妄言，而抨击农村之凋敝破产原因恰在于行政者不知如何以良法美意帮助人民厚生利用，“特村农有其产，不知所以扶助之，且有时不免摧残之，斯遂破产耳”！（《农村破产中之畜牧问题》，《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218—223页）为家乡民生仗义执言，言百姓隐忍而不敢伸者，这位出版人的言论，理性分析，而又情动于中。

最为集中体现张元济民生思想的，是他1933年9月6日就美国棉麦贷款事致行政院院长汪兆铭之长信中所阐释的有关反贪、建设与节俭的论述。张元济首先提出必以刑赏约束官吏，使之不敢为贪墨，“至是而国家之钱，悉以办国家之事”。他说，揭借外债，用以生利，实为今日之急务，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其用途。张元济提出，“用途之宜整而不宜散，宜专而不宜广也。棉麦借款不过二万万余圆，用一二巨大之事尚嫌不得。若东移百万，西拨千万，即令有成，所成亦仅，岂非等于虚掷乎。所谓巨大之事，如积极者有粤汉铁路，其次为陇海、为川汉。又次为黔滇之数路者。苟能有成，全国脉络贯通，土货竞出。国民始有生机。消极者有黄河长江之水患……”他甚至认为与铁路不通、水利不能治相比，海关盐税受外人监督亦为轻者。“铁路为有利之事，水利既兴，租税又增，债既偿清，监督自去。”否则，即使



张元济 1936 年七十岁时

勉强开辟财源，其对于民生恐终难免于“白花”。他重点强调数事：其一，“不宜高谈建设，而置民力于不问也”。他以自身所熟悉之浙江为例说明，铁路公路建设，举债数百万，而仅便行旅往来，于国计民生益处甚少；且“开筑之时占用民地，勒派夫役，又有田亩捐、特别捐，何一非出自民力者！”家乡海盐所谓村自治、整理土地、保卫团，“究其实无非扰民之事”。其二，民力困竭，张元济亟言政府不宜自营实业，“官商合办不过亏蚀罄尽而止，中外合办者当由国家负其责，则又非取于民不可矣”。其三，“政府亟宜首倡节俭，以为全国之表率”。“今设一官，月费数百金，建一官舍费数十百万。朝遣一人，暮派一人，出洋调查，少者数万，多者乃至数十万，此无非取之民。……政府诸公亟宜身为之倡，必减至最啬之度，其他官吏循是以降，仅令维持其淡泊之生活而止。其他土木之工、游宴之费、舟车之供应、庆吊之馈酬一律停罢。实行其卧薪尝胆之苦行。如是而士习不变、民心不奋未之有也，起死回生庶有望乎。”（《张元济 1933 年 9 月 6 日致汪兆铭信》，《张元济全集》，第 2 卷第 133—136 页）

对国民政府如此，张元济对新中国的民生举措亦一如既往地关注。1949 年 6 月 9 日，在陈毅参加的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周年纪念会上，张元济发表演说词，直言一则以喜，喜解放的顺利；一则以惧，惧建设的艰难。在上海霞飞路上看见有新搭的牌楼，预备庆祝解放军入城，张元济直言，人民应该格外忧勤惕厉，解放军已经入城半月，何必如此浪费，不如用来赈济难民。6 月 15 日，上海召开耆老座谈会，张元济就发展工业生产、农村开荒、疏浚河道、发展水利、恢复交通、救济失业、社会治安及教育改造等事关民生的问题建议甚多。他在全国政协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提出发展海运。10 月 11 日，毛泽东邀请他到中南海进餐，他当面向最高领袖进言：“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当局措施容有未当，报纸不敢倡言，宜酌登来稿。报馆应负职，必须

有确实地址、姓名，方予录登，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工业先轻工业，次重工业。国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三为征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报之户，于是实报者意有不平。同匿报者反而减轻，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毛泽东逐一解释，对第一条，“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第二条，“现在铁路需要铁轨，鞍山矿产不能停顿，纺织亦有数十万亦亟于进行”。张则认为“现有者无中辍之理，需新创者宜斟酌”。第三条，先是陈毅解释：“河北、山东负担较江浙为重。江浙并未征夫。又无锡有某姓有田七万亩，征数甚微，且不肯缴，不能不与以惩儆。”毛泽东补充说：“现有大军数十万移向江西、福建，分别南下。以下可以减少若干。”（《一九四九年赴会日记》，《张元济全集》，第 7 卷第 403 页）1951 年 8 月 29 日，在解放军进藏前夕，张元济不仅写诗庆贺“积雪西陲今渐化”，还致信毛泽东，洋洋千言，力陈西藏解放后“首都宜特设西藏语文学校”“首都及邻近各省大学宜特设西藏语文专科”“宜编辑藏文常识之书”“凡有藏胞聚集之处，宜由当地政府领导人常与集会，加意联络，使有宾至如归之乐”等对藏政策主张。

1931 年“一·二八”事变，日军残暴地焚毁了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的印刷总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等，胡适来信安慰。张元济复信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所最望者，主持国事、皈依三民主义之人，真能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则吾辈或尚有可措手之处。否则，摧灭者岂仅一商务印书馆耶！……”（《张元济 1932 年 2 月 13 日致胡适信》，《张元济全集》，第 2 卷第 549 页）致民于生而不是致民于死，可谓张元济一以贯之的民生思想。在今天，改善与



汪家熔《张元济》

关注民生日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心。农家书屋建设、免费教材及教材循环使用、图书馆与博物馆免费开放、数字图书馆建设等新政，都是当下书业民生的内容，也成为书业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和产业原动力，促进出版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在此背景下来审视张元济这位出版前辈的民生观，这当能给我们提供一面历史的镜鉴。

余论：张元济不可追？

客观地说，除了全集与新版年谱长编的出版，近年的张元济研究多陷入一种停滞状态中。大多重复的论述，使得学术界对张元济这一“永不过时的话题”呈现出一种更多的期盼。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出版人论及张元济时，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态。刘杲在为汪家熔《张元济》所作序言《今天向张元济学习什么》中提出今天再读张元济，“一，学习他忧国忧民，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追求进步”，“二，学习他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从根本上造福人民”，“三，学习他发展出版，建设文化，攀登民族文明高峰”。刘杲并由此发出三问：“对比一下，我们做出版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是为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还是为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钱？这个根本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相形之下，我们现在出版教辅，一心发财，不惜粗制滥造。铺天盖地的教辅，出版单位敢出，教育单位敢用。这种思路，与张元济当年出版教科书的思路如何比较呢？”“优秀文化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是浑然一体，而不是两张皮。这与目前出版界流行的

唯利是图、拜金主义，难道不是大相径庭？”他的结论是：“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做出版与张元济有很大差距。这差距不仅在出版项目的选择和策划上，不仅在出书的数量和质量上，不仅在人才培养和事业经营上。最根本的差距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张元济的出版境界，可能至今无人达到。”（刘杲序，汪家熔《张元济》）汪家熔在该书后记中提到这是一个难求答案的问题：“[今天]能不能复制张元济？能不能复制邹韬奋？”“毫无疑问，逻辑上今天应该是绝对肯定的，但事实或许并不一定。然而，更值得研究的是菊老的动力来自何方。这应该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学习，也是我们研究、褒扬菊老的基本目的。”而出版人王建辉，则在多种场合直言，“张元济不可追”。在当下出版产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来回望张元济这位大动荡时代的建设者，反省“张元济能不能复制”，除了一种走入历史深处的幽远追怀，更多是一种直面现实的尖锐提问。出版业后人总在不断的追问中走近前辈，前辈也总在不断地给后人提供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除了张元济这位现代出版奠基者泽惠后世、高山仰止的出版功业，他的人生气象，也来自于他兼容旧式士大夫品格与现代知识分子情怀的担当与贡献。当出版超越传统读书人“三立”价值观支配下以不朽为目的的出书自娱活动而新变为自觉服务于民族解放、思想启蒙与进步的社会性经营，我们很难说得清出版人的出版行为与其政治思想、民生思想等相得益彰、相互促成之处。审视张元济的政治思想与民生思想这种书卷之外的多彩人生，今天的出版人，当不会认为这完全是书卷之外的事吧！

2012 年 12 月 2 日

1949 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2001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近世学人日记”丛书。令读者颇感惊讶的是，首出者即有由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先生整理的《张元济日记》。这是该日记继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陆廷珏、汪家熔、金云峰、朱蔚伯校点）之后的再一次新版，充分体现了丛书主事者不俗的学术眼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一向是旧书新版的通例。与旧版不同的是，新版《张元济日记》字大行疏，装帧更为精美大方，成皇皇两巨册共一千四百余页；编排则一改旧版按原件三十五册顺序排列的方式，而以年份逐一断排。不过这还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要论内容上的最大不同，是新版增添了 1937 年日记残本及 1949 年赴会日记两部分。关于 1937 年日记残本，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在《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第 432 页首次引用此资料时特别注明：“除已印行的先父日记外，原还留有数册日记稿本，‘文革’被毁，我从废纸堆中检回《1937 年日记》残本一册，现仅存此残帙。”而在同书第 546 页首次引及 1949 年赴会日记，却对其避而不注一词。笔者曾向参与旧版日记整理的学者请教当年商务未将张元济 1949 年赴会日记收录的缘由，得到的回答是因旧版所整理者纯为馆事日记，而 1949 年部分则不属于工作日记，故无从纳入。的确，旧版日记的“出版说明”开宗明义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种解释，似乎不能完全消除读者的疑惑：既云“馆事日记”，当在书名中注出而不宜径书“张元济日记”；况且从现在所见 1949 年赴会日记所记内容看，也并非全是个



《张元济日记》

人私事而多有关馆中事务。更为深层的原因，不知是否因为1949年赴会日记所记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日记问世时时机并未成熟而仍多有“不合时宜”之处？

“一九四九年赴会日记”（从9月3日至10月20日），指张元济在1949年由沪北上至京参加首届政协会议的日记。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其深刻地折射出了作为一位旧年知识分子的张先生在大转折的1949年里的复杂心态。在鼎革变化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面临的政治抉择，多可以从他们北上迎接新时代的行动与心绪中看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仍然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历史话题。钱理群先生所著《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一书，对于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夕去留进退的微妙心情，剖析至当。尤其堪称妙用的是钱先生于每章的开头，摘录叶圣陶先生1948年的日记作为涵括全章论题的引子，极其巧妙地贯串起了一年中的思想史线索。盘点起来，这类较为私密的日记文本，在1949年前后并不少见。1949年2月，包括叶圣陶、柳亚子、王芸生、徐铸成、曹禺、郑振铎、马寅初、赵超构、宋云彬等在内的二十余位在港文化名人，应中共中央之邀，乘“华中轮”北上参加新中国建设。3月1日叶圣陶先生在船上出了一个谜，谜面是“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猜《庄子》一篇名。同样曾是开明书店中人的宋云彬先生射中为“知北游”，即知识分子北上。令人感叹历史多情的是，这次“知北游”途中留下了包括日记在内的诸多文字。至今已经陆续问世的日记，较为人知的有《叶圣陶北上日记》（见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日记三抄》、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叶圣陶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旅途日记五种》）、《柳亚子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宋云彬北游日记》（刊《新文学史料》2000年4期，又见山西人

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红尘冷眼》）等。细读诸种日记，很可以窥见这些在旧时代奋斗、追求过的文人在新时代到来之前既充满希望与憧憬，又心怀迷惑与担忧的复杂心态，以及他们在新环境中个人心理与精神的“微调”，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如草蛇灰线般地在其中时隐时现。即以对光明前途的模糊与担忧而言，叶圣陶先生 1981 年将《北上日记》收录于《日记三抄》公开出版时，曾在所加短序中说：“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应当说，这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张元济先生不在“知北游”的船中，但他与叶圣陶、宋云彬等出版家及王芸生、徐铸成等新闻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是旧年纯正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身份。而稍有不同的是，相对年长的张元济先生，身世与经历较叶圣陶先生们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感。他曾是“戊戌孑遗”，见过了自晚清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与挫败、求新与复旧、欣喜与悲伤、欢歌与痛哭、成功与失败；在出席新政协的人当中，他是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见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年版、张人凤著《智民之师·张元济》，第 25 页）的文化名人，可谓是阅世甚深。19、20 世纪之交乱世中国的变迁嬗递、知识分子的荣辱浮沉，于他可谓是身与其中、千帆过尽。加上自己长年沉湎史书，娴于史事，对现实的理解见识自然超迈他人。历史的政治前厅里变更频仍，而作为文化人的张先生，自从在戊戌变法中遭遇重创，痛定思痛而绝意仕途之后，他就一直宠辱不惊、心无旁骛地经营着他的出版文化产业，深沉地尽现代知识分子一己之担当。从 1949 年日记可以看出，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此时已经年过古稀的他，固然有及见长达半世纪的抗战及内战终于尘埃落定，太平时世有望到来前的欣



1949 年的张元济

喜，但还是流露出了一丝对时代将定未定、难以把握的惶惑之情。

从旧友陈叔通先生信中得到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自己被列为代表的消息时，起初张元济先生马上托词谢绝了，自道“实有难于应召之处”。至于理由，就像 1913 年他拒绝熊希龄邀请自己任教育总长时所说的“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民国二年 9 月 12 日致熊希龄札，见 1997 年商务印书馆版《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第 1278 页）相似，他缕述原因：其一，如今自己“脑力渐觉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费钻研之事，思虑亦复不能深入……似此衰孱，有何裨补？”其二，“中共诸子多非素识，在会中者，屈计故交大约不及十人。气类太孤，殊觉岑寂”。其三，自己“素性戇直，不喜人云亦云，况值此国家多难，又重以弓旌之招，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其四，“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还有，儿子单位上正“倡议裁汰”，如今要他请假陪伴自己北上，“必被顺水推舟，从此失业，以后何以为生？”因此他要陈叔通“善为我辞”（1949 年 8 月 24 日致陈叔通札，《书札》中册第 754—755 页）。就在给陈写信的当日晚，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来访，转致中央来电邀请北上之意，恰逢张元济早早睡下了，而由儿子接待。次日他写信给梅，说自己“并未接得当轴电示，亦无等函牍，自审菲材，愧乏贡献，且年力衰迈，方染微恙……苦精力不逮”，因而不便远游，谢辞政协代表。两天后政府方面由陈毅、潘汉年来信慰问并再致意说“如近日贵体转佳，盼能北上”，并希望他 9 月 10 日到达北平。犹豫之中的张元济答复说：“自惭椓枿，愧乏讦谟，且孑身远行，惮有种种障碍，再四思维，甚难遽行决定。”（8 月 30 日致梅达君，《书札》下册第 857 页）“元济椓枿庸材，涓埃莫效，仰蒙宠召，无任悚惭。迩届衰年，时时触发旧疾，惮于远行。……际此残暑，

孑身远行，殊感不便。故一时行止尚难决定。”（8月30日复陈毅、潘汉年，同上）尽管口气已经有所松动，但张元济无疑仍在犹疑观望之中。就在此时，曾为商务职工、得中央授意的陈云来访，告诉他不久前到东北视察期间，见到沈阳、长春商务分馆情况均好，请先生放心，并向他介绍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见张树年主编、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第546页），张元济才在9月3日决定北上赴会。托病不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于朝代更换之时常用的故技。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张元济这一由拒绝而犹豫而终于同意的心态，反映出了他微妙的思想变化。

临行前，张元济还要为正困扰着商务的劳资纠纷而大费心思。劳资纠纷在旧年商务史上一直没有断过。商务的工人运动，历史上有着较好的基础。张元济对于工运及劳资纠纷，一向是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1926年8月，他在商务各工会组织联合发起的纪念三十周年馆庆大会上讲话说：“劳资之怨，在西方尚未解决，不过西方不能解决之问题，难道不可以东方先行解决？难道不可在本馆先行解决？解决之途径，不外诚意合作。”（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第112页）但际此转变之时，纠纷有着更为复杂与深层的原因，也体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如何慎重处理根本并非易事，而且无法像以前那样资方处于绝对主动地位，可以快刀斩乱麻。加上由于公司经济效益的滑落，劳资矛盾更是空前尖锐。此前的6、7月份，张元济一直在为商务的业务改进事情绞尽脑汁。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工会方面一直未接受。（《年谱》，第545页）登车北行的前一天，张元济“出赴商务印书馆，约职工会常务委员叙谈。略言余将北行，际此艰难，甚盼努力合作。当此合作伊始，彼此都不能相互满意，但望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若辈斤斤于总务改组，新订章程及人选均不满意。余言人选我亦大不满意，但当局诸君斟酌再四，确有为难。此次用人较多，即予备数月之后去留地步”（9月5日日记）。

在去商务时，他还“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招令会员陈述意见”（9月6日致丁英桂，《书札》上册第175页）。到北京后，住在六国饭店的张元济仍挂念此事：“得陈夙之十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夙之提出原则二项，尚正当。然同人无能相助者。夜寐不宁。”（9月13日日记）看了此信后一夜没睡好的张元济，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信面交给同时与会的陈叔通看，“甚为不平。言允职工会要求开紧急会议尤不合”（9月14日日记）。他草拟一份回复商务总经理陈夙之的电报，陈叔通修改了几处，却不愿列名。他还给另一董事陈拔可写信，“请坚持拒开董事会”（9月15日日记）。9月19日，张元济等应毛泽东之邀，同游天坛，回来后陈叔通向他转述，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在政协筹备会上讲演，说“工会要求不宜滥允……工会有团结，商业同业无组织，不团结。遇工会过分要求，只图苟安。目前随意应允，且与签约，事后翻悔。此与工会为难者一。又资方怕事，工会要求不敢与之争辩，一切推归工会，工会即欲扶助，资亦无从措词。此与工会为难者二”。李立三希望“资方与劳方尽管斗争，斗争不已，工会出为仲裁，反可持平。并盼资方不可怕事。怕事反要生事等”（9月19日日记）。张元济还托人取得一份北平药业劳资集体合同，大概是想以此作为参考之意。他将李立三讲话的大意以及药业劳资合同，都随信寄给远在沪上的陈夙之。10月8日李立三与朱学范来访，张元济向他们说商务的职工会筹备会常务不肯加入改组职务，“似欠合作”。李立三问他原因，张元济说：“诸人以恐被疑为资方买收，故而胆怯。”李立三支持他说“职工不应违抗公司用人之权”。就在返沪后的1949年年底，张元济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致辞时，突然患脑血栓症倒地，留下了左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王云五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出于狭隘的政治偏见，将张得病之原因归咎于商务劳资纠纷中对他的“侮辱”。此说后来遭到中外诸多学者，包括张元济后人的辩驳。

我们不好将张的病因直接归因于商务劳资纠纷，但对于一位年逾八旬的恂恂老者来说，这种过度的操劳，无疑是一大勉为其难的负累。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大陆一向很少出版王云五的著作，即使如仅见的《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关鸿、魏平主编，学林出版社，1997）一书，编者在出版缘起中说："鉴于大陆在当今语法体系等方面与海外的习惯有些不同，因此，在编辑过程中作了少量删节，特此说明。"其中所收《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就作了一定删节。对照刊发于台湾《传记文学》四卷一期或收入《谈往事》一书的原文，可知删节的正是王云五论述张元济1948年中期至逝世前一段岁月经历的有关文字。这种删节性处理是不太妥当的，令人感到遗憾——我们未必会认同王的看法，但这毕竟是他的真实观点，也为我们认识晚年的张元济提供了一个参照。

作为旧中国出版重镇而一直稳坐"龙头老大"的商务印书馆，此时的发展已经步履维艰。来京前张元济就曾向陈毅呈文，诉说了职工薪金难支的情况，恳求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簿》，转引自《张元济年谱》，第546页）。张人凤在《智民之师》中介绍说："其实这时商务印书馆的处境非常困难。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万令，而1948年降至6.6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年为341令，1948年为130令。1949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年用纸量为1.37万令，人均27令，比194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年9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第228—229页）日益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出版分工合作改革方向，也在张元济的日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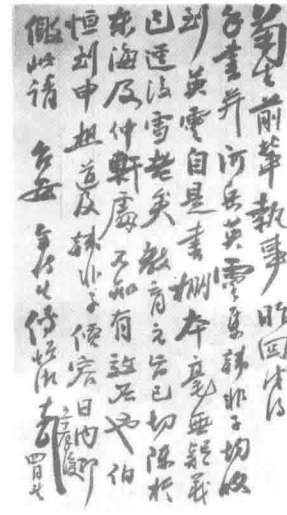
月 9 日，郑振铎、胡愈之同来见张元济，说日后出版将注重分工合作，各专一类。对于一向是全面出击、包罗综合的商务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打击。对于合并为中国图书公司，张元济为难地说："联合出版社，闻春季须大加扩充，若如今年秋季例，由各家比例出纸，再加以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匪特商务一家为难，恐各家亦无此能力。"胡对他说，这只是试办性质，如果有困难，可作变通。第二天宦乡来访，他向张元济建议说，可以请政府将新华书店不能尽做的业务，匀一部分给商务，如《毛泽东选集》等，"以图挽回馆誉"。旧时代里一向在市场竞争中勇猛进取的商务，此时不得不希望得到一部分分配性的业务，从中很可以窥见这家旧时代里最大的文化企业在新时代变迁的一个侧面。原先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商务，在此后分别被归于出版、工业和商业三个领域，出版门类大大缩小，1958 年后更是被严格限制在出版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性著作和中外文语文辞书这一有限的范围内。商务旧人章锡琛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写回忆录《漫谈商务印书馆》（收入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其中说道："1949 年上海解放以后，商务为了解除不可克服的困难，八十高龄的张菊老曾经亲自到北京，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和我等几个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言语中透露出对这位八旬老者仍勉力劬劳的钦佩，也流露出了对其后无替人的同情。从时间上看，这应是在政协会议期间事。对于在天地玄黄的时代中商务的命运，从具体的历史情境看，就如张人凤在上引书中所言：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于具体情境中接受这种历史命运的人来说，心理上的一时失衡是难以避免的。此时商务职工因资金缺乏、劳资纠纷等问题不时发出怨言，1949 年 11 月 26 日张元济在商务做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



张元济祖孙三代在 1956 年

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的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渡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出席政协会议之回忆》，转引自《年谱》，第 552—553 页）应当说，这其中蕴含了张元济一份深沉勇毅的担当与负重。

前面说到张元济不愿北上的托词之一是，旧地重游，无法不周旋都门亲故，会给自己凭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及至到了北京，张元济于故友亲朋方面，多有照拂。与侄孙张祥保、姨丈俞阶青等亲友的相聚，给这位长者带来极大的欢乐。他与儿子一起去凭吊岳丈许庚身的故居，还托学生陪儿子去看了旧年恩人徐用仪的故宅。旧年在此冠盖京华，风流俊逸，而今已垂垂老矣，故地重游，自然多有着物是人非的感受。尤其是在同道朋友的交游方面，更有着让他一言难尽的感受。张元济去看望了旧年的同好挚交傅增湘。这位当年名满天下、位至民国教育总长的文人，自从 1911 年 6 月与张元济在中央教育会第一次会议上相识以来，两人书札往来长达四十余年。



傅增湘 1919 年 4 月致张元济信

厚厚一册三十余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见证了他们的交游之密切。两人在藏书、校勘、保存影印古籍等方面的合作及成果，可谓是珠联璧合，尤其是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影印大型丛书时，得傅之助尤多。作为一名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者、藏书家，傅的“双鉴楼”“藏园”藏书一向名动天下；他还性好游历名山大川，放纵情怀，南北殆遍，登山临水，夙具胜情。“六十以后，腰脚犹健，故招携俊侣，常肆游观，一岁数出，不以为劳。”（《藏园老人七十自述》）而今旧友张元济所见，傅已是“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9 月 12 日日记），毫无当年的风流逸彩矣。一月后南下临别，张又去见了傅，说了一些沪上旧友的近况，“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10 月 15 日日记），其中可以看出张元济无法抑制的感慨伤怀。这种情谊，自然有着无法为外人所体会的相知之感。而对于商务旧人中适应新时代因而才华渐展者如陈云、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人，日记也记录下了他们微妙的关系变化。当年出入商务的练习生，此时都居于或将居于领导地位。这种相互之间地位的变化，微妙地影响着他们与张元济、商务的关系，如沈雁冰。此时商务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沈雁冰南下重回商务。来京前的 7 月 19 日，他提议将商务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通过了此项决议。在北京见面时，沈雁冰说自己“甚愿南下， 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他推荐了郑振铎。张元济“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9 月 9 日日记）。在离京南下的前一天，张元济还与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日记中记道：“午后二时，偕叔通访沈雁冰。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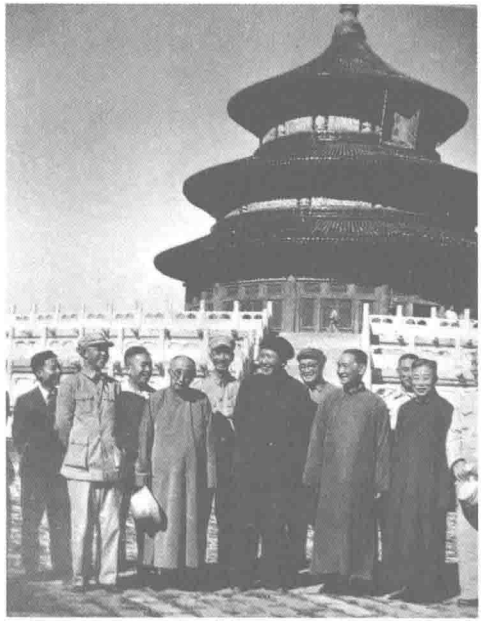


1949年张元济重游科举殿试重地
——北京故宫保和殿

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10月18日日记）在张元济返沪后，沈雁冰数次致信，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之一席。此一时彼一时，早年由练习生而至《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此后不久出任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要他在一个历史意味太深的民间企业里任职，无疑是不可能的了。

民生问题，一向是张元济作为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1949年6月的一次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张元济对生产、开荒、水利、教育等事关民生的方面提出了建议。他所提的“发展海运”一条，也与此相关。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进餐。宾主畅谈中张元济提了两条建议，一条是凭着一位老出版家、新闻人的经验，提出应设法使下情上达，广开言路；另一条，则是建设必须进行，重要的有交通、农业、工业。他说经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民穷财尽，现在百端并举，民力有所不逮，关键是要权衡缓急。民生问题的核心之一是土地改革。尽管要到1950年1月召开的一届二次政协会议上中央才将土改问题提上中心，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土地改革日益明显的矛盾与冲突要在以后才逐步凸显出来（袁小伦《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一文对此有详述，刊《书屋》杂志2002年第8期），但类似的冲突在1949年里就已经出现苗头了。9月16日，张元济在日记中记录下了来访的河南第一师范副校长高镇武所说：“自言年七十矣。……日本军至，为被侵略者；入八路军，国民党来，又为反动派；解放后又目为剥削者。房屋先后均为他人所有，仅留七八间房，供□栖止。”

晚上陈毅与梅达君来访，聊天时陈问及张在北京的旧友今存几人，受高镇武之事所触动的张元济就向陈转说了傅增湘房产为他人所占一事："余言前日访傅沅叔，其同乡也（引者注：傅与陈毅同为川人）。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其所居正房均为人所占。伊问为某军队所占，昔为国民党军，今则不详。"陈毅答复说"当查明，为之设法"（9月16日日记）。9月27日，他接到远在南方的藏书家刘承幹来书，告诉他说南中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部队占用。刘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张在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馕需孔亟，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1949年10月30日致刘承幹信）此事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10月15日学者孙楷第来，也向张元济谈及他"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读到这样的日记，我们不能不佩服张元济这位阅世丰富的长者对时势与气氛敏锐的洞察力。他所记下的并非特殊现象。袁小伦在上引文中说："总体而言，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土地改革是相矛盾的。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句常用话讲，真是'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了'。"当时与张元济一同与会的另一位老民主人士柳亚子，常常是"牢骚太盛"，令他牢骚不已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断听到自己故乡为关于房产、土地之类的求援之声。宋云彬1949年7月24日的日记记道："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红尘冷眼》，第143页）柳亚子虽说能"识



张元济与毛泽东一起游天坛

大体”而对这类频传的呼声“置之不理”，但无疑，这增添了他们作为一个“叹息肠内热”的知识分子对民生作出本能的关切。张元济本人故乡是否有此遭遇，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还无法论定。上述王云五《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转引“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同年有人带到香港付邮的一项上海通讯”说：“他（张元济）返沪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更觉高兴。不料迭接海盐的家乡来信，谓族众多遭清算，甚至他族里的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强夺之威胁；于是他在祠堂张贴布告，说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级党政人员不得扰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谓当汇齐代向有司申诉。稍后他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陈说，饶当即劝其勿管闲事，因为他这些亲友都是土豪劣绅之流，是应该清算的。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写信给在北平的毛泽东。”这段文字在《旧学新探》中被删节无遗，《年谱》也未及一词。此事在海外流传甚久，但被大多出版史学者论为讹传。

1949 年的日记，还记述了张元济在参政议政方面的努力。这位在 1948 念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上曾以“刍荛之言”而令知识界振作（连一向敢言的胡适都为之担心说：“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煞风景了吧”）的老者，此时仍然有着一定的政治热情。他提出删节“禁止肉刑”条，增加“推广海运”条等；即使反对公历这条建议没有被接受，也得到了解释与回复。与毛泽东同游天坛、颐年堂座谈等情形，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共同纲领》，张元济曾直率批评：“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发言人多斤斤于词句之末。”



《张元济全集》

（9月14日日记）尽管冷却多年的政治热情稍有升温，但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张元济似乎极为谨慎。9月13日，《大公报》记者高汾与张先生谈至两小时，“临行前谆嘱所谈勿发表。高言当写成，候余许可”。24日，《光明日报》记者谢公望来访，向张元济问及身世及对新政府的感想，张元济赠给他《刍荛之言》《新治家格言》及《奇女吟》各一册，并告诉他说如果要将自己的答语登报，“请先以稿本见示”。

张元济研究，在当下的出版史研究中是一个热点。已经问世的诸多张元济传记等相关著述，对其1949年前后的心态，都强调他“望断天涯”（吴方《仁智的山水》中语）而“及身已见太平来”（张元济自挽联语），顺应新时代的一面。这无疑是主要的一面。作为一个开明通达而不拘泥守旧的知识分子，张元济一向体现出了其顺应历史与时俱进的胸襟与见识；但无可讳言的是，像任何一位旧年知识分子一样，处于时代变革中的张元济对新时代一时也无法做到彻底投入。他的日记微妙地折射出了这一点。文人遇上大时代变动，当然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因而也更为“瞻前顾后”，有着一种本能的“保守主义”情怀。这与政治有关，但又可以说不全是政治因素，而大体是文人的性格与本能。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今天我们不应也不必对此有所忌讳。

顺便可以提及的是，新版《张元济日记》的不足之处之一，是无任何出版说明。如对整理体例如何，是否删节，新旧版本的区别何在，等等，都无任何交代。而与其同属“近世学人日记”丛书的《桐城吴汝纶日记》等，则对此作出了说明。如能有所说明，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读解《张元济日记》。

2002年8月16日

长沟流月去无声

——旧年《大公报》人命运感怀



唐振常《识史集》

前不久，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在沪上溘然长逝，读书界一时多有叹惋之声。喜欢文史的读书君子，再也没有福分读到这位自谦只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蔡元培、章太炎、吴虞与半个吴稚晖）的长者那既具丰饶文采又富通脱见识的新作了。他的《川上集》《往事如烟怀逝者》《识史集》《饕飧集》一类集子中的珠玑文字，曾经给广大书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喜欢看他笑谈饮食文化的朋友，大多记得他的深言妙论：烹美味，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鱼在锅里不要去乱动它”，因为，如果凭主观意志乱动一番，那就真乱了。——细细品味，那真是历尽沧桑者才说得出的智者之语。

如果对唐先生早年的经历知道稍多，更会为他在今年年初的离开拍案长叹。唐先生后半生以研究历史旧闻知名，他自己说是典型的“半路出家”。他早年所经历的，是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新闻人生涯。从燕

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民间性报纸《大公报》，他驰骋了七年；随后转到《文汇报》，一待就更是十五年之久。唐先生说新闻事业“空空洞洞”，自有他作为一介书生的深沉感慨，就是新闻“学无所专，时有空虚之感”；而“轰轰烈烈”则并非随口笑言。1947 年 7 月，刚进《大公报》一年的唐先生，就被四处滥捕的中统特务抓进牢狱，对他颇为看重的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要求马上放人。吴支支吾吾想拖延一下，王掷地有声地说：“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当晚唐就被放出。后来唐先生写文章说：“国民党最怕这一招。”新闻界中这种“道高于势”的旧年风景，固然反映出了《大公报》在风沙扑面的年代里可贵的报格与尊严，也折射出唐先生在当时的活跃与瞩目。在后来的著述中，唐先生多有对旧年报界同人的深沉追忆，记述了他广泛的交游与来往。1949 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在为随军南下的记者设宴饯行时，赞扬《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的确为中国新闻界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按照周总理当时对另一位著名《大公报》人徐铸成先生的说法，唐振常先生“不也是《大公报》出身么？”前面说唐先生年初离开人世令人长叹，是因为今年 6 月 17 日是《大公报》一百周年诞辰的特殊日子。关于《大公报》的研究性专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王芝琛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和《大公报》的社论文选——《1949 年以前的大公报》（王芝琛、刘自立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都已经得以出版并引起学界的关注。文化界对旧年《大公报》的研究，正日益走向深入，日益摈弃阶级分析方法的教条与框架，而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前一书，唐先生还亲自写下了儒雅深透的序言。可惜天不假年，他竟无机会得见《大公报》百年纪念这一天的到来了。说起来，这是继 1991 年徐铸成先生猝逝、1999 年萧乾先生离开之后，又一位旧年《大公报》人的远行。《百年》一书中，收录有一篇名为《座中多是豪英》的精

彩文章，描绘出了报社当年风云际会、群英翔集的盛况。而现在屈指算来，除了在香江畔数着版税逍遥度日的金庸先生和后来成为出版家的戴文葆先生，在稍微知名的文化人中，普通读者如我等，已经说不出有哪位是旧年《大公报》中人了。对于留心中国近现代民间报馆旧踪的人来说，一种历史的记忆正在缓缓地合上大幕。

萧、唐二先生的逝去，自然让人感叹人生百年的倏忽无情，但读完《百年》一书，我又不禁为他们顽强的生命所赢得的最终胜利感到钦佩与欣幸。盘点起来，旧年《大公报》人中，不幸者实在太多了！按《座中多是豪英》的说法是："从总的方面看，《大公报》内的'左派''中派''右派'记者，都有他们不同的贡献和各自的成绩，都是无法替代的。殊途同归，最后的命运，大都是以'悲剧'而告终。""右派"的命运呈现悲剧色彩，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但《大公报》里"右派"之多，足可以称得上当时的集中地之一。著名女记者、地下党员彭子冈，与另一位名记者徐盈是夫妇。1957 年，她因说了句"我最不喜欢解放后这一系列的运动，太麻烦太耽误时间，有时间不如多搞点业务"，结果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她不服批判，继而升级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急先锋——极右分子"，开除党籍，下农村改造。等到从"五七干校"归来，已是病魔缠身了。又据说 1957 年，她发表一篇文章主张让菜农自己进城卖菜，文章里说："事情是明摆着的，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折腾，时间上也经不起拖延，坏了没救。……不说别的，北京胡同里卖菜的清脆悦耳的吆喝声，也尽够叫人惦记！……这也许只是我不足为训的小资产阶级旧情调，真正受到实惠的是万万千千、每条胡同里短不了的家庭妇女们。"就是这种文字，却成为当时的"彭子冈右派言论"专集"最毒"的一篇。名记者朱启平，太平洋战争中活跃一时的随军记者，参加过 1945 年 8 月 19 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当时



杨刚

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还被选入大学新闻学教材。其后又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文革”一顶“右派”帽子，让他九死一生；蒋荫恩，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曾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主任等，门生遍及全国新闻界，“文革”中亦未能幸免，悲惨地自缢身亡，数天后才让家人收尸。至于首席“右派”萧乾，是欧洲二战战场上极少的中国记者之一，大概是因为在《大公报》写过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刚到天地玄黄的1948年年初，就劈头遭遇到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化丛刊》上的怒斥：“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献就是《大公报》的萧乾！”这就注定了他以后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接踵而至的“右派”、抄家、下放，都与他结下了“缘分”……有一个显得有些奇异的现象就是，《大公报》的“右派”记者，命运悲则悲矣，但历经劫难，大多数却最终能不屈不挠地拨云见日，走到承平之世。相反，倒是被认为是身在“左派”之列的，多有玉碎钢折、赍志以殁者。女记者杨刚，由于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一手促成了《大公报》和王芸生留在大陆，此后颇为顺利，执掌过上海《大公报》，担任了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和改组后的《进步日报》党委书记。“我所要做的就是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这个以豪迈诗句表达自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新中国成立后出落成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先后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独身一人，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据说1955年，她因一次车祸造成脑震荡，后又偶然丢失一个重要的笔记本，神情紧张。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反击右派”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次日，杨刚就以“金银花”为笔名发表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上阵呐喊。可是，在10

月7日她却突然自杀身亡，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自杀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大会。另一位知名“左派”记者范长江，早年以报道工农红军长征和西北消息名动天下。在延安，范长江与毛主席彻夜长谈，使他彻底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新华社总编、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等要职。可是，在“文革”中他却被一些自称是“响当当的左派”造反者进行长时间的“逼、供、信”，最终于1970年12月23日在河南确山干校自杀身亡。范长江的亲密战友、记者孟秋江，1941年入党，后任上海《大公报》副社长、香港《文汇报》社长。“文革”爆发，孟被迅速召回北京，而很快于1967年3月16日自杀身亡。《大公报》记者的“后起之秀”刘克林，地下党员，出自燕京大学，文采斐然。抗美援朝时主笔的文章，让总编王芸生很是感佩后生可畏。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中宣部，曾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笔，当时广播中那铿锵有力的言论，大多出于他之手。正当他平步青云之际，却在“文革”爆发的“红八月”里突然神秘地坠楼自杀。说起来，倒是王芸生在“反右”中幸免于难。只是他的“幸免”又未免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唐振常先生在《川上集·王芸老十年祭》中说，自己不理解一向不愿屈居人下，为了一个记者的性命敢于向国民党拍案而起说“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的王芸生，后来“奇怪”地变得学会了十分隐忍。他追忆说，即使到了1979年，与唐谈起“可以装上扩音器公之于众，毫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事”的内容，王芸生也还是放低声音，关上房门，“谨小慎微，与往日全然不同了”。按学人郭汾阳和丁东两人在《报馆旧踪》中的说法，就是“失语”了；或如谢泳在《失望的王芸生》中所说：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不久之后就变得精神委顿、一蹶不振了。解放后王继续担任《大公报》社长，但不管业务，而是专心修改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后奉毛主席的指示，与曹谷冰合写长文《1926—1949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

的旧大公报》，算是从新闻人到“旧闻人”了。他以违心之论一手推倒自己早年孜孜追求的志业，极度“忏悔”《大公报》的历史。“文革”中，王芸生在劫难逃，进了“牛棚”，偶尔可以回家，但回家仍念念不忘“早请示”“晚汇报”；若不是家人劝阻“您目前还是专政对象”的话，他还执意要参加居委会组织家庭妇女跳的“忠字舞”。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让秘书找来了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资料阅读。会见时，毛对在场的周总理讲，应该让王芸生也参加接待活动。正在北京车公庄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的王芸生，就这样突如其来地接到了让他莫名其妙的“特赦令”。不久，他参加各种中日等外交活动，被任命为中日友协副会长。临终时他留给儿子的遗言中有一句：“这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由于这部书，我提前好几年又吃上了你妈包的西葫芦馅的饺子。”这是王芸生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幸运，但却是作为新闻人的王芸生的莫大悲哀。

“座中多是豪英”一句，出自南宋词人陈与义的《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多年前，唐振常先生以一支生花妙笔在“往事如烟”中“怀逝者”，如今怀人者也遽然成了后人追怀的对象。“长沟流月去无声”，读着有关旧年《大公报》的一些文字，遥想一些在文化风尘中渐行渐远的旧人物，真是让我等读书人无法抑制住心头频起的“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之叹。

2002年3月

《大公报》与燕京大学：民间报馆与教会大学的思想关联

2002年的6月17日，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民间性报纸《大公报》一百周年诞辰的特殊日子。此前，关于旧年《大公报》（1902—1949）的研究性专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王芝琛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和《大公报》的社论文选——《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王芝琛、刘自立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都已经在大陆得以出版并引起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据了解，王芸生先生的传记也在编辑出版之中，这是继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之后姗姗来迟的另一《大公报》灵魂人物的传记；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公报百年报庆丛书”共十册书以作纪念，丛书包括《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大公报一百年头条新闻选》《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大公报寰球特写选》《我与大公报》《大公报一百年副刊文萃》《大公报小故事》《大公报特约专家文选》《大公报历史人物》《大公报一百年》等。在读书界影响颇深的报纸《南方周末》与杂志《书屋》，亦相继刊发专辑长文，以助《大公报》百年纪念。学术界对这张在风沙扑面的现代大力标举“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为宗旨，坚持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旧年《大公报》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日益摈弃以前惯常的阶级分析方法教条与框架，而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

色彩、学术品格与思想史意味。

今天逐渐基本认同的一种看法，就是把《大公报》视为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之堡垒，把《大公报》人群体看作现代史上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将其言行喻为“比较公正的裁判”。百年回首，在近现代这一特殊时空中，民间报纸可谓多矣，唯独《大公报》与自由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追溯起来，偶然中有其必然。笔者以为，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与报格的培植与养成，从大的方面说，是昙花一现的时代大环境使然——王纲解纽、两极对立等等特殊时代的政治语境，使奉行中道而行、自由主义的《大公报》有了生存的空间；从文化生成与机制建设这一稍小层次来说，还和这张报纸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关系密切，深受“燕京精神”之影响与熏染有关。探讨《大公报》与燕京大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色彩找到一条隐幽的思想史线索。

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进程与古代有一极大的不同，就是现代传播媒介开始在文化发展与思想熔铸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轻忽的“势力”。在20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中，知识界对宣传媒介的重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教育家、传教士司徒雷登，凭着他对时代的敏感意识，从中看到了中国对新闻出版人才的需求及燕大作为教会学校在这方面可能施展的广阔空间，从1924年即开始筹创燕大新闻系。据史静寰在《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一书中介绍，创办过程几经艰难浮沉，先由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后代白瑞华及另一美国人聂士芬合作开课，但不久由于白瑞华生病等原因，工作一度中止。此时美国著名的记者兼教育家，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院长惠廉士(W. Williams）访华，他极力支持在中国创建新闻教育基地，并亲自出任燕大新闻系筹款委员会主任。他很快筹得六点五万



司徒雷登

美元，并促成密苏里新闻学院与燕大结成姐妹学校，由前者帮助后者。1929年，新闻系恢复建设。调查表明，30年代初新闻系仅有学生五十二名，在全校各专业中学生人数名列第四。而至30年代末，则一跃成为燕大第一大系。1930年仅有毕业生一人，1935年有十五名，而至40年代末，全国各大报都有燕大毕业生。由于外语的绝对优势，及其因办学的开放性而带来的对国际局势的广泛了解，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占绝对优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一书中不无得意地说："有一段时间，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我系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报纸编辑人员的地位也同样突出。"新闻史研究者公认，燕大新闻系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受过系统教育的新闻工作者，是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

客观地说，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移植，在无地自由的中国现代史上，教会大学拥有一个政治上相对自由、思想上相对民主、文化上相对开放的小环境。宗教信仰上的自由选择、思想观念的宽容开放、学术研究中的独立不依、师生关系上的民主平等、社团活动的蓬勃活跃，都使教会大学与当时的国立大学有着明显不同。作为教会大学的突出代表，燕大典型地体现了这些特色。"燕大是在中、美两国注册的大学，因此体制和风气上都深受美国'校园民主'的影响。与其他国立大学不同，燕大不设'训导处'，而代之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它的目的既不是统制思想、监视行动；它的手段也没有专以记过、开除、侦探、取消公费等方法对待同学。'因此，燕大的学术空气非常自由，'要是你愿意，你可以从马克思研究到克鲁泡特金，一直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陈时伟《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刊《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燕大学生、记者卢祺新和葛鲁甫在《燕京新闻系》（刊《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中说："最初八年，燕大新闻系教育全都

是美国式的，因为四名教师不是美国人，就是接受美国教育的。当时，所有的新闻教科书或参考书，没有一本是中文的。”作为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代表人物，司徒雷登将燕大校训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在校歌中强调“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他还说：“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与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在华五十年》，第61页）正是出于对燕大这种开明、自由的现代教学风气的赞赏，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同样是教育家的胡适先生，1934年7月在《独立评论》发表《从私立学校谈到教会大学》一文，也对燕大由衷褒奖：“燕京大学成立虽然很晚，但他的地位无疑的是教会学校的新领袖的地位。……近年中国的教会学校中渐渐造成了一种开明的、自由的风，我们当然要归功于燕大的领袖之功。”（载《胡适学术文集·教育》，第256页，中华书局，1998）即使在播迁流离、仓皇战乱之中，燕大也保持这种风气于不坠。成都校友会在《抗战期间迁蜀的燕京大学》（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一文中，重点以新闻系为例，说明了燕大学风独立思考、自由探讨的特点。史静寰在《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一书中说，由于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也由于司徒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办学思想，凝聚成一种“无形的燕京精神”，“有人说‘坚持真理、崇尚民主、办事认真、勤奋进取、热情开朗’是燕京精神；也有人认为亲密、健康、平等的人际关系，‘中国人和外国人，教师和学生，都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亲如一家’是燕京精神。对燕大的校友来说，无形的燕京精神体现在燕大的校歌、校训之中，体现在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教师

燕大师生的举止、言行与风度之中。总之，燕京精神是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基础的，是对中国旧教育传统的否定。正像一位燕大校友所说：‘西方民主有缺陷，但比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要高一个层次。燕大的民主精神培养一个人的民主观念……’”史为此特意主持了一项问卷调查，在对三百多名校友进行“燕大的生活最令人怀念的地方是什么”与“燕大这所教会学校所提供的教育对于你的成长产生的主要影响是什么”两个非标准化问题调查时，有一半的人提到了校训，提到了燕大的民主、自由精神及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

如上论述“燕京精神”，并非随意拉扯游离，而意在说明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对其思想信念与人生践行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以研究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问题见长的学者谢泳曾精当地说：“我近年在研究中国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较为看重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因为一个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这样，对于从政的自由主义官员也是这样，虽然他们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我们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这些人最终价值理念的归宿，都要回到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上。这是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特点，现在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这样，我不好说，但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体是这样的。”（《由叶利钦想到吴国桢和蒋介石的一次谈话》）可以想象，沐浴着“燕京精神”成长的燕大新闻人，很早就会在心中或隐或显地根植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在校园中，燕大新闻系学生就以《燕京新闻》与《燕大周刊》为基地，践行自己的新闻信念。这两份报刊，一直坚持新闻自由。就《大公报》而言，领导层人物中，早期的“三巨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先生有着留学（日本）背景，后入的总编辑王芸生先生则是自学成才。他们几人的思想观念固然对《大公报》的报格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

就像郭根在《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自由主义报人》中所说的那样："一般认为《大公报》的成功，是由于胡政之先生的经营以及张季鸾与王芸生先生的文章，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转引自《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大体可以这样说，社长与总编辑们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一张报纸的风格与思想走向，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风格与思想的达成与实现，需要通过那些中间层人物的名记者、名编辑们来加以践行与推展。而令我们惊讶的是，《大公报》的中坚人物，多是出自燕京！出自燕大新闻系的，就有朱启平（名记者，太平洋战争中活跃一时的随军记者，参加过 1945 年 8 月 19 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被选入大学新闻专业教材。其后又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蒋荫恩（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曾先后担任燕大、北大、人大新闻系教授、主任等，门生遍及全国新闻界）、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欧洲二战战场上极少的中国记者之一，著名作家）、刘克林（《大公报》记者的"后起之秀"，抗美援朝时任新闻主笔。新中国成立后入中宣部，曾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笔）、唐振常（名记者、著名学者）、唐人（原名严庆澎，后以小说知名）、谭文瑞（后来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等人。其中蒋荫恩后来还曾担任燕大新闻系主任一职。另有女记者杨刚（解放时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一手促成了《大公报》和王芸生留在大陆，后执掌过上海《大公报》，担任了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和改组后的《进步日报》党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政治活动家，先后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等职），虽是英文系学生，但与燕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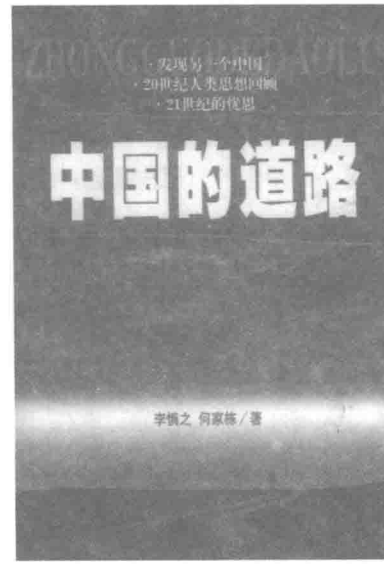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

新闻系埃德加·斯诺、萧乾等师生关系密切。——事实上，除了杨刚，今天学界所体认的《大公报》的自由主义，正主要体现于上述这些名记者、名编辑的文字与行事之中。50年代，上述人物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右派”，遭受厄运，这正可反证他们思想底色中涂抹不去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

由于自5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对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会学校进行了极其激烈甚至是粗暴的批判，教会大学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一定性下再无存在空间。在《杨刚文集》《萧乾研究资料》《朱启平通讯集》等编辑于80年代的著作及有关回忆录中，我们很少见到这些名记者对当年燕京母校的回忆与叙述（在唐振常先生晚年的怀人、自传等文字中，我们欣喜地读到一些篇什涉及旧年燕京），思想的影响与熏陶，被历史的忌讳抹去了可见的线索，被遮掩在粗线条的文字之下，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深入挖掘。倒是在1998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之际，出身燕大的知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中说：“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这种概括，可谓是一语中的。及至今日百年报庆之时，林放在《〈大公报〉与燕京学子情》（载《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一文中说：“回顾半个世纪多来，燕京学子和《大公报》如此密切的交往，源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

不卖、不私、不盲’，体现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所向往的是公正、平等的社会。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王芸生授意，萧乾执笔撰写的社论《自由主义信念》一文，可谓是‘大公报人’的‘燕京学子’思想融合的体现。此文周恩来总理阅后，曾评价说：‘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时，能不感奋。’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正是燕京新闻系学子愿意投奔‘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大公报》忘我工作之缘由。而《大公报》也愿为这批有着同一理想追求的学子，提供为他们展示自己智慧和才能的舞台，由此，共同铸就了不解的情结。”这种论断，更是对一种历史本相客观而又确切的评说。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

除了毕业生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供销”关系，燕大与《大公报》的另一种密切联系，就是许多知名《大公报》人曾到燕大任教。早在燕大新闻系创办之时，《大公报》就曾与焉。卢祺新在上述一文中语焉不详地说：“天津大公报的名发行人胡霖（政之），对燕大新闻系创设的成功，贡献极大。”30年代初，王芸生与曹谷冰等也曾到燕京登台为学子讲授新闻课程。1942年，燕大在国难中迁至成都，聘蒋荫恩讲《新闻概论》与《采访写作》，他还曾任新闻系主任一职，对重振燕大新闻系贡献极大；聘《大公报》主笔张琴南讲新闻社论、编辑学，一直到50年代初期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大成都

校友会在《抗战期间迁蜀的燕京大学》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大公报》人对燕大新闻系的贡献："燕大成都时期，新闻系能够做出出色成绩，是和蒋荫恩先生的民主思想，以及他待人接物平易谦和的作风分不开的。蒋荫恩先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思想与才能。他始终不渝地强调新闻真实，要尊重事实，要客观公正，竭力培养学生独力思考、独立工作、千方百计采写独家新闻的坚强活动能力。"

还有一桩事也可以说反映了燕大与《大公报》关系之密切。1941 年美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将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这是中国现代新闻传媒获得的最高国际性荣誉。奖状中有云："该报自 1902 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而如前面所述，我们知道，密苏里新闻学院与燕大，有着互助合作的良好关系。

民间性报纸与教会大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有着比其他文化机构更多的免于政治干扰的自由。这使得稀薄而可贵的自由主义因子能够得以在那样的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培育。在文化剧变的现代史上，具有现代品格的媒体与高校、社团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思想关联互动型关系以激动潮流，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明显的如《新青年》与北大、《学衡》与南京高师、《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之间。同声相求、推波助澜的关系，使它们在一度因王纲解纽而相对开阔的时代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合力。燕大与《大公报》之间的思想牵系，值得中国现代新闻史、教育史及思想史研究者深入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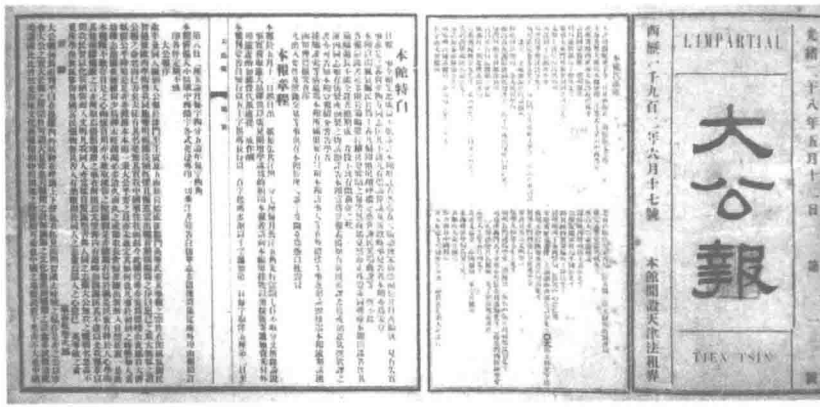
2002 年 11 月

自由之身与自由主义的一种底线

——漫说几位旧年的知识分子

从古至今，“大公”于中国人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1902 年 6 月 17 号，英敛之先生创办民间报纸《大公报》，在第一号“大公报序”中即鲜明精当地将“大公”释义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至 1926 年 9 月 1 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手《大公报》，将复刊的报纸改为“新记公司大公报”以示与旧报相区别，但报纸所具有的自由独立、忘己无私的精神仍得以延续不辍而光大发扬，并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有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大公报》创刊号

今天的思想史研究领域逐渐认同的一种看法，是把《大公报》人群体看作现代史上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将其言行喻为所谓的“比较公正的裁判”。至于具体论据，则多数以当时对立的政治两极对《大公报》既友好又冲突的态度来说明。如毛泽东与蒋介石双方势同水火，但都喜欢阅读《大公报》，而同时国共两党又都反对《大公报》奉行的“自由主义”旗帜；《大公报》自身呢，偏偏置双方毁誉于不顾，而只是中道而行，宠辱不惊地奉行独立民间报纸之职责，对双方的借重都不以为喜，且对双方的政治都有所责难与批评。再如《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逝世，国共两党都对他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这在两极对立的政治情境中是很少见的。这些情节，确实能深层地折射出《大公报》人作为“第三种力量”的自由主义品格。《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王芝琛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一书，对此也多有论及。但令我这个普通的文史爱好者感慨的是，在“重回历史现场”的心绪中走近《大公报》同人及报史，我甚至以为，要说明王芸生、张季鸾等旧年报人对自由主义立场的坚持，也许不需要深入审视这张报纸在沉浮胜败的种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之术；不必去研究一些曾经引起极大反响的著名文章，如《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看重庆、念中原》《自由主义的信念》等，而只要看看报纸的几个灵魂人物在个人进退出处这一问题上所体现出的自律原则——比如对报人之身不入党、不从政之原则的坚持——就可以见出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与风范。如果说，在两极对立的复杂政治环境中，能做到中道而行、不偏不袒而唯报人良心、知识分子担当这一境界是一个自由主义报人之上线的话，那么报人之身不入党派、不从政之原则，则可谓一

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底线之一。做到上线诚然极难，但即便只能坚持底线，又何尝容易？！

《老照片》杂志在其总第十二辑头条刊出了刘自立先生的文章《大公风云录》，于《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倡扬有加，杂志主编冯克力先生在“书末感言”中对此多有同感。而谷鸣先生在第十四辑上提出异议：“在激荡复杂的近代中国，难以有完全超脱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例如‘不党’，1935 年吴鼎昌出任‘名流内阁’的实业部长，1937 年张季鸾参与陶德曼调停和以后的谋和活动，1947 年胡政之参加蒋记国大，这都是‘有党’。”对此异议，王芝琛在《百年沧桑》中逐条谈了自己的看法。据王芸生、曹谷冰写的《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载，1926 年，吴、胡、张三人接办报纸时，就曾“约定五事”，其中第二条即是“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后来《大公报》将其推广到一般社员，皆不得兼任社外的有给职务。《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第三条规定：“创办人及在本社服务不兼任社外有给职务者为社员。”1943 年胡政之宣布了一个《大公报同人公约》，其中第三条为：“本社职员不得兼任社外有给职务，并不得经营抵触本社利益或影响社誉之业务。”《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写于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其中对报人群体当年所矢志追求者多有违心的否定，对这种违心之论王芸生在晚年亦颇为悔恨，但文章所写的当年报人的具体做法，大体是实录。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其后三人都坚持了报人不兼公职这一点。王芝琛介绍，1935 年 12 月，吴鼎昌一担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即在当月 13 号的《大公报》上刊出启事，通告董事会照准吴辞去报社社长之职，履行三人不兼任公职的约定。吴辞职后，即不再插手报社社务。新记大公报社评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大公报》副社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 1986 年在《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中回忆说，吴辞职后不再过问《大公报》

的方针及人事经营。“抗战期间，1941 年 3 月间，我在赴重庆路过贵州，见过吴鼎昌。当时他是贵州省政府主席。我跟他作过很长一席谈话，吴鼎昌没有一句触及《大公报》的事，就是说对《大公报》的工作，没有给过我一句话‘指示’。”王芸生在临终前也曾追忆，自己在担任总编辑后，在与吴鼎昌仅有的一次单独会面中，吴也“从来不涉及《大公报》”。1937 年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议和”条件，诱使蒋介石订立城下之盟。蒋请张季鸾亦参与“谈判”，但张在谈判尚未结束就愤而退出。他发表于汉口版《大公报》的《最低调的和战论》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该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议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至于胡政之参加“蒋记国大”，情况似乎稍为复杂一些。在中共与民盟皆拒绝参加“国大”的情况下，蒋介石威逼部分党外人士参加，他在南京召见了胡政之。陪同在座的傅斯年说：“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国家走，还是跟共产党走，今天该决定了。”没有退路的胡政之只好跑到签到处报到，但没有参加一分钟会议。在《大公报》社评议会上他颤抖地对同人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希望你们理解我的苦衷，参加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当时周恩来在文章中就胡的遭遇为例，揭露蒋“套住”无党派人士的无耻做法。文章还被收录于《周恩来选集》。王芝琛以“同情之了解”的史家精神，来叙历史之事实，使后人清楚地看到当年报人坚持不入党、不从政原则的艰难与可贵。

读到这里，我记起谢泳先生一篇写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文章《蒋梦麟的一件旧事》，所记与《大公报》诸公所奉行者相仿佛。手上刚好有谢泳《教授当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一书，遂找到重看了一遍。1945 年，时任北大校

长（时为西南联大常委）的蒋梦麟，进入政府担任行政院院长时，没有立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这在当时让很大一批教授颇有意见。因为1929年在蒋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国民政府曾颁布过一个《大学组织法》，其中规定“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1934年修改为“除担任本校教科外，不得兼任他职”。这个以教育独立为精神的法令，规定了教授专任制度，做官者是不能担任大学校长的。当时学界教授都以为，由胡适接替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一职较为合适，但当时仍为驻美大使的胡适认为蒋做官是特殊时期由政府征召的，只是暂局。议来议去，结果还是由胡适出任，只是在此前由傅斯年代理了一些日子。1945年10月19日，蒋向西南联大写了辞职信说：“谨启者：梦麟业已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所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兼职，自应一并解除，即希察照为荷。此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劝蒋辞职的人有他的好友傅斯年、朱家骅、江泽涵等人。谢泳文引用了江泽涵8月8日给胡适的信中所言：蒋梦麟“说骝先、孟真两先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任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他说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在江写信的前一天，北大教授茶会在昆明举行。会上蒋梦麟对身入政府而辞去校长一职，也很是不舍。我还注意到可稍补充谢文的是，当时的教授反对蒋一身二任，几乎到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江泽涵在14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梦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长，几全体不赞成。”傅斯年在10月17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昆明同人吵起来了。”傅去劝说，蒋一时“虽发一小气，事后甚好”，最后还是决定由胡适继任。汤用彤在9月6日给胡适的信中也提及：大家极推胡适返国担任校长，“此举用意并非对孟邻先生有所不满（其时亦未知校长将辞职）。至孟邻先生所以坚持辞职的缘故，实因‘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吏’之规条，乃其任校长时所手订。当蒋先生自渝返昆召集教授同人宣布辞意时，措辞极诚恳坚决，

同人悉闻之下，神志黯然，盖惜其去而知其不能留也”。许宝逯在9月22日给胡适的信中，要当时仍坚持由蒋梦麟担任校长的胡适理智考虑此事：“梦麟先生无论多理想，入了中委的头衔，就不免是自由之累了。”（以上见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适的日记》）可见当时的情形是，教授们对有办事之才的蒋梦麟离开教育界而身入政界这一“自由之累”都深表惋惜，但他们又都是接受过现代观念洗礼的知识分子，懂得法大于情的道理，因此最终还是坚持蒋必须辞职。

此后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也对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原则，做出了自律性的抉择。40年代蒋介石请胡适入政府。据傅斯年1947年2月4日给胡适的信说，1月5日，蒋介石请傅吃饭，问起胡适组党的事，傅回答没有再和胡适谈过。蒋说，可以请胡适再作考虑。傅斯年提出“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的主张。蒋介石提出要胡适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作为胡适当年的学生，深知老师坚决秉承自由主义立场的傅斯年立即代胡适拒绝：

我当力陈其不便：自大者言，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失效用；即如翁咏霓等，如不入党，不入政府，岂不更好？他说，并不请先生入党。我说，参加政府亦同……。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治观念极微）。如此谈了许久，我反复陈说其不便，他未放松。我答应写信通知先生，详述他这一番好意。

两天后，胡适就给傅回了信，其中分析：



1920年3月，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左起）在燕京大学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

蒋介石试图通过胡适的另一好友、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来说项。胡适仍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在2月22日给王世杰写信说：

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以上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3月17日胡适的日记记载：“我以为是‘放学了’，其实不然。今日雪艇奉命来谈，说，院长不要我做了。只要我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做无党无派的一个代表。我再三申说不可之意：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应以全力为之，不宜兼任。”3月18日的日记中又记：“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三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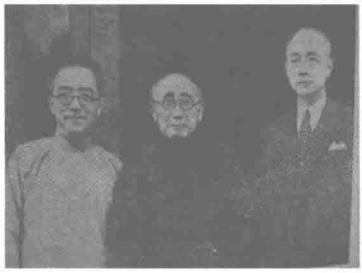
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已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此后蒋介石曾经有意请胡适参加总统大选，我们都知道其间经历了一番波折，但胡适最终还是没有参与。而且从具体情况看，这并不是胡适“不能为”，而是他最终坚持“不为”之故。

《大公报》新闻人群体与北大学人群体对自由之身的守护，在现代史上并非孤例。同样的精神我们可见之于以封建末世的进士身份与时俱进，奠定中国现代出版业基础的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张元济先生身上。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南下上海，从庙堂走向民间，埋头躬身于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此后，他多次拒绝孙家鼐、瞿鸿禨、熊希龄等晚清民国权臣希望他出任大学堂总办、外务部职事、民国教育总长等职务的邀请。张元济的深沉想法是，从事民营出版固然相对边缘，但可以让自己真正地与一些有着务实精神的民间人士合作开启民智，踏实地践行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在新旧过渡时代开创一番不朽的事业，而不必在封建官场徒耗年华。我此前曾经写过《张元济与胡适：有所不为方有所为》一文，来说明张元济疏离官场自处民间、维护思想独立、以实业立身救国的情怀。

尽管在近现代的政治舞台上，如蒋梦麟、丁文江、翁文灏等先生一度有过书生出山从政仕宦的经历，但在以胡适为灵魂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都有一种坚定深沉的想法，就是希望保持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之身，不为政治势力支配、束缚自己的个体自由。民国时代，大学、报馆、出版社、研究所等文化机构，逐渐在“政学分途”的现代大趋势中从政治的附庸中游离出来，都把成为超脱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力量作为一种追求的方向。最明显的就是教育界，甚至形成瞩目一时的“教育独立”思潮。直到 1937 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他还老调重弹，支

持蔡元培先生1922年提出的《教育独立议》。胡适阐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的首条含义就是：“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借用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说法，就是努力在“势”之外保持一种“道”的尊严。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权力与体制，普遍保持着一种深刻的怀疑与警惕。这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健康人格在政治上一度王纲解纽的现代语境中的初步生成。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那样一个政治力量暴烈的时代，就如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所说：“理性总是要退却的，它总是很少得到重视的。就像北极之光，它照亮了广袤的地域，但它自己却只能存在短暂的一瞬。理性是最后的努力，进步几乎难以抵达的顶峰：因而它又是强大的，但它抵抗不住拳头。”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几乎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艰难逼仄的抉择。但唯其难能，则更见出其可贵。抗战初期，陈诚在武汉组织政治部，他邀请王芸生出任第三厅厅长。王说：“我信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我头上戴了新闻记者这个帽子，就看不见别的了。”陈许诺不要他办公，只要他推荐一个副处长，王也没答应。后来陈又送来一个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聘书，允许王不上班能拿三百元津贴，王还是将聘书退回。这说明王芸生对于十余年前目睹“四一二”政变的鲜血，而决心“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与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转引自甘竞存《一代报业宗匠王芸生》，刊《文史精华》2001年第8期）的想法，是出言必行、许诺必践的。

关于民国前后的知识分子，时下人们依旧在萌生了自由主义传统还是“主义之不存，遑论传统”问题上争论不休。作为一种思想，自由主义有其复杂的内容，如宽容与尊重异见的精神，如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价值观，等等。



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后：胡适、张元济、朱家骅（左起）

但它更是立足于一种常识性的认识之上，那就是以个体性的自由之身而做到“中道而行”。如果说那个时代萌生了自由主义精神的话，那么王芸生、胡政之、张季鸾、蒋梦麟、胡适、张元济们对独立自由之身的守护，可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深刻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精神。自由主义“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在现代史上也曾经引起过一场不小的争论。这其中当然也蕴含着复杂的理论。但作为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我是赞成后者的。我们大可不必把一些类似于常识的事情过于理论化、复杂化，更重要的是看其在个体的层面上践行担当。就像上面提及的这些知识分子，不管是由于出洋留学所得异域现代思想之熏陶，或是承传本土传统思想而能别开新境，他们内心对自由主义大都有着一种深刻的了解与坚定的信念；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个人的进退出处这样一种底线性的事情上做到了自己的坚持与践履。这是最不容易的事情。

2002 年 6 月 20 日

周海婴与王芝琛回忆父亲：豁显历史的真实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连续读到两本让自己多有感慨的新书：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萧关鸿主编“非凡书房”之一，2001）、王芝琛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中国工人出版社，丁东、扬生主编“学灯文丛”之一，2001）。将这两本书相提并论倒并非是由于自己平日随意泛览、“瓜蔓抄”式读书的坏习惯，而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相似，太容易让读者产生一丝由此及彼的联想：其一，两书作者与书中所写人物、事件，都有着一种家世的渊源：周海婴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是《大公报》总编辑、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的儿子。缘于与所论人事之间这种特殊关系，作者在耳濡目染之中对旧年人事有着一份感性的认识，于史实有着他人所无的切身体会。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原因，

伴随着父辈的名人身份而来的悲喜荣辱，就像一簇巨大的影子，一直深刻地影响后人的生活，使他们终生承受着一种别样的压力，同时也积淀了一种深沉的动力。六七十年岁月（两书作者皆已是七十岁上下）沧桑的淬砺，旧事新思，促使人多有触动，在此情绪中将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既可以说是作者个人化的芥末家事，更是对逝去的20世纪中国人所走过历史的一份重要缩影与写照。其二，两书作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界中人，更未承父辈志业。周海婴长期在广电部门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王芝琛则是专业的海军工程与计算机研究人员，两人与父辈所从事与担任的职业相去甚远，在社会上的影响较父辈也无法以道里计。逝世前一月，鲁迅给亲属留下的遗嘱第五条就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且介亭杂文末编·死》）；无独有偶，一向对儿女采取大撒手态度的王芸生，在1955年听说高中毕业的王芝琛打算报考文科，他非常生气并表示坚决反对，说儿子"不太懂事"（王芝琛《我的父亲母亲》，刊《老照片》第19辑）。传统中国一向多有文化世家的美丽风景，但在动荡多难的20世纪，来自政治的力量常常干扰着这种文化生态的形成与培育。这既有现代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原因，也有知识分子个人际遇的影响，鲁迅父子与王芸生父子的文化代际差异，多少折射出了其中的深沉消息。但正是因为与父辈保持着一定的专业距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两书作者所写既能避免局外人的隔膜之感，也没有时下学界专业研究者笔下常见的高蹈理论与积深成见。其三，两书所写内容，都具有浓郁的私人化叙述色彩，与流行的正史所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曾有的相关历史叙述的一种订正、核对甚至是颠覆。在此前，关于鲁迅先生，周海婴的母亲许广平女士曾经写下《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书；关于《大公报》，王芸生先生自己在60年代曾与《大公报》另一旧年同人曹谷冰先生合作，在《文

史资料选辑》上连载刊发过《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为文史界众所周知的是，由于特殊年代的政治干扰与环境影响，“左”的偏颇及其之下作者身不由己的扭曲，使上述著作的历史真实性都打了一定折扣。关于前者，尤其是《鲁迅回忆录》一书，鲁研界已多有指明。比如以考证见长的鲁迅研究学者朱正先生早在70年代末就出版过专题研究著作《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在后记中他以同情之理解说：许广平的著作“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误记失实的材料，不仅是因为年代久远产生的记忆上的误差，还有不能完全由她本人负责的原因”。此书直到前年仍印行了第三版——由这册小书的生命力，也足以折射出其间历史所受遮蔽程度之深。至于后者，王芸生先生本人在“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他自己，也对张（即大公报前总编辑张季鸾）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他自己也参加了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百年沧桑》，第75页）。而如今，世事沧桑，由儿子一代人来“重”说这些在历史的迷离镜像中亦真亦幻、或喜或悲的旧人旧事，真可谓是历史无情却又多情：豁显历史的真实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但历史永远在召唤着人们更大程度地趋近她的真实。

《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书腰上，印有一段广而告之的文字：“揭开父亲死因中的浓浓谜团；挑开兄弟反目的隐秘面纱；披露父亲身边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道出父亲与文坛敌友的恩恩怨怨；坦叙父亲逝后一家人的不平常岁月……”这些话或有出自出版社之手的炒作气息，但读罢掩卷，揆诸内文所叙，却也不得不感慨所言大体不虚。我们看到，书中既有近乎内幕揭秘式的新说（还有第一次公开的大量照片），如周海婴在书中提出怀疑：鲁迅的死可能与日本须藤医生有意拖延治疗的阴谋相关；如鲁迅之孙周令飞非常年代的跨海婚姻引发巨大风波时周家所受的冲击与压力；又有大出普通读者意料

的一些事情，如许广平逝世后一个月周家即被迫搬迁而顿时陷于贫病交困状况；再如周建人幼子周丰三血气方刚，对二伯父周作人附逆以死相谏而牺牲生命；再如困守在上海“孤岛”艰难度日时，昔日的朋友利用许广平的信任与商业上的缺乏经验而从出版《鲁迅全集》中渔利；等等。而贯穿全书的，更多是对周家寻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平实记录，如海婴幼时与鲁迅父子情深的嬉戏，父亲与朋友往来的场景，动荡播迁中的人世炎凉，家人的病痛悲欢，周氏兄弟的家庭成员，自己的婚姻与工作，母亲的生活与工作……在人们为应该“解构”/捍卫、“批判”/辩护鲁迅“这把老骨头”争论不休时，在处于所谓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鲁迅研究出现“过度阐释”甚至导致空洞化倾向时，今天的周海婴只是平心静气地以一些记忆深处的生活细节为材料，以自己个人化的感受与回味为黏合剂，还原、展示出了一幅关于鲁迅的丰富历史画面。当现代的读者早已为层出不穷、泥沙俱下的鲁迅研究著作产生阅读疲倦、心理反弹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出现，使我们更为真切地走进了历史的现场，以一种更为有血有肉——而不是任由抽象理论无情掩制——的方式，凸显出鲁迅作为一个巨大的思想资源库与今天的读者、时代之间的“历史—现实”关联性。值得一提的是，周海婴在回忆录末尾，又写下了“再说几句”一节，记述了一件令他“再三疑虑”的事情：1957 年毛泽东到上海，召集周谷城、罗稷南等湘籍人士座谈。众所周知，当时正值知识界“反右”，罗向毛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对此十分认真，他思考片刻后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罗当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说。此事乃 1996 年海婴应邀参加巴人研讨会时，亲聆罗稷南先生所言。周海婴一直没有对外人说过。写此书时他拜访王元化先生，王说他也听过此事，应当可以披露，不会对两位伟人产生影响。心怀疑虑、将此事写好又抽掉的周海婴才复将此



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

事补入。毛对鲁的认识，一般人知道的是1936年鲁迅去世时毛泽东说的那些话。其实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在以他的思想理解鲁迅。这两位终生缘悭一面的伟人之间的思想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零散的文章所见多矣，易严甚至为此写出厚厚的一册专著《毛泽东与鲁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周海婴写出的这件事，应该说对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角度。

相比之下，王芝琛所写下的《百年沧桑》，与周海婴的取径有所不同：对旧年人事，尽管作者有着一些“重回历史现场”的描写，但更追求的是对其进行学理性的深层探讨；有一些生活花絮式的细节刻画与再现，但更重视的是对其所体现之内在精神的朝圣与寻踪。这种不同，是作者所面对的不同研究现状而产生的。质言之，与汗牛充栋、叠床架屋以至于写出了数部《鲁迅研究学史》来进行总结的鲁迅研究相比，在20世纪上半叶风云际会的王芸生与《大公报》，在今天显得太过寂寞了。到目前为止，对这一影响深远的民间性报纸有分量的研究文章，也许就是王芝琛这本书中所收的那些了——这是要令许多专业的新闻史研究人员反省的。无可讳言的是，在今天我们看到，通行的新闻正史、教科书多是一些粗线条的历史勾勒与先入为主的概念图解。更说不过去的是，新闻史写作者对历史与旧年老报人，普遍缺乏史家陈寅恪所倡扬的“同情之理解”，也不具有另一史家钱穆先生认为研

究历史所必具的“温情与敬意”，因而相关著述整体面目可憎。即使是如范长江、邹韬奋等与时代合拍的新闻人物的传记，或者如一些至今仍意气风发、慷慨担当的报纸的报史，亦多难以卒读，遑论在天地玄黄中时感拘束以致晚年失语的王芸生，以及“仅剩下一个香港《大公报》延其命脉”（唐振常语）的《大公报》了。因此如果说我们对鲁迅先生有所误解多出于某一目的的神化与无限抬高，那么对王芸生与中国报刊史上坚持最久的《大公报》的误读，就更多来自于过度意识形态的蔽障和评价坐标的非历史化。就如史学家、旧年《大公报》人唐振常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议论大公报，是议论历史上的大公报，是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要纳入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去考虑去论断，脱离了历史的背景，甚而以今天的政策或所要求于今日报纸者，去作论断，去要求一个历史上的报纸，不是唯物史观，是反科学的。这样，也就不能从历史中求史识。”《百年沧桑》所体现的，正是以这样一种科学的历史唯物论精神，来对王芸生进行真实写照，更对其所代表的旧年新闻人与旧年报刊予以公正之研究与评价。如后来一直纠缠着《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与“大骂”之争，王芝琛深刻地指出说：只有认清《大公报》是否是真正的民间报纸，才能打破这种争论的僵局，否则只能在“阶级分析”的框子里“打转转”。又如《大公报》于世事风云中是否做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自己倡扬的“四不”方针，一直有争论。谷鸣先生在第14辑《老照片》提出异议：“在激荡复杂的近代中国，难以有完全超脱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例如‘不党’，1935年吴鼎昌出任‘名流内阁’的实业部长，1937年张季鸾参与陶德曼调停和以后的谋和活动，1947年胡政之参加蒋记国大，这都是‘有党’。”对此王芝琛逐条谈了自己看法。1926年，吴、胡、张三人接办报纸时，“约定五事”的第二条即是“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后来《大公报》将其推广

到一般社员，皆不得兼任社外的有给职务。《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第三条规定："创办人及在本社服务不兼任社外有给职务者为社员。"1943年胡宣布《大公报同人公约》，其中第三条为："本社职员不得兼任社外有给职务，并不得经营抵触本社利益或影响社誉之业务。"事实上其后三人都坚持了报人不兼公职这一点。1935年12月，吴鼎昌一担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即在当月13号的《大公报》上刊出启事，通告董事会照准吴辞去报社社长之职。吴辞职后，即不再插手报社社务。新记大公报社评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大公报》副社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1986年在《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中回忆说，吴辞职后不再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抗战期间，1941年3月间，我在赴重庆路过贵州，见过吴鼎昌。当时他是贵州省政府主席。我跟他作过很长一席谈话，吴鼎昌没有一句触及《大公报》的事，就是说对《大公报》的工作，没有给过我一句话'指示'。"王芸生临终前也曾追忆，自己担任总编辑后，在与吴仅有的一次单独会面中，吴也"从来不涉及《大公报》"。1937年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议和"条件，诱使蒋介石订立城下之盟。蒋请张季鸾亦参与"谈判"，但张在谈判尚未结束就愤而退出。他发表于汉口版《大公报》的《最低调的和战论》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该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议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至于胡政之参加"蒋记国大"，情况似乎稍微复杂一些。在中共与民盟皆拒绝参加"国大"的情况下，蒋介石威逼部分党外人士参加，他在南京召见了胡政之。陪同在座的傅斯年说："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国家走，还是跟共产党走，今天该决定了。"没有退路的胡只好跑到签到处报到，但没有参加一分钟会议。在《大公报》社评议会上他颤抖地对同人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

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希望你们理解我的苦衷，参加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当时周恩来在文章中就以胡政之为例说明蒋“套住”无党派人士的无耻做法。王芝琛的这番议论，毫不高调，亦不作苛论，而是通达明晰，以同情之了解来叙历史之事实。再如范长江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离开《大公报》，王芝琛分析认为，仅是因为他与张季鸾一次关于上夜班是否影响健康的偶发事件而已，而不存在如后人所怀疑的思想冲突、政治分歧；如后者种种，都是立异以为高之说。再如多种著述中所说《大公报》1948 年年底从中立立场转向拥共为“起义”事，王芝琛通过《“起义”云乎哉》正续两篇文章剖析认为，那只是个人出于政治需要的一种历史虚构，在报纸抉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记者杨刚，并不是想象的来“策反”《大公报》的“党代表”，王芸生也不是从反动营垒中反戈的“首领”，中共中央也并无《大公报》“起义”一说。除了上述这类求真求实的文字，《百年沧桑》的“人物篇”“事件篇”“花絮篇”等还多有一些笔墨，描画出了《大公报》当年“座中多是豪英”的盛景，以及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文章报国”的情怀。人物如一身“国士精神”的张季鸾，女报人杨刚与彭子冈等；事件则如《大公报》在台儿庄战役、重庆谈判、日本投降等重大历史时刻的新闻记录作用，抗战中在中文报刊中唯一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的辉煌，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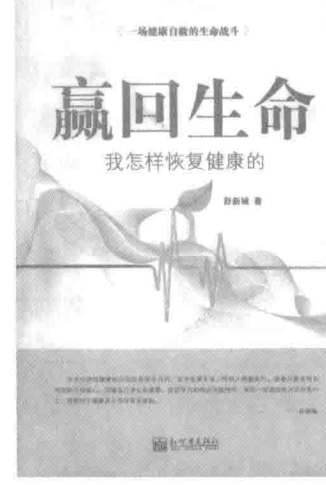
不可否认，在读由书中所涉及人物的家属或后人撰写的许多文字时，我总是下意识地保持着一个读者的警惕。因为与所论内容的亲缘关系，固然可以使其较其他研究者有着更翔实之史料与更真切之感受，但也易因为情感作祟而陷于扬长护短之偏执，使历史的真相受到另一种非正常力量的遮蔽与改写。近些年在关于一些近现代学人的研究中，我们见到不少来自学者家属后人方面的因素总在不同程度地干预着学术的进行，如撰写年谱要恰到好处，整理日记要修改删节，传记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读三联版《川上集》，我们

知道连唐振常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写《吴虞研究》都还遇到这样的问题，遑论一般的研究者），如此之类，不一而足。更何况是由作为后人的周海婴、王芝琛自己执笔来写历史人、事，意味着可能有着更多的感情色彩与意气用事。但就《鲁迅与我七十年》和《百年沧桑》两书而言，无论是如前者之平实朴素，或如后者之于翔实生动之外而又有征实求真之品格，我们都欣慰地看到了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鲁迅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刚刚过去，而明年则是《大公报》创刊百年纪念。历史实在太容易让人感觉老去——就在说来不算太远的视野中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生活过的一些人物，就需要我们如此费心来铭记与梳理；而历史又似乎根本不老：她永远保持着一种期待着后人参与理解她的开放精神。每一辈人都在尽力摆脱自己身上的种种负累，而豁显一些被遮蔽的部分，从而极大可能地走向历史的真实。自然，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每一代人笔下的历史是否真正真实，也未可知。但我们知道，一旦站在她的面前拿起笔来剖析与理解她，需要的也许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而首要的是一种诚实与良知，一种平实的姿态，一种求真的品格。

2001 年 11 月

舒新城：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我从不问津坊间铺天盖地的养生书。有一次逛书店，邂逅《赢回生命——我怎样恢复健康的》一书（新世界出版社，2010）。封面做得有些俗滥，书腰缀以“一本科学养生的神奇之书”“国内第一部严格依照现代医学的养生名作”之类夸张的广告词。让我讶异的是，作者竟是舒新城——作为一个对出版史有些兴趣的编辑，“舒新城”这个名字我不陌生：民国的出版家与教育家，“中国文化长城”《辞海》的主编，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经常翻读参考其《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但老天，我却从未听过他写过一册《赢回生命》！回来核查，才惭愧自己的寡陋。此书确实并非伪书、托名之作，且早在1947、1950年就由中华书局出过多版；早在湖南从事教育工作时，舒先生就研究编译过多种教育心理学著作，关注人的健康问题；他还写过《健康与人生》《饮食与健康》《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等多种“养生书”。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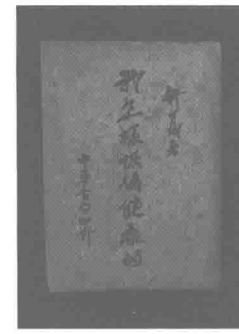
新版《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舒新城

这册《赢回生命》原名《我怎样恢复健康的》。旧书新版时编辑移正作副，再替舒先生补取了个正书名——这种自作主张、大动斧钺的编辑风格，不仅抹杀了著作的本相，也未见有助于促销，实在算不上明智之举。

舒新城先生年轻时，仆仆奔走于教育试验与改革；1930 年出任中华编辑所所长后，原先那种书斋式的个人著述生活，为公司事务性的“簿书”工作取代，劳累过度，积年疲苦，导致一度百病丛生，胃呆、便秘、唇舌溃烂、失眠、高热、风湿、头晕……他住院多次，形容枯槁，面如死灰，不仅不能满意于自己的工作欲与求知欲，了无生人之乐，彷徨于生死之间，甚至因感于医药无灵，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深刻反思之下，舒新城意识到人皆恋生，一方面出于无限的自觉创造性，即追求自我实现；一方面是自我扩展到社会和相关的人，即牵挂自己的现实责任。前者，舒先生欲以著作实现教育理想；后者，则最为关切家人和同道朋友。“我在百病丛生的情况下，自身的生活尚要他人扶持，更何能说写作、说理想、说事业。至于学问上、道义上、事业上的朋友，虽然情意间有种种相需的地方，但彼此生活独立，一旦死去，不过给他们记忆上留下一些阴影而已。”生固足乐，死亦何悲，最苦的是死既不能、生无可乐的“带病延年”。舒先生意识到，既不能死，便当乐生，必先求健康，转而以死之心境追求生之健康。他反思后得出结论：“疾病是生活错误的惩罚，我以前在生活上所犯的错误自然很多，错误之由是无知，其责任应该完全由自己负担。”坐而言不若起而行，舒新城痛定思痛，下数年苦功，自学生理卫生、医药、营养学、保健等现代知识，反思自身生活方式、保健知识的错误无知，并严格实践，最终恢复了健康。三折肱而成良医，1945 年他应上海《大公报》之邀，撰写恢复健康的经验谈；随后又在《新中华》半月刊执笔答复读者来信，主持《健康通讯》专栏，最后汇合成书《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舒新城《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在这册小书中，舒新城首先反思了自己对健康常识的错误认识，包括把各种器官看作独立的结构、把健康的一切责任完全推给医师、误解营养、忽视排泄、误解运动和休息、身体一元观而不是身心平行论等。由此，他既从具体方法上教人如何吃饭、食补、清洁、运动和休息、调节情绪，更在精神上教人破我执、透生死、建立理想人生、面对现实运用理智平衡情绪。他以自身经验嚼饭哺人，倡导以克制力、恒心践行饮食起居，达致健康。在现代医学的视野中，关于“健康”的定义林林总总。舒先生在《怎样才算是健康》一文中的观点通达而平实：

> 就个人讲，在日常生活中，心身各部机能与器官能和谐地工作，而不觉得有任何阻碍的人方是健康的人。就民族讲，是每一国民都够健康水准，而能活泼愉快地发挥其工作的效能，消极方面不多消费于疾病医药之费，积极方面能增加生产，增加国富；同时全体的平均寿命能加长，而种性又能加优，这样的民族方是健康的民族。假若你健康，不问你职业是什么，只问你职业上的工作是一般人能负担，你也一样能负担，而在工作的时候，你虽然用你的手工作，用你的脑思想，但绝不觉得是在用手用脑；同时对工作感觉愉快，工作后不觉得疲劳，散工之后还有兴致去做适当的娱乐，到夜间倒在床上便睡着，天亮起来更精神，这样的健康状态方合乎个人健康的标准。

这与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健康”的定义时所说“一个人只有在躯体、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四个方面都健康，才算完全健康”暗合。舒先生特意写有《精神健康》一章，说明精神与身体的健康之密切关系。他对自己以心理学、道德学、美学、哲学与社会学等种种修养处理精神问题的经验，娓娓而谈。其所论者，往往有纯医学者所缺乏的通达与人性化角度。如谈到

人事毁誉所带来的无谓苦痛，值得录出：

我从遗传学与心理学的常识上知道隔膜是人生所不可避免的：他人之不能完全理解我，也和我不能完全理解他人一样。我唯有尽其在我，为个人，为家庭，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努力。努力而无成固然属当然，有成就亦甚渺小，因为世界太大了，我在其中真是渺沧海之一粟，此一粟或被鸟食，或沉海底，或被冲至泥土而成种子，全看当时当地的环境而然。此一粟被鸟食或沉海底固然可以看作无所成就，但它已尽其应尽的责任，其本身应无所怨尤；若飘与泥土接近而成种子，算是有成就，也不是完全由此一粟本身之力，而为此时此地的环境所促成。他人能欣赏固好，不能欣赏也无所损于种子的价值。因此，我对于小麻烦不重视，更不附无谓的主观的解释，而把人类的隔膜看作仇恨，人类的温情解作怨尤。我唯求尽其在我，努力于应作、能做的工作；我唯求在工作中过生活，以工作坚定我的意志，安定我的精神。我的精神安定了，健康也受其利益。

如此理解，既无学究气，亦无阿Q味，分明有民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而通达不滞、“治事深入社会，修己超脱社会”的人生态度，对于为他人作嫁衣裳、倡导奉献精神的编辑群体来说尤其有针对性。常常伤感于知识分子因健康而早逝的消息。记得学者型书店经理刘苏里在2010年非虚构类图书阅读报告中向年度出色作者致敬，特别提到与病魔缠斗的高华、早逝的蔡定剑、致命疾病缠身的朱维铮三位先生，贡献出了《革命年代》《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重读近代史》等年度力作，听来固然令人动容，也令人中夜伤怀。知识分子当然也是常人，无法免却生老病死；但似乎又很遗憾，与强大的内心建设与精神超越相比，知识分子对肉体的关怀似乎总是不尽如人意，无法双美并具，

反而经常顾此失彼，疾病很容易就摧毁了他们所孜孜营建的精神高地，留给同道与社会无尽的哀思。虽说精神不朽无疑是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但如果立言者能够以更加健康的方式立身处世，我们当然可以更多地、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家人、朋友，贡献于社会。从历史来看，古代的读书人虽说绝对寿命无法与今人相比，但他们似乎拥有更为健全的养生知识、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更为达观的生死态度；巫医史一家的人文传统，断而不绝，使古代士子能更为全面地关怀自己。在黄帝、张仲景、华佗、李时珍等统系外，我们见过识苏东坡、李渔等人博物通医的摄生修养。民国文人身上，还有此种远古遗风。而今“道术已为天下裂”，读书人多撑着“学者”的招牌满足于所谓的“专业”而对基本的人文修养置之不问；且因为过于相信并依赖现代医学，而日益失去自我的健康调适能力，沦为一种“单向度的人”。虽说当代人有得益于现代医学的福分，但放弃自身的调适与努力，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人生的迷途，值得反思。

细读舒先生这位旧年出版家的养生书，固然缘于他是一位令人佩服的出版家，但我更不否认自己潜意识中的当下关怀。在“现代性”的职业环境中，编辑职业所惯常承受的电脑辐射、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眩晕头痛、颈椎病、背酸头重、身心透支等所导致的躯体化强迫症状、器质性疾病，日益加剧；加之生活方式缺乏规律，忽视体育锻炼，亚健康大面积存在。而尤其是在步入出版业“后转制时代”的今天，体制改革引发身份焦虑，市场原则造成了文化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创新冲动导致挫败心理，技术应用带来观念革新……这一切出版转制、人事改革、创新发展等新变，都给处于转型期的出版人带来了程度不等的心理健康问题。这种职业挑战，甚至过于当年舒新城先生所处的东西方冲突、救亡与启蒙纠结的时代。当下，行业名为出版，却形同工地，有转型，多折腾；无安静，失从容。在由利润、码洋等构成的生存网之下，

出版人坐立难安，疲于奔命，魂不附体，焦虑丛生，心理障碍、人际关系问题、职业倦怠、心理疲劳等心理问题严峻凸显，迫切期待缓解调适。日前有一位编辑在微博上发表一副对联，引发行业中人广泛共鸣："一名记者两部手机三餐不定只为四千工资弄得五脏俱伤虽已六神无主却还得七点起床八点上班找九个选题十分辛苦；十年编辑久坐案头八方约稿需要七窍玲珑即便六亲不走五官老矣但仍要四体勤快三审校稿为两个铜钿一生清贫。"在这种情境中，对"阶段性发作，持续性紧张"的编辑群体来说，传统的课间操、养花浇水、远眺、闭目养神等保健术固然需要坚持与倡导，职业疲劳的缓解、内心幸福感的寻求、自我健康的调适更为急迫。出版人亟须在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指数、工作效率、个人素质等方面加以注重，培养编辑的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生态度、积极人格等，提高健康知识、健康意识和健康能力等"健商"。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了编辑出版界的重视。近年，"广东省部分科技期刊编辑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河南省编辑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和"高校学报编辑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等实证调查大量践行；学界甚至提出了编辑心理健康论。当下中华书局正在举行各种百年纪念活动。除了出版功业，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身心关怀方面的修养与努力也值得我们关注。"句酌字斟还未妥，案头积稿又成垛"，在匆促的职业生活中，读读舒新城前辈的"养生书"，今天的出版人不妨稍慢下脚步问问自己：我们病了吗？我们如何恢复健康？

2012 年 8 月

韦君宜的思痛录：编辑的忏悔与价值守护

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增订纪念版《思痛录》，我又忍不住重读了一遍出版家、作家韦君宜的这本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的反思之书。与此前广为流传的“百年人生丛书”本淡灰色的封面相比，增订版封面深黑，和著作孤愤忧思的品格更为契合。这次我才注意到其中有一节，名叫“编辑的忏悔”。和前后几节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作者“文革”中对编辑角色、编辑价值的思考与反省。

1973 年，韦君宜从流放地咸宁“五七”干校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社领导之一分管组稿出书。在动辄得咎的畸形政治化情境中，韦君宜打定主意不再发表片言只字，自觉泯灭自己的作家身份；但在出版工作中，她却逃不开自己要面对的思想痛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原则与艺术水准的夹缝中，编辑经常面临放弃自己的精神高地与人格尊严的考验。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但当时政治上可靠的作者只有工农兵。因为“由工农兵当家做主人”，当然要由工农兵为主写稿子。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还要经



韦君宜《思痛录》（增订纪念版）

受“革命派”的审查，编辑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平时接到许多词句不通、无法卒读的稿子，韦君宜习惯说：“这没法出书。”驻社的军代表马上教训她：“出书有什么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育人！把这些学习写作的工农培养成人，不能只看出书这样小的目标！”编辑经常被安排去外地取经，比如去以《虹桥作战史》出名的上海。取回来的经是“不要提篮买菜，而要自己种菜”，就是说，不要经常出去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边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冲动，只要编辑拿着上级发下的“菜籽”来“捏咕成菜”就行。刚从干校回来时，先回来的“革命派”就告诉韦君宜：今后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题材和作者，然后编辑和作者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反复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这就是流行的“三结合”创作方法（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要命的是，“工农兵作家”往往无能为力，只能委屈编辑来处理。实际上是工农兵写了头遍，“一般由编辑重写二遍，能剩下三五句就算好的了”。编辑的任务，就是把着他们的手，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作为这种政治性一体化文学生产线上一环的编辑，韦君宜们就像木偶，只能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大连造船厂轮船下水庆典，出版社派韦君宜去学习，凭着常识她发现用千斤顶把没有机器的空壳顶下水去，实在是一种荒谬的表演。厂里的工人作者，要把工人在学“哲学”的道路上如何当家做主的过程描写出来，努力憋了几万字，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作为编辑，韦君宜本想告诉他停止这种无效劳动。但是，想到这是政治任务，她只得含糊应付过去。编出的故事是否有艺术性不论，最重要的是内容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让人费尽脑筋。农业题材，农民积极分子自己制作了一台拖拉机，非得写“走资派”暗中破坏。作者根本没见过破坏拖拉机。韦君宜带着作者到农场“深入生活”，请拖拉机队长讲破坏的“窍门”。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浩然作品《金光大道》，韦君宜担

任第二卷的责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的一位造反派，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尽管与抗美援朝无关，浩然还是只得在四五页稿子上每页均加上"抗美援朝"，小标题《堵挡》《让房》分别改成战斗性十足的《阻击》《让房破阴谋》。奉派去延安组织插队青年写歌颂小说，要找出一个地主来作斗争对象。土改之后，地主早就没了，韦君宜提出可以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但指导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够尖锐。只好把这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的。最后要写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的情节。作者说从未见过水闸，就领着去参观并讲解。作者私下表示不愿意"让女主人公去和那个老地主在水里肉搏"，但还是在开会"集体创作"中通过。韦君宜说："我也屈从了。天，我干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情况多了，韦君宜渐成习惯，"好似看那些诬陷别人的刀笔吏的讼状，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是有一点难过之处，就是我自己必须参加帮忙制造这种刀笔吏的讼状"。韦君宜联想到一起投身革命而被当作"隐藏的坏人""反革命"等遭到"肃反"的多位大学同学，深知现实中这些精英所蒙受的"莫须有"的罪名，就像自己现在所编小说中捏造坏蛋一样，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诬陷。自己参加革命，是认定其中有救国的真理；搞文学，是相信文学可以反映革命可歌可泣的生活。而现在，自己只能执行着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编造谎话，"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清夜扪心自问，她的内心无法安宁。

尽管不断有着违心之感，但直到"文革"后期，韦君宜才真正在良知的驱动下有所抗议，迷失的编辑身份才开始回归。一本写小学生暑假抓搞破坏的地主的书，孩子满嘴"阶级斗争"，韦君宜不赞成出版。军代表说她无权推翻他终审的稿子。韦君宜指着原稿中"我们要一枪两眼，把邓小平打个透心凉"这样的"革命语言"表示抗议："你们不是要'育人'吗？育这种人，

专门要替他出书，育的什么东西？”书，终于没有出。1983 年，韦君宜将她的工作文字结集为《老编辑手记》出版，特意收录她在“文革”末期为两部政治小说退稿所写的审稿札记。退稿的原因，除了大量令人哭笑不得的细节，根本的问题是对革命和历史的无端想象、胡乱编造，让韦君宜实在无法忍受。她在后记中说，十年浩劫中的编辑工作，对自己是巨大的折磨。把编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与自己的抗争写出来，就是想让年轻的编辑了解，在非常的政治环境下，编辑曾遇到过一些什么问题，而作为一名编辑又该怎么办，“让我们记住这一页历史，想想怎么样才能制止它的再现”。

说起来，韦君宜对编辑身份与价值的守护，亦曾经历了长时间的反复与迷途。1954 年，由团中央转岗而来的她受命主编中国作协《文艺学习》时，这位早年在自由主义气息的清华园中编辑过《清华周刊》的知识女性，经过在延安主编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养成了注重政治性、教育性的自觉意识、党性原则，以至于时任人文社社长的冯雪峰直接批评她不要把《文艺学习》办成了《中国青年》，“你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文艺的东西”。而她的下属、作家黄秋耘若干年后在访谈录《文学路上六十年》中说，当时的韦君宜是一个“正统的教条主义者”。难能可贵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最终促发了她的思考与觉醒。1957 年昙花一现的政治“小阳春”，因为在刊物上开展《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大讨论，体现出“干预生活”的编辑精神思想，以及帮着“丁、陈反党集团”说几句公道话，她差点被打成“右派”。历经“文革”的折磨，等到 1980 年代回归常轨，她一旦有机会主持人文社，即顶着风险推出反思历史、为现实改革鼓与呼的现实主义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沉重的翅膀》《芙蓉镇》等一批名作。归根到底，韦君宜与纯粹的编辑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她编辑、作家、革命者三者合一的身份，使她的编辑工作有着深刻的现实意识与历史感。在革命占主流的 20 世纪，韦君宜不断



《韦君宜文集》

地承受着政治与文化间的冲突与纠结，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作为真诚的革命者追求民主自由的思考，始终自觉将编辑工作放在反思历史、改变现实的高度上。

在“后文革”时代，关于是否需要忏悔、是否有权要求他人忏悔，一直是知识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直到最近，“文革”中曾经充当红卫兵的“红二代”公开表示道歉与忏悔，仍然成为一个轰动的公共性话题。记得 1990 年代，新闻学者陈力丹曾经写过一篇《新闻学需要忏悔意识》。文章回顾了在 1975 年这个过渡性的岁月，二十四岁的他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中，受命编写新闻理论教材，用流行的政治观念强调“把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办成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而奋斗”的经历，对自己当年的学术迷途作出反省。韦君宜曾沉痛地说，与“文革”中借机会登台出乖露丑的角色相比，“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今天，《思痛录》成了一本了解当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和理解中国革命的必读书，更值得每一位编辑阅读。说起来其中并无太多关于编辑技巧一类的内容，但真实地记录了出版人在特定时代中的扭曲与抗争、迷失与回归，记录了出版人最需要呼唤的良知与风骨。在政治走上常轨且日渐“祛魅”的今天，编辑不再会在变态的政治环境中面临着荒唐的灵魂折磨。但是，如何葆有足够的社会现实感，尤其是防止可能滑向唯利是图的商业性迷失，始终在考验着这个时代编辑的定力与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编辑仍然时时需要忏悔与反思。

2014 年 4 月 10 日

从萧也牧到吴小武

萧也牧是谁？吴小武又是谁？估计前者还有不少文学圈中人听闻过；而后者，知道的人就极少了。事实上，这是同一个人。



萧也牧

从1950年代开始日益峻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第一桩就是1951年批判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当年6月25日的《文艺报》发表“读者李定中”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认为小说从头到尾都在以一种轻浮的态度玩弄工人身份的女主人公，“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来信将作者定性为“最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敌对阶级”。多年后公布的材料表明，所谓“读者李定中”，实际上是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作家冯雪峰。两个月后，再由主编丁玲出手发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批评小说拥护小资产阶级趣味，反对毛泽东倡导的工农兵方向和人民的现实主义文艺。如此来势汹汹上纲上线，原来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小说作者萧也牧，

很快就被发配到属下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不再写作，也就不能再用笔名“萧也牧”，而恢复原名“吴小武”。从萧也牧到吴小武，这种命名的被剥夺，既意味着他从作家到编辑的身份转换，也是他从著名到“失语”的生存境况的转换。

说萧也牧“著名”，不是一种虚誉。《我们夫妇之间》这部城市日常生活题材的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被公认为1949年后首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广受读者喜欢，很快被改编为连环画、话剧、电影等。更不用说他还多有其他小说如《锻炼》等作品了。而用“失语”来形容吴小武在中青社的编辑生涯，肯定不大妥当。事实上一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吴小武和出版社同道一起，创造了中国红色经典编辑出版史上的奇迹：推出了“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李自成》《烈火金刚》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红旗飘飘》丛刊，培养了刘绍棠、高玉宝、白桦、公刘、浩然、流沙河等大批青年作家，这一辉煌至今仍是当代文学史、编辑史研究的话题。不过从创作权被剥夺这个角度来说，萧也牧的“失语”也是一种写实。王蒙在《萧也牧——一个甘于沉默的人》中回忆，当年刚满二十岁的自己怀着敬畏之感把处女作《青春万岁》初稿送到中青社。当得知接待自己的吴小武就是鼎鼎大名的萧也牧时，王蒙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感。“一个作家而多年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其可怜与可悲，即使幼稚如当时的我，也是完全明白的。”

编辑的角色一向容易被湮没与忘却。目前关于萧也牧最好的传记《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出自曾同为编辑的作家石湾之手。其中的一些片段，对萧也牧/吴小武之间身份变换导致的人生影响，读来令人唏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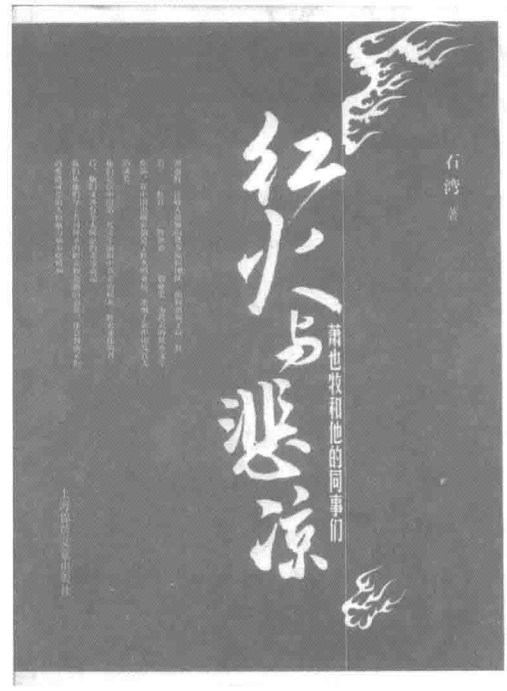
1954年初夏调入中青社的年轻编辑王立道，在见到萧也牧之前就是萧的

作品迷。他千方百计地寻找萧的作品来读，“就像一个固执的孩子，在夜里追寻蟋蟀的歌声，不达目的，总难罢手”。王立道尊奉萧也牧为自己“精神的导师、神交的密友”，但是，他竟不知与自己在编辑室朝夕相处的副主任吴小武，就是他仰慕已久的萧也牧。有一次同去巡阅东安市场旧书摊，吴小武问他喜欢看谁的作品。王立道说，现代的是鲁迅，当代的是丁玲和萧也牧。吴认真地对他说：丁玲的书要多看，还可以看看赵树理和马烽他们的小说；不要读萧也牧的书，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读了没好处。王立道辩驳道：“这样评价萧也牧太不公道。”吴小武笑笑并不回答。逛完了书店，吴小武说：“你没有事吧？我领你到萧也牧家去！”等到看到吴小武悠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时，王立道才恍然大悟：眼前的人就是萧也牧。

如果说王立道的遭遇还算是趣事，流沙河与萧也牧之间因姓名而发生的事情，则算得上是真正的误会了。1955 年秋，萧也牧到四川文联组稿，热情地叫流沙河把已发表的短篇小说结集给中青社出版。第二年夏天，流沙河进京到中国作协文讲所学习，突见萧也牧也在旁听，便急忙怀着感激之情大叫了一声“萧也牧同志”。不料对方热情与他握手之时却满面笑容地声明：“我是吴小武。”流沙河不知萧也牧就是吴小武，他暗想认错人了，只好尴尬地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此后多日，每当再遇见吴小武时，流沙河都设法回避，假装没看见。可是吴小武总是快步过来，热情招呼他，使流沙河尴尬不已。次数多了，吴小武察觉到流沙河的有意回避，也就不再招呼他了。直到几十年后从报刊上读到纪念萧也牧的文章，流沙河才知道萧也牧是吴小武的笔名，他追悔不及：“罪过罪过，原来并非认错了人，难怪他目光里的疑问。他会认为我是一个忘恩的小人吗？奈何他已去世，我没法向他当面解释了……”

被批判之后，也有人给吴小武以温暖。在吉林，团省委宣传部、报社得悉来采访的吴小武就是萧也牧，专门派了两位青年同志陪他，拜他为师学习

写作；在广东，杜埃赠送自己的文学论文集给他，题名直写萧也牧。事情不大，却是一种身份的“恢复”与认同，使吴小武精神上受到很大鼓励。等到1956年“早春”时节，受到“气候影响”的萧也牧写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第9期，对自己大批判中所遭遇的“莫须有”的人身批评进行了控诉。其中谈到因批判带来的冷嘲热讽：自从被批判后，自己作为编辑出去组稿，不用“萧也牧”这个名字了。



石湾《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

然而这也不行，有人说这是萧也牧经不起批判，连真实姓名都不敢用了。“甚至，我到某些从未到过的机关去有事情，会客单上填的是我的真名而非萧也牧，不知怎么竟也有人知道，会客室的窗户外边竟会出现了许多好奇的、含有轻蔑神气的眼睛，和‘萧也牧、萧也牧’的声音。”纯真的吴小武，此时还在念想着“小阳春”之后自己能重获作家身份。但是，一场“鸣放”，原是“引蛇出洞”与“阳谋”而已。当年出现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品，被打成“创作上的逆流”；而吴小武微微的申诉，也被批成“反攻倒算”。此后风霜刀

剑严相逼，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日益严苛。1970 年 10 月 15 日，吴小武被折磨惨死在流放地河南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因为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右派”，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他被胡乱埋在一个乱坟岗里。等到 1979 年平反，家属去找寻其坟茔，结果一无所获。所谓“积毁销骨”，于萧也牧这位名作家、名编辑竟成惨痛的写实！

编著合一，一直是文人身上常见的现象。到当代，在政治侵轧一切的特定气候中，个人权利与名声的合法化成为一种可疑甚至是罪恶，因此经常出现对个人创作的政治压制与群体规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因职业的特殊性，似乎比作家要自我压抑许多，也要“无我”许多。曾经以《人民文学》主编身份帮助萧也牧修改并刊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又以笔名何直在同期刊物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作家、编辑家秦兆阳先生，晚年在散文《忆侯金镜》中说：自己“发现，这几十年竟是在许多矛盾中走过来的。搞写作而不愿以作家自居；是歌颂者却长时间变成了‘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在取消了‘代表性’以后反倒写了一点批判意味的作品；一直不愿意搞编辑工作却一直在使劲地搞编辑工作，甚至在编辑工作上摔了很重的一跤也不后悔”，但“如果一个人必定要有一种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而对于曾经名动文坛的作家萧也牧来说，是否会像秦兆阳一样如此执拗地认同编辑身份，难说。王蒙以“一个甘于沉默的人”来概括萧也牧，也很难说是知人之言——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在 1956 年政治气候稍微回暖之时，萧也牧即不甘沉默，对“双百方针”有感而发。萧也牧还是吴小武，这种命名表面看只是一种符号；对于当事者来说，却是一种从肉体到心灵真切的个体性困扰。后来的研究者也注意到这种现象。与萧也牧同坐一桌面对面编稿多年的编辑张羽在《萧也牧之死》中说：“在那个年代，受批判的人只有低头认罪之份，毫无据理辩论之权。何

况是在中央的主要报刊上，以这样大的声势压来，年轻的萧也牧如何抵挡得住？他只好把想通了的和没有想通的统统包揽了下来，认了账，表示要从头学起，认真改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从此名扬四海，同时也被迫收敛锋芒、偃旗息鼓，开始了下半生的坎坷历程。作家萧也牧在报刊上消失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花名册上记上了他的原名——吴小武。”而以研究共和国文学体制出名的学者李洁非在《一篇作品和一个人的命运》中接过话题感叹：作家萧也牧不仅如张羽所说在报刊上消失了，“而是在作为作家的整个生命意义上彻底消失。他恢复了本名吴小武；从此，他所做的每件事，与‘萧也牧’毫无关系，‘萧也牧’已经是一个逝世者……如果我们此刻不是在文学史意义上谈论这个人，严格地说，在后面的部分，我们真不应该称他为萧也牧！故事仍未结束；而且毫无疑问，以后的故事完全是 1951 年大批判的合理的延续。他自己弃用了萧也牧的名字，现实却根本不承认他是吴小武，坚持以‘萧也牧’相待，死死咬住，直到他终于死去”。痛哉斯言！

2013 年 11 月 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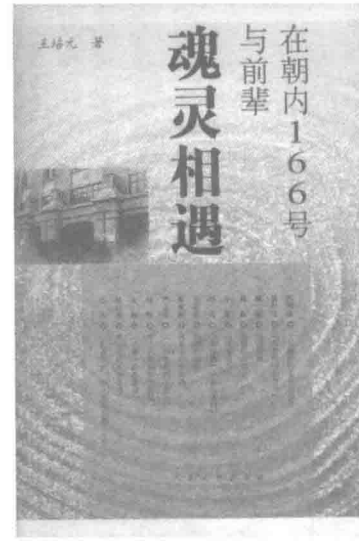
为他人作嫁衣者的“寿衣”与“小背心”

编辑终生为他人作嫁衣，却毕竟在文化学术的幕后，角色模糊，“妾身未分明”，在立功立德之外，自己能不能也以立言的方式拓展、丰富自己的人生？

编辑文化的教授传承，是依赖学院派高头讲章式的纯粹理论演绎，还是出版人自身朴素而实在的自叙式言说更为靠谱？

在今天这个大面积产业化的时代，编辑已然成为一种谋食的职业，在燃尽自己服务社会的同时，如何得到应有的关怀而能够真正安顿此心？……

正好看到2月10号《文汇读书周报·新观察》栏目，刊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李景端先生的文章《希望留住前辈出版家的足迹》。文中说，出版人常年为他人作嫁衣，用图书宣传过各条战线许多优秀人物的事迹，唯独极少宣传自己。他们当中许多人埋头苦干、艰苦创业的事迹，长期鲜为人知，这是非常可惜的被埋没的知识资源，值得努力去挖掘和开发。当下有着林林总总的编辑出版学，“内容很全面，读后很有收获，但是心里总觉有点茫然。所讲这些都很有道理，只是有点虚，仿佛看得见，却摸不着，在编辑工作实践中如何应用它，心中还是不怎么有数”。相反，许多前辈出版家丰富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敬业的精神、成功的业绩，具体实在，才是“摸得着的”编辑出版学。这些出自实践的编辑出版工作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编辑出版学



王培元《在朝内 166 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的内容及范例，堪称当前年轻出版人学习的珍贵教材。令人惋惜的是，不少优秀的前辈出版家如周振甫、赵家璧、韦君宜、陈原、罗竹风、许力以、宋原放、范用、戴文葆、绿原、包文棣、曹辛之、高纪言、杨德炎、王幼于已经作古，未能在他们生前采访和记录下他们的风范、经验和事迹，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而健在的前辈出版家如刘杲、丁景唐、巢峰、江曾培、沈昌文、董秀玉、薛德震、傅璇琮、邵益文、吴道弘、胡守文、张守仁、屠岸、孙绳武、周明鉴、高斯、蒋迪安等多为耄耋老者。随着时光流逝，一代编辑精英难免也会越来越少。有鉴于此，李先生吁请社会关注这个状况，希望怀着“抢救”的心态，抓住时间留住前辈出版家们的足迹，尽快落实措施，把尚健在的出版精英们的精神财富，及时保留和传承下来。他提出的具体建议是：新闻出版总署、有实力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合起来设立“编辑接力棒基金”，专用于收集、整理、传播优秀编辑经验，充实和丰富中国编辑学之用；委托中国编辑学会组织得力人员随带录音笔和摄像机，抓紧逐个采访成就显著的老编辑，尽量把他们的音频及视频资料采录保存下来；在采集、整理必要材料基础上，组织编写、出版优秀出版家丛书。

李景端先生的呼吁，让我想起不少老出版人在退休后努力为自己编织“寿衣”的隐痛与心结。

王培元先生在其著作《在朝内 166 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中收录记录著名出版家、作家韦君宜女士的《折翅的歌唱》一文。其中说到，1985 年下半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社里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上，这位从“一二·九”运动起投身革命、饱经忧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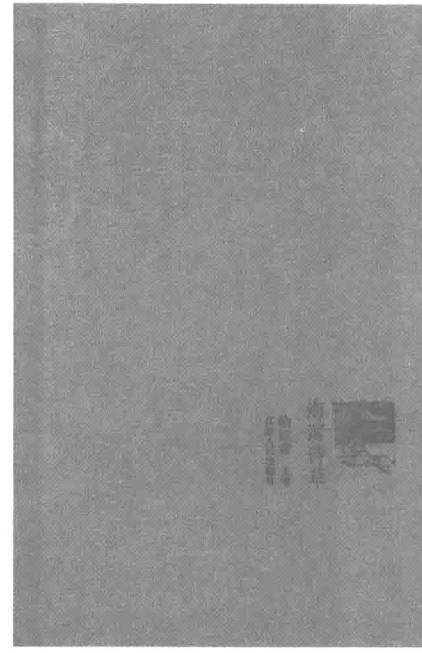
清华才女，此刻已是在文学编辑界折腾多年、心中淤积无数疑惑与苦痛的“韦老太”，她不停地擦着眼泪哽咽：“……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从此，她再也没有进过人文社的大门。十几年后，她克服脑溢血偏瘫、骨折等无尽病苦的折磨，完成了自己念兹在兹的“寿衣”，向社会贡献了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文化标本《思痛录》与《露沙的路》。

无独有偶。文学界的著名编辑崔道怡先生在悼念同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名编辑王笠耘的文章《退休后为自己做一件“寿衣”》中，也记述了编辑的“寿衣”情结：退休时，王笠耘表示，“为他人作嫁衣裳，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只有一个愿望，退休以后还有精力的话，自己给自己做一件寿衣”。在场之人无不动容。退休后十多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心血之作《她爬上河岸》。



《王笠耘纪念集》

除了“寿衣”这种令人动容的说法，关于编辑自己的著述，印象深刻的还曾看到过另一种说法：小背心。2011年底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老出版人喻建章先生主编的小精装本诗集《海滨诗草》。一册小



喻建章主编《海滨诗草》

诗集，按照序作者宋木文先生的概括，是“一段尊老崇贤的出版佳话”。1980年，全国百业俱兴，一派繁荣景象，出版业亦然。国家出版局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鉴于各出版社总编辑业务繁忙，身心疲惫，决定于当年八九月间在青岛市举办一期总编辑读书会，让参与的学员们摆脱一切事务，静下心来读点书，联系实际，相互交流业务经验，同时放松身心，调整一下健康状态。参加读书会的四十余人，全都是出版社总编辑或编辑部负责人，绝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工作的中年人，是全国出版部门的主要业务骨干、在出版岗位上奋战不息的老出版人。国家出版局特委派出时任局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的宋木文同志专职主持会务工作。当时学习氛围浓郁，采取“三自”方针：自我阅读，自由讨论，自写心得。课余学员思想碰撞，激烈讨论，兴味盎然。读书之余，意兴未已，学员们以诗歌表达自己的感受，汇集成了一册打印诗集。诗作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工作者的愉悦心情，以及1980年代出版界的时代风貌。当年身与其会的喻建章先生，在2008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在回忆录中，他专门记下了这段往事并提及自己存有这份油印的诗草。得到消息，当年的学友，纷纷索求旧年诗作。“敬惜字纸”、对资料保存细心的喻先生在旧文件中找到这册诗草，“封尘三十多年，已发黄憔悴，重读之后，有如走失的婴儿重逢的喜悦”（《编后》）。经宋木文先生等人奔走之后，以《海滨诗草》为名出版。寻求出版的过程中，

喻建章在致宋木文信中恳切地说，诗草“以诗的形式记下了读书和各种活动以及参加者的心情”，希望出一本小册子发给学友们，“给这批为人作嫁衣的老出版家做件‘小背心’穿穿如何？……”“小背心”，对于一辈子为他人忙碌的老出版人来说，这是一种贴身贴肉的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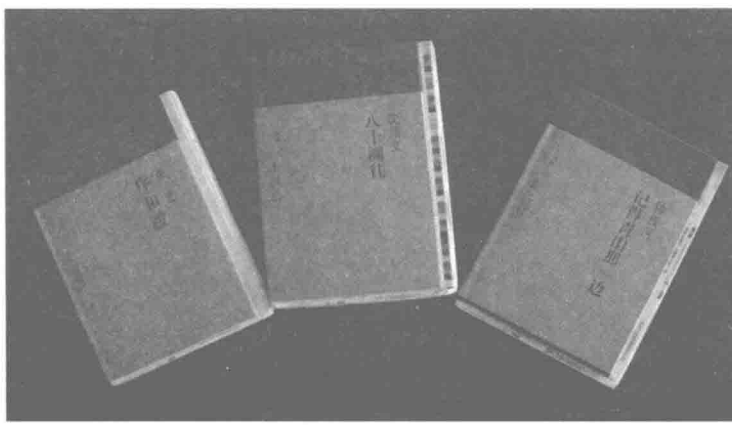
“寿衣”也好，“小背心”也罢，为他人作嫁衣者，多有着这份无法释怀的牵系与“私心”。从个体讲，它体现了一位出版人真正成全自己的最后一笔；对行业来说，它是出版业让从业者超越职业而跃升为志业、获得归属感的重要动力。

令人欣慰的是，李景端先生提出的编写出版优秀出版家丛书的建议，今天不少有识之士正在践行之中。2009 年，作为向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重点图书，中国版协与首都师大出版社共同策划推出的“书林守望丛书”，正是一项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老编辑经验的拯救性文化工程。丛书第一辑收录有《叶至善序跋集》《为书籍的一生》（潘国彦）、《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王维玲）、《我的科普情结》（陈芳烈）、《编辑生涯感悟》（林君雄）、《编辑阅读与校对阅读之比较研究》（周奇）、《编辑的悟性》（郑一奇）、《书林漫步：聂震宁序跋随笔集》（聂震宁）、《期刊：长流的江河》（徐柏容）、《文化的积累与追求》（熊国祯）十种。印象中，这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版论丛”之后，再一次以方阵的形式推出、以总结编辑工作的客观规律与承传优良的编辑作风为主题的丛书。假以时日，相信这样的出版人的“寿衣”和“小背心”会越来越多，让为人作嫁衣者内心温暖，也让出版这个行业有着一份真正的人文关怀。

2012 年 3 月 19 日

朱正：序跋文字的风骨

序跋虽说是一本书的辅文或副文本，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附骥点缀，而是自成一体，有其独立之价值。与堂皇、定规的正文不同，序跋更为自由发散，大多有点“书边杂写”的笔调，可以见出作者“压在纸背的心情”，因此读书人乱翻书，很少有不喜欢读序跋的。我亦不能免俗。而序跋之中，我尤好读长序，原因无他，以其深思宏论读来过瘾。以学术图书而论，如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所作序《清代学术概论》，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写的自序，1970年代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中译本写的序《胡适杂忆》，1983年余英时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作序言《中



《三老集》（毛边本）

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等等，都因序长显得“喧宾夺主”而闹了“独立”单本成书了——因其实在有单独行世的价值。印象中近年还有余英时为台湾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所写长达八万余字的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季羡林为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所写的序言《还胡适以本来面目》、王元化为《杜亚泉文选》所作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刘梦溪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所作序等，知人衡文，点评导读，都是传世雄文。当然，序跋不能以长短论优劣，古人欧阳修为《六一诗话》所作序仅“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区区十三字且不说，现代学者钱锺书的《谈艺录》自序与陈寅恪为《王静安先生遗书》所写的序言，都不过两三百字，但或论学或感慨，寄托遥深，亦是学术史上当之无愧的短制名文。所谓“修辞立其诚”，要而言之，序跋长短不拘，关键在于是否有话可说。“有话可说”四字简单，但践行不易。近期读到朱正先生的《序和跋》（海豚出版社，2011），于序跋之道深有感触。

朱正虽说长期僻居湖湘，但编著两相长，其“反右”研究与鲁迅研究等，卓然成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主持湖南人民出版社编政，推出的“骆驼丛书”“鲁迅研究文丛”等反响不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更是首开思想风气，与同人一起开创了1980年代“出版湘军”这一新风景。由此看来，他亦算得上是位读书出版界的“头面人物”了。《序和跋》与沈昌文《八十溯往》、钟叔河《记得青山那一边》被并列为“三老集”，正说明了朱正在读书界的影响力。但按他该书《题记》中自述，自1988年为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作序起，历年给别人著作写的序跋，不过这八万字一小册，“平均起来，一年不过一篇多一点”。至于其缘由，除了朱正自谦说“找我写序跋的人就少”，主要是因为他的“洁癖”：“如果书稿写的是我自己没有多少研究的领域，当然不能写；我不太同意作者意见的，也不能写；还有一条，自己干的是出

版这一行，也不能给在我工作的出版社的书来写。”这种“约法三章”，明显是爱惜羽毛，有所不为；但恰恰是这种看似不情、不随和不通融的“洁癖”，使得朱正的序跋文字超出寻常的应酬文字多矣而能自成风格、自铸风骨。

只写自己素有研究的领域，还要求认同书中内容，从朱正所作序跋书名，可知他所言不虚，举凡如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三家诗》，黄昌勇《王实味传》，邵燕祥《非神化》，陈明远《吴祖光：1957》，舒芜《我思，谁在》，《新生备忘录》，《李锐诗词本事》，《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年家信集）》，陈琼芝《生命之华——百年巴金》，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吴永平《胡风舒芜关系史证》，向继东《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董每戡集》，胡遐之《荒唐居诗词钞》……书中主题，多与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有关，尤其是深度涉及“反右”、知识分子这一主题者。至于《饶敦朴纪念集》、张翅翔《更能消几番风雨》、林开霞《一个受牵连者的自述》、赵文滔《伤害》与《木人的话》、《俞润泉书信集》、《李仁溥印存》、吴永良《雨雪霏霏》、夏和顺《老报人新问题》、李荫国《走出炼狱》等，多为湖湘普通作者文字——但绝不仅因作者或为亲友或为旧年同事，更以其人生经历与朱正相类，有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性：早岁追求进步，而中年遭逢错乱时期，多有被打成“右派”、劳教者，青春岁月，喑哑污损，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而终其一生，仍不减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骨气。命运相似，感受深切，写序尤近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故而往往同声一哭，其中有大哀痛，非普通的读者、旁观者可比。朱正有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书名可以见出他对于个人与大时代关系的深入思考：“芸芸众生似乎并未参与历史事变的进程，对历史走向的影响隐而不显，一时甚至无法看出来。可是他们，正是历史事变的承受者。历史的风涛激浪，冲击到他们身上，也就造成了他们个人经历中的苦乐悲欢。把这些如实地记录下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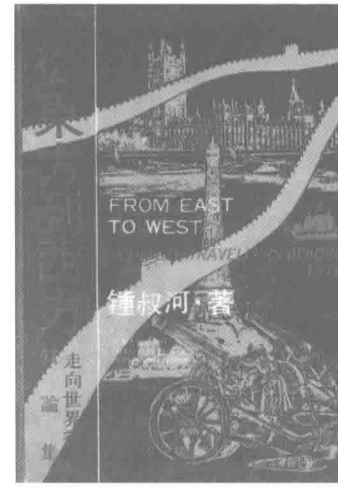
《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

也可以让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这些人所处时代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么？”他在序跋中数次引用此段论说。他不断鼓励各类朋友撰写回忆录，“给时代留下一帧接近于完整的写真”。在序跋中，也可见出朱正对油印小报、日记、家书、回忆录等一手材料和私人记忆在当代政治史与思想史研究中史料价值的深刻认识。李锐在家书中建议女儿李南央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立此存照……从一个很小的侧面，从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的经历反映这个剧变的时代，可作为个人一生的史料，也可作为时代的史料，所谓从一滴水也可见到太阳”，朱正称之为“一位史家对后辈的嘱托”；张翅翔《更能消几番风雨》中描写“文革”时期在资江边见到大量浮尸，朱正联想到二战中犹太人的命运；吴永良写出反映其“右派”生涯的《雨雪霏霏》，朱正赞扬他“做了一件大有意义的工作，为后世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史料”。对李锐 1975—1979 年的家书、叶圣陶父子干校家信、舒芜书信、黄苗子打油诗等名家材料“可征国史”的意义，朱正多有发覆；对普通亲友的回忆录等，他也屡次强调有助于理解当代生活史的镜鉴作用，“小而言之，记录了一个不幸的小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大而言之，折射出了一个大时代的历史细节”（《〈俞润泉书信集〉序》），有将个人苦难命运转化为思想资源，促进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的巨大意义，能使年青一代读者认识过去，而且启发他们在对过去的反思中认识未来。在中国，个人的记忆与历史往往在政治的“宏大叙事”中被湮没与覆盖，而留下粉饰的历史。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对待读到的一手材料，并在存史的高度上来评价，以这样的眼光与抱负来作序，自然有着思想史的分量，而不是轻飘飘的点缀或烘托之言。

朱正曾分疏学术从来大体就有汉儒的朴学与宋儒的性命之学两种。朱正早年所著《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正见其朴学式的考证功力。《序和跋》

亦有以朴学精神讨论学术者，如指出王锡荣《鲁迅学发微》一书从注释鲁迅日记的书账入手，了解鲁迅思想来源的重要性；为《生命之华——百年巴金》所作序，特别指出该书引用抗战中重庆一地遭空袭次数、投弹数、伤亡人数、毁屋栋数等以及中央通讯社生活指数调查等统计数字来分析巴金作品、力求准确的史家风格。历经20世纪的扑面风沙，躲进书堆仅孜孜于琐屑考证未免心有不甘，朱正显然已志不在此，而更追求在此史料功夫坚实基础上的思想阐释，或者如王元化所说，追求“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可以说，朱正的序跋文字看似散珠碎玉，实则聚焦式地捋成了一条抻起当代思想史研究的主线；表面看是寻常应酬文字，实忧愤深沉之作。其思考与反省之深，实在高于他人诸多高头讲章，以其体现出深刻的反思性、批判性。在为邵燕祥《非神化》所作序中，朱正一再强调思想者的特质：“鲁迅也好，绀弩也好，燕祥也好，他们的杂文好在什么地方？最根本的，好就好在有思想。议论风生之中，时见思想的闪光。思想是杂文的灵魂，没有思想还成什么杂文呢？”他认同邵燕祥“自由思想来自自由的而不是禁锢的奴役的精神”。为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作序，指出三人的环境、影响、机遇不同，具体道路各异，但“目的都是为了中国，为了未来，为了中国的未来，却是相同的。而且，下定了这个决心之后，也都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如同屈大夫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们都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了分担民族的苦难，付出了代价。这更是相同的了……而他们的遭遇有大同者在，他们都有一个程度不同的平反问题”。为《王实味传》写序时，朱正对王实味被作为“托派”误杀表示痛心，但进一步反思：“假如他确实是个托派分子，这样处死难道就是应该的吗？……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托洛茨基本人和托派分子，也都服膺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也都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朱正赞同杜威与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中所说，“并不认

为假使列宁的后继者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制度就会是美满的制度……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独裁政治不是达到良好社会的办法”，“应该毫无成见地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起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对于舒芜，朱正特别强调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标本意义；但他在为其《我思，谁在》写序时明确反对将舒芜与周作人相提并论，理由是，舒芜早年的《主观论》表明：“他在那时就是拥护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拥护苏联，拥护共产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国解放，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是心悦诚服地服膺毛泽东思想，心悦诚服地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终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后来的道路。简单地说：周作人是投降了‘恶’，舒芜是归顺了‘善’。”在为《胡风舒芜关系史证》作序时，朱正对书中所论舒芜 1955 年利用胡风书信写材料，而前一年胡风就在《三十万言书》中多次引用舒芜的来信的做法深加反思。“至于说胡风引用这些信件并没有给舒芜造成什么损害，而舒芜的《材料》却闯下了滔天大祸，那只是因为当时舒芜还没有被划入必须加以打击的对象，而胡风是早就要寻找机会加以打击的了。”此种剖析，可谓一针见血。作为当年身陷囹圄的被劳教人员，朱正至少在《〈新生备忘录〉序》等数篇序跋中一再申论强调，劳动教养违反《宪法》与《刑法》，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应该重视当前法学界提出的劳教的存废问题。他赞同赵文滔《伤害》一书中引用黑格尔所论：“罪犯劳动，实际上主要是以惩治和折磨人为目的的劳役、苦役。……其劳动仍然是对肉体的摧残，也是对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仍然是不符合人性的，不人道的。”联系到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后，当下法律界、公共知识界不断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急切呼声，就会感觉，朱正先生这样的文字，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

已经不仅是一种思想史研究了，而是现实性的抗争与呼喊了。

说起来，序跋文体是一种巨大存在，不少作家可谓序跋圣手。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茅盾、巴金、唐弢等人都出版过序跋集。今天甚至有眼光独到者，编辑过“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书人文丛·序跋小系”等汇编。因得职业之便利，出版人为他人著述作序跋，堪称一种现象。在现当代出版史上，如张元济、鲁迅、叶圣陶等即有古籍整理与出版序跋集问世。只是，在文字批量生产的今天，轻薄为文的风气严重影响、污染了序跋写作。我们今天常见的“潜规则”是，作者有攀附名人、借虎皮作大旗之俗念；作序的名人呢，也不免来者不拒、随意闲扯、简单应付，更甚者则是廉价吹捧、无原则歌颂。更有作者代笔名人签字序文即出炉之事。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各得其便之意。两相呼应，序跋自然等而下之、寡淡无味、面目可憎，让读者避退不及。这种时风，亦不免影响了编著之间“合则双美”的良性关系与传统。出版社的主持者，长期辗转于文人堆中，多好文名；有求于他的作者，干脆投其所好，请其写序以“增重”。每见这类你情我愿、轻薄为文的序跋，我总想建议作者应该去学学老出版家朱正先生如何替他人作序跋，去读读朱正先生的序跋文字，学学他的“约法三章”，秉诚信著文，且深入思考，让序跋有一己之风骨，让读者能真正从序跋中获得思想的养分。

说及朱正的序跋文字，顺便想起以前读到的一桩编林旧事：1985年，钟叔河将其为“走向世界丛书”所作长篇序言结集为《千秋鉴借吾妻镜》，列入朱正主持的“骆驼丛书”出版。两年后钟叔河将其修订为《从东方到西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以朱正发表在《人物》上的《述往事，思来者——谈谈〈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者钟叔河》一文为代跋。但钟叔河把李一氓原为

湖南人民版所作序中的“湖南人民”字样删节；且在原代跋下加上五行附记，其中提及是朱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所写，钟叔河“叫我写一篇序。序是不敢写，只好写跋吧；跋又写不出，就只好把这篇旧文略加修改充数了”。对此，朱正在那册要言不烦的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中特意花了不小篇幅“作一点辩解”，认为不应抹去湖南人民社的功劳与作为；并声明附记“这虽是模仿我的口气，却不很像”，因为朱正当年是借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注释《鲁迅全集》，他不会省却“借调”二字。而且，“当初叔河只说要附录我这一篇，并没有说过让我作序的话。我也没有说过序是不敢写跋又写不出这样的话。朱正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谦逊的人呢？”——不惮费词的说明文字，有所调侃，更有所辨正，也可见朱正对于序跋文字的认真与谨严。朱正与钟叔河1950年代新中国岁月同为新湖南报社同事，不久在“反右”运动中“同榜进士”；1970年又同被判刑押解农场劳改。说来说去，原因无他，只是在于两人作为书生的“不安分”，“错就错在有思想”——或许还有近代以来湖湘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的倔强气质。不过，“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1980年代二人复出进入出版界后，就很快以“走向世界丛书”“骆驼丛书”以及曾国藩、周作人著作等重磅图书将湖湘出版界搅得风生水起，让读书界刮目相看。而今天人书俱老，又以《序和跋》与《记得青山那一边》同列“三老集”，算得上是一种欣慰与缘分了。由朱正先生的序跋文字，联想到这种难友兼同道间的旧事，不由得想起在风沙扑面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宿命性的追求与遭际、欢乐与悲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亦有其一代人的情怀与风骨，我竟要情不自禁地向旧年出版人由衷致敬了。

2013年10月17日

“全集”古难全

三十年前就启动，但后来成了“烂尾楼工程”的《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在学界呼唤多年之后，最近重新推出，引发了关于全集出版中存在问题的热议，包括书札、题跋、演说、读书笔记、译作、未刊稿、公务文字等是否应收入全集，编者求全的职业精神与其权限何在，入选文字应以初稿本还是改定本为准，全集到底是应定位为“个人著作”还是“专题档案”，等等。（陈平原《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从〈章太炎全集〉说起》，《中华读书报》2014 年 6 月 17 日）从整体上看，晚清民国以降文化大师的文字，在当下经济实力提升，因而“求大求全”、开足马力的出版工程节奏中，大多已经完成了全集或文集的出版；在国家重点图书或出版大奖获奖名单上，每次总多有全集入围；只是，透过这种表面繁荣的出版现象，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深入细察，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一种虚热的味道，可以说全集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别的暂不赘言，以我个人编读生涯中碰到的两例，多少可以说明“全集不全”这一突出的问题。

多年前编校罗成琰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古今之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其中提及章士钊评价陈独秀犹如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坡不止”。原稿注明引文出自《吴敬恒—梁启超—陈



《章太炎全集》

独秀》，刊《甲寅》第1卷第30期（1926年2月6日）。通查《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孰料上天入地，竟无此文！我不敢怀疑引者有误，因为印象中现代文史著作谈及陈独秀性格，多有引用“不羁之马”一说者。隔了几年，在网上看到袁伟时《从〈章士钊全集〉看编辑》一文，批评该全集不全，才知道《甲寅》同期其他五篇章文都收录了，却偏偏漏了这一篇。袁先生由此“借题发挥”议论：“长期与编辑打交道，不少编辑的人品、学识和敬业精神都令我肃然起敬。但出版业是我国几个不能松动的特许行业之一，随之而来的一些负面因素也令人头痛，其中之一是编辑质量不高，校对质量极差。说一件小事：1949年以前的学术刊物和书籍的编辑，大都有个职业习惯：查对作者的引文。目前港台和海外的有关编辑通常也仍然遵守这一规矩。在现在某些编辑听来，可能是海外奇谈了。”不过，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篇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违碍的文章，《章士钊全集》为什么失收。最近又读到吴小东《全集不全 佚文非佚》（《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6日）一文，提到学人葛涛早就著文指出有四篇“佚文”均已被收录于出版多年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中，而后出的《章士钊全集》却没有收录，“的确耐人寻味”；吴小东本人也很容易发现章氏1925年“女师大风潮”前后的多篇佚文。这么说起来，《章士钊全集》“奈何遗漏过多，未免让人有些失望”！

前年调到大学当教书匠，备课时参考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看到书中提及沈从文在1938年10月13日《云南日报》发表《知识阶级的反省》一文。其中所论所思，充分体现了战时状态下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值得一读，不妨介绍一二。沈从文说，自从昆明经过一次小小的日军轰炸后，城区的居民都好像有点乱了神，把每天出城避难当成唯一课程。于是昆明成了一个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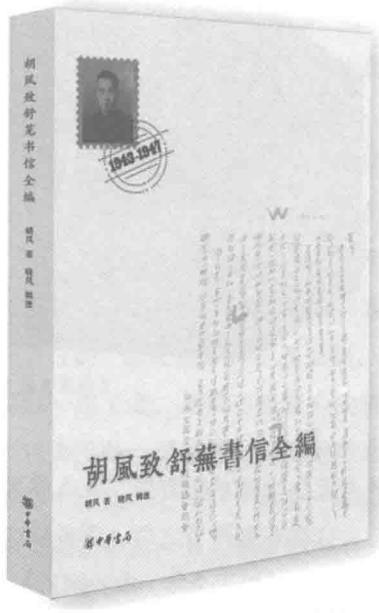
城，而“四乡庙宇中或村落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务员、大学教授、学生、商人、土娼、王八”。一部分从沦陷的北平、上海等地来昆明的青年，这时“居然走回头路，反身向平沪求安全”。“多数人平时从不思索生存的意义，更不打量怎样活，方活得有意义，只是一个‘混’。到无可奈何混不下去时，徒然怕死战争中”。沈从文引“君子临危不乱”古语批评说：逃生固然是本能，但“受过相当教育，在社会上负有责任的人，也同样如此无知识，如此胆小，似不应该”，尤其是“受了国家委托，来到后方领导青年的，和负有特别重大责任的，或必需作青年人表率，或必需与典守事物共存亡，事变欲来未来，都以一跑了之，凡稍有羞耻心的责任感，就应当觉得这种行为如何可耻；如不以为可耻，那是过去做人的教育，受得不够。他即或是一个专家，可不配称为中国良好公民”。过去一年以来，牺牲的中国官兵不下百万。“这些人知道国家事大，个人生命渺小不足道，军人的责任是守土，尽职，他们因此都死在所守的一片土地上，壮烈而沉默，各在自己分内挣扎，牺牲，不逃避，无怨言。”与之相比，“一部分知识阶级如和无知市民一样，放下责任职分不管，终日下乡作一个流浪汉，岂不是无形中为敌人张目”。特别是那些耗费国家许多金钱到欧美留学多年的人，在社会上所得物质待遇特别高，自应记得欧洲所谓公民应当具有的“本分”，应该想想，“这种无知识无责任的行为，是不是在丢国家的丑，丢读书人的丑”。知识阶级纵使不能直接参战，“至少也必需镇静自处，不轻易离开职务，学习战胜自己的懦怯！”这样的激昂文字，充分体现了热血青年沈从文对知识分子战时担当的深入思考，即使今天读来也觉得荡气回肠、令人神旺。但遍查流传颇广的花城版《沈从文文集》与后出的《沈从文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皆未收录《知识分子的反省》一文，实在不知何故。在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热门的今天，全集“佚文”到这种程度，多少也令人匪夷所思。



《胡适全集》

除了用功不到家、搜集不全外，导致“全集”不全的主要原因，还有政治方面的文字违碍，如广受学人责难的《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未收两位作者赴台后批评中共、苏共的多篇文章。如出版家朱正曾经就《胡适全集》未收《民主与极权的冲突》《〈陈独秀最后对民主政治的见解〉序》等提出看法：“其实，胡适其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尽人皆知的，《全集》的出版者也无法为他承担责任，要么你可以不出版这书，要么你就不要号称‘全集’。这样东删西节之后，读者从这部《全集》中看到的，就不是完整的胡适了。”（《〈胡适全集〉中的阙失》）此种名不副实的遗憾，如果深知国情，实在应对编者与出版者抱“同情之了解”而不是加以苛评。如果不以“全集”命名，这样的出版物该取什么书名呢，难道以“文集”或“非全集”更为名实相副？再有就是为尊者讳，包括作者本人、后人在出版全集时“不愿意全”等因素。如众所周知的《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收《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冯友兰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不收《论孔丘》等名文，于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种缺失。再如钱锺书、杨绛夫妇不惜为出版《围城》汇校本、《记钱锺书先生》刊出书信、拍卖公司拍卖手稿等诉诸公堂。将来如果出版《钱锺书全集》，是否可以违背作者意愿，收录上述内容呢？难说。

顺便想起一桩类似的出版个案：2010 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收信一百四十二封。当时笔者就想，离则两伤，合则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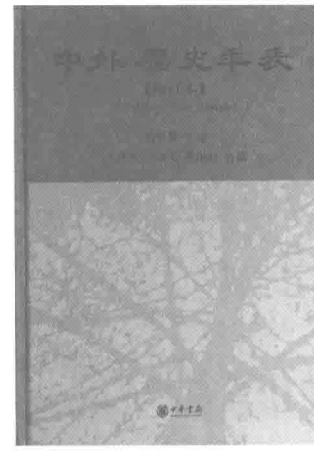
《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

这种有思想史价值的书信，如果以胡舒二人“来往书信集”的方式推出多好啊。可惜，这只是一种读者“想当然尔”的“如果”！（看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中提及，当年舒芜写《回归五四·后序》这一晚年重要文章，张家甚至不同意舒芜征引胡风书信，以致出版几度拖延。）最近，见到中华书局出版《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收录胡致舒的书信一百一十一封。两册书信全编，各有写信者而未有收信人，读者对读起来实在不便，令人遗憾。借用一句编辑常说的话，“出版总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书信的合璧尚且如此之难，何况“全集”求全乎！

2014 年 9 月 14 日

著作署名关义利

闲来好读书话。最近翻读陈晓维《好书之徒》(中华书局，2012)，中有《聂崇岐与翦伯赞》一文，记有史学家聂崇岐批评翦伯赞不当署名的学林旧事：1950年代，翦主持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由聂编纂《捻军》。交稿之时，翦当面提出，聂在“三反”运动中成为“重点”，不宜单独署名，且这种资料丛书从无一人署名的先例，因此建议署名由范文澜领衔，翦居其次，聂列第三；又嘱另推荐两人以凑成五人之数。聂推荐自己的学生许大龄、陈仲夫。不料翦未用许、陈，而改以其助手林树惠与秘书王其榘。“于是此书编者项下遂居然有五人矣。”对这种以署名徇私的做法，书生聂崇岐大为感叹：“呜呼！义利之不明久矣，彼寝馈儒经者尚难辨此，又何责于今之人哉？”陈晓维介绍说，聂崇岐解放前曾先后服务于哈佛燕京学社、中法汉学研究所、哈佛东方语文系，历史复杂；加上其为人耿直，“三反”中，即以“态度恶劣，对抗运动”而遭“隔离反省，交代问题”。而翦伯赞则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在1937年就入党，此时正是燕京大学意识形态上的领袖人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是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一座策略性的桥梁”。他“先一针见血地点出聂在‘三反’运动中的不利处境，一句话先把聂摁在椅子上，使其在谈话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然后再提出署名问题”，聂还能再



《中外历史年表》

说什么呢？文章中还提及，聂崇岐在另一著作《中外历史年表》的题跋里，就署名问题也对翦多有不满："此书下力最多者为余，次为刘君，次为齐君，翦则总其成者……旋又争名次前后，翦先生与刘固旧交也，意存偏袒。"署名的顺序是：翦伯赞主编，齐思和、刘启戈、聂崇岐合编。1980年代重印时，著者排名顺序照旧，但在著者项下加上了一行字：以笔画为次。

由聂崇岐先生的遭遇，我想到同样时代语境中的另两桩与署名有关的学林旧事。1957年，王国维之子王仲闻，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被打成"右派"遭开除公职。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不顾其政治身份，力荐王参与审订中华书局正在编辑的《全宋词》。王由此以临时工的身份，在中华书局四年补编《全宋词》。成稿后，唐先生毫不顾虑地向学院党委、中华书局要求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审订"的署名方式。但"右派"的名字，怎么可以见诸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中呢！最终，王的劳动成果被一笔抹杀。1969年，因为曾在由国民党"中统"掌控的上海邮政局任职员，王仲闻蒙有"国民党特务"的嫌疑，走投无路，效其父投昆明湖，却未能死，最终仰药含冤自尽。生前出版的《南唐二主词校订》和校注《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署名王幼安，"文革"前就打好纸型的《李清照集校注》1979年出版时仍署名王学初。至于《全宋词》，直到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简体本，才补上"王仲闻参订"的署名，给了他一个迟到的正名与安慰。

无独有偶，与唐先生一样，特殊时期，不顾政治影响而同意署名的，还有被许多人讥为不问世事的钱锺书先生。徐友模在《为钱锺书先生的署名喝彩》（《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8日）中介绍：1964年，社科院文学所领导余冠英分派年轻人吴庚舜与钱先生承担研究洪昇《长生殿》的任务，最



王仲闻先生

终完成论文《也论〈长生殿〉》。两人都是谦谦君子，为署名先后相互推让。钱机智地署下“郑辛禹”一名——三字均居“吴庚舜”之后，让吴无话可说。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论文从人性的角度明确指出，这场爱情“绝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爱情”；还锤炼出“心上的人”“心下的人”“心外的人”“分爱”“钟情”“素喜”等系列概念，“仅仅这些词的出现，每个曾经历和了解‘文革’的人都应该能设想出，一旦被即将走红的‘四人帮’揪住，钱吴二位将招致什么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啊！这才是钱先生会署名的根本原因。……不署钱锺书，而居后签上郑辛禹的笔名，只是为了负责地居后而已”。

中国现当代的学术，包括论著署名这样极其微小的一个细节，都可能蕴含着深沉的政治消息。要不是有心人记下这些编辑史上的小事，学术史也许要失去很多深沉的况味。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学界因成果署名而产生问题的消息，大多是为署名谁先谁后的功利之争；或是如高校中博导教授们将自己大名“理所当然”地冠在学生研究成果之前，行政领导“当仁不让”地冠名于学界作者姓名之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以至于出现了学生抄袭他人成果而让导师大受牵连、反受其累的后果，让局外人不知是该替导师叫屈还是当痛说“活该”。说起来，这些多是因名利作怪而产生的怪现状。署名关乎义利，古今皆然。

2014 年 7 月 14 日

且以后注改前误

最近读到两位学者对自己文字中曾经出现错误加注说明以示纠正的旧事，觉得记录下来，对今天的编辑不无启发。

王伯祥是一位今天被严重忽视了的老出版人。从1920年代进入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到1930年代加盟开明书店，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著相长，王伯祥点校了一大批惠及读者的古籍。其主编的《二十五史》及其《补编》，郑振铎与茅盾称为“扛鼎之作”。说王伯祥是一代名编辑、名学者，丝毫不过分。其藏书题识的结集《庋椠偶识》，既见学术价值，又有文人趣味，笔者以为尤其值得文史编辑细读学习，从中体会编辑藏书读书、爱书知书的情怀。但与同辈朋友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郑振铎、夏丏尊等先生的影响相比，王伯祥的知名度今天似乎低了太多。以传记而论，仅见其哲嗣王湜华著有一册《王伯祥传》（中华书局，2008）。抗战中，蛰居上海敌伪治下的王伯祥，像很多传统读书人一样，闭户抄书自娱，排遣内心苦闷。《王伯祥传》中记录了一件王伯祥抄书时发生的事情：1938年冬天，郑振铎先生从陈乃乾先生处购得清代李雨村撰《弄谱》。王伯祥即向郑借来抄录一份，装订好后并作简短题记：“清绵州李雨村撰。雨村有《诗话》《赋



苏州五老：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

话》《词话》《曲话》，见所刻《函海》中，别有《剧话》及此谱单刊印行，传本极希。著雍摄提格（戊寅）之冬，振铎得自乃乾，因假钞一通，以为玩赏。”此题记见于其《庋椠偶识》。次年正月十三上灯日，王伯祥偶然读到清代翟灏《通俗编》，见其中十九、二十卷即《剧话》，廿一、廿二卷即《弄谱》。翟灏与李雨村皆为乾隆进士，但李晚于翟，因此显系李抄袭翟。王伯祥发现这桩公案后，深悔当初抄书作题记之孟浪草率。但他发现错误，决不掩饰。他并不将此看来是浪费笔墨的抄本粗暴撕毁以掩藏一己之失察，而是立此存照，在抄本后再加一跋，承认自己之失检，并指出李抄袭翟之事实。跋文说：“己卯（1939）上元前三夕，偶翻仁和翟晴江（灏）《通俗编》，见其十九、二十两卷即《剧话》，廿一、廿二两卷即《弄谱》。予大讶，岂访贾震雨村之名，故从所刻《函海》中割取此四卷，抚其版式，窜名刻印以射利耶？然再检《童山文集》，则《剧话》《弄谱》二序赫然在焉。予据钞之本，亦正冠此序。因疑雨村或先得翟稿，即窜己名刻之。其后刻《通俗编》入《函海》，遂寝此不行。故《函海》收雨村四话外，无此二种，唯集中两序，刊除未尽，致留此话柄耳。呜呼！读书考订之难如此！复何敢摇唇鼓舌于版本目录，忘肆雌黄哉！粗心失检，浪费笔墨，不禁哑然。弃之可惜，爰抒所见，藉以见年来好事之一斑，并以识吾过尔。容翁记于书巢。”小小一则抄书题识，既见学术考据之功力，又有反躬省思的自觉，老辈读书人的严谨与可敬，由此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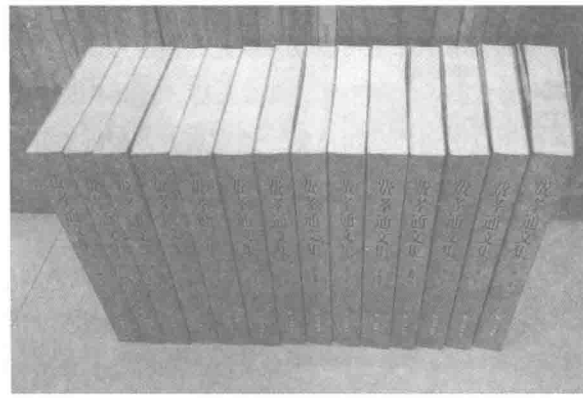
王伯祥先生抄书失察而加补注更正的做法，让笔者想起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2001 年，笔者有机会为元化先生编辑其三卷本文集《清园文存》（江西教育出版社），其中第二册收录有先生 1992 年写的《太炎与鲁迅》一文。其原稿中有这样的文字：“秦代无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为李斯独立



王元化先生

一篇，称他尚有华辞，而在划一文字上则有殊勋。其第七篇合贾谊和晁错为一章。其中谈到《吊屈原赋》《鹏鸟赋》《治安策》，而未及《过秦论》，不知这是否受到太炎所说‘短识’的影响？鲁迅曾明言，自己有庄周的‘随便’与韩非的‘峻急’。他说‘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使人气闷的沉重’。我认为从以上所揭示的一些资料，可以进一步发掘鲁迅与太炎在学术思想上的关系。”当时在读书人群体中评价极高并曾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亦收录了此节，文字相同。我在编校过程中，想起自己读过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其中明显提及《过秦论》：“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鲁迅事实上提及了贾谊《过秦论》，仅指出其言“疏阔”而已。我当即向元化先生提出自己的疑惑与异议。先生当时正在住院，初闻我电话中所言，不信如此，说该文被收录于此前自己的多种选本，从未有编辑提出过质疑，因此失误的可能性很小。但先生谨慎，因此令弟子带鲁迅著作到医院核对。结果发现，确系误记。考虑《太炎与鲁迅》一文，白纸黑字，流传多年，几经斟酌，先生将该段文字改为：“其第七篇合贾谊和晁错为一章，文中强调贾谊的法家色彩（司马迁是以屈原、贾生合传的）。而文中称贾不如晁‘深识’‘沉实’，则似乎多少受到太炎所谓‘短识’的影响。鲁迅曾明言……”并在文末加附记说：“本文原称《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论贾谊部分‘未及《过秦论》’，经编辑张国功同志指出有误。现已作了改正，并向他致谢。”查先生2006年出版的《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即改作更正后的文字。

与王元化先生处理旧误做法类似的，还有费孝通先生。费先生在为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版《费孝通文集》所写“前记”中，特意说明自己对原刊错误文字的态度：“最后我应当感谢这本文集的编者，他们不仅费了大力去搜集我散失的写作，而且又费了大力去校核所搜到的文章的复印件和原刊里的错字和失误。我嘱咐他们的一条原则是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旧。因为在这段虽则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语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近时已不常见的辞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不宜改动。但在校核过程中确是发现不少出于作者的错失或疏忽，以致文章内容中有实质的错误，使前后所提的事实对不上口，甚至有矛盾，在数字上又有出入。这些错误应当由作者来负责的。我十分感激编者对我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能发现这些错误，使我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把这些错误予以公开纠正。所以我请求编者凡逢到这类情形，应当按照原文不加修饰地予以付印，并加注说明错误所在，千万不可掩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一言既出，驰马难追。人生不可能无过，



《费孝通文集》

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如果文章中还有错失没有揭露之处，祈望今后读者继续纠正。我即在九天之上，也将表示感激。”这段文字有些长，但不惮繁杂抄录如上，以为的确是值得编辑细读遵循的辅文。与王元化对旧误文字作出修改而加注说明修改过程不同的是，费孝通坚持“按照原文不加修饰地予以付印”，更为客观存史。

常有所谓的知名作者，对自己的文字深信不疑，反对任何修改，甚至有人对编辑诅咒说“动一字如辱我父母”。而平庸、不负责任的编辑呢，容易对名作者匍匐拜倒，迷信崇拜，言听计从，丝毫不敢质疑，一字亦不作改正；或者干脆以作者“知名”“可靠”为借口，省事不作为，放弃自己作为“把关人”的责任。说起来，编著双方皆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前者欺人，后者欺世。最终的恶果，是误了读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学者亦是如此，总是难免文字上的错误，甚至是他人一望而知的低级错误。一味掩盖否认，显为不智；以“深悔少作”而随意修改，让后人看来是“从来如此”“一贯正确”，亦非历史主义的态度。见己之过，服人之善，不仅不会影响学人声誉，而且只会增加读者对学人的钦佩之情。在笔者看来，坦陈错误，并以加注的方式进行说明更正，是一种最为理想、最见学人胸襟的做法：一来不回避早已流传多年的文字；二来可以促人改正，甚至可以看出作者由偶犯错误到不惮改正的求索之路、严谨作风、真诚人格。编辑不以作者系“名人”而完全盲从，作者亦不以旧错而固执己见。编著双方，皆以编好书服务读者为追求，这样人情通达而做事认真的态度，才能构建起编著之间良性的关系，才是出版界、学术界应该培育的好作风。

2014 年 12 月 12 日

许觉民：更能消几番风雨

作为一个出版中人，我一向喜欢读出版家在编辑之余写下的东西。其缘由，除了那种文字大多没有纯粹的学院派学人笔下高头讲章所难免的方正呆板之气，还因为这类随笔普遍有着诸多与现当代出版史相关联的内容，比如出版人物、出版事件、出版个案等，流传着不少旧年的人文消息，往往令我等后辈不由得产生出一种“历史的想象”。许觉民先生的《风雨故旧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就是这样一册让我心动的文字。秋凉渐尽而冬意乍起的夜里，风雨敲窗，信手翻书，许先生笔下的风雨也频频入我梦中。



许觉民《风雨故旧录》

在当代文学史上，许觉民先生以笔名为“洁泯”所写的文学评论名世，但他的本行是出版，曾任三联书店副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等职务。编著双栖的出版人在学界往往容易获得好人缘，广于交游的许先生与许多现当代作家、学者保持着长久而友好的交往。一望书名可知，《风雨故旧录》就是他所写人物追忆文章的结集。故旧之中，包括叶圣陶、

俞平伯、黎澍、陈翰伯、郑振铎、聂绀弩、姜椿芳、傅雷、冯雪峰、巴金、艾青、陈企霞、荒煤、冯牧、何其芳、李季、郭小川、吕荧、孟超、邵荃麟、周扬、张光年、严文井、王瑶、韦君宜、巴人、唐弢等。文章原是报刊上连载的专栏，每篇只是两三千字。因其短，所以能在尺幅之间，尽见其剪影与摹神的文字功夫，多是一些片断的勾勒与写真，或一件小事，或一个瞬间印象，不求立全传，而只求以生动之笔，传瞬间神情、述独特感受而已。回忆文章一向被认为是年长者的文体，因为记忆之外，还有着一份经历与见识的淬砺。许先生笔墨的老到，就在于其看似平淡闲笔之中，却寄寓着一份别样的深情与沧桑之感。如他在《萧军风貌》中写萧军：“50年代的某日，我的办公室忽有一人推门而入，他身材魁梧，约五十左右年纪，戴一顶约莫有一尺半宽的大草帽，身系一条足有三寸阔的皮带，皮带的系口一块大铜牌，闪闪发亮。这打扮颇像是北京天桥的卖艺人。我正想问他找谁，他抢先开口说：‘我是萧军，来结算稿费的。’……我很欣赏他的打扮，他说这打扮在北京可称独一无二。他问我稿费的计算法是怎么来的，我和他解释，他说少了，他是专业写作者，拿稿费糊口，靠它养家活口很难。他建议稿费应采用鲁迅时代的版税制，比现在的要多。……他又问，为什么他的稿费支取的标准要比茅盾的低？我说何以见得，他告诉我刚才在会计室桌上一叠单子里看到的。又说茅盾的资格固然比他老，但是他写的小说不比茅盾差，何以有此悬殊？你们这是论资排辈！我说，倘若鲁迅至今在世，你是否也觉得你的稿酬和鲁迅一样？他说，鲁迅的文章当然比我高。我说那么还有别的作家比你高的么？他自信地说，高不到哪里去，都差不多。我想，他很有点像《水浒》中的几位好汉，让的只是宋公明一人，其他都不在眼里。”萧军的“野气”与纯真，以及他作为鲁迅精神嫡传的形象，栩栩如生，仿佛眼前。再如俞平伯的宁静，巴金的深情，冯牧的好客，吕荧的书生意气，王瑶的烟斗，韦君宜的抑郁，周扬的悲苦……

都如一帧帧素描写真，让人过目难忘。

《风雨故旧录》与以往所常见的文人剪影大有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仅停留于勾勒文人形象与旧习，铺演文人逸事与情趣，而更追求从他们身上见证与折射出时代的风雨。许觉民先生所在的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院文学所等，是文坛运动相对集中的地方（顺便可以说及的是，对这些当代文学枢纽之地所发生的运动史的梳理，还多停留在个人回忆录的阶段，而系统的研究则仍是一个空白）。所见所闻，自然多是入得现当代史书的内容。熟悉现当代文坛运动史与思想史的读者，都能从其所记故旧名单中看出，在这些文坛中心人物的身上，荷载着一缕意味深长的历史负重与记忆。中国大半个20世纪特殊的政治语境，主宰着每个知识分子的悲喜沉浮。总体而言，一部现当代文人命运史，就是一部以不懈的求索开始而屡屡坠入悲情苦难的历史，就如作者在《前记》中所说："所写那些人物的遭际，大抵都与'文革'有瓜葛，因此文章就难免坠入悲怆与痛楚的情境里去。"至于个人命运与时代风雨的密切关系，端的非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理清。在《心曲万千忆周扬》一文中，作者剖析了周扬身上的悲剧性后在末尾写道："20世纪是多难的世纪，大抵怀瑾握瑜之士多半在不得已中死去，这是足以令人感慨而感慨不尽的。语云盖棺论定，无奈世情度量之乖舛，盖棺而不能论定者比比皆是，这只能有待于历史去作公正的论断。"这实在是历经风雨后的沉痛之语。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这是中国文人时时向往的一种人生境界。但"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燃烟卷觉新凉"（鲁迅《秋夜有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20世纪，并没有许诺给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多少春秋佳日，而更多的是频繁无端的文坛与思想"运动"所裹挟而来的急风暴雨。等到风消雨歇，则唯剩下面对满地落花而生出的怆然追怀与伤感忆旧。早在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编《风雨谈》，就由衷地说"这题目的三个字我很有点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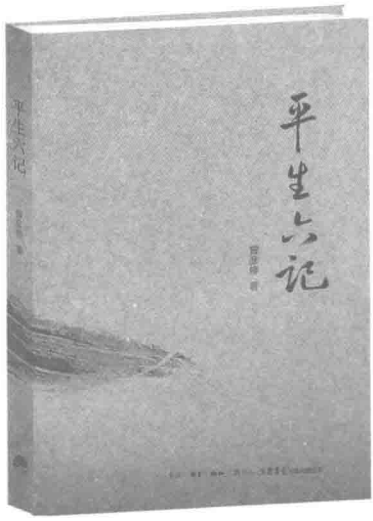
还说“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更能消几番风雨”，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这种“风雨心绪”，也许是一种宿命性的承受。

另外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书中收录的另几篇长文如《孤岛前后期上海书界散记》《夜未央，更著风和雨——解放前上海生活书店的活动纪实》《四十年话旧说新》《想起了名编辑》等，是难得的现当代出版史史料，值得今天的编辑与出版史研究者一读。

2003 年 1 月 3 日

曾彦修的良知与施燕平的软弱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一京一沪两大出版名社各自出版了一薄一厚两册当代编辑出版人的回忆录。薄的是曾彦修所著《平生六记》（三联书店），仅有区区八万字；厚的是施燕平所著《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皇皇五十余万言。虽说都是个人回忆录，前者是典型的三联版文化读物风格；后者却被南京大学敏锐地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染上一丝学院派的色彩。两位作者，都是有着革命经历的老新闻出版人。曾彦修生于1919年，1937年以热血学生身份进入延安投身革命，1949年作为南下干部主持南方日报社，20世纪50年代进京担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施燕平生于1926年，烽火遍野的青少年时代在家乡苏中游击区抗日，解放战争后随军进入上海接管中华书局印刷厂；因为爱好文学，“百花时代”被当作工业战线创作队伍的新生力量转业到上海作协，安排由巴金带徒培养，编辑文学名刊《萌芽》，转身为有着红色出身、前途光明的文学骨干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基层干部。相比较而言，曾彦修因为晚年长期身居京城，以“严秀”为笔名写下大量深刻反思苏联崩溃历史的杂文，影响深远，名声更著。而施燕平，按照回忆录作序者与出版推动者吴俊的话来说，则是“被沉默的少数人”。即便在文学圈，也鲜为人知。事实上，他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文革”中，施燕平被卷入著名的上海“写作组”，20世纪70年代成为服



曾彦修《平生六记》

务激进政治的“文革”代表性杂志《朝霞》负责人之一；1975年底被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推荐，调入北京担任复刊的《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另外的主编、副主编，是知名作家、学者袁水拍、严文井与李希凡），协助袁水拍贯彻极左路线，成为“文革”文学与政治的重要见证人与当事人。有意思的是，当根正苗红的新中国青年文化干部施燕平正从“文革”风暴的发源地上海进入政治中心北京时，老革命曾彦修却以“右派”之身从1960年起外放上海《辞海》编辑所从事编务工作，直到1978年才重返京城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而差不多这个时候的施燕平，正随着“四人帮”倒台接受完审查，结束三年多的京城生活，重新回到上海，最后在复旦分校任教寻得圆满归宿。两位出版人一北一南京沪两地城市间风水轮流转式的工作调动，意味深长地折射出新中国复杂的政治情境中知识分子令人唏嘘的起伏浮沉、荣辱悲欢。

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家文学、文化一体化建构的推进，作为文化制度中重要一环的编辑出版业，日益浸染上浓郁的政治色彩。一方面，这赋予了人民出版事业厚重的社会责任感与凝重的历史品格；另一方面，这也使无数编辑出版人承担国家意识形态建构重任过程中或深或浅地承受着政治的挤压与诱惑，甚至在非常岁月扭曲为政治与权力的工具，放弃知识分子的峻洁风骨与独立人格。这种风云变幻中的进退出处、洁污醒迷，在今天成了我们回首历史、评价一代编辑出版人主体是否自觉的重要标准。曾彦修晚年欣慰于“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九十自励》）。这册一改以前

用笔名习惯而刻意以真名行世的《平生六记》，以“土改记异”“打虎记零”“镇反记慎”“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反右记幸”六记，记述了“镇反”、土改、“三反”“肃反”“反右”和“四清”等系列政治运动中自己良知未泯，坚持不沦为政治工具的所作所为。土改中，他以“不管不告”原则处理贫农家中多因逃灾流离而来的“小老婆”与“丫头”问题；“反贪污运动”中，他不相信革命几十年的人会成为贪污分子，宽大处理“大老虎”；“镇反”运动中，作为南方日报社社长，“编前会议”上面对只因“一贯反动，民愤极大”罪名而次日即要处决的一百四十余个名字，他不仅没有大张旗鼓配合宣传，而且半夜紧急告知叶剑英，力谏并促成停止执行枪决。及至1954年在胡风案后全国内部开展的“肃反”运动中，作为人民社领导，曾彦修撤销怀疑对象，平反错误。尤其是在强烈的政治压力下，仍然十分肯定地为日后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非常肯定的结论”。戴文葆中学毕业后，曾在家乡江苏阜宁县“情报室”短时任职。尽管后来因政治苦闷、追求进步而主动脱离，在五六十年代却一直饱受“特嫌问题”困扰。因为曾彦修的出手，戴文葆的历史档案中连“一般历史问题”都没写上。1965年“四清”运动，曾彦修被安排参加群众印刷厂“四清队”，为被审查的三十多个工人与干部，全部洗清并以书面形式撤销“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一类子虚乌有的帽子。与大半生新闻出版工作相比，曾彦修甚至自认“我一生真正谈得上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1957年“反右”风起，作为人民出版社抓“右派”的“五人小组”组长，曾彦修干脆自己作为出版社第一个“右派”主动上报，成为《人民日报》上第一个被点名的“党内大右派”。因为“要我无缘无故地把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打成‘右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以被打而能够免于去发号施令打他人为“右派”，曾彦修自嘲、自问亦自慰：“这



施燕平《尘封岁月》

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与曾彦修参透政治“运动”就是“整人”因而坚守良知相比，施燕平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与对编辑人格的坚守，则如他自己在回忆录后记中所说，“常常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随波逐流，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以至失足落水，犯有不少错误。回忆往事，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在经历“文革”前期无休止的检查、交代与批判，目睹著名学者以群与诗人闻捷自杀、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受尽屈辱，自身也被打成上海文艺界“黑帮的忠实爪牙”之后，施燕平也曾萌生深入工厂远离作协是非的想法，但面对市委写作组伸出的橄榄枝，他很快身不由己地投身时代潮流，编辑《朝霞》刊物，组织创作学习班，充当“文革”路线的传声筒。1975年底北上参与《人民文学》复刊工作后，施燕平更是接受袁水拍的授意，发扬上海经验，举办创作学习班、召开创作会议，组织作家队伍宣传与“走资派”斗争、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内容，逆时代潮流而行。未几，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与“文革”的结束，他最终陷入尴尬的境地，在彷徨过渡中接受清查、不断检讨，最终被定性为积极贯彻“四人帮”反革命极左路线，犯了政治错误；但由于待人谦和、能够积极交代、揭发与检查并有意悔改，“决定予以解脱”。京沪二十余年被政治裹挟的编辑生涯，宛如南柯一梦。梦醒之后，真如今天无厘头的说法，“节操碎了一地”。在袁水拍交代检查后，施燕平以同情的态度写道：“‘四人帮’未必看中了他（袁），他无非充当了他们手中的工具而已。所以有些情况他并不清楚，有些事情他确属糊涂。从意识上讲，他竭力想获得‘四人帮’的好感与欣赏，这也是真的。”其实，施燕平自身所作所为，也大体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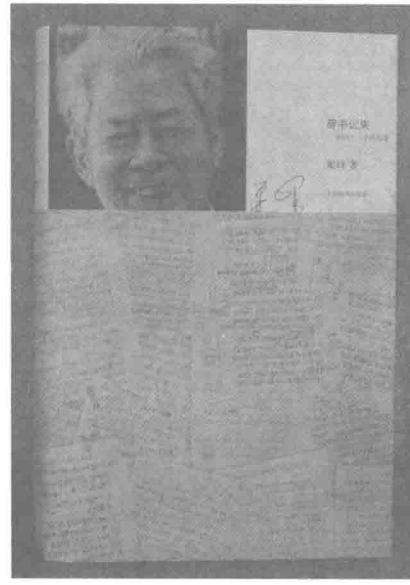
在一个全民疯狂的年月，包括编辑出版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被政治利用乃至异化，清醒者几人能够？！

曾彦修回忆录“四清记实”部分内容，20世纪80年代曾以《审干杂谈》之名列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知名的“骆驼丛书”出版。读到这些内容的知名理论家吴江在《一本有严肃有意义的书》中对其“但求问心无愧”、绝不违背良心的品格评论说：“在那个‘左’倾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除了政策失误造成实际工作的损失，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对人的问题的处理轻率粗暴，无根据地怀疑人打击人，任意将问题扩大化复杂化，胡猜乱想，胡乱定案，或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仍揪住不放，甚至实行一种把‘帽子’拿在手里随时准备给人扣上的恐怖策略。”曾的可贵之处，恰在于对人的态度、在于重视了人。而对于施燕平的命运，高度评价其回忆录史料价值的吴俊则在序言中说：“政治是诡异的。施先生显然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一度貌似接近了政治核心圈，但终究只是个边缘人，而且他对权力政治有着深刻的警惕和怀疑。一个佐证是，在调京工作后，他始终不愿将家属迁往北京……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因时代变故而被突然逐出历史舞台的人。他像我们一样，在许多重要的人生和时代关头，都无法自主自如地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但因为个人修养品行的不俗，命运最终还是厚待了他。我把他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人物，就是‘被沉默的少数人’。作为从业学术研究的人，我们经历过太多歧异纷呈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这种变化就在不断地重构我们的历史认知，其实也是在解释当下，在建立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们当然无法扭转宏大的历史逻辑，但可以将个体的人生轨迹从历史的逻辑中小心地剥离开来，区分其中的善行或恶意，既充分理解人性的弱点，同时更加注重发掘人性中的善良品质。正是这种善恶构成了历史的走向和面貌。当我们关怀沉默的大多数的时候，那些沉默的少数人，特别是‘被’沉

默的少数人的权利同样是不应该被剥夺的，否则历史必将再次出现不公正的倾斜。那么所谓正义的审判及其正当性不也应该被质疑吗！”“文革”之中，曾彦修亦曾对自己的怯懦自责，施燕平亦曾有一定程度的不解、反思甚至是抗争。吴江对曾彦修的风骨报之以敬意，吴俊对施燕平的软弱待之以恕道。先贤孟子固然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高标期待，但我们并不能要求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做到像曾彦修那样清醒，“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承担就是”（《平生六记·前记》）；也没有谁能保证如果置身于同样境地，能够抵制政治的威逼利诱，不像施燕平那样随波逐流。“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在难以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清醒地摆脱历史的被动性？”（《尘封岁月·后记》）历史不应苛求，也不可假设，需要的是记录与总结。正当笔者在写作这篇小文章时，3月3日，九十六岁高龄的曾彦修去世。施燕平亦曾称自己是个“在暮色中赶路的人”。随着新中国一代编辑出版人的老去，他们的回忆录、书信、日记等，已然成为书写当代编辑出版史、思想史等的重要史料。在产业化、市场化的泡液中，今天的编辑出版人对于20世纪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日益模糊与陌生，甚至恍如隔世。我们期待着出版更多如韦君宜、曾彦修、施燕平等一代编辑出版人的回忆录，以纪实之笔，让历史不再尘封，而能激起今天的读者对一代知识分子当年的复杂命运、艰难抉择与心灵痛苦以沉思、以镜鉴——深怀伤感与遗憾，更深怀敬意与温情。

2015年3月31日

巢峰：出版家的思想家底色



巢峰《辞书记失》

参与四版《辞海》修订编辑部领导工作的资深出版人，四十载《辞海》春秋，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编辑学会顾问，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以及其他林林总总辞书巨著的具体践行者，有着如此丰富的辞书出版经验的巢峰先生，在躬行实践同时不断地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总结。如果说，此前出版的论文集《巢峰辞书学论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相对宏观全面、兼顾理论文章地展示了巢峰的辞书学思想体系，那么，《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则以一种“小题大做”的札记体形式，通过“记失”与反思

的方式，有趣、有料、有思想地记录了他在辞书学方面涓滴成河的探索细节、蚌病成珠的思考过程；而其所折射出的，既是辞书编纂者求索真理的心路历程，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历史轨迹。

一、“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

“记失”涉及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各个层面，其中有对具体知识性错误改正过程的记录，还有释义前后矛盾、以偏概全、词条漏收、领头条目缺失、不释本义、概括失当、文风欠简明、引文不当等辞书体例问题的专业性思考；而更为主要也更为精彩的内容，是以辞条释义存在的得失为症候，发掘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剖析当代中国文化思想观念复杂的变迁轨迹。

辞书释文首重客观性。不正常的政治文化语境，经常对辞书这一基本要求肆意扭曲。巢峰对此多有反思。苏联《简明哲学辞典》“新黑格尔主义”释文中充满如“凶恶敌人”“一小撮反动分子”“法西斯主义依靠着新黑格尔主义，力图‘从理论上’来论证自己仇视人类的思想”一类文字。巢峰指出辞书的任务是为读者提供知识，而谩骂不是战斗，更不是知识。（《怎样写“新黑格尔主义”的释文？》）真正有品格的辞书，应该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不随政治俯仰变迁。毛泽东曾借用资产阶级政治家说过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强调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同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干部哲学辞典》“斗争哲学”条认为这并不说明毛泽东赞成用“斗争哲学”概括党的世界观。巢峰则举出毛泽东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和开展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张“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运动不休等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是肯定“斗争哲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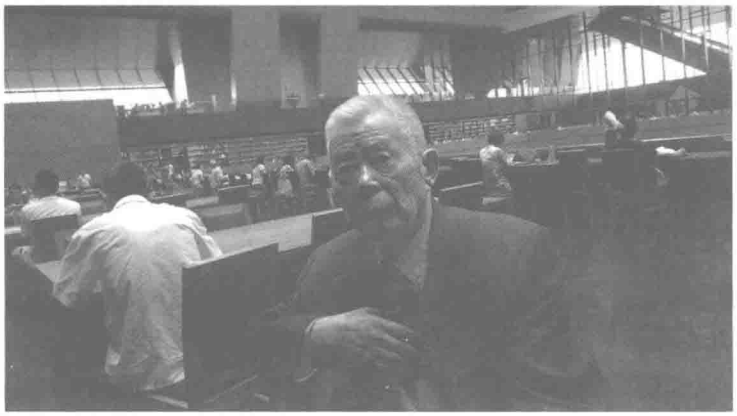
辞条不必为尊者讳。（《关于“斗争哲学”》）《哲学小辞典》“孝悌”条认为孝悌“是一切反动阶级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是欺世惑众的谬说。……孝悌之道，腐蚀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极端反动的”。巢峰针锋相对地批驳：“提出孝悌之说，早于无产阶级专政两千多年，居然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不知从何说起！‘文革’中，因为开展对孔子和包括‘孝悌’在内的孔学的大批判，大造孔子和孔学的反，助长了儿子造老子的反、弟弟造哥哥的反、妻子造丈夫的反，以及亲属之间相互揭发，相互造反。从而，天下大乱，家庭大乱！‘文革’结束了，但它带来的后遗症却并未随之结束。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不和，同事、师生、亲属决裂者不计其数。”（《说“孝悌”》）《辞海》第六版“资产阶级道德”条肯定其自由、平等和人道主义的进步意义，但仍然强调它常表现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这种认识虽有进步，但仍然不深不透，我们仍然需要摆脱传统影响，学会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关于剥削阶级的人生观》）

辞书的进步性，根本体现在它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与尊重，为推动人类进步提供知识支持与精神动力。以经济学内容为例，多处“记失”札记，充分反映出巢峰对生产力的重视。他指出哲学史、经济学史上都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一术语，而“四人帮”却荒谬地将其列入《哲学小辞典》。（《关于“唯生产力论”》）《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辞书都说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两对矛盾。巢峰通过经典文献的辨析与历史的总结深刻地指出，在“大跃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特别是在“文革”中，在农村中搞“穷过渡”，大批“唯生产力论”，提倡“政治挂帅”，提倡“个人崇拜”等，究其理论原因，概出于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拔高为社会基本矛盾。“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唯一的社会基本矛盾，就可以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从上层建筑角度分

析阶级形势；就可以把政治思想因素塞进阶级标准中去；就可以肆意扩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可以推行个人迷信和个人意志；就可以制造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就可以‘抓革命“促”（实际上是“压”）生产’；就可以任意批斗、吊打和迫害广大革命干部、知识分子甚至一般群众；就可以为天才论、造神运动开辟道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商榷》）辞书的义例往往蕴含着隐幽的思想倾向与史观，巢峰往往一针见血地发覆其存在的思想混乱等问题。《毛泽东思想辞典》“三不主义”条最后说：“实行这一方针，能够广开言路，使人民消除顾虑，解放思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形成生动活动的政治局面。”巢峰敏锐地指出，这种释义，让人感觉提出“三不主义”后，党内和社会很快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事实上，“1959 年年底直至‘文革’结束，经过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等运动，前后长达十七年之久。这个时间段，恰好是大抓辫子、大扣帽子、大打棍子的时代，而该条只字皆无。”1962 年，大讲“三不主义”，结果却是“钓鱼的诱饵”。（《关于“三不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词典》将“急于求成”释为“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一种‘左’的错误倾向”，作者指出这不仅存在宽义窄释，还有将“急于求成”这一远非决定性因素概括“左”倾错误的不当。（《“急于求成”与“左”的错误》）

至于当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诸多词语，如“计划经济”“市场”“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社会学”“杨度”“抗日战争”“遵义会议”等在条目设置与释文等方面出现的变化，《记失》中皆深入进行知识论考察，剖析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这些辞书得与失的记录与探讨，按照巢峰总结性文章的名称，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



巢峰先生

是与非》，第353—361页）的历程。

二、政治经济学滋养的出版人精神

“辞书记失”，不仅是一组别开生面的辞书评论与研究，其与当代西方史学中流行的概念史、观念史、词语史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巢峰“记失”所依赖的理论资源，主要是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作者少年参加革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但终身自修政治经济学。在高校云集的上海，巢峰以一出版人的身份长期担任上海经济学会会长，可见其政治经济学修养的深厚。与当下“现代性”“文化研究”等流行理论相比，政治经济学也许不够时尚、不够超脱，但正因其自觉密切结合现当代中国社会所铸就的实践性品格、问题意识，不流于凌空蹈虚，而自有其厚实稳重的理论品格，值得今天的出版人深思。

按照出版史学者的分析，可以将20世纪的中国出版人大体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如章锡琛、张元济等；第二类以邹韬奋为代表，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第三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以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领导或参与出版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为代表；第五类出版人则以“文革”后大学生、跨世纪出版人为主。第四代或曰第四类出版人，以王益、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边春光、陈原、王仿子、宋木文、刘杲等为代表。他们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新闻出版领导工作的。“这部分文化人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又有较高的出版

编辑能力，有丰富的出版文化实践经验，在本行业中，他们大多是有胆有识的领导者。”社会政治环境对出版人的造就，影响极大。“左”的政治路线之下，他们亦曾迷失或被一定程度地扭曲。及至改革开放，他们重回出版文化原来的位置，很快以文化的眼光和经济产业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出版行业，由此推动中国出版文化的功能得以恢复，出版文化人的视角发生改变，出版行业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随之提高。（李白坚《中国出版文化概观》，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10—119页）按这个代际标准来划分，十四岁从军、1954年起从事出版与管理工作，从新四军的小战士到知名出版人，巢峰无疑属于第四类出版人。这不仅是因为年龄、经历的同步，更在于那一代出版人知识结构、文化气质与思想风貌的鲜明特色。以新时期以来的个人思想探索历程来说，巢峰的理论思考与出版实践，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回春转暖几乎同步：1978年8月21日，《文汇报》整版发表巢峰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吗》，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1978年底《辞海》新编启动，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出台，但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无明确说法。如何处理这些相关词条，是摆在辞书人面前的大难题。在上级指导意见迟迟不出台而编纂工作不容坐等的情况下，巢峰组织《辞海》编辑部多次讨论，并最终由他动手起草，经主编夏征农审定，形成了当代辞书史上著名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八条三十九款。其精神，即在于大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说法。1980年，巢峰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两对吗》再次直面重大理论问题，提出“如同世界本原只有一个（即物质）一样，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只能有一个，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避免

天才论、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1981年，巢峰发表《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文直陈：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绘制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左”倾错误违背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出版家兼经济学家陈昕曾分析，作为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巢峰最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大多发表在拨乱反正年代。“他以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敏锐犀利的学术洞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一文，针对“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观点，大胆提出“生产力中人与物的内在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生产关系的作用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动力”的颠覆性观点。1980年发表的《谈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一文，联系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受大破坏的情况，分析了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乃至经济危机，甚至出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的严重后果，因此提出“国民经济既要制定生产计划，也要制定生活计划”，“实行体制改革，使公有制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对消费者负责”。巢峰是老一辈学者中较早将消费列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学者，“消费是生产的终点，生产必须在消费中完成”，“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背离目的生产就会导致经济危机”。（陈昕《经济学家、出版家巢峰》，《出版忆往》，海豚出版社，2013）可以与这些理论文章相互印证的是，《辞书记失》中的不少篇什，同样反映了巢峰重视消费研究的经济学思想。《辞海》前五个版本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影响，对“政治经济学”释义时将交换和消费排除在外，而直到第六版才得到更正。巢峰在札记《怎样为“政治经济学”下定义？》中对其进步意义大加肯定。

巢峰曾在《我与经济学》中说自己是一个出版工作者，学习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为了出版工作的需要。从1980年代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

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要以人民生活消费为出发点；到1990年代发表《出版经济》《出版物的特殊性》《图书是一种完全的商品》《市场经济与出版改革》《图书效益论》等，自觉建构出版经济学，强调认同与维护图书的商品属性；再到2005年前后，以《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是周期性必然性生产过剩危机吗？》等宏文尖锐地提出中国出版面临“滞胀”即“膨胀性衰退”的风险，巢峰重视消费者的经济学思想一以贯之。

正是因为自觉将政治经济学用以指导出版实践与研究，使得巢峰的理论追求充分体现出其“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与探索精神。值得指出的是，以“记失”的方式剖析自身职业生涯的是与非，还从一方面反映了巢峰们追求真理、解放思想心路的复杂与艰难，以及其光明磊落的批判精神。这一代出版人也许曾经迷失过，但依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持与精神鼓励，他们很快清醒过来，以理性的头脑进行深刻反思，不惮于以“记失”的姿态进行自我批判与清理。这是巢峰那一代人的可爱与可敬之处。

三、出版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

“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作者评论的对象，大多是1949年以后编纂出版的辞书，也包括少量苏联辞书的中译本；大多数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科词典，也包括自身主持编纂工作的《辞海》。评论的内容，不仅有释文的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客观性等辞书编纂的理论性问题，也包括少量思辨性问题。（徐庆凯《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序》）思辨的重心，是作者所经历的“文革”前后中国思想变化在辞书中的反映。“文革”时期，



《巢峰辞书学论稿》

政治的堕落、思想的混乱，导致文化建设的扭曲。及至改革开放，国人迫切需要进行思想清理，直接体现于大面积词条的正名。这种对辞书得失的思想史梳理，需要读书得间的考据功夫，更需要融会读书、阅历与独立思考而成的思想深度。在普通读者如我等看来，正是这些思辨性札记中忧愤深广的思想批判，充分展示了巢峰那一代出版人的思想家气质。一册《辞书记失》，不仅是出版界、辞书界业务学习与思考的典范，也堪称现当代思想史研究的必读书。

出版人如何对社会与历史发言，一向见仁见智。近现代以来，“为他人作嫁衣”的价值取向、编创分离的社会分工趋势以及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的编辑出版群体一向习惯隐身于书稿与书斋之后，通过编辑出版的书籍来默默地进行文化启蒙、影响社会进程，而普遍放弃自身在社会文化进程中的“现场亮相”与“直接发言”。不过，在出版人群体中，我们庆幸仍有诸多前辈“破门而出”，以朱笔为人作嫁，以蓝笔撰文自娱，既以编辑出版活动践行职业理想，还以立言的方式进行自己的思想建构。总体看来，出版人留下的林林总总的文字，真正能流传久远的，不在于其是否记录了多少学林书坊的逸事趣闻，不在于其是否称得上风光的名人交游录，而根本在于文字是否蕴含有编辑出版生涯淬砺而成的思想之光。举其大者，

我们看过陈原的社会语言学著述，钟叔河、朱正与钱伯城的文史随笔，曾彦修的杂文，等等，都反映出出版家的思想家气质，折射出他们独特的知识分子底色。陈原的文字称得上百科全书式，但一以贯之的是浓郁的思想启蒙意识。钟叔河被劳教十年，被批“坏就坏在有思想”。曾彦修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思考，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判断。近年，上述第四代老出版家中，不少人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集、回忆录等，如刘杲《我们是中国编辑》、宋木文《八十后出版文存》、曾彦修的《平生六忆》等。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大多没有接受专业系统的学院化学习，但独特的革命经历、起伏的人生命运，把他们锤炼成了深刻的思想者。因为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有丰富的出版文化实践经验，做过不同类型的领导工作，因而多能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来思考历史、中国的命运。这种境界与眼光，固然给那个时代的出版领域赋予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拓展了出版人的宏阔视野，提升了出版物的凝重品格。他们既以老一代革命出版家的实践方式参与文化思想缔构，影响时代进程，同时又热切地以文字记录个体与社会的发展心路。言为心声，他们的文字，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其话语表达方式，也许不够精致，但质朴中有着一种真诚与力量；更说不上前沿性，但平和之中自有一份深刻与凝重。总体上说，他们的文字，真正称得上如亦曾担任出版社领导工作的同代学人王元化所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

从革命年代以出版服务政治、新时期以出版推动思想启蒙，到市场经济年代思考出版与民生关系，以政治经济学为思想资源的巢峰那一代出版人从来没有放弃其关怀社会、直面现实、心忧天下的追求与担当。与此相比，今天的出版人无疑更为“务实”。在产业、市场、创意、新媒体、经营等业务细节方面，今天的出版人也许早已经超越了前辈。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也许并无巢峰前辈笔下那些今天看起来有些幼稚的失误、迷失可记。但值得反

思的是，为什么我们总说这是一个思想贫乏、“无书可读”的时代？“钱学森之问”重重地拷问着包括出版人在内的整个社会。在出版业发展转型为文化大产业的时代，经济与技术的力量，使出版进步太多；但无可讳言，发展之中，出版业也丧失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比如，多元出版、文化消费主义之中，多了些趣味与娱乐，却少了些风骨与品格；从业者钻进了狭窄的钱眼，而少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高远关怀；技术重塑了出版的面目，但亦稀释了文化内容。从今天看来，对这种畸轻畸重，巢峰那一代出版人往往有着更为辩证的把握、更为沉潜的坚持。说到底，出版家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正是将个人兴趣、职业行为自觉置于国家命运、社会进步的视野中进行思想探索的勇气，提升了革命出版人的思想境界。这，也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编辑与前辈的根本差距。如果说巢峰们的“记失”更在于省思当年曾经无奈经受的政治迷失，那今天出版人应该反思的，更在于文化娱乐、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等时代泡液中可能不自觉滋生的思想平庸。

2014 年 8 月 25 日

张元济、鲁迅、胡适、叶公超、朱光潜、梅汝璈、丁玲、熊式一、王芸生、周扬、韦君宜、储安平、王元化……商务印书馆、大公报社、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人民文学出版社……

通过其人其文，在温情与敬意中体认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风流与精神风骨。

上架建议：文史·知识分子
ISBN 978-7-5568-1415-2
9 787556 814152
定价：36.00 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风流与风骨　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
作者=张国功著
页数=351
SS号=13964280
DX号=
出版日期=2015.12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上辑　学者与文人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
《巨流河》中的好老师朱光潜先生
诗名应共宦名清
世间已无叶公超
吴宓与顾颉刚的身份尊严
梅汝璈：“中国还得争气才行！”
何兆武：那个时代的书生为什么还有幸福感？
胡适·王淦昌·许良英
王元化笔下的胡适之
于光远先生们的“一二·九”情结
季羡林留德日记中的储安平
季羡林：亦真亦假的追忆
李长之的六十九岁
学人乎？文人乎？
夜读鲁迅札记三题
旧时王谢早无家——熊式一们的生命骊歌与文化乡愁
“两个丁玲”的冲突
周扬与丁玲：欲说“左”右好困惑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历史
廖沫沙的打油诗：艰心出涩语　滑稽亦自伟
同人群体·历史温情·常识理性
无刺的马烽与多刺的时代
王得后先生的“乡愁”与隐痛
下辑　报人与出版人
张元济与胡适：有所不为方有所为
书卷之外的张元济
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长沟流月去无声——旧年《大公报》人命运感怀

《大公报》与燕京大学：民间报馆与教会大学的思想关联
自由之身与自由主义的一种底线——漫说几位旧年的知识分子
周海婴与王芝琛回忆父亲：豁显历史的真实
舒新城：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韦君宜的思痛录：编辑的忏悔与价值守护
从萧也牧到吴小武
为他人作嫁衣者的“寿衣”与“小背心”
朱正：序跋文字的风骨
“全集”古难全
著作署名关义利
且以后注改前误
许觉民：更能消几番风雨
曾彦修的良知与施燕平的软弱
巢峰：出版家的思想家底色
封底